# 马克思的事业

##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著

中纪委读书活动推荐阅读
全行业优秀畅销书

若告别了卡尔·马克思，我们将与永无休止的危机相伴
今天的中国再次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得主
继《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后

回归马克思的本源，带你再读马克思

中信出版集团

# 版权信息

书名：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作者：韩毓海

ISBN：978750867122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 序诗

——献给卡尔·马克思

大胡子卡尔·马克思

23岁获得博士学位

官方档案记载说：他是普鲁士史上最年轻的博士

他娶了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为妻

他内弟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是普鲁士内务大臣

而他却选择了离开家乡四处流亡

他一生著述浩瀚

但绝大多数手稿

至今仍没有出版

已经出版的，却基本上没有获得稿费

这位在西欧各地流亡

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

是知识分子中最辛勤的劳动者

也是劳动者中

最博学的知识巨人

他祖宗八代都是犹太教拉比

而他却成为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先知

在布鲁塞尔
他一举揭穿了“资本”这个谜
资本主义就是
“买空卖空、票据投机
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资本的原意
是“头脑”（caput）
资本主义
是个“头足倒置”的体制
所以
资本主义无可救药

这个开天辟地的发现
至今无人超越

在布鲁塞尔
他与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著作
作为流亡者，他使这个欧洲边陲小城永垂史册
但是，布鲁塞尔却把燕妮当作妓女关押
无耻地亵渎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女性

漫天星光

照彻布鲁塞尔寒冷的街道

也照彻了这样的真理

“让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成为兄弟，是不可能的”

像一切剥夺者一样

资产阶级滥用了劳动者的信任

并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

转化为对全世界的欺诈

“到处都是劳动者把信用交给了资本家”

于是，世界一分为二

信用成为欺诈者的特权

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

大胡子卡尔·马克思

无情地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法则踩在脚下

悲怆而自豪地

向着灿烂的星空伸出臂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巴黎公社的原则

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者伟大的自信与团结

公社可能失败

而公社的原则

将会永存

他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在拉雪兹公墓

与公社战士们共存亡

多年之后

他的一个铁杆粉丝选择了顶风冒雪

奔回伏尔加河畔革命的故乡

这位粉丝是乌里扬诺夫家的小弟弟

他的亚历山大哥哥

因为刺杀沙皇被判绞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推翻了自己中学时代恩师的儿子当权的

临时政府

《国际歌》歌声从此响彻全球

狂飙为你从天落

他曾经写信赞美林肯

甚至打算移居美国

但当时的美国人民

却一直看不懂他的著作

直到昨天

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才刚刚发现

他们的美国梦

原来就是

“百分之一剥夺百分之九十九”

美国人

总是觉悟得最迟

在尼采眼里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那么，你就是“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

你为中国写的文章

比为自己的故乡普鲁士写的还要多

你四处传扬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

你预言：离开了中国的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

而一旦中国加入

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就将被撑破

你的话

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二万五千里的长跑

把你的名字镌刻在了

欧亚大陆的中心

长征时代的毛泽东

就像你一样

有着先知的双眸

枯槁的容颜

革命家的腿

历史已经证明

我们最大的愚蠢

就是没有读过《资本论》

却相信了这样的口号：

“告别卡尔·马克思”

历史还将证明

当永别了卡尔·马克思

我们就将与永无休止的危机相伴

卡尔·马克思

“他的英名与工作将数百年持续地存在下去”

而他的思想

将无情地照亮历史

这“满载愚人的船只

向着命运驶去

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

# 序言

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的书？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 ——“究竟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词，但丁对此的著名定义是：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科学。

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牛津、剑桥、博洛尼亚等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但是，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便脱离了劳动，更视“动手”为贱业。

脑与手的分离——这便是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和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可直译为“鲜花盛开的地方”）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艺术家与裱糊匠却没有什么不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但丁等人称为“科学”。

事实上，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而这也正是现代文化与

一切“旧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

现代文化的实质，无非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他们便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这就是E. 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示出的历史事实。

然而，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因为它与旧势力对“文化”的理解如此相悖，以至在某些人看来，正是这种散发着劳动和“动手”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正是这种把“文化”和“下等人”联系起来的努力，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与“书香”味道的文化，亵渎了高尚的、纯粹的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这种崭新理解，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就对“纯文化”“纯精神”“纯文学”构成了挑战。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资产阶级文化不过是基督教文化的变种，它认为“身体”、手和脚是肮脏的，纯洁干净的只有“心灵”和“脑袋”。而让–保罗·萨特在《肮脏的手》中则这样讽刺说：

> 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什么也不干的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个手肘贴着身体，戴着手套。而我的手是肮脏的。我把它们伸到血污和大粪里去，所以它们一直脏到了臂肘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你可以天真无邪地掌权吗？

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代表着脑与手的结合，真正显示着现代文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力量的，正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而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尤为震撼的是：当马克思说到“动手”的时候，他所说的“动手”并不仅是指劳动，还有“革命”和“人民专政”：

>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合集》**）
>
>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摘自《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毫无关系。“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在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中，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

因此，阅读马克思的书，既不会使你感到舒服，更不会使你升官发财，当然，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无关。

伊壁鸠鲁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而古往今来，很多人是

他的信徒，于是，他们读养生、健身、旅游、性爱、游戏、美食和赚钱方面的书，以为这样的书能使他们快乐。但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却调侃说，实验已经证明，快乐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网络的运动，为了追求快乐，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嗑药，而不是读书。某位号称“无知者无畏”的作家曾经说过，不读书我们一样快乐，没准儿会更加快乐——而他很可能是对的。

我想，人们读书，一定是希望解决一些使自己感到苦恼的问题。因此，如果书籍不能给我们带来震惊、带来惊奇般的收获，如果书籍不能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并挑战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知的“常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

一般的读者也许知道马克思出身于快乐、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且有一半荷兰血统，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的姨妈索菲亚和姨夫利奥·菲利普联手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而当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一定会追问：作为一个如此快乐的富二代，马克思为什么会成为为了世界无产阶级而痛心疾首的伟大导师呢？

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快乐”无关，却与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

边沁还说：快乐与快感是动物也有的，但“快乐的猪”与高尚的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实际上，“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17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我所在的“世界一流学科”谋一份教职，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于“知识”和“幸福”的理解，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每当想起马克思的事业，每当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猪的快乐”与“人的幸福”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学课本上的叶挺的《囚歌》，想起那些革命者对于幸福的理解：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只是不知道，像马克思17岁时的那篇作文一样，叶挺的诗篇，是否还幸存在今天的小学课本里。

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在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为他人而工作。

而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阅读马克思的理由有很多，但我以为这两条是最基本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炬，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马克思的学说是如此博大精深，我们阅读并学习马克思，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万事开头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

而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恰恰就是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辩证法？

而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古希腊思想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包括两个部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原子及其运动，形而上学则把世界的本源理解为数以及计算和预测——因此，形而上学也直译为“物理学之外”。

将命运归于数和“定数”，还是归于矛盾、运动与斗争？这既是一个宇宙观的问题，更关乎对于政治的理解，实际上，它也关乎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腊城邦的命运。

所谓辩证法，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它也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也被称为“助产术”，即启发、帮助公民们把自己的话讲出来的方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古希腊城邦公民政治的基础。

但是，在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却被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教条，即在思想上否定、在现实中肯定（现实秩序）的庸人哲学。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它的核心，就是启发、帮助无产阶级——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他们的声音：“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是无产阶级实践力量的“助产术”，它最终

凝结为波澜壮阔的《共产党宣言》。

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这句话的意思是：形而上学是在古希腊城邦政治衰败时（黄昏时刻）崛起的。这意味着，随着古希腊城邦的衰落，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代替了公民政治，也代替了公民政治的基础——辩证法；这也意味着，从那时起，在古希腊城邦，“哲学家”对思想的垄断，代替了生产与战斗着的公民的呼声。

在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古希腊城邦的沦陷，既肇始于哲学家的掌权与兴起、从事战斗与生产的公民的消失，更在于形而上学以数字的计算和逻辑的推演代替了自然哲学关于原子运动的学说。

马克思23岁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其目标与抱负，就是要恢复、发掘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并以此批判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极具开创性的文献，其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原子运动有两种必然性——互相吸引与垂直运动，而这两种运动互相作用的结果，则是原子运动不是直线运动，而是矛盾、对抗造成的“偏斜运动”。

正是以此为起点，马克思接续并发展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发展了自然哲学描述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继承康德“仰望星空”（星云爆炸）的视野，把辩证法由静力学的时代引向热力学的时代，从而把自然哲学锻造为唯物辩证法。

与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世界的逻辑呈现，而在于宇宙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着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只有了解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才能了解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才能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有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才能懂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矛盾是对称、对等的，正如有正即有负，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而在毛泽东那里，矛盾是不对称、不对等、不均衡的，因此，就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有其之间的对立转化。毛泽东曾说：小是大变来的，弱的一方，可以打败和战胜强的一方，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键，就是要善于掌握这种矛盾对立转化的规律和不平衡性。

毛泽东对于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集中体现为他独创性的矛盾学说，而这一学说，则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血的哲学”。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均衡、不对称的思想，也深刻地启发了钱学森、丁肇中、屠呦呦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

人的正确认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马克思率先指出：所谓正确认识，不是对宇宙间“唯一规律”和“必然性”的沉思——那便是宗教的，或曰形而上学认识论，人的正确认识，来自包纳他人的视野，倾听他人的声音——特别是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声音。这种被马克思发展了的苏格拉底辩证法，又被毛泽东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践”。因此，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实践论》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

马克思是极为高深的学者，我们阅读马克思所遭遇的最大困难，便

在于马克思的著作是极为抽象的。

但是，故作高深正是马克思所最为鄙视的，马克思著作的那种高度抽象性，绝不是马克思刻意为之，而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决定的——把握这一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28岁的马克思和26岁的恩格斯，联手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其核心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分析之上。

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是极其抽象的，因为与此前一切生产交换活动都不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物物交换、不是简单的掠夺，甚至不是看得见的剥削——它表现为商品和货币交换，而无论商品（的价值）还是货币，却都是高度抽象的，是我们的肉眼看不懂的。

《资本论》就是从分析商品与货币这种“极其抽象”的东西入手，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方才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谜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性，集中体现为信用体系的支配作用。因此，所谓资本，并不等于“货币”，因为资本无非就是“信用化的货币”，即马克思所说的“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信”，改造为信用体系——这是“致命的一跃”，它意味着：在现代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依靠自有的资金经营企业，没有人是依靠自有的资金买了东西再卖出去，甚至没有人是依靠手头的积蓄消费。因此，资产阶级的生产与交换，甚至不是建立在商品与货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

马克思率先提出了“全球化”的理论。但是，马克思更重要的发现则

是指出：有“世界劳动人民的全球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前者以“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为基础，后者则以少数资本家对于信用体系的垄断为基础。而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来说，其最大的障碍是：当生产与贸易发展到全球规模的时候，国际信用体系却依然垄断在少数资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也是根本的矛盾。

而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少数资本家通过权力垄断信用的制度。

于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的老祖宗这样定义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为全世界劳动者服务的信用体系，而不是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个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

因此，《资本论》所提出的，也并不是简单、浅显的阶级斗争学说，《资本论》所发现的，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抽象性，《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危机的规律。

在世界范围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是通过垄断国际信用与投资来剥削全世界——这就是金融垄断；另一个方面是以武力制造一个有利于国际资本掠夺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其手段是战争。

共产主义是全世界劳动者的事业，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条件谈社会主义，我们更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背景，以及对国际秩序的清醒分析、把握、引导，去抽象地评判某一时期社会事业的功与过、得

与失。

一句话：我们不能离开国家安全空谈国际秩序，更不能离开合理、公平的国际秩序，去讲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离开了这一切，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的历史，也不能正确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1958年，当赫鲁晓夫发表所谓“秘密报告”的时候，他表面上是在否定斯大林，而实际上，则是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赫鲁晓夫的真实用心，实际是希望踩着中国的肩膀与美国讨价还价，即建立一个美苏两霸独占的世界秩序，而这个所谓的世界秩序，则是以包围、孤立中国，并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全世界广大劳动者利益为前提的。

自1960年开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由时任中共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挂帅，中国共产党公开批判苏联共产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并发表了包括《列宁主义万岁》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献。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实现全世界劳动者的全球化，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就必须打破美苏两霸独占的全球化，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而1960年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对世界形势做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方才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新秩序的形成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根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中国成立的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总书记在这里讲的不仅是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是深刻

阐述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共同体视野，那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坚持，没有前30年的斗争所换取的和平，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全世界劳动者的全球化，所谓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更加是不可能的。

而在这前后30年中，曾经主持过对苏“九评”，又开创了改革开放道路的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真正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伟大任务是：“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视野，去审视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党的创新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社会主义是人间正道。要走这条人间正道，就必须改造少数资本家垄断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就必须改造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所制造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以及他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广泛响应。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启了由世界劳动者推动的全球化。1840年以来，正是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不懈奋斗，逆转了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因为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征，也是全人类——全世界劳动者的万里长征。

在波澜壮阔的实践和艰苦卓绝的长征面前，我深知：这本小书还不配做一个注脚。

我真诚地渴望着读者的批评，无论这种批评何等尖锐，只要它是科学的，那么就对马克思的事业有利，就对我们的新的长征有益。

# 上篇
# 批判旧世界

#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 第一章 马克思与卢梭

我们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有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和改造我们所处世界的指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的著作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简单、平常的问题，下述即是一例：

人们辛勤劳动，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织网、蜜蜂在忙碌着建筑蜂巢。那么，人类的劳动与忙碌的蜜蜂、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却并非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康德和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与蜜蜂和蜘蛛不同，人类总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从事劳动，而且，他们还要使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法则与社会价值标准。

因此，人类的劳动与蜘蛛、蜜蜂的活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创造自己的物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而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蜜蜂和蜘蛛只是生产，它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再生产；而人类的劳动，则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

上述这个观点，即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筑蜂巢与人类的劳动加以比较的是康德。他说，蜂巢之所以不能叫作艺术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法则生产出来的，即它不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创造”：

> 尽管人们喜欢把蜜蜂的产品（合规则地建造的蜂巢）称为一个艺术作品，但这样称谓毕竟只是由于与艺术作品的类比；也就是说，一旦想一想蜜蜂并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自己的任何理性思考之上，人们马上就说，这是它们的本性（本能）的一个产品，而它作为艺术则只应归于艺术的创造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支配，即他们是在由“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标准”和“法则”的支配下进行劳动，而这就是织工的劳动与蜘蛛的活动的不同，是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巢的不同：

>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

> 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人们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却根据既定的社会标准，根据既定的社会法则和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劳动做出评价。人们劳动，他们挥汗如雨，不仅仅是为了换取口粮，还为了赢得“社会评价”，并以这种社会评价，来换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分配。只是他们总是忘了问一问：这个“社会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于是，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从而就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法则和价值判断准则呢？马克思以一个著名的断语来概括说：这就是“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下了如下著名的话：

> 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于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取得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成功。……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如果套用马克思的断语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是价值的货币形式，而支配当今世界的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其实就是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

按照商品二重性理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价值体现的是抽象劳动。而马克思之外的经济学只是尽可能地把抽象劳动说得抽象，即“价值实体就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但实际上，所谓“人类抽象劳动”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所谓“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非就是以“英镑”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而在今天，就是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

换句话说，在今天，一切人类劳动都必须转化为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才能够被评价、被表述、被认知。当今人类的劳动成果，必须与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相适应——换取美元并与美国接轨。生产活动必须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相适应，这便是所谓“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当今天的中国感受到“美国标准”的束缚时，也许会自然地领悟马克思的话：“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注

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发现，它以无比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而当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试图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走近马克思了，你也就离《资本论》第一卷不太遥远了，或者说，你就开始按照物质生产—社会再生产原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进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

察中国与世界，而从今往后，你或许会被人“攻击”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中国生产了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钢、一多半的水泥，中国的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电话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发达国家超市里70%的日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2008年，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 940美元，而中上等收入国家为7 878美元，高收入国家为39 345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8 613美元。[注]

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世界工厂”，3. 75亿中国劳工（主要是农民工）作为支撑世界经济的群像，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但是，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和评价，中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穷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约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是以美元汇率来评价的；这就是因为那个作为普世价值、普遍标准的“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外在于挥汗如雨的中国劳动者的荒谬尺度。而在这个外在的、荒谬的价值尺度的支配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注]

实际上，比“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更离谱（违背常识）的“观念”还多着呢。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是当今最具支配性的信用评价机构。它们将华尔街制造的垃圾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却将中国的金融机构、融资信用评为3B级。[注]于是，今天就出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3A级的欧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机，竟然需要信用等级很低的3B级的中国来救助——而前者还拒不承认后者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其实是个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以吓人”的“观念”罢了。但是，由于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西方承认，按照《巴塞尔协议》[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为零，而中国国债的风险则为100％。换句话说就是，那种认为“美国国债是白条、两房债券是垃圾”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因为许多精英人士坚持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的理由，绝非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简单，即他们“不爱国”乃至是外国奸细，而是因为：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标准，中国国债的风险比美国的垃圾债券还高百倍呢！

当今世界所谓资本积累，就是积累美元和美国债券，而不是积累人民币，这种资本积累的形式，决定了我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消费，而是出口来换取美元和积累美国国债。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说过的那些话，包括：“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注]“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注]“物质生产的领域”是怎样被“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支配？实体经济为什么会被虚拟经济支配？这都是因为：既定的社会价值尺度和法则支配着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生产领域，而发达国家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恰恰是通过占领人类社会再生产领域、垄断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方才实现了对于人类劳动的剥夺，完成了对于世界的统治。

因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并不是由市场那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决定或者轻易左右的，而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由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定者们决定的。

但是，某种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说：市场是理性的，消费者是理性的，因为他会“用钞票来投票”，这迫使社会生产那些能够“满足大多数

人需要”的产品，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一般观念。

而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一种学说只是达到了幼儿园的水平而已。就投资而言，当下世界所谓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指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当今世界，只有美元才是“世界货币”。就消费而言，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说的那种“抽象的消费者”也仅仅是一个观念而已，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社会。在现实社会中，消费和消费行为都是分裂的，富人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消费者，但他们的消费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偏好”（虚荣心），即为了通过消费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劳斯莱斯、联排别墅不是社会的真实需求，但它们却反映了现实社会一小撮儿最具消费能力者的“品位”（商品社会中人们表达信仰的特殊方式）和价值尺度，而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实质。

马克思说，商品并非简单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也并非劳动和劳动者赋予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者即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造者们赋予的。所谓商品的“二重性”是指：一方面，商品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劳动的产物，它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商品又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表现为植入人们头脑中的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是人们头脑和精神的产物，是现代人的价值依托，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

作为价值，作为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商品中并没有凝结着什么“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中所凝结着的，乃是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是指资本的支配地位。[注]由于资本积累法则统治着社会、分裂着社会，并与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消费永远不可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它只能扭曲社会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种扭曲（异化）了的社会关系。

简单地提倡“消费”，并不能改变美国资本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今天，中国是全球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有三亿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热爱者，他们消费名牌，其实就是真正地在彰显“西方普世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来昭示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他们消费的只是观念。他们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圣物，名牌商品是他们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上的护身符。可惜，这些“虔诚的商品拜物教教徒们”恰好都比较有钱、有消费能力，这三亿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费支出占全国人民消费总支出的50％以上，即在每年超过13万亿元的消费品零售中占了7万亿元。如果他们中30%的消费是购买了国际名牌和服务，其中一多半的钱用于买了“牌子”，那么就有1.5万亿元在无形中被拿走了。而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国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约有1万亿元。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每年会向西方“虚拟经济”“普世价值”贡献2.5万亿元。[注]更不要说“成功人士”投资移民、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留学了，如果这两项再加起来，那么中国每年起码会再向发达国家贡献7 000亿元。[注]

中国是西方教育（主要是美国教育）的主要消费国。

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先进——这几乎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基本上是虚假的。美国教育充满了种族歧视与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人文盲人口达2　3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10）。与中国不同，美国没有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规划。1979年卡特执政时，联邦教育部方才从卫生教育福利部中独立出来，只是在奥巴马时代，美国方才制定了全国性的课程标准——“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

美国是通过购买人才的方式来弥补其教育和人才培养上的失败的。美国大规模地为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工程技术专业本科生）提供奖学金，不是因为美国的钱多得花不了，这恰恰证明了美国教育的失败和中国人才培养上的成功。

如果使中国教育与美国接轨，只能使中国教育变得不公平、不公正。当前中国的“学区”制度和由此而带来的“学区房”问题，就是盲目学习美国的结果。

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积累美国资本，那么，就不能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劳动者。“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注]如果没有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凭借今天流行的那种与美国接轨的经济学，我们恐怕永远都不能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中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上，但实际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对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主要制造国中国与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它雄辩地印证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真理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社会阶段一样，由生产领域和社会—文化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法则。这正像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产物，受商品的价值法则支配，而后者和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取决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制定的抽象法则。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是现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改造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2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首次对“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表达了深刻的不满：

> 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中方赞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提高其应对危机和紧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职责。我们应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使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使用并改善其货币篮子组成，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注]

这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当代世界局势做出的有力回应。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改造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改变国际资本积累和全球消费形式，是一场艰苦、漫长而残酷的新形式的斗争，要进行这种有着新的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工匠、工程师、无产者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

马克思是大知识分子，是无比杰出、深邃的学者，但是，人们却把他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以批判“旧世界”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为工作目标的马克思，很难说崇拜过什么，如果有的话，那么，他毕生崇拜的就是无产阶级。

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如此伟大的学者毕生竟然以无产阶级为服务对象，这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如果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经错乱”。

我们首先要知道：马克思毕生讴歌并为之战斗的无产阶级，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与现代欧洲文明一起产生的，它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既是劳动者，但更是知识者——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相统一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找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了。曾几何时，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同时，无产阶级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被资产阶级盗取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两手空空地走向了阴暗的物质领域。

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以“行会”为依托的工匠阶级，而正是工匠们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他们开创和引导的“自然的知识”大潮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内核与动力；也正是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会财富而创造

的那些发明，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大革命，并最终推动了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现代工业革命。

欧洲科学技术史表明：自16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劳动者，就是欧洲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他们引导了文艺复兴、开辟了启蒙的自然知识领域，最终，正是他们的后继者——产业无产阶级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16世纪以来直到工业革命的爆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工匠和产业无产阶级一直就是欧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阶级。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与知识非但没有分离，而且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只有思辨体现为行动，只有头脑被手的试验、劳作所证实，如此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动力，是欧洲“新文明”的实质。这种“新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唯物主义，它最终的代表者当然就是无产阶级。

在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E. P.汤普森指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就起源于工匠，他们最初的斗争，恰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手艺和技艺，以免沦为无产阶级。工匠的“手艺”是这样一种知识：它表现为手与脑、知识与劳动的结合。而这种维护“手艺”的努力在资本的打击下失败之后，他们又以工匠组织的方式与资本进行政治对抗，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

汤普森说：

> 这也许是英国所具有的最突出的大众文化。它包含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金属、木材、纺织和制陶工人，如果没有他们从上辈承传下来的“秘技”以及利用原始工具进行发明创造的高超技能，工业革命的创举几乎不可能超出纸上谈兵的范围。从这种工匠和自修者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要说这种文化是后进的或保守的倒也容易。工匠和外作工的伟大运动持续了30多年，它的目标确实是为了避免自

已沦为无产阶级。

当他们知道这一事业失败之后，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力求实现新的想象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曾受到镇压，而且在自己的群体中也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然而，反革命所力图要镇压的东西反而在准合法的地下组织中变得更坚定了。只要统治者的压迫一放松，人们就会从小工场或织工居住的小村庄里走出来并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被告知没有权利，但他们知道他们是生而自由。骑兵纵马冲击他们的集会，他们获得了公众集会的权利。小册子作者被监禁，他们就在监狱里编辑小册子。工会成员被送进监狱，一路上有乐队和手持工会旗帜的队伍相陪伴。注

马克思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首先是欧洲现代新文明的产物。在马克思之前，欧洲的工匠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在产业无产阶级产生前，已经存在工匠的联合、工匠的组织，已经存在工匠的代言人。因此，只有将马克思放置到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

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们现在就必须从启发了马克思的欧洲思想“先驱们”说起，而这些“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中最为重要的，首推卢梭。

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是卢梭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乃是与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卢梭目睹了城乡分化背后农民与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里巧夺天工的工匠与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之间的分化。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认为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本质上与神学家们一样，都不过是些靠煽动迷信，调动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从而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种可疑的社会价值标准的“骗子”，他们与辛勤劳作的农民和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不同，正是这些“形而上学者”败

坏了欧洲文明，也败坏了人类的“理解力”；一旦将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人类理解力”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让–雅克·卢梭（1712—1778），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了解卢梭的家世，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卢梭的家世很不幸，他的母亲苏珊娜因生育卢梭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自然是对这个孩子又爱又恨，因为他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是汤普森所说的“自修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是最大的钟表匠：

>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7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佗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琅琅读书。注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琅琅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

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佗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自修生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意耳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这一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父亲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并不是卢梭的父亲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复兴”的知识，是被阿拉伯人发掘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和修辞学。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些古典知识被东罗马遗民带到南欧，这些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理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下等人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注)

对现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绝对影响的就是手艺，是手艺人的知识，而不是人文知识。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石匠的行会组织（多名美国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被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鄙

视：

> “技”艺和“文”艺的社会对立，脑体的对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智慧活动和职业活动。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中意于对古代医书评头品足；而需要动手术和做解剖的外科医生则与理发师为伍，社会地位与助产士相差无几。文人学者与艺术家（指艺术性的技师——引者注）相比，人们更仰慕前者。14世纪，艺术家还没同刷墙工和石匠区分开来。㊟

实际上，推动了包括哥伦布航海在内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人们，就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眼里是“下等人”：“在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下的是手工艺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铸造工和矿工。他们在技术进步和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和枪支；建造起造纸厂、钢丝厂和模具厂；他们创造了鼓风炉，并于16世纪把机器用于采矿业。他们冲破行会传统的限制，受到经济竞争下产生的发明的鼓舞。无疑，正是他们成为经验观察、试验操作和因果关系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还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工匠也分高级工匠、艺术工匠和一般的手工业者。高级工匠，正如卢梭的父亲一样，正是一群热爱读书和善于学习的“文化人”——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藩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阅读塔西佗和莫里哀的著作，通过了解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讨论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但他们的创造精神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所以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有学者所达不到的地方，尽管他们不能将这些实践知识

理论化、体系化，但他们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先驱。正如齐塞尔所说，虽然“不能把这些高级工匠叫作科学家，他们是最贴近科学的先辈。他们理所当然成不了当时世人眼中可敬的学者。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智力的系统训练与实验观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层有学问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留给了底层平民劳动者”[注]。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于北欧的新教伦理，但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无论是美第奇家族还是威尼斯商人都兴起于南欧天主教地区。而现代科学思想则诞生于北欧的工匠文化。

“工匠”与“学者”之间彼此隔绝的局面，在16世纪终于得以改变。这首先就是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宗教迫害”运动，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工匠们的力量在这些地区空前壮大，工匠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工匠们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单独的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

卢梭生来就是“公民”，这是喜好读书钻研的父亲的另外一个遗产，于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注]的封面上郑重其事地印上：“日内瓦的一位公民作”。

卢梭学说的重大贡献，是使工匠阶层由中世纪的纯粹经济阶层，上升为政治阶层——使工匠由平民上升为“公民”。实际上，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人民”，以及马克思所指称的“无产阶级”，都是受到了卢梭“公民”概念的启发。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发明了“人民”这个概念，他按照主权、人民、法律和共和国之间的相关性，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

>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作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作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整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注)

无论公意、法律、主权还是共和国，它们的基石都是“人民”。我们要记住的是：法语中的“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词，它指的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劳动阶级”，是有文化、有手艺的劳动者。而卢梭所谓“人民”的基础，其实就是工匠阶级。

“人民”和共和国作为政治主体，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这种政治运动，就是反宗教迫害运动。

要知道什么叫作日内瓦公民，首先要了解日内瓦共和国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要了解16世纪以来欧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国意图推广天主教，开始大规模迫害异教徒，这里的异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杀。菲利普二世以来，西班牙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针对荷兰、英国的战争，都是这种追杀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天主教和新教。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流放和追杀，大部分新教徒工匠跑到荷兰、英国、德意志，还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内瓦。不过，西班牙帝国蓄意的迫害运动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鞭子”，它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导致了欧洲的工匠师傅由原本经

济发达、贸易集中的南欧向当时相对闭塞的英格兰、北欧流散，这种工匠的“大流动”造成了手工业行会的大聚集，它最终为经由行会向工厂生产的大转变，即我们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条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国人不愿做法国人，特别是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业和私人银行业著称于世，但是，制表业却并不是在瑞士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导致了大批追随加尔文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这才带来了制造钟表的技术。至于私人银行业，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财产从南欧和法国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带兵出征的欧洲贵族将其财产和掠夺来的财物交给代理人经营，由此产生私人银行业务的萌芽。这个萌芽，随着欧洲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战争的扩大，随着国王们为了扩大战争而日益增加的筹款需要，而日益庞大起来。[注]

卢梭出生时（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

日内瓦作为“行会工匠的逃难之乡”，作为“流亡者的避难所”，相较荷兰这种处于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兰那个孤岛而言，自然条件还算是好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

——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起初是为日内瓦所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会”制度。《社会契约论》日后成为美国《独立（大会）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ongress*，即我们常说的《独立宣言》）的蓝本。而与后来的美国社会一样，日内瓦移民社会的前提是：作为有手艺的劳动者，共同体成员没有什么先天社会背景，即“起点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平等，而社会分工是按照手艺来确认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完成稿）中曾盛赞北美的移民社会，认为移民社会有利于摆脱旧世界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全新的交往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启示。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注]也是为了在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组织[注]而作。

欧洲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传入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散播到欧洲。而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则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业又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的知识，这一切都促成了知识与劳动的结合，人口的有组织流动促进了这种结合，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

>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

> 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注]

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工匠的联合和工匠组织的发展，汤普森说："一般认为，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的第一条，这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先声。

1792年1月，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在埃克塞特大街"钟声酒吧"召开，9名工匠参加了会议并分别交纳了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鞋匠托马斯·哈迪当选司库和书记，他将用这些钱购买信纸，以便联络英国志趣相同的工匠。通讯会的宗旨是：参加议会选举、交流劳动知识。

伦敦通讯会这样的组织促使了与劳动有关的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而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却一方面是人文学者为宫廷提供知识，另一方面工匠们的技术发明远远地把人文学者们甩在了后面，现实中仍是手脑分离的状况，经院哲学和神学传授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6世纪，这种分离的状况才终于随着欧洲封闭状态的打破而改变。从那时起，首先是统治者们开始更加关心"海外的财富"；关心那些能够使他们在彼此争战中掌握先机的武器制造技术；关心那些能为他们筹措战争和航海经费的货币操纵者。于是，从战争国债筹措者中产生了资产阶级，从海外贸易中产生了大贸易商，而从

工匠中则产生了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在1550年前后，欧洲的人文学者们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关注起手工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了——工匠与人文学者的结合开始了，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后来所谓的“科学家”产生了：

> 到155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技术在经济上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编写的拉丁文和本国语的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发现、航海和制图、采矿和冶金、勘测、机械加工以及炮术。最终存在于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社会界限消失了，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们采纳。真正的科学终于诞生。大约1600年左右，这项工作由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注]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来完成。[注]
>
> 总之，16世纪末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动的不同层面中，上层贡献了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趣；下层贡献的是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注]

尽管在那个时期，工匠们的发明还停留在行会内部，还是一种“特权”，即还没有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战争、财富竞争还是海外贸易，都已经离不开技术发明，而技术发明则来自底层工匠和技师们的生产劳动实践。

卢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作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与自尊、他的特立独行和愤世嫉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上升时期的工匠阶级精神的表现——它传达的正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骄傲。

真正大规模的变革是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注]一方面是在“外部”，

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和经济竞争要求适应新的经济情势的、能够尽快投入使用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亦要求军事技术的现代革新。于是，在大学与行会、人文学者与工匠的结合中产生的科学，就这样开始被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之中。于是，行会作坊扩大为现代大工厂，工匠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概括了从行会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

>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
>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注]

加州学派的戈德斯通认为，欧洲的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完成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发动机驱动实验科学到发动机驱动工业”[注]。而这里的关键是，当年的工匠阶级把生产技术带进了大学，并在那里与学院的知识相结合而诞生了科学，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把科学运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

> （在18世纪——引者注）手艺工人、商人、仪表技师和上流人

> 士（甚至神职人员）都开展了自己的实验工作并且小心、有条理地进行观测，以期能够获得自己的新发现和有用的先进知识，这种协作与关于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尽管罗伯特·波义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学会仪器馆馆长的丹尼斯·帕潘最早进行了活塞式蒸汽机的设计，但他未能成功制造出一个可操作的样本（不过他发明了另一种实用的产品——高压锅）。倒是一个手艺工人托马斯·纽科门制造出了实用的部件，并发明了一套复杂的蒸汽进出的阀门系统，这才使得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成为可能。
>
> 毫无疑问，纽科门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和全国各地的公开讲演中，获悉了大气压力发动机的改进问题并了解了大气压力和压缩蒸汽产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采矿业经历和作为手艺工人的技术才使得他有可能制造出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来。
>
>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数十年以后，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鉴了约瑟夫·布莱克和其他人关于潜热的科学思想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能量效率思想，并以这些科学思想为指导制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机。瓦特可以自由地从手工艺匠人、仪器制造者和煤矿工程师（他们需要并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机）的世界，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的世界，以及像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他生产和销售蒸汽机的合伙人）这样的企业家们的世界之中。[注]正是各阶层人士的混合和流动，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机械技巧和了解市场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他们都热切地追随实验探索的过程以寻求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艺——从而使得蒸汽机的发明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注]

这就是说：采矿工人发明了蒸汽机，仪表匠改良了它，而皇家学会仪器馆馆长只是发明了高压锅。

工业革命，是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结果，而一开始促使科学技术发展的，却是无产阶级力图克服和解决生产活动中遭遇的难题与困境的智慧性努力，这些难题与困境包括：如何节约劳动时

间；如何减轻劳动强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不过，推动工业革命并使其发生转变的还有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欧洲的资产阶级最初是作为国债的筹措者、作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投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当资产阶级发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转而投资工业；当他们发现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马上以资本投资的方式，想方设法把科学技术垄断在自己手里。

卢梭的故乡瑞士是与意大利、荷兰并肩的欧洲私人银行业的摇篮，瑞士对于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社会契约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支配当今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尔协议》——这一体现当代资本主义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则。

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一贯看不起人文学者，这甚至波及启蒙学者，卢梭曾说，启蒙运动不过是以百科全书代替了《圣经》，不过是以学者来冒充教士罢了，因此，启蒙运动本身也需要启蒙。而那个时候，卢梭之所以还没有抨击银行家，是因为银行家的势力还没有压倒作威作福的贵族和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

后来的马克思则这样说，资本家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注]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和金钱的力量，认识到"钱能通神"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确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钱，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权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家就能控制生产；而只要有钱，同样可以买到并垄断科学技术。

资本与劳动为争夺知识和发明而斗争——这是18世纪一个极为重要

的政治主题。

金钱是资产阶级胜出的关键。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流入绅士阶层和商人手中，而国王的资金主要依赖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众议院。在投资方面，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1696年大规模重铸货币，这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和公债市场的形成。而在科学知识方面，英国于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尽管该学会是“独立”社团（实际上是由财团出资），不对政府负责，但它的股东是银行家，英国政府也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初期时学会有100多名会员，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是格雷欣学院，它是由当时的银行家和皇家的财政代理托马斯·格雷欣在1579年资助成立的，也就是说，该学会是以公司的形式运作的，它的真正股东是大金融资本家。这个组织“以每天讲授不同专题的形式向外界公开提供高等教育。该学院特别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实用研究。在17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它已经成为实验科学新成果的研讨中心”[注]。

毫无疑问，英国皇家学会在成立的初期，确实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注]，因为该学会的会员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普通人，它没有规定一个入会的门槛。

在欧洲大陆，专业化科研机构的成立，一开始便是国家和大金融资本家主导的自觉行为。1699年，法国在王室的赞助下成立了法国科学院，并在1794年成立了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而被哈耶克认定是“唯科学主义”发源地之一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德国、美国在18—19世纪也成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资本与知识的结合是划时代的现象，它导致了一个新阶级的出现——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凭借着与这个阶级的联合，资本家阶级得以

战胜工匠阶级，并使得工匠阶级一举沦为现代无产阶级。

由银行家和国家资助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后，它便迅速取代了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从事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工人自发组织，一个独立于生产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由此产生，并迅速地代替了技术工人从事发明工作。前者因为在充沛的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发明，从而有着后者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工人阶级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

更为关键的是，对科学技术进行资助和垄断，以使得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劳动相脱离，这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剥夺工人的有意识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战略”，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资产阶级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一项发明可以代替许多工人的劳动，而被资本家垄断的技术发明不再帮助工人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并给技术工人带来好处和收益。恰恰相反，它现在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发明与工人对立起来了，被资本家雇用的工程师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了，工人被迫与新发明竞争。这样一来，包括先进机器、仪器在内的新技术的发明，就不再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创造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负担、制造社会贫困的手段。

马克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 ……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

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注]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注]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这不仅是为了贬低手艺、打击并消灭有文化的劳动者。当发明成为职业，当技术成为神秘的并为专家所垄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就表现为知识与劳动的分离，表现为工人与工程师的对立。而随着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管理科学”，知识就分化为“管理者的知识”与“劳动者的知识”，社会就分化为“有知识的管理者”与“无知的劳动者”——现代社会的等级制，正是建立在知识的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完全就是为了抵制工人的罢工及提高工资的要求，只要有了新机器和新发明作为工人劳动的替代，就可以抵消工人罢工的力量，因此，所有那些机器和技术创新“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注]——“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注]。而资本家对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利用，必然使其求助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从而使科学成为致富的手段并促使搞科学的人互相竞争，这便使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也成为资本家的同伙，而同工人和劳动相对立。

资产阶级的胜利在于：它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各阶级以及社会各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

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注

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不仅仅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却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正是通过“占有科学”，资本家使得工人被异化为机器，使他们的劳动与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变得“一无所有”：

>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注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家占有、吞并和盗取的关键时刻。从长时段的欧洲历史来看，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传统走向分裂解体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劳动被“异化”和片面化的时代，是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的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开始走向对立的时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资产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无产阶级则两手空空，被驱逐进阴暗的物质生产领域。从那个时代开始，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和劳动者分离了，包括蒸汽机在内的无产阶级曾经拥有的一切辉煌的发明，都反过来成为剥夺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的能工巧匠消失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历史上遁去了，无产阶级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宝贵遗产，以唯物主义为标志的新文明传统——思辨体现为行动、头脑被手的试验所证实这个创造性劳动的伟大传统，已经开始失落了。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哲学战胜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时代，但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的基本情况则是：资产阶级以其形而上学战胜了朴素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挫折，乃是与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失败；是与他们的科学文化创造成果被盗取密切联系着的；是与资产阶级全面占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以那个领域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着的；是与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立联系着的。它势必表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生产者与社会法则制定者的对抗，而这就是现代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心壮志是：再造一个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即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听任无产阶级沦为物质劳动的工具。

“马克思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马克思这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这样，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 资产阶级与形而上学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

在很多人看来，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无产阶级则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持这种看法的人，要么是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彻底洗脑，要么就是对真实的欧洲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杰出知识分子，会把资产阶级看作最没文化的阶级，会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为落后文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变种，视为一种现代迷信。

正像占有和盗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占有和盗取了“别人的科学”。如果说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继承和发扬的就是欧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学文化，即使那些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神学和迷信换成了“形而上学”这种貌似新颖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质上，神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本质。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希腊哲学分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自然哲学，它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原子；另一个是形而上学（直译为“物理学之外”），它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把世界数量化”，马克思后来说，把“价值”数量化，进而货币化，这就是资本化。所以，他方才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

正如上帝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样，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信用”，而这就是信贷制度——投资放债制度的基础。资本也并不是财富，恰恰相反，资本要消灭一切现实世界里的财富，为的就是将其转变为投资——“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资本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转化为投资，即把“对财富的许诺”，转化为“有待实现的财富”，就此而言，资本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而对于投资或者投机失败，即“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许诺”会在现实中落空这个残酷的问题，资本投资家的回答倒是极其简单而且天真有趣：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的投机——“相信上帝与你同在”。而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实质是“理性化”，所谓理性化，是指

社会的运行与合法性，是建立在计算和严密的推理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则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这其实都是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活动自行增殖这个简单的神话的基础上。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活动建立在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这个想象的基础上，所以“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就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而所谓“一切经济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这句十分简单的话，却深刻地点明了问题要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现代迷信。而这里的“信心”，就是对资本永恒积累的信心。

理性信仰，是现代社会的信仰，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建立在“信用”这个“想象的沙滩”之上，而并非建立在真实世界里的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并非建立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清醒评估的基础上。现代唯物主义的使命不过是把信仰归于想象，而把观察和试验归于科学——最早提出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英国一位由于被控贪污受贿而赋闲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这位大法官于王阳明（1472—1529）去世30余年后出生，于明朝灭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岁的时候因在严寒中做实验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实力走势的大转变——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依赖“想象力”，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知识就是如此。实际上，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想象无非是人们头脑中概念与范畴的推演。另外一种知识依赖“理解力”。所谓理解力，来自对于现实事物的观察、试验和归纳，它不能依赖头脑的“冒测”，不能依赖“概念”，而是依赖现实中手的劳作、眼睛的观察，只有当头脑被手的劳作所证实，当事实纠正了“人心的冒测”时，真正的知识才能形成。这种真正的知识，就是批判。

培根指出，神学和经院哲学长于语言论辩，这是因为：语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上的结构，而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

转变，依赖的只能是想象力。培根所谓想象力，与“形象思维”无关，相反，它是指抽象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树，但是“树”这个概念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树”这个概念，我们只能依赖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图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解释现实，这本身就是虚妄。

因此，培根对于经院哲学的批判不是与之辩论，而是指出想象力与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们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事物，与在现实中通过试验和观察理解一个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人心的冒测”，是“独断论”；他把自己确立的新的认识方式称为“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前者仅仅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已，并不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注]培根表示，对于“真理”，应该求助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必须杜绝那些无谓的“党争”[注]，而经院哲学和神学一样，无非是靠动员人的联想和想象去制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化的：

>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象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注]

在培根看来，文艺复兴也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人文学者身上还带着教士的影子，他们争来争去，争的无非还是些抽象的概念：

> 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

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注]；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注]

为什么神学和经院哲学有碍于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这就是因为它们把知识活动束缚在人的头脑之中，它们依赖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联想和幻想，它们限制着人类的观察能力，而对经验的鄙视则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注]

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和抽象的辩论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

的。㊟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

在培根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就是卢梭。培根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批判对象，卢梭则以人文学者和启蒙主义为批判对象。卢梭尖锐地揭示出启蒙思想中的幻想和神学因素，当然，也就是因为这种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卢梭把同时代的启蒙学者全都得罪了。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在欧洲，虽说上帝的权威被动摇了，但这不过是以无形的法则和观念代替了有形的神，不过是将神学的统治转变为形而上学的统治，而迷信则是依旧。

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这篇文章来阐述卢梭的观点。

鲁迅曾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卢梭10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斗殴伤人而“跑路”了，他从此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饭吃，怎么办？只好去学手艺，日内瓦城里的各种手艺他几乎试了个遍，而工匠师傅们对他的评价则基本相同：这个孩子蠢得活像一头驴。

卢梭其实一点儿也不蠢，像一切天才那样，他这朵奇葩只不过是开花比较晚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学的那些手艺，后来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特别是抄乐谱。卢梭一辈子全靠抄乐谱为生，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当卢梭成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明星之后，还是靠抄乐谱混饭吃，多少达官贵人、名媛淑女，就是为了一睹大思想家卢梭的风采，特意跑去请他抄乐谱。卢梭秉承了工匠世家的职业伦理，保质保量，一丝不苟。到了晚年，卢梭抄乐谱的手工费非常高，当然，他抄的乐谱也极其精美。卢梭一生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但是，当伟大天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大家却对他没有耐心，而卢梭本人更是对学手艺这件事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被逼无奈，给自己想了一条出路——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地方不仅给钱还管饭，那就是天主教圣灵收容院。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加尔文教徒），如果想加入天主教，就有一个“灵魂培训班”等着他，去上这个“思想学习班”，到那儿反省，就会得到钱。为了吃饭，卢梭就这样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不得不把“灵魂”给出卖了。

于是卢梭这个苦命的孩子流浪到了南欧，进了撒丁王国的都灵圣灵收容院，出卖自己的灵魂，改奉天主教。卢梭在那里洗心革面了三个月，但却大失所望地出来了，因为从反省班出来之后还是没有工作——从“天国”里出来，还是没饭吃。出了“天国”的门，卢梭只好又回到了“人间”，他不得不去法国一个专门“改造灵魂”的人那儿当助手。卢梭原本以为这个人是个老太太，但是去了一看，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美少妇，这个美少妇就是华伦夫人。

那个时候，卢梭16岁，华伦夫人28岁，对无家可归的卢梭来说，华伦夫人的家就成了他的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和华伦夫人一起住在法国的乡间。在那里，他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研究者（在大自然中旅行并收集标本，这是卢梭一生的最爱）；在那里，他目睹了法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的急遽分化，从而开始深入思考“人类不平等”的问题；在那里，他远离了欧洲城市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和无聊论辩，远离了那些“无用的知识”，从而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与劳动和手艺相比，一切

以“人类灵魂”为说辞的营生都近乎欺骗。

奇葩总是很晚开花，卢梭成名其实也很晚，卢梭出名是由于他的一篇征文习作。1749年夏天，年近40岁的卢梭依然在法国的城乡间游荡，默默无闻，而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属于当时欧洲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勃艮第公国）的1749年年度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他参加了征文，这篇文章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所谓机遇出自偶然，卢梭有个好朋友名叫狄德罗（马克思在《自白》中曾经说，他毕生最喜爱的散文家就是狄德罗[注]），而当时的狄德罗正在编纂一本百科全书，他拉卢梭入伙，请他编写关于音乐的词条。百科全书的全名是《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这与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类似。

1749年，狄德罗因为编写《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触怒了教会，被判短期坐牢，编纂启蒙百科全书的事也只能停了下来。而狄德罗入狱后，卢梭坚持每天都去探监。那时的卢梭特别穷，没钱坐车，每次都是走着去的。这天，卢梭手里拿着《法兰西信使报》边走边看，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征文题目。据说看到征文题目的时候，卢梭就像触了电一样，感到天旋地转，7岁时读过的那些罗马经典：塔西佗、西塞罗……这些人的教诲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他一路上念念有词，文章如同乐章一样从心中流出，首先便把他自己感动了。卢梭就这样一路流着泪去了狄德罗那里，而铁窗里的狄德罗听了他的阐述后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二人隔着铁窗彼此讨论，于是，一篇震撼欧洲思想界的伟大文献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卢梭在这篇成名作中究竟发现了什么真理呢？

卢梭发现了政治衰败的根源，就在于知识活动与战斗和劳动的分

离，而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堕落的根源正是科学和艺术日益与生产劳动的实践相分离。没有观察和实践能力的学者、缺乏对现实的理解能力的统治者，只是依靠幻想和想象（用今天的话就是靠“拍脑袋”），来支配现实，这样一来，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域非但不被重视，而且还要受幻想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支配，于是，人类文明就在“独断”与“幻觉”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卢梭作品的一贯风格，那就是如同交响乐章一般的结构。卢梭是个音乐家，他的写作风格是音乐式的、宣言式的，而这种宣言式文体、这种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风格，在马克思那里被发挥到了极致，《共产党宣言》便是如此——从一个“幽灵”的出场开始，随之转向辽阔恢宏的世界场景：新大陆的发现、运河的开拓、火车的奔驰；然后再伴着隆隆的机车轮声，转回到欧洲大工业时代的工厂——通红的火炉、轰鸣的机器、挥汗如雨的工人、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

卢梭的文章中也贯穿了这种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大开大阖、由许多小和弦反复推向主题和高潮的结构。

全文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卢梭便以史诗般的风格分别考察了历史上三个伟大文明的兴盛与衰落：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当时的中华帝国还处于繁盛期，故卢梭只是预言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同时指出了造成伟大文明衰落的共同原因：对于虚幻之物的追求，毁坏了伟大文明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希腊政治的失败，就在于希腊以形而上学代替了政治，造成了知识与劳动和战斗的分离，造成了哲学家与公民的对立。也正是有鉴于此，卢梭对于希腊文明的评价是很低的，希腊人善于言辞辩论，但是，正是这些无聊的辩论，瓦解了希腊人的团结，使这些言辞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在外敌攻击下沦为奴隶：

> 希腊的学术虽越来越昌明，人民虽那么的快乐，但他们始终是奴隶。闹了几次革命，但闹来闹去，只不过是换了主人。德谟斯梯尼的辩才从来就没有使任何一个被奢侈和艺术弄得精神萎靡的希腊人重新振作起来。(注)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卢梭对文艺复兴的评价则更差，卢梭认为：与其说文艺复兴是罗马文明的“复兴”，还不如说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文明的核心——公民政治道德、劳动工作伦理的无情摧毁，文艺复兴以一种可疑的“文艺生活”代替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和劳动生活，以一帮“文艺小青年”代替了刚健尚武的罗马武士和勤劳勇敢的劳动者，与其说它标志着希腊文明的新生，不如说它标志着欧洲文明的堕落。

卢梭说：

> 使文艺在我们这一地区复苏的，是那些愚昧的伊斯兰教徒，是那些肆意摧残文艺的暴徒。君士坦丁的宝座的倒塌，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法国也从这一堆珍贵的遗物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时隔不久，科学便接踵而来；出现了写作的艺术之后，又出现了思想的艺术。这种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现象，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但却是很自然的。人们开始感到与缪斯交往的巨大好处：用一些值得人们互相赞赏的作品，促使人们彼此争相取悦，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富于社会性。(注)

在卢梭看来，如果哲学脱离政治、哲学家脱离公民，那么欧洲从伊斯兰文明中引入的数学、天文学，便与从希腊的废墟中复活了的艺术一样，都将在欧洲肌体里产生一种致命的“副作用”，即它们固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但却有一项极大的坏处，就是如果人们一味沉溺于此，它们便会瓦解，为了国家和共同体，不惜牺牲生命的政治意志与埋头苦干的工作伦理——以至于对人们来说，只要能“过好日子”，能够享受生

活，当奴隶也无所谓。

卢梭还说，哲学的兴起造成了希腊公民政治的衰落，它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由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这其实是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着的事，是文明演进中的普遍规律——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被腐败文化瓦解，它的崩溃和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果以今天的“常识”看去，卢梭对于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进行如此尖锐的批判，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把他的意见简单地视为“反对科学和艺术的传播”，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卢梭这里所指斥的“科学”，是与劳动和生产技术相脱离的夸夸其谈，他批判的哲学，是形而上学。

实际上，卢梭深刻揭示了：如果人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与政治和生产劳动无关的事业（包括“科学与艺术”）上去，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统治，就很容易沦为奴隶而不自知。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并总结了欧洲各帝国、各王国兴衰的历史，提出了支配人类历史运动的“黄金周期律”：那些奢侈腐败的文明，一定会被艰苦奋斗的文明所击溃，而这就是因为，前者拥有的是金钱，丧失的却是劳动和战斗意志，金钱不过是想象的财富，而劳动产品才是真实的财富。

卢梭滔滔雄辩地指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共和国，一个非常富有，一个很贫穷，结果却是后者打败了前者。罗马帝国把世界上的财富搜刮一空，结果却被不知道“财富”二字为何物的“野蛮人”所消灭，这就是因为罗马人对于法权和财富的变态性追求。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英格兰人，靠的不是别的法宝，而是靠他们的“勇猛与赤贫”。勃艮第乃是欧洲最富裕文明的公国，但它却被“最大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得到几张羊皮”的瑞士人所击溃（想必他提到的这个例子，一定极

大地震动了第戎科学院的评委们）。西班牙帝国无比富裕，它还拥有整个美洲，但是西班牙帝国却被“一小撮儿捕鲱鱼的”荷兰渔夫打得落花流水。卢梭说，这些事实无不揭示了一个兴亡之辨的真理，那就是：

> 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和公民。(注)

卢梭深刻地认识到：罗马人所谓“美德”就是“武德”，而今这种价值观不是被取消了，而是被理性化、中立化了，一旦价值被数量化，它就会被货币化，对于美德的信仰，就会被对金钱的膜拜所替代——这一论断，通向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

要进一步了解卢梭对科学的态度，就必须将之放到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语境中考察。18世纪的法国尽管还不是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也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国像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为了战争和汲取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实行所谓的重商主义政策，即把贵金属货币看作唯一的财富源泉，因此格外重视金银的积累，同时集国家之力发展工商业，积极增加出口、限制进口，因为重商主义者相信，只有贸易的顺差才能完成贵金属的积累。

重商主义的后果是明显的：首先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第三等级中的中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政治权利，他们在思想上开展了启蒙运动，并最终联合起来发动了法国大革命；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了惊人的贫困和道德的堕落；最后，重商主义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所谓“农业革命”）导致了农村的衰败、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的凋敝，“三农问题”严重破坏了法国这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国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

因此，卢梭对科学的批判、否定，首先就联系着他对重商主义发展

方式所导致的后果的批判。卢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使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一旦资产阶级垄断了科学与艺术，那么科学和艺术就只有一个目的，这便是赚钱。为了赚钱，科学家便可以造假药害人、造武器杀人而毫无愧色；为了赚钱，艺术家也可以鼓动迷信，麻醉人民而心安理得。科学与艺术本来面向的是自然和人，但现在“自然秩序”和人全被败坏了，“自然状态”变成了只有金钱利益关系的“人为状态”。当然，这不是科学与艺术的罪过，而是科学与艺术“资本化运用”的必然恶果。卢梭对金钱社会之于科学与艺术的戕害的揭露，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卢梭对200多年前法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描述，就如同描述今日之世界一样，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 如果你仔细地想一想使人们心力交瘁的精神痛苦，使人们精疲力竭的情欲；如果你想一想穷人不堪忍受的过度劳作，富人耽于其中的更为可怕的骄奢淫逸，还有那些使一些人因匮乏而死、另一些人却因过剩而死的东西；如果你想一想各种食物奇怪的掺和，有害健康的作料，腐败发臭的食品，掺假的药品以及贩卖这些药品的江湖骗子，给病人用这些药品的庸医，配制这些药品的有毒的瓶瓶罐罐；如果你注意聚集的人群中由于污浊空气导致的流行病，还有因下列原因导致的疾病：生活方式过于讲究，室内室外进出频繁，增添衣服过于小心，以及所有那些细心照料，由过度地耽于声色转变为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若疏忽和戒除这些习惯便危及健康或生命）；如果你再把吞噬和颠覆整个城市、造成大量居民伤亡的火灾和地震也算在内……总之，如果你把所有这些原因接二连三地给人类造成的危险汇总起来，就会发现，由于无视大自然给予的教训，人类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大！注

> 我们要想一想，人人被迫相互亲近，又相互争斗，出于责任而结仇，又由于利益而互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态！如果有人辩称，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每个人都从帮助他人中得到了利益，我就要反驳他，如果人们不损人而更能利己，那就太好了。合法的利益是绝不会大于非法所得的利益的，伤害他人总是比帮助他人更有

> 利可图。因此问题只在于寻求确保自己不受惩罚的手段，正是为此，强者用尽权势，弱者用尽心计。[注]
>
> 此处我不想重提关于战争的事情，这在别处已经说过。……显然，暗杀、投毒、拦路抢劫以及对这些罪行的惩罚（……），都应当归咎于私有制的确立，从而都应当归咎于社会。[注]

卢梭这里所说的“社会”，当然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即黑格尔后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卢梭说，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人们出于单纯的物质需要，即人们为了“彼此互相利用”而走到了一起，它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在“美德”已荡然无存的地方，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契约”去管束，那么，这些“逐利的社会动物”就将互相撕咬，直到文明解体为止。而这就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论述的观点。马克思无疑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说：“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注]

与卢梭一起为《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还有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魁奈撰写了“政治经济学”词条。实际上，自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诞生起，它就面对着这样的困境：政治脱离了生产活动，它表现为资本、科学技术与劳动的对立。实际上，卢梭的许多观点是与重农学派、与魁奈完全一致的。卢梭和魁奈都认识到，法国的社会是颠倒的：一群与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占领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在那里支配着生产活动。由于这种致命的颠倒，劳动者被鄙视，游手好闲者反而四处得好处，如此而指望法国生产的发展、科学的真正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公民政治的基础是战斗与生产，公民被市民所取代，而这便是一切伟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征兆：

> 长此下去，人们必将越来越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

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这种现象愈加严重。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如果还有的话，他们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一生贫困，被人轻视。那些向我们提供粮食并向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就是如此。注

卢梭思想对于马克思的最大启示，就在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卢梭指出，在法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无非是那种曾经为培根所批判过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变种，它只是统治者们力图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的想象的产物，是无法通过观察和试验来证实的，是与现实的生产实践相脱离的。学者们宣称的那些观念和词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些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在自然中根本就没有原型，既然如此，他们怎么可以要求老百姓们接受和理解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呢？

你试试画一棵一般的树吧，你就永远画不成它。不管你怎么看，你都必定看到：它要么是棵小树，要么是棵大树；要么枝叶稀疏，要么枝繁叶茂；要么是浅绿色，要么是深绿色。如果你只根据从所有树上看到的共同的东西来画，那么这棵树就不像一棵树了。纯粹抽象的存在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人认识的，或者只有通过语言才被人理解。仅仅用三角形的定义就可以给你一个关于三角形的真实概念：当你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三角形时，它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而不是另一个三角形，而且你不能不赋予它三条实实在在的线，或一个着了颜色的面。因此，我们必须用语句，也就是说必须用语言来形成一般概念。因为想象活动一旦停止，思维活动就只有靠语言帮助进行了。因此，如果说语言创始者只能给他已经拥有的概念命名，那么最早的名词就只能是专有名词。……例如，他们怎么能够想出或理解物质、精神、实体、样态、象征、运动这些词？这些词我们的哲学家虽然已经用了很久，可它们至今理解起来都还很困难哩。况且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纯属形而上学的，在自然界找不到任

何对应的模型。(注)

马克思对于德国哲学以及经济学之形而上学的批判，完全可以看作对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精练概括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概念的基础上，这些抽象的概念与现实是全然对立的。经济学家们离开现实的经济活动越远，反而越以为自己把握住了经济活动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之所以是神秘莫测的，无非是因为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对这些抽象的概念说不清楚、不甚明了，结果，围绕着这些抽象范畴的争论就永远也不会停止：

>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注)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宗教正在消亡之中，一切偶像都已经破灭了。但是，马克思却认为：事实绝非如此。在一切宗教破灭之后产生的宗教是形而上学，在一切偶像崇拜消亡之后产生的偶像是资本。

资本主义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是极其简单幼稚的东西，它的全部基础就建立在资本永恒积累这个神话之上，围绕着这个简单的神话，

派生出了一系列抽象的范畴。资本主义经济学之所以看起来高深莫测，无非是以这些高深莫测的范畴来掩盖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如果不剥夺劳动，如果不剥夺自然，如果不剥夺世界特别是“落后地区”，资本积累的神话一天也不能继续。

像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那样，马克思也是从研究资本主义精神和作为“精神现象”的资本主义起步的。例如，从研究犹太人的精神现象学——犹太教入手，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犹太教的基本特征是“反视觉”的，是“反偶像崇拜”的（早期的佛教也是如此）。但是，“反视觉”和“反偶像崇拜”并不意味着反对“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意味着最为深重的迷信——因为犹太教的实质，就在于相信一个“无形的神”的存在，即上帝不存在于“视觉”中，而只存在于“思想”之中，存在于“观念”之中。

马克思因此认为，犹太教是最为根深蒂固的迷信，犹太教是“迷信”深入灵魂最深处的表现。

马克思说，此前的革命所针对的，都是有形的偶像，即奴隶主、封建主、国王、教宗，但是，它所造成的却是对“无形偶像”的崇拜，这就是对于观念——“资本”这一最为抽象的偶像的崇拜。

在欧洲历史上，由“偶像崇拜”走向“观念崇拜”的历程，首先表现为从天主教到基督新教——犹太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其次表现为从有形的封建财产向抽象的“资本”的过渡。

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结尾，马克思这样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人中获得解放。”[注]而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解放，是指社会从观念崇拜中、从资本崇拜中解放出来，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去勇敢面对那个《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的资本主义世界。

正像培根和卢梭倡导的那样，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将迷信交给形而上学，而将经济学交给科学。它要求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的现实世界的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对虚拟的资本的迷信上。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

## 卢梭与中国

劳动成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

精神哲学根据其神学起源对自然科学和由自然科学促成的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认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却没有积极地表现自己。

——卡尔·洛维特

当《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风靡欧洲的时候，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顶峰，拥有“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成功击退来自廓尔喀和回疆的挑战，更雄视海上的荷兰、英国势力如同海盗、倭寇。乾隆时代，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2.5％，即使是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不能与康乾时代的清帝国比肩。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在卢梭眼里已经日益腐化，而且即将走向衰落和崩溃。

卢梭预言清王朝必将垮台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竟然按照一个人是否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来选拔官吏；第二，中国普通百姓缺乏读写能力。在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权并与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程度都落后于欧洲

的原因，换言之，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着文化知识的国度，绝非战无不胜。

卢梭这样说：

> 我们为什么要到远古的时代去寻找事实的证据呢？其实，可靠的证据就在我们眼前。在亚洲有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当高官。如果科学可以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果科学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能鼓舞人的勇气，中国人民早就成为贤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了。如果他们不是满身恶习，如果罪恶之事在他们中间不是司空见惯，如果大臣们都有见识、法律都很严明，如果这个庞大帝国的众多居民能保证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那些饱学之士对它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满身的荣誉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让它处处都是奴隶和坏人吗？㊟

清王朝固然在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固然在文化和艺术上也是灿烂的，但是这种文化却不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牺牲”。中国的士大夫文化鄙视劳动者，因此，它就不能发展出欧洲那种立足生产实践又推动生产发展的科学。

自汉朝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即以周之“文饰”教育选拔社会精英，魏晋尚清谈文辞，至南朝梁武帝，则开创了“以诗文取士”的先河。隋朝立国，即看到这“重文”之弊，《资治通鉴》说：

>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

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这番话非常著名，只是他虽看到了问题，却不能纠正，而唐开“文辞进士科”，宋代文人治国则进一步助长了虚文作风，可见风气既成，如江河日下，非有大力，实难以变革。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观察同样是敏锐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士大夫文明，从本质上说，如果不是脱离现实的，便是把人民培养成奴隶和乡愿的工具。

李谔所谓“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是指孩子还没有学会数数，便先学作诗，而卢梭也曾就这个问题沉痛地说道：

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

卢梭问：欧洲的科学进步了、艺术繁荣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饭吃的人越来越多了，关心现实中劳动者处境的人反而更少了，因为有本事的人都去追求学术和艺术了：

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从人们采取的办法看，似乎是担心农夫太多而哲学家太少。我不想在这里贸然把农业和哲学加以比较，人们是不喜欢做这种比较的。我只想问一问：什么叫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里讲了些什么？㊟

大哲学家们啊，我们是从你们手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知识的，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教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是不是就不会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就不这么为人所畏惧了？是不是就不这么繁荣或者更加邪恶了？现在，回过头来谈你们的业绩。请你们想一想：连你们学者当中最有知识的学者和公民当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业绩对我们的用处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么，对于那一群空耗国家钱财的不入流的作家与游手好闲的文人，我们应当怎样评说呢？注

清代的郭嵩焘是驻英大使，这个人算是严复的入门师傅。作为一代改革家，郭嵩焘深刻地批判士大夫的作风与文风，他说：唐代重视艺术和文辞，宋代重视致知穷理，这统统都是对知识的败坏，而从那之后，中国文明就走上了歪路，因为士大夫与老百姓心里隔着一座大山，他们思考、研究的问题统统与老百姓的生活、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这样的知识越多，知识者便越反动。而郭嵩焘的看法其实也与卢梭相同，即认为与现实生产实践无关的“艺术和学术败坏了人类”、“文士”和理学家们更把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当成“贱业”而加以鄙视，而这样的“文士”和欧洲的形而上学者一样，实则游手好闲的“闲民”，统统是些无用之物，是文明发展的绊脚石：

古无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其能为士者，与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养。其有禄于朝，则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则任为府史。……至汉犹然……或历仕公卿，或怀道守节，隐见不同，而皆不辞贱役，所资以为养然也。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博带，从容雅步，终其身为士者，而士之实乃终隐矣。注

这就是说，战国时代卿与将是不分的，此即所谓“出则为将，入则为卿”，文与武也是不分的，“士”并没有脱离现实事务，更未将此视为“贱业”。大规模崇尚虚文的作风是唐宋之后才形成的，郭嵩焘指出：这种作风不能被视为中国文明的进步，毋宁说是文明的退化。

李约瑟曾经认为，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非常适合发展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有适合这种科学水平的“无为”观念，但是，这种“无为”的观念却像“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样，又不能使中国产生近代的自然科学，因此，非有现实运动的干涉，否则立足于抽象思辨的无为哲学便很难产生近代科学突破。受韦伯影响，李约瑟更把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的“官僚科举制度”阻碍了像近代欧洲那样的商业行会的出现：

> 在中国文明中，绝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因为官吏体制的基本观念不仅与贵族封建制度的世袭原则相对立，而且也与富商的价值体系相对立。在中国社会里确实可能有资本的积累，但要将其运用于长期生产性的工业部门，则总是受到学者型官僚的压制，其他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社会活动无疑也遭此同样命运。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会从未获得过接近欧洲文明中的城邦商业行会那样的地位和权力。[注]

但是，现代中国杰出的科学家竺可桢驳斥了科举制度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观点。与钱学森一样，竺可桢阐明了生产活动，特别是知识与生产的结合，在近代科学兴起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至于时文八股的束缚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阴，的确与中国科学的不能发达有相当影响。但从两宋到明清凡是有识见的人，从朱晦庵、文文山，到顾景范、袁子才没有不痛恨科举，鄙弃时文的。有许多学者最初作时文为了要功名，等到有地位以后，就可钻研他们所喜欢的学问去了。所以清朝虽以八股取士，仍旧无碍于当

时汉学的发扬了，从此也就可以晓得科举制度，并非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了。

据我个人的见解，近代科学即实验科学所以在中国不发达，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实验科学的最重要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难得做的。希腊的科学家对于几何学、天文学贡献极大，但是希腊不能产生实验科学，也是因为希腊人鄙视劳动的缘故。希腊以后，罗马时代对于科学可以说没有什么贡献，不久就到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等到16世纪中叶，才产生了近代科学的开山祖师伽利略。(注)

竺可桢认为，鄙视劳动是我国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空谈心性、崇尚虚文的士大夫文化，中国和希腊都发展了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的科学，但都未发展出近代科学，这里的关键就在中国和希腊的知识文明都鄙视劳动。因此他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应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观念，只有让知识与劳动相结合，才能发达科学、实现富强：

今日学校里边的学生还是和从前士大夫阶级一样，仍是嫌恶用手，嫌恶劳动。希望教育当局能够在小学里边，就改移学生这种观念，这种态度，使个个小学生得到相当用手的训练。成人以后，以能自食其力为荣，不以劳动为可耻，则将来不但可以增进生产，减少消耗，而且可以发达科学。

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要发达实验科学，绝不是仅仅买几座无线电、几架飞机所能了事，必得人人肯用他们的手来做实验，来做工作。(注)

竺可桢认为，并不能一般地认为作为“选贤机制”的科举制是坏的，但是，如果“选贤”依据的标准是脱离实际的“虚文”，如果这种“选贤机制”造成知识者与现实、民众与生产的隔绝，那么它就是坏的，而这也

正是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归根讲起来，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此种机构，到如今还大部分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之价值上。"注

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到近代以来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并不是因为中国一般地缺乏艺术和学术，更不是因为读书人不"价值中立"，而恰恰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个超越现实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就叫"士大夫"，他们钻研的学术与艺术从根本上脱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不关乎产业经营，甚至无须动手，这些人实际上也没有宏济艰难的真本领，即所谓"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这就仿佛今天的中国托庇学术与艺术之振兴，以为只要有一批专家好好做学问，中国的科学就不再落伍，但这是十足的梦话。因为鄙视劳动、鄙视动手、鄙视试验和实践的士大夫传统依然存在，所以今天的受教育者往往是一进入大学便思"考公务员"，凡属吃苦、动手、跑路的专业往往因为"出路不好"而令人望而止步：

> 道丧而文敝，得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若规永叔、子瞻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注

钱基博先生的这些话，恰恰使得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曾经令卢梭泪流满面的问题：知识活动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外圣贤们的心思其实是相通的。

---

1. 康德． 判断力批判[M]//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5–316.
2. 马克思．资本论[M]//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
3.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8.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5. 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9/人均国民收入（http: www. stats. gov. cn/tjsj）。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7. 早在2002—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其中不乏“有毒”债券。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总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数据构建评估模型，对房地产市场、CDO（担保债务凭证）、CDS（信用违约互换）等结构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蕴藏的风险估计不足，给予不少次级债3A评级，误导投资者，结果制造了巨大的泡沫。比如，雷曼兄弟倒闭前，三大评级机构还给予其A级以上的评级。直到2008年5月看到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后，才开始降低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但仅过了两个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大范围调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美联社在当时评论道：“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西方评级机构对于中国的立场问题和利益取向表现得特别明显。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外债信用级别的唯一标准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外债本息的能力。无论是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都要优于美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然而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却是3B级。很显然，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是因国而异的双重标准。美国评级机构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的背后还掩藏了另一个目的：为国际垄断资本、廉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在2003年，它们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时，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参见张捷.中国面临的两大魔杖 [J].环球财经. 2012（2）.
8. 1974年，发达国家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一个国际银行监管部门——巴塞尔委员会，它通过分别制定1975年、1988年和2010年的三个《巴塞尔协议》，为各国银行业的经营设置了标准。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6.
1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5.
11. 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
12. 杨松林. 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J]香港传真. 2011–10–18.
13. 杨松林. 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J]香港传真. 2011–10–18.
14. 马克思. 资本论[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1.
15.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551.
16. 引自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的讲话。
17.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979–980.
18. 雷蒙·特鲁松.卢梭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
19. 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75.
20. 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76.
21. 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76.
22. 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78.
23. 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24.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22.
25. 刘艳涛. "黑金天堂"里的贵族瑞士私人银行：金字塔尖上的神秘与迷茫[J].环球财经：2012（2）.
26. 1872年，《共产党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这一版以及后来出版的1883年和1890

年德文版，书名改为《共产主义宣言》。

27. 指正义者同盟，1836年被流放于巴黎的德国手工艺者创立的组织。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该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28.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80.

29. 埃德加·齐塞尔以伽利略为例，说明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技术、军事工程学和艺术家技师之间的关联性："伽利略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试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与精深的数学分析结合到一起，才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使用的两种方法后来成为近代科学的方法。"参见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80.

30. 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79.

31. 埃德加·齐塞尔. 科学的社会学起源[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82.

32. 杰克·戈德斯通.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83–184.

33.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274.

34. 杰克·戈德斯通.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82.

35. 这里所提到的瓦特可以进出的"三个世界"，其实就是技术发明家、科学家和资本家的"三个世界"，它们是1850年以后产学研一体化体制的初步模型。

36. 杰克·戈德斯通.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00）.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83–184.

37.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38.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4.

39. 戈德斯通描述了英国皇家学会在促进和传播科学方面的作用："由于教会的支持和牛顿的声望，皇家学会在18世纪初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尊重，这也推进了实验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科学仪器的销售迅速增长并推广到了全国甚至国外，到了18世纪中叶，伦敦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仪器的制造中心。公开的讲演、论证和各郡内部科学团体蓬勃发展，各种不同的人群——绅士、女士、手艺工人和商人——也都向这里集聚。"参见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83.

40. 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0.

41. 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2.

42. 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85.

43.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

44.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I）.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

45.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4.

46.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

47.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1.

48.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

49. 培根把西方的“学术革命”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里说的“第三阶段或时期”指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

50.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1.

51. 培根. 新工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6–67.

52.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1–42.

53.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62.

54.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15.

55.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10.

56.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10.

57.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0.

58.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78–179.

59.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0–181.

60. 马克思. 马克思致恩格斯[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4.

61.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7.

62.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6–107.

63.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600.

64.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51.

65.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

6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第12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1：5578.

67.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5.

68.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8–39.

69.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7.

70.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3.

71. 李约瑟.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M]//刘钝，王扬宗.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89.

72. 竺可桢. 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J]. 国风半月刊：1935（4）.

73. 竺可桢. 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J]. 国风半月刊：1935（4）.

74. 竺可桢.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J]. 科学：1946（3）.

75.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8.

# 第二章
# 马克思与康德

## 康德的两面

>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
> ——康德

人都有两面性，知识分子更不例外。但很少有人表现出康德那般伟大的两面性——一面朝向星空，一面朝向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很少有知识分子像康德那样，既如此保守，同时却又如此革命。

康德和卢梭出身相同，他们都是工匠的儿子。然而，时代却不同了。因为时代的不同，康德这个工匠的儿子方才被从自己的阶级中分离出来，成为“知识分子”，即他不再是卢梭那种“劳动公民”，而是上升为“学院公民”。从1740年9月24日在大学注册那一刻起，这个工匠的儿子其实就从一个行会转入另一个行会，从一般“市民”变成“大学生”。这意味着：他从此便脱离了那个“靠双手劳作和买卖营生的阶级”。

知识分子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主力军，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法则、标准和价值观。在此前的欧洲，这项工作是由教士们承担的，而在教士名誉扫地之后，人文主义者和启蒙者继承了这个使命。现在，这个工作由教士手里转到了教授的手里，并最终在康德那里得以完

成。

康德所做的是综合性工作。康德首先是个伟大的“综合家”，他提出的法则就叫“先天综合判断”。康德把此前人文主义者、启蒙者对于范畴和推理的爱好，与经验主义者、早期科学家对于观察和试验的爱好综合起来。其中，数和量、时间与空间、逻辑与推理就是这样被综合起来，成为法则（即“判断”）。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也就是这样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它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既是理性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合理的，也是现实的。这个法则是如此普遍，以至它可以被运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可以被运用于一切领域，也似乎适合一切领域。

康德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似乎说明了一切，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说明。

从康德时代起，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学院知识分子就是个稳定的阶层，其地位类似贵族，而对“普遍法则”的热衷恰恰表明知识分子更关心的是解释世界，而不是世界的改变和改变世界。因为，只要“法则”这个基础不变，那么世界就不会真正改变，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康德的思想固然有其保守性，却也有深刻的革命性，虽然这种革命性并非来源于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康德对于现实政治几乎毫无热情，他毕生住在哥尼斯堡，不会像四处流亡的卢梭和马克思那样对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康德思想的革命性来自他的谦虚好学，这正是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具备却很少具备的美德。

说来平常，不曾踏出哥尼斯堡半步的康德，他思想的革命性就来自“仰望星空”。康德因此知道，先天综合判断只是人内心的道德法则，但是，能量和生命力却是自然的法则。面对自然的法则，道德的法则是机械的、狭窄的，是会被能量和生命力冲破的。因此，革命和变化，并不是指一个事物摧毁和推翻另外一个事物，而是指事物内在的能量冲破

了其外在的结构、法则之束缚。

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星云学说”。马克思23岁时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在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希腊哲学，而希腊哲学分为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马克思认为，希腊哲学中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自然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意思就是形而上学诞生于希腊城邦衰落之时。

形而上学将世界数量化，而自然哲学则把世界理解为原子的运动。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运动之必然性的学说，指出正是这种必然性，导致了基督教的上帝决定论。

德谟克利特说，一个悬在空中的物体会掉到地上，这说明向下的垂直运动是一种必然性，同时，原子之间的碰撞表明，互相吸引的运动也是一种必然性。但马克思却说，正是垂直与互相吸引的运动，导致了原子的运动“是同时对这两个必然性的反抗”，从而表现为“弹性和偏离”。如果说垂直运动和互相吸引的水平运动是必然性，那么，原子的运动就不是直线，因为它是在这两种必然性之间斗争和较量的过程，其结果是偏斜，是偶然性。

必然性是理性和计算造成的假象，但是，斗争改变命运，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超越，形而上学和理性化排斥了意志，因为所谓意志，就是斗争。

尼采后来这样批评形而上学的因果律：“一切斗争——一切发生事件皆是斗争——都需要延续。我们所谓的‘原因’和‘结果’放过了斗争，因而并不与事件相符合。一贯的作法是，否定原因和结果中的时间。”而没有时间，就没有历史，没有斗争，就没有意志，而没有意志，历史就成为上帝决定的命运，也就轮不到人类创造历史。

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与此前的革命家的学说都不同，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社会法则的真正基础，就是以康德哲学为集大成的形而上学（先天综合判断），这个法则支配、限制着资产阶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法则正如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太过狭窄、机械，因此，最终必将因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而从内部被冲破。康德提出的普遍法则，不过是静力学时代的法则，而关键在于热力学时代的法则，即“浩瀚星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法则。

实际上，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康德的物理学理论最为接近，即社会“革命”类似宇宙能量的爆炸，是新的社会因素冲破旧社会秩序的外壳。而面对人类世界，马克思往往把这种能量和力量称为社会化了的自然力——生产力。

##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这是正义的最古老和最天真的道德戒律，是地球上一切“善行”、“公允”、“好意”，以及“客观性”的开端。
>
> ——尼采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诞生于普鲁士哥尼斯堡的一个马具匠家庭，他比卢梭小12岁。但康德活了80岁，远比卢梭长寿。

马克思、康德和黑格尔都出生在普鲁士。“二战”之后，同盟国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为了彻底肢解“法西斯的策源地”普鲁士省，便把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划归了民主德国。而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则再次划归了苏联，直到现在，它还属于俄罗斯，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康德算

是半个俄罗斯人。

与写下《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卢梭不同，康德毕生疏离于政治，尽管他晚年总算是睁开了眼睛，面对着欧洲的烽火连天，怒斥欧洲的军阀混战，写出了《论世界永久和平》这本伟大的著作。但在康德生活的时代，哥尼斯堡一度被沙皇俄国占领，而康德在沙皇俄国统治时代似乎过得很不错，康德跟许多沙皇俄国军官的关系都非常好，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合作搞研究（这个研究也很有趣，就是对一个先天盲人进行复明手术，因为康德想搞明白盲人"想象的世界"与他第一次睁眼看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即观念与视觉的关系、无形的观念世界与有形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普鲁士有两所著名大学，一所是耶拿大学（马克思在此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普鲁士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另一所就是哥尼斯堡大学，而康德后来则成了哥尼斯堡大学的校长。不过，对于康德的政治能力（治校能力），他的同事希佩尔却这样评价说：尽管康德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他却没有能力"领导一个邦、一个村，甚至一个鸡圈"[注]。

在欧洲，作为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或者"独立知识分子"，首先是在普鲁士产生的，因为"制造知识分子阶层"正是普鲁士的既定国策，是普鲁士当局针对欧洲各国彼此争霸的局势而做出的战略选择。正是在普鲁士国家有意识的鼓励和推动下，"知识分子"被从工匠阶级中分离出来，并与工匠相对立；或者说，德意志的"大脑"被从手的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与手的劳动对立。而这一切都是在普鲁士率先发生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方才形象地把德国社会说成"头足倒置"——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落后，就是由于缺乏英国那种"先进的工人阶级"，即那种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这就是因为：德国社会的主体，乃是"动脑不动手"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仿佛是在用他们的木脑袋倒立在地上行走。当然，康德就是其中的典型。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他们也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即“否定之否定”原理。这一原理最深刻地体现在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在那里，所谓“否定之否定”，就是在思想上否定而在现实中肯定，也就是说：在思想上否定专制，但在现实中却要做一个懂得服从的好臣民。马克思说，这种德国庸人的态度，就是启蒙的态度，也是一切“知识分子”的局限。

不过，马克思或许忽视了：普鲁士却并没有因为这种战略选择而真正“落后”，恰恰相反，普鲁士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国家争霸中后来居上，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并迅速超过英国，就是因为德国与英国相比，更为重视专业化的知识分子的培养，更加重视造就一支专家队伍，更加有意识地资助和鼓励学院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方才使得“学院公民”在康德时代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而与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虽然其国内也有很多工程师社团，但是英国却并没有“学院公民”这样一个特殊阶层。在当时先进的英国，由国家主导的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教育培养也并不多。英国这个相信实践和经验的国家，如同相信作家是不可培养的那样，普遍相信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不是学校可以培养出来的，而应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因此，最有益的学习就是在生产实践中向那些有技术的工人学习。

例如，一位在英国享有极高声誉的工程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必须对你提出郑重警告，不要妄想从法国作者那里学习到实用的力学知识。你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当作纯学术书籍来阅读，向他们学点儿静力学、动力学和几何学等。但他们写的力学书，就像现代作者提出的宗教原理一样，你最好少去理会。到铁匠铺或造水磨的木工房里待上几个小时，你会学到更多实用的力学知识。关于实践方面的知识，你应当阅读英国作者的书籍。从他们那里，你学到的东西也许并不多，但却永远忘不掉。”[注]

英国人的这种自信，当然就来自英国工业革命从劳动实践中获得了无数技术发明的经验。英国人相信，即使动手试验、劳动实践并不比理性计算和推理更加重要，起码它们也同样重要：

> 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许多技术进步都是实践性或经验性的。它们产生于冒险的实践、大胆的试验以及尝试的失误。这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代，也是工程师大显身手的时代。人们对“工业启蒙运动”带来的光明前景深信不疑。在这场“工业启蒙运动”中，蒸汽和金属铁为造福工业和全人类而得到普遍应用。这个时期的工程师行业不同于后来的工程师行业。那时的工程师较少依靠数量分析和理性计算，他们往往凭借一种思维方式，并以满腔热情和超常的能量为支撑，带着浪漫主义精神的印迹。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19世纪上半叶决定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注]

然而，英国这种不重视理论学习，而是仅让技工们在生产实践中凭借创造精神进行技术发明的做法，却很快使它的技术能力被德国和美国等国家主导的“专家培养模式”赶超了，而且，不论是英国的国家实力，还是其在工业生产中的技术发明的数量，也都被德国和美国迅速地超过了。

而康德就是典型的德国“专家式教育”的早期受益者，也是这种德国教育的“杰作”。普鲁士教育认为：理性计算和推演比动手试验更重要，而且，理论是只有在专门性的教育、研究机构中才能完成的训练，这种训练要求学者脱离长期实践的摸索，一心一意去掌握法则和规律。学生们与其去学习木工、锻工和机械，与其在工厂里与能工巧匠混在一起，还不如在专门性机构里学好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从而打好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以保持一个研究者的“头脑清明”。正是在这样一种“头足倒置”的文化氛围中，康德这个工匠的儿子很小就离开了工匠阶级，走上了一条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道路。从此之后，与号称“日内瓦公民”的卢梭不同，康德便开始骄傲地号称自己为“学院公民”；而与卢梭在著作

的封面上印上“一个日内瓦公民”不同，康德在自己著作的封面上骄傲地印着“康德硕士”：

> 成了大学的成员或称为“学院公民”之后，他不再接受哥尼斯堡行政单位的管辖，而是直属大学的行政系统。像行会一样，大学也是相当独立的组织，而埃马努埃尔的大学生身份，也为他带来了许多特权。一个学院公民不仅有听课与使用大学设施的权利，同时也不必接受城市或国家的直接命令。举例来说，他可以受到免征入伍的保护。……1740年9月24日，大学校长将“埃马努埃尔·康德”这个名字填入注册名单的那一刻，影响至为深远。这表示这个工匠的儿子其实就等于从一个行会转入了另一个行会。然而这个“知识”的行会有自己独特的位阶，在许多方面，它的地位较接近贵族，不似靠自己的双手劳作或靠买卖营生的阶级，从一般“市民”到“大学生”的转变，因此不容小觑。在18世纪的普鲁士与其他各地，对年轻人而言，成为学院公民乃是……很重要的跃升。注

为人类的活动立法，这就是康德的志向，而且他认为，这也应该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天职和志业，因为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主导者，而这个领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生产和交换活动制定法则，为人类行为设定规范和价值标准。

在康德看来，人最杰出之处，便是他内心中拥有道德法则，这使人的行为是“合目的的”，是符合社会法则并在法则支配下进行的，而不是盲目试验的被动反应。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便是遵守法则，服从法则的支配，因此，一个讲法则的坏蛋，在道德上也要超过一个“无原则的好人”——这就是伦理学（实践理性）的实质。

康德对于法则的重视，可以从许多例子中看出：康德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大学获得了钟点讲师的教席（中国当下的学院体制与欧洲类似的，就是硕士毕业只能当讲师）。所谓钟点讲师，就是看听课人数多少

来收费。当年，曾经有一个学生跟康德说，自己决定来听他的课，只是说过之后，却总也不来，后来，这个学生希望康德帮忙推荐他做律师，但康德坚决不写推荐信，而且还批评这个学生言而无信，即他的行动“不能受法则支配”。康德认为，这种“心中没有道德法则”的人根本就不配当律师。

康德自己对于“钟点法则”可谓身体力行，他一生都生活得如同钟表那般有规律，整个哥尼斯堡也都把康德当作法则、规律的象征。著名的典故是康德每天中午12点出门散步，分秒不差，所以每当康德出门，大家就都知道那时是正午12点了。

不过，康德的研究者们却对这种“钟点法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说：康德之所以生活得如此有规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伦理的，而是生理的，不是出于道德目的，而是为了养生（肉体）。卢梭毕生为泌尿系统疾病所困，康德则为心肌缺氧所苦，至于究竟病症如何，今已难考。不过，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流行卢梭所讥笑的“疑病症”，即怀疑自己有病，这乃是知识分子中的时髦。其实这也与当时的中国差不多，即“以病为美”，也就是《病梅馆记》里所写的那种时尚，它也一直在中国的士大夫中流行。

总之，康德似乎是个多病之身，他天生胸腔塌陷，所以一辈子都在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这种疑神疑鬼的忧郁症对于他的思想和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养生，为了与“疑病症”做斗争，康德方才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严格管理，并且严格地按照作息时间表身体力行——无论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说法是否靠谱，坚持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确实给康德带来了好处，因为康德最终活了80岁，而且去世的时候毫无痛苦。[注]

康德对自己为人类制定的普遍法则——以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非常满意。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们也会心悦诚服、“普遍赞同”地这样说：这正是人最基本的美德，是一个求学者先天

具备的美好素质，一旦认识到这一被上帝植入所有人内心的法则，人们就会感恩戴德地遵从它，因为这是普遍而终极的法则，是人人遵守、人人同意的法则。

不过，世界上总是有这样一些特立独行者，他们对“普遍法则”的说法深表怀疑，并指出康德所说的“先天法则”不过是布尔乔亚社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因而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法则。这些人甚至认为：一切法则，无论它号称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的，都无非是特权阶级和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束缚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人，前有卢梭，后有尼采和马克思，这些人的英名与康德一样永垂不朽，而他们却都是与康德完全不同的人，即这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

例如，数学和逻辑学的法则，在康德看来是最真实、最普遍的，但是，到了卢梭和尼采那里，恐怕就没有比这些法则更不真实的了。正如各种各样的树是真实的，而一个抽象的“树”的概念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那样，“圆”和“三角形”这种东西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康德所说的法则都是头脑中想象的产物，这些逻辑的产物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对应物。于是，除了对这些法则硬性规定、强行灌输之外，人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它们，也便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它们。

尼采说：

> 逻辑学所根据的是，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前提；比如等同物的存在，又如“一个物质即使被放在不同地点上还是同一的”等等。就数学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就严格意义而言，根本不存在直线和圆形，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量”的话，数学恐怕就不可能出现。(注)

从前的教士们可以这样为“法则”辩护：法则是上帝制定的，如果谁

有异议，尽可以去找上帝打官司，即他们可以把责任推给上帝。但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教授们却完全不能这么做。而康德的办法则是这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上帝出于爱，植入我们头脑中的"先天法则"，而数学、语言和逻辑能力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先天能力。因此，他方才说，他所提出的法则，乃是"先天综合判断"。

但是，尼采却说，这些法则和能力并不是人们先天具备的，也不是上帝"基于爱"赋予我们的，康德所说的那些法则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则，它并非永恒的，而是起源于人们在买卖—交换关系和债务—投资关系中产生的规则，因此，它完全是后天形成的。比如说，所谓"公平意识"，就起源于"买卖公平"，起源于买卖和交换活动。所谓"法"和"规则"，无非也就是"戒律"，而"戒律"是为了"惩罚"而制定的，它惩罚的首先就是"借债不还者"；而法律的公平，无非也就起源于"欠债还钱"，它的实质是"以恶报恶"。正是由于法则的根本目的是惩罚和惩戒，所以，它的本质便是恶，而不是善。

既然法则作为戒律是为了惩戒而设置的，那么上帝也就是把惩戒、报复——"恶"植入了人间。康德提出的内心道德法则的基础是恶，即道德起源于恶。

尼采说，正是在买卖—交换关系和债务—投资关系中，价值尺度才得到了极其迅猛的发展；也正是在买卖—交换关系和债务—投资关系中，人们方才产生了衡量和彼此衡量的意识，并进一步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宇宙的尺度；也正是在买卖—交换关系和债务—投资关系中，方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对抗的"恶的法则"。

总之，一切法则，无不是为了压迫人、束缚人、惩戒人，因此，那些标榜道德的社会法则实际上都起源于恶。

尼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 罪恶感和个人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第一次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从这里培育出了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意识，同样，人类最早的骄傲，人对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感也由此而产生。或许我们对于“人”（manus）的称呼也是出于这种自我感觉的表达。人把自己看成是衡量价值的，是有价值、会衡量的生物，看成是“本身会估价的动物”。买和卖……恰恰是那些关于交换、契约、罪孽、权利、义务、协调等的萌芽意识首先转化出最粗放、最原始的公共群体（和其他类似的群体比较而言），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力的习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这是正义的最古老和最天真的道德戒律，是地球上一切“善行”“公允”“好意”，以及“客观性”的开端。注

尼采说，离开了市民社会，康德所谈论的抽象法则便不会得到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解，比如说，康德所谓的“自律”和为“自己立法”，无非就是把人看作“自身会估价的动物”；所谓的“内心的道德法则”，无非是指“爱你的邻人”；而所谓“爱你的邻人”，其实就是在你的邻人需要钱的时候借给他高利贷。

人们经常把“公正”作为一个词来对待，其实，“公平”与“正义”是不同的，而把公平等同于欠债还钱、愿买愿卖，则是对“公平”的最大误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吗？”建国后他又说：“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谁想过这个问题？我是经常想这个问题的。”而毛泽东之所以对按劳分配、论功行赏颇有微词，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无数先烈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原则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而如果用论功行赏、按劳分配的法则来对待这种牺牲，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经济学家卢周来深刻地总结了“公平”与“正义”原则的区别与演化，他指出：

> 据考证，在西方哲学界，亚里士多德首次对正义和公平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法庭严格依据法律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的判决，因为法律本身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赖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正义的判决却可能是不公平的。在这里，公平是指判决的结果符合这个社会的“习惯法”，即符合公众的常识、道德与良知。例如，一个在街头行将饿毙的流浪汉，为了活下去而抢了店铺里的一些食品。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是违法的，应该受到惩罚，所以依据法律对其予以惩罚是合乎正义的。然而，这种判决却不公平，因为社会并没有尽到互济的义务，所以才造成这个流浪汉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是高于正义的，必须通过公平的理念来对法律的判决做出某种矫正。
>
> 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平高于正义的思想，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某种体现。罗马法就是通过区分严格法和衡平法，使公平理念得以付诸现实。其中前者通过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程序来保证正义的实现，而后者则用来保证正义的判决同时是公平的。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
>
>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在现代法律传统中，作为公平高于正义的原则的体现，在操作上见诸于陪审团制度。在英美等国家，律师与法官必须精通各种法律条文，必须对案件有详细的了解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辩护或判决，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实现法律正义。但最后的判决还必须经过陪审团通过。而与此相反，陪审团的成员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法律知识或背景——甚至在早期，陪审团组成还有意避免有法律专业知识与背景的成员，同时，除了在法庭上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述之外，陪审团成员不需要也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具体案情。陪审团成员做出决定，完全听凭于常识、道德与良知，以此来保证其决定是符合公平的，由此也保证了正义的判决最后也是符合公平的。

关于公平的这一法哲学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其实也有体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有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约翰·罗默尔（John Roemer），在各自领域都对社会公平研究做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提出的社会公平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其中，最大的共通之处应该是：他们似乎都在不同程度地诉诸于哈桑伊（Harsanyi，1955年）提出的“无知之幕”（veil of ingorance）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只要问一问那些并不知道自己社会处境的社会成员就可以了。换言之，即使是处于“无知之幕”的背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仍然同意的资源分配才是公平的。这里有一个例子：两个人产生了纠纷，其中感到受到不公平对待者一般会这样说：“你可以找任何一个无关的人评评理！”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从上述法哲学与经济思想的背后，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公平不公平，老百姓的感受比经济学家依据专业知识做出的判断更加重要。通俗地说，社会公平与否，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也因此，人民群众应该成为判断社会公平与否的主体。这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人民是看实际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

资产阶级法律所要维护的秩序，是资本积累。于是，马克思方才这样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注)，“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康德所谓的“内心的道德戒律”其实也就表现为一纸借据，而所谓“上帝的爱”、所谓“上帝因为爱而植入人们头脑中的先天法则”、所谓“爱你的邻人”，其实也就是指“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

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注]

马克思曾幽默地说，让自己的儿子去卖帽子还是读书，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卖帽子获得的是现钱，而读书则是另外一种投资。他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银行家把一切社会财富都转化为资本投资，而他们总是会在自己的“邻人”们最需要钱的关键时刻，作为投资者——也就是放债者出现，热情洋溢地为后者提供各种“服务”，并四处兜售这种“服务”。而当他们把对于子女的教育和爱也变成一种投资的时候，家庭也变成了公司。通过把金钱变成资本投资，他们就能把资本转变为支配他人的权力，以此奴役人、剥夺他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因此，这种程序的正文，造成的是社会的不公。

这种道德戒律在债务—投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甲借款给乙，表面上是满足乙的需求，但这样一来，甲也就可以通过催债这种行为，使乙廉价处理自己的所有财物来偿还债务。实际上，无论是作为资本家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个别的资产阶级私人，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业，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邻人”当作资本利息和利润榨取的对象，而他们这种“爱自己的邻人”的方式，当然就是恶，也就是用资本的法则束缚“邻人”，并在“邻人”破产的时候“合法地惩罚他们”。

马克思描述了对于“邻人”需求的掌握和利用，怎样导致了资本家支配权的扩张，导致了“债务人”的日益贫困和依附状态，同时也导致了货币的无节制与无度发行，导致了消费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产品开发的速度、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投资扩张的速度。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是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事实：

> （在资本社会里——引者注）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注

今天，正是对层出不穷的高档商品的消费依赖，导致了债务的扩张，从而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统统陷入债务的圈套。美国的“两房”债券操作，就是典型地利用了广大下层消费者对于房产的需求，先以“零首付”的方式诱导消费者购房，再以“贷款乘数按揭”这个银行家的法宝将滚雪球一般的债务压到购房者头上，从而把他们深深地推入债务陷阱，最终将其剥夺得一无所有。

尼采指出，所谓“爱你的邻人，他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给他”，这句基督教箴言的真实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债务人还不起债，那么就继续借债给他，直到他完全成为你的奴隶、被你彻底控制和支配为止。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法则最一般的形式，表现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契约，通俗地说就是高利贷借据。

而马克思下面的话，可以说是与尼采的说法一模一样：

> 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

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注

卢梭说，比起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比较自私自利、总是比较胆小怕事，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法则行事，这不仅表现为一种疾病——一种普遍的疑神疑鬼的“疑病症”，而且表现为，做事之前，他们总会在头脑中把代价、收益、得失利弊盘算得清清楚楚。

而被康德视为“心中的道德法则”的东西，恰恰是卢梭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通病——自私自利和胆小怕事：

是理性使人产生自尊心，思维又使之增强，是理性使人多考虑自我，也是理性使人远离烦扰折磨他的一切。哲学思维把人孤立起来。正是由于哲学思维，人才会在见到别人在受难时，暗自在心里说：“去死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反正我是安全的。”只有那些危及整个社会的危险，才能搅得哲学家不能安睡。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杀死他的同类却逍遥法外，他只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稍微为自己辩解一下，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背叛他自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同情这个不幸的死者。野蛮人就没有这种令人钦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性，总是愚蠢地听凭这种原始情感的支配。例如，在骚乱中，在街头殴斗中，贱民啸聚一起，而谨慎的人则站得远远的，但最后往往还是群氓，是卖菜的妇女，挺身而出隔开打架的双方，阻止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自相残杀。注

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卢梭关于哲学“起源于自私自利”的论断，他

的说法虽说并不刻薄，却更为深刻（自然也更为晦涩）。他说哲学就是“我思”，这意味着思考不可能脱离“自我”这个陷阱，或者说，也意味着超出“自我”的思考是不可能的。

于是，像康德一样晦涩（如果不是更加晦涩的话）的海德格尔方才说，欧洲智慧的最大难题就是：它难以走出“自我”的封闭体系——按黑格尔的说法，也就是难以走出“我思”——简而言之，也就是无法“走出康德”，即无法走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无法走出康德为之设置的法则——市民社会的法则。

我“所思”的，就是我“所欲”的；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占有它；我认识和思考某物，那一定是按照我的方式、从我的角度去思考它，我一定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认识对象。这种“先天综合判断”，当然也正是一种先天的综合局限，或者说是“先天综合征”。

在黑格尔看来，法则就是“意指”，而所谓“意指”（meinen），就是“意见”（meinung），也就是“我的”（mein），而在德语中，“意指”、“所意指者”和“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词。德国的语言和思想先天地陷入了一个死胡同，它基本的思维方式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我思故我在”，认识活动无非是把“世界”变成“我的世界”。

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便是这样把认识活动转化为“占有活动”：

> 我们所有的表象和直观都是这样：我们在其中意指某物，意指存在者。但在每一种意指中，我都同时而且不可避免地使所意指者变成了我的东西。一切意指，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一切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所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意指本身同时就是：把某物表象出来，并且把被表象者变成我的东西。但甚至当具体的“自我”（Ich）并没有进行意指时，当某个个别的人的思想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时，主体性的危险也只是在表面上得到克服。在这里，对存在者整体的人化

> 并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仅在规模上变得更大了，而且主要是在方式上变得更大了，因为没有人哪怕仅仅猜测到这种人化。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起初不可消除的假象，仿佛在这里并没有人化在起作用。但是，如果说世界解释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化，那么，任何想把这种人化非人化的努力，就都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这种非人化的努力本身又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努力，从而说到底还是一种潜在的人化。[注]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便是形而上学——一种关于“占有”和“私有”的学说，而这就是市民社会的思考方式，因此，要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先批判形而上学。

为什么不能将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化为“人权宣言”？马克思说，这是因为“人”与“公民”不同，这里的“人”特指“市民社会的成员”，“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注]，“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注]。

西方世界至今也没有打破这种形而上学的束缚，因为西方所标榜的“人权”的实质，就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它所能理解的人也就是“自我”。曾经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今天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意指”，中国作为“意指”，对西方而言就是“我的东西”。一切看起来仅仅与对象本身相关的意指其实都变成了一种占有和接纳，即把意指者纳入人的自我之中。西方思考中国，西方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占有中国。而按照“西方的方式”理解和谈论中国，自然就会产生如下“我思”：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它就会威胁别人——这是因为西方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如果有一艘航母，那它就一定会打别人——这同样是因为西方自己从来就是这么做的。

除了"我占有的世界"、"我接纳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外，形而上学思维中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世界；因为走不出自己、走不出市民社会，所以它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

自从康德哲学诞生以来，西方智慧便很难走出康德所制定的法则——所谓的"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至于这个"道德法则"实质上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否是"道德的"，尼采和马克思早已经极其透彻地阐释过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

西方的形而上学根本就未包容过这样的经验：与另外的世界平等相处。因为按照康德的法则，离开"我思"的"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

## 仰望星空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马克思*

然而，无论怎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康德这个"学院公民"却总还是从工匠的儿子蜕变过来的。作为知识分子，他毕竟是从手工劳动者——马具匠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从任何角度说，他都不可能与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完全一刀两断，恰恰相反，他身上永恒地打着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烙印，而他保守的思想中也始终埋藏着革命和激进的种子。

人们往往以为，对康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休谟，因为康德自己说过，是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他懂得了在试验、观察和动手劳作面前，概念的推演和无休止的语言辩论是何其苍白。但是，休谟对于康德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毕生的。实际上，即使没有休谟的影响，康德这个"工匠之子"也会明白，在判断力面前，理解

力显然更为重要，而要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亲自动手，正如要知道李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一尝。

相对于休谟来说，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才是毕生的。康德的书桌前一直挂着卢梭的画像，就像鲁迅在自己书桌对面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片一样。也正是钟表匠之子那伟大的面庞，提醒着这位马具匠的儿子：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是立志为他们造福，而不是使自己比他们更没用，甚至成为他们中的叛徒。

康德曾经这样说卢梭给自己带来的深刻启示：

> 我天生是个求知者。我时时感到知识的饥渴，带着不安的欲望一步一步探索，时而因有所斩获而感到满足。长久以来，我相信那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荣耀的唯一可能。我鄙视一无所知的乌合之众。卢梭在这方面纠正了我的错误，消除了我的盲目偏见，我学会了尊重人。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作为研究者）不想在奠定人权上给大家做些贡献，我就会比那些普通的劳动者更没有用处。[注]

尽管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没见过世面。哥尼斯堡曾是普鲁士首都，是北海和大西洋交界处的出海港，这个海港与英国、俄国、欧洲南北部的交往均非常密切——形象一点儿说，此地相当于“普鲁士的上海”，而在康德时代，它依然是东普鲁士的首都。

因此，康德这样评价哥尼斯堡：“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与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注]

康德的传记作者库恩则如此描述了康德时代的哥尼斯堡：

> 18世纪的哥尼斯堡常被形容为德意志的没落中的、偏僻的“后

院”，或是普鲁士的“边陲城市”。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颇有出入。它位于普鲁士东北角，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理上离波兰比离西普鲁士更近，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岛民”性格。尽管如此，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市。哥尼斯堡于1255年由条顿骑士建城，于1340年加入汉撒同盟，直到1701年，还都是全普鲁士的首都。而到了康德出生时，它只是东普鲁士的首府，但依旧是整个王国里三四个主要城市之一，无数的政府机关仍留在海湾，所以也是重要的贸易据点……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波兰、立陶宛、英格兰、丹麦、瑞典与俄罗斯……作为港口，其繁忙的程度不下于汉堡或其他汉撒城市，主要的竞争对手则为但泽市。[注]

正如故乡“普鲁士的上海”一样，康德身上开放的一面与保守的一面始终是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为了说明这两面是怎样奇妙而必然地水乳交融，我们最好采用弗洛伊德的解释。弗洛伊德说，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在不断分裂中生成的世界，所以方才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单一的、洞察一切的、知晓万物的神，或包罗万象的理性法则，渴望由它来控制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似乎这样才会感到安全。人对于法则的固执，是对“婴儿期”的留恋，通俗地说，即在这种不成熟的状态下，他才需要一个万能的父亲，因此，他迷信永恒法则、害怕变革、拒绝斗争。

对于康德执着于法则的保守的一面，康德的传记作者所做出的那种分析——康德是因为怕死，是因为要与先天胸腔塌陷对抗，方才坚持有规律地生活——方才是深刻而独到的。

显然，在康德那里，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一直就是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存在的。而他对抗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仿佛根除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这种造物在它短时间内（人们不知道是怎样）被配备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质归还给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纯然的点）”[注]。在这种存在面前，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法则都被冲破了，而与内心的道德法则相

对立的这种存在，也就是“星空”。

康德说，最令人惊叹和敬畏的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这短短一句话，一举划分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另一个则是浩瀚的星空。

在《实践理性批判》“结束语”之开篇，康德指出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根本不同：

>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前面那个无数世界之集合的景象仿佛根除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的造物的重要性，这种造物在它短时间内（人们不知道是怎样）被配备了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曾由以生成的物质归还给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纯然的点）。与此相反，后面这种景象则通过我的人格性无限地提升了我作为一个理智的价值，在这种人格性中，道德法则向我启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官世界的生活，至少是从凭借这个法则对我的存在的合目的的规定中可以得出的，这种规定并不局限于此生的条件和界限，而是无限延续的。注

一方面，人是自己制定的法则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也是宇宙间生命力的造物，且终将会把这种生命力归还给宇宙。但是，宇宙不是按照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规则发展的，宇宙的存在形式不是道德戒律，而是能量和力，宇宙是能量的扩张，它的运行方式是“力的爆发”，是“在分裂与解体中生成”，这种扩张与爆发是对法则的突破，而不是按照既有社会法则进行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用一句话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按照既有社会法则生产、生成的世界，另一个是在不断的

分裂和解体中扩张着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之所以要坚持“内心的道德法则”，当然是力图与后一个世界对抗，无论这种对抗是否有效，但是至少可以从凭借这个法则对我的存在的“合目的性的规定”中，克服我对整个感观世界的依赖。

被隐喻为“星空”的世界，即后来被马克思称为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现代世界。在康德生活的时代，现代世界已经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汹涌喷薄而出，恰恰是康德最早分析并概括性地抓住了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律，并用一个绝妙的比喻——“星云爆炸”来描述它，尽管康德是用非常抽象的方式——隐喻，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发展和运动规律，但是，康德的隐喻和他的描述方式却深刻地启发并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比如，康德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面对“星空”，面对力量的冲突，数学的办法、逻辑学的办法、一切“形而上学”的方式都是匮乏的，因为这里需要的是物理学所揭示的“力量对抗法则”，需要“化学的离析程序”，以此来分析各个不同的“力”之间的关系。而恩格斯谈到唯物史观时则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注]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就建立在“星空”隐喻的基础之上。

使康德得到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这是康德第一篇研究“能量”和“力”的文章（写于1755年），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样，讨论的是自然哲学问题。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它不属于哲学论文、伦理学论文，而是一篇物理学论文，康德的学位论文

应属于理科论文，“康德硕士”实际上是个物理学硕士。

这篇论文的核心创见，是通过阐述“活力”，以与莱布尼茨和牛顿的“死力”相区别，它以热力学的思想代替了静力学，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论断。所谓“活力”，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所谓“死力”，则是说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事物发展的外因或者外在动力。康德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之根源，在于“力”有吸引力、排斥力、弹性这三种形态，而并非牛顿所谓的只有“引力”这一种形态，因此，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事物本身内在的矛盾性——“力的吸引和排斥”。物质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事物的外部（即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联系），而在事物的内部——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康德杰出的后继者（尽管他未必深入研究过康德的著作），因为他的《矛盾论》以极其短小精悍的篇幅一举抓住了康德所开辟的“热力学时代”的精髓。

康德的另一篇重要论文，亦属自然哲学方法论范畴，以今日之见，同样属于典型的理科论文。它乃是一篇用物理学方法批评数学方法的文章，题目叫作“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那是康德1763年的作品。这篇文章的创见是提出了“负值”的概念。康德深刻地指出：如果从数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矛盾”的观点根本无法立足，或者说，在数学和逻辑学中，“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因为一切“自相矛盾”的命题在数学上均不成立；实际上，“矛盾”的观点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它的基础就是“力的冲突”。

康德说：物质的坚硬性，即阻止他物穿透的力量，是与吸引力不同的“负引力”，而这就是矛盾冲突的基础。库恩评论说：

> 康德反对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哲学，却又认为数学可以有效应用在哲学里。他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包含逻辑矛盾的

东西，便不可能存在。因此，任何在逻辑的意义下有矛盾者，即为虚无。然而包含事实冲突的东西，却是可能的，不可穿透性便是一例。它是“负引力”，是一个物体阻止另一物侵入它占有的空间的力。康德另外还从心理学及伦理学里援引了其他例子来支持“负量”的说法。许多物体里头都有相反的力，然而由于它们互相抵消，所以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是或许一个小火花便能让处于力量平衡状态的事物动起来。[注]

马克思后来说，相对于那些“机械的唯物主义者”，正是唯心主义发展了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能动的方面[注]，辩证唯物主义面对的是热力学时代的问题。康德在发表于175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所提出的著名的“星云假说”便是如此。这一学说的要点是：宇宙的生成，源于物质中内含的能量和力量的冲突。能量的积累冲破了它的物质外壳，从而形成了爆炸性的扩张——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正如宇宙是在分裂和爆炸中生成一样，资本社会也是在对抗和分裂中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前提。因此，拒绝斗争，拒绝对抗，也就是压抑这种分裂，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在伦理学领域，弗洛伊德则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理论，认为人的心智与灵魂也处于本我、超我和自我的分裂状态，长期压抑这种分裂，必然导致精神崩溃。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都是热力学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毕生喜欢对抗和斗争。恩格斯说，斗争是马克思唯一的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抗、斗争和在分裂中发展，这才是宇宙生成的真实景象，即使静止，也不过是内部能量冲突达到暂时平衡的一种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现存世界秩序的破裂，即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不但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意味着公民权即劳动者权利的扩大，意味着那些被既有资本主义秩

序压抑着的生产力和无权者权力的解放，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生成。

与“三大批判”的主旨完全相反，马克思说，一切法则都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关于社会法则，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绝不能。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产生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注]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人类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同时，正如康德推测的，人类也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居民，在其他星球上也存在着有智能的生命——由于康德的这个如此具有革命性的假说，不但“自我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不能成立，就连“人类中心”论也不能成立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大厦都轰塌了。

因此，若要理解康德，就应该从康德深刻的“两面性”入手：康德早期的科学著作所面对的是“宇宙”，这些著作讨论的是力、是能量；而与早期著作不同，康德的“三大批判”面对的是“人”（这样的“人”乃是资产阶级个人）的内心，是市民社会的道德法则。康德早期著作与“三大批判”的主题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而今天的人们感到陌生的，其实是康德早期的科学著作。一般的读者甚至并不知道，康德相当一部分重要著作研究的是天体、物质、火，乃至地震与海啸，而它们的主题就是能量和力，并不是“人的内心”。康德眼里的科学，面对的就是“浩瀚的星空”，这样的科学要讲述的是物质

内含的能量、力量的扩张如何摧毁了其外壳。

“内心的道德法则”与“浩瀚的星空”——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市民社会的法则，后者则是历史和宇宙发展的隐喻。

康德曾经这样评论“哥白尼式革命”：哥白尼没有改变宇宙和太阳系，但是，他却改变了人类观察宇宙的方法。而康德由于提出了“星云假说”并把辩证法建立在对宇宙发展的观察方面，终结了牛顿开创的静力学时代，把人类引入了热力学时代——那个《国际歌》中所谓的“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的时代。

恩格斯说：

>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做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注]

尼采嘲笑了康德妄图通过“三大批判”重建形而上学的努力，但他却继承了康德早期“没有造物主的造物活动”的宇宙观，因为尼采的哲学就是“没有基督教上帝的新造物论”，它论述的核心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不死的死”——形而上学的内心法则。

如果抛开早期著作，那么，康德的“三大批判”就几乎还属于静力学时代的作品，但是他早期的科学作品却发现了浩瀚的星空，即一个由热

力学支配的宇宙。正像爱因斯坦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热力学定理揭示出宇宙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衰老的过程，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分裂解体的过程，尽管能量守恒，即能量总体上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是，能量的扩散却并不是有序循环的运动，因为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即总是从可以利用的能量转化为不可利用的能量，从“有序的能量”转化为“无序的能量”，随着能量的扩散，“熵”也在增加。

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不同，马克思、尼采、爱因斯坦的学说都属于热力学时代而非静力学时代的产物。尼采认为，正如罗马帝国一样，西方文明将“在扩张中崩溃”；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同样将在扩张中崩溃，因为无产阶级、贫困、自然资源的耗尽、激烈的阶级分化，这些就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相伴随的“增熵运动”。

恩格斯说，康德之伟大，就在于他开创了这样一种发现和观察“自然”的方式：“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注]。

康德认为宇宙运动基于力量的矛盾冲突，它的表现形式是能量在扩张中爆炸。正是这场“仰望星空的文化革命”突破了形而上学——这既启发了尼采的生命力学说，也奠定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

马克思提出了类似康德“星云假说”的预言：资本主义发展所孕育的生产力，将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炸开，冲破现存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外壳将在扩张中破裂。马克思在这里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康德研究火、地震和宇宙大爆炸时那样的科学视野。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

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资本得以积累，海上贸易得以发展，殖民地得以建立，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注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正是一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永远的变动不居，这是它不同于此前一切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因此，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方才需要“仰望星空”的视野，这种视野要求把力的冲突和能量的扩张放在第一位。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作被资本主义社会压抑的能量和力量的化身，从而把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和发展过程看作无产阶级这个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最终释放的过程：

>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注

资本主义所孕育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数量的日益庞大，无法消化的生产过剩与无处消耗的资本过剩——这一切将从内部“挤破”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便是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自然力学说的最重要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无非就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力”。马克思这是将康德的“星云假说”用于描述物质生产力的运动。

## 经济学与形而上学

>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马克思因研究资本而起家，他最为经典的著作就是《资本论》。不过，由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理解极其深刻而独到，所以，要抓住他的深刻理解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什么是资本呢？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资本”这个词早在12世纪至13世纪就已经出现，“它于1211年肯定已经问世”。“资本”这个词，源自后期拉丁语“caput”，意思是“脑袋”或者“头部”，马克思在分析日尔曼生产方式时说，资本的原意是“人头税”，同时这个词源隐喻着：资本也就是对于财富的想象和想象的财富，而“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注)。

在梳理了对资本纷纭复杂的理解之后，布罗代尔引用别人的看法这样说，“马克思赋予了该词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含义：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尽管布罗代尔不同意这样的定义，但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或许马克思本人并不一定会拒绝对资本做这样的理解，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一般地反对过资本，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这一点，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中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

蒲鲁东认为，资本就是利润和利息，而只要取消了利润和利息，工人的合作社与合作劳动就会消灭资本。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想象的财富，意味着可预期的利润，倘若没有了对于利润的预期，不断扩大的先期投入就是不可能的，要使生产扩大，资本就必须扩大，如果没有资本的扩大，仅凭劳动合作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合作社最终也难以为继。而实际上，工人所缺乏的不是劳动力，而恰恰是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资本”，而是如何利用资本为劳动和劳动者服务，即把资本从资本家的垄断中解

放出来。

恩格斯也曾这样批评蒲鲁东说：

> 他的工人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协作社所能带来的费用上的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蒲鲁东的——引者注）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排斥所有的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这些生产者只能承担资产者的亏损，却不能分享资产者的利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明摆着的异议，他都由于沉醉于自以为是的幻想中而完全忘记了。注

我们一定要记住：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是资本主义。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极为关键。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即共产党人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更不是拒绝利用资本为中国的发展、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服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对资本加以垄断和独占的一种制度，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资本主要也不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异化。

那么，马克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究竟又是指什么呢？

资本是“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货币化的信用和“货币化的道德”。信用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无产阶级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不可能获得信用，信贷完全被统治者所垄断。马克思本人这样深刻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注。

而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一样被异化了，资本不再是生产资料，不再是任何现实的财富，相反，资本主义把一切现实的财富都剥夺（或者转化）为想象的财富或者对于财富的想象——如果用一个中性的说法，也就是把一切现实财富都转化为“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最初是作为“投资人”或者“投资者的代理人”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所拥有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信用”或者说社会对他的“信任”。资产阶级把对于宗教的虔信转变为资产阶级道德法则——“信用”，而“信贷”不过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道德的外化机制而已。

资本主义产生于战争投资，这种战争“债券”是怎样获得价值的呢？杰克·卡希尔指出：

> 与银行业务一样，债券市场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国家。随着市场的逐渐复杂化，一种新的简单债券运作模式出现了。在意大利，城邦国家通过发行债券来偿还债务，特别是为发动战争而产生的债务。套用今天的术语，一个公民买了10万里拉利率为3%的固定利率债券，或“息票”。这种投资能保证他每年获得3 000里拉的回报。在佛罗伦萨，政府多少有点强制性地让公民购买这种债券。皆大欢喜的是，强制购买的性质让公民免去了高利贷禁令的约束，更好的是，政府以及教会允许他们在需要流动性也就是现金的时候可以把债券卖给其他公民。(注)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投资人和投资者代理人的资本家，其所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就很像银行。但是，布罗代尔指出，公营银行和私人银行是根本不同的：在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建立前，公营银行只办理存款和转账业务，不经营借贷或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价证券业务。这些活动很早就属于私营银行的业务范围。而指出这种区别是很关键的，它表明私人银行所建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换句话说，私人银行的信用并不是建立在生产与交换的现实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财富迅速增殖的空头许诺之上，而这种许诺取决于重要事变

（如战争），具有赌博性质，因而往往是不可靠的——正如今天华尔街所发明的那些金融衍生物是不可靠的一样。

“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这也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脆弱性所在。既然离开了重大危机与事变（战争与重大技术革命），它所建立的信用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于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不再是生产资料，而成为财富自动增殖（通俗地说，就是“小钱生大钱”）的魔术，这样一来，资本确实被异化了。它被从生产资料异化为“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但是，这种异化又恰恰将资本的含义追溯到了它的词源、它起源时的隐喻——“头脑”（caput）。

布罗代尔睿智地说，资本发展的历史说明脑袋终究比躯干稍胜一筹，而这就是说，资本作为“对未来财富的许诺”，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经济总是比实体经济稍胜一筹；而当马克思更为睿智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头足倒置”时，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资本分为现实资本、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话，那么，资本家的银行则总是把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而不是现实资本——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特征。

于是，马克思用如此高度凝练的句子来概括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出这种批判的意义和限度所在：

> 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注]
>
> 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还有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注]

如果把资本理解为“利用头脑赚钱”，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缺乏现实基

础的信用制度，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头足倒置”的体制。而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够攫取社会信用、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的信任，绝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投资行为是符合逻辑和数学法则的，但这些法则却是人们头脑的产物。

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欺诈性，依然信任着资本家，与其说他们是受到了资本家的支配，不如说他们是受到了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法则——合逻辑的理性积累法则的支配。这种被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法则所支配的状态，类似于信奉宗教时的状态，因此，它被马克思称为“拜物教”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正是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法则的支配，而这个法则的核心就是资本在流动中的扩张，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围绕着资本扩张进行，并服务于这个唯一目标，因此，它是资本扩张法则支配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

但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不是这样认为的。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是受市场支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领域里，居于支配地位的“神”是市场的法则——供给与需求的法则，而不是资本积累的法则。它们竟然还天真地认为：市场的运行完美地体现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一种纸上谈兵的“供需均衡”。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它采用的那些范畴都是极其抽象的，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康德发明的“先天综合判断”支配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成为这门学问的真正基础。评判经济运动的标准是逻辑，“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注]，因此，经济学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

《康德传》作者库恩曾经说，康德反对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却又认为数学可以有效地应用在哲学里。他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

实际上，马克思同样也是如此。马克思既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采用计算工具，同时又反对用数学的方法代替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是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的，而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但它却完全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我们只要从现实的观察而不是从“心的冒测”出发，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乃是资本投资活动，这种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活动并不是受形而上学的法则支配的，而是受资本积累的法则支配的；资本法则还与现实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相对立，并集中表现为社会上的劳资对立。由于这个极其简单的发现，马克思区别了资本的法则与抽象的市场法则，正如康德区别了“逻辑的矛盾”与“力的真实冲突”那样。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的生产既然是受资本积累法则支配的，那么，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完全取决于资本投资者的判断，因此，评判商品的“价值”，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要看它能够给资本投资带来多少利润和回报。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承认，他们反而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该劳动产品的价值，而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体现为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而这个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又是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计算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仅是过于表面化的认识，还是十足的荒谬见解：如果按照这种计算方式，靠“延长劳动时间”就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话，那么奴隶主和封建主比资本家更容易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他们就更能够积累剩余价值了。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了实现资本投资的利润，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不但可以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可以干脆让工

人失业，更可以通过停顿生产、消灭劳动产品等方式，人为抬高商品的价格。

可见，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方面，采用完全脱离社会观察特别是资本分析的数学计算方法，这是十足的书生之见，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或投机活动，是不受数学法则、逻辑法则支配的。

在历数了马克思的思想成就之后，恩格斯曾经这样感叹：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注)

在这里，恩格斯特别提到了数学。而根据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北京大学马克思数学手稿翻译组编译的《马克思数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数学方面的造诣是怎样的令专业人士叹服。这证明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数学才能的赞美是准确的，绝非谀辞。

不过，马克思研究并思考数学，绝非像后来的经济学家那样，把数学当成客观、明晰和透明的学问，并以数学的客观、明晰和透明来维持经济学的科学性，即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以数学为手段，论证经济学模型的不可动摇。恰恰相反，马克思研究数学，就是为了质疑数学——当然，并不是质疑数学这个学科的正当性，而是质疑它被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之有效性。

数学思维方式的神秘之处其实是：在“质”上不同的东西，在“数”上可以相等，在“量”上可以比较。因此，数学意义上的平等，就是无差异的等同，而绝不是差异的平等。数学方式所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对抗性的世界，是一个无差异的世界。马克思说，根据洛克和斯密，“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

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注]。

如果在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人类劳动之间可以画上数学的等号，那么，一个无矛盾、无差异的抽象世界就产生了，一切交换也就成了“等价交换”。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世界没有差异，那就不会产生交换利润，如果交换活动不能产生利润，则商人这个行当就根本不会存在。

那么，交换的利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交换的利润，就产生于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在交换过程中不能被抹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剩余。

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什么被视为“等价的”呢？实际上，只要抹平了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异性，使得它们在“数”上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看不见了，这样，交换产生的剩余也就看不见了，同样地，交换产生的利润也就看不见了。商品交换就这样成了“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通过把“不同的人类劳动”等同于它们的“劳动产品”，从而在“物”的意义上，抹平了不同劳动之间的差异，进而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这些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数和量的关系。这样，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也就变成了客观的数学法则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对产品的理性计算），而真实世界中的劳资对立也就这样被“等价交换”的数学法则掩盖了。

于是，了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活动之秘密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资本是如何采取形而上学法则支配社会，认识这种魔术般的“虚幻的形式”。

马克思说，在宗教的时代，人们在自己头脑中造出一个上帝的形象，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却造出一个抽象的市场，让它用“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生产和交换，他们似乎

完全忘记了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现实世界是由资本投资法则支配的。资本主义并未发明市场，它只是用计算的方式，抹去了市场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的对立，抹去了尼采所谓“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一次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从这里培养出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意识”。形而上学以抽象的数学推理和理性化，取消了斗争、取消了矛盾、取消了人类历史。马克思说：

>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注]

弗洛伊德（他也是犹太人）从“视觉兴奋”这个角度阐释了马克思的见解，他指出，视觉快感是一种强烈的本能，它使人陶醉于表象，从世界和事物的声色光鲜中获得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有形的事物”而去追求“无形的事物”，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这是人类对于自己“本能”的一种摒弃。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摒弃，人类方才由“偶像崇拜”走向了“观念崇拜”，由崇拜有形的偶像走向了崇拜自

己头脑中的观念。㊟

资本主义社会崇拜的是“资本”，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却说它崇拜的是“劳动产品”，是“物”，是劳动产品的堆积处——商品市场，这是多么荒谬的学说啊！

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形而上学（逻辑和数学）的地位代替了资本的支配地位。经济学取消了社会关系，以商品之间的关系（供给与需求）代替了它。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法则之“客观公正性”，也就建立在数学法则的“客观公正性”的基础之上。正因为资本法则被置换成了数学和逻辑的法则，所以，人们就很难怀疑它，甚至很难发现资本社会其实是用数学的法则来代替了资本的逻辑，因而，正是数学法则的客观透明性掩盖了劳资关系的对抗性。

如果马克思不是一个批判的哲学家，如果马克思的知识不是如此之广博、深邃，如果他对于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形而上学传统没有如此精深的了解、洞察，那么，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资本论》，或许只能写出《市场论》而已——而那样一本著作，或许反而会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奉为“葵花宝典”。但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首先采用数学的方式，将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然后，又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正如从不同的树木中抽象出“树”这个范畴意义，其采用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式，是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因此，这种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想象和幻想。

卢梭认为人生来平等。但马克思指出：人生来平等，却绝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生来是相同的”，因为，人生来平等是一个政治命题，而人生来相等或相同却是个数学命题。

所谓“人生来平等”，并不等于“人生来都是相同的”，因而是“相等的”。这首先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这种事情在现实中

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出两个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人。卢梭自己也承认自然差异性，即人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只有被还原为数字，才能等同，正如只有通过取消社会关系，只有每个人在逻辑上被还原为"抽象的人"，才能等同一样。而这种还原，首先就取消了人，即取消了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的人，而那种观念上的、数字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实际上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说，"人类平等"，这个法则的确立其实是商品社会的需要，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人作为抽象的劳动力"是相同的、是可以等同的，它也意味着应该根据"一般劳动时间"的标准，无差别地支付工资，因此，这种"平等"，不过是将不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不过是把人视为"无差别的劳动力"，并在"劳动力"的意义上抽象地等同起来罢了，而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注]

要把不同的人在"劳动力"的意义上等同起来，从而把不同的人类劳动在"一般人类劳动"的意义上等同起来，需要一个"公约数"，即马克思所谓"一般等价物"，而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五床等于一屋。"但是他马上就补充说，这绝不是说"床就是屋子"，而是说5张床等于若干货币，而这些货币又可以换一间屋子。亚里士多德知道，床与屋子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同劳动的产物，之所以要假定在床和屋子之间存在等一性，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等一性，也就不能交换，没有可公约性，就没有相等，因此，也就没有形式上的公平交换。这就是说，货币作为数的公约性，或者作为一般等价物，不过

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而这种需要就是交换的需要。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识到了最简单的事实："床不是屋子"，本质上不同的劳动产品是不能等同的。这是因为希腊人建立价值尺度的基础不是抽象的逻辑，更不是数学，而是政治学，而在政治学的视野里，人是划分为不同阶层的，因而是从事着不同职业、不同劳动的人，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更是不能等同的。

在古希腊，货币还不是支配社会的"唯一的神"，劳动力还不是商品，故而，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产生"不同的事物在抽象的数和量上是等同的"这样奇怪的想法。

但是，商品社会里的人却不能了解这样简单的道理，这是因为：在商品社会中，作为劳动力的人成了商品，而把人还原为"等量劳动力"的依据归根到底是数学；作为劳动力的人因此变成可以计量的，即在数的意义上是可以等同的，而且，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为数学是客观的、明晰的、透明的。[注]

但数学绝不是透明的。一个著名的经典故事说明了"复利"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故事说的是：某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个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在棋盘上的第一格放一粒米，接下来每一格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满所有的空格。国王以为这微不足道，就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到21格时，米粒数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在41格之后，整个世界的米都不足以填充其余的空格了。这个故事的一个结局是，国王只好砍了象棋发明者的头，但这个故事说明了复利的力量多么容易被低估，当数学被用于按揭贷款时，在复合增长的后期，债务或利息加速的情况出乎意料。

1202年，来自意大利比萨的商人列奥纳多·菲波纳契出版了《珠算原理》一书，首次向欧洲介绍了"印度算法"系统，从而把复利概念引入了欧洲，它加速了商业变革，也使欺诈变得更容易。

由于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少了解，因此，人们就忽视了如下重要问题：数理逻辑是资本社会中占支配性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而资本法则的最抽象的合法性表述就来自数学，来自数学法则对于现实中占支配地位的“劳—资法则”的取代，来自形而上学对于现实中政治关系的取消。经济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特征，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他采用这个概括，一举抓住了资本社会的要害：以无矛盾的描述来掩盖劳资矛盾的对抗性，以数学取消了政治学，这便是把阶级统治转变为“数目字管理”。

“密那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这句箴言的意思是：“哲学是在希腊城邦政治崩溃时产生的”，从此，形而上学代替了政治学，而数学作为解释世界的方法，其要害并不是揭示了现实对抗，而是神秘地掩盖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特别是资本支配劳动这种现实政治性。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从事不同劳动的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是不能等同的，而就阶层而言，他们之间也是不平等的。

与“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明显的剥削不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只要臆造出“一般劳动”这个形而上学范畴，只要抹平了工厂里工人的创造性劳动与抽象的一般劳动之间的差异，剩余价值就产生了，因为一切工人工资其实都是按照一般劳动的标准支付的，而一般劳动作为价格尺度，只是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根本就不是对工人实际劳动创造的评价。

《资本论》第一卷从“产业资本”入手，做出了这样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产业资本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差异的体系：（1）工厂里的工人集体劳动与单个工人的劳动相加是不同的；（2）劳动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给付的工资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空间的差异”，后者是“时间的差异”，而剩余价值就是从这两种差异中产生的。尽管上述两种差异是很难被看到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异，也就看不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分析说：一方面，资本家占有的是工人在工厂里集体劳动的成果，但却按照每个工人个别的劳动分别给付工资。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是在劳动场所进行集体协作劳动的，而“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注]，资本家获得的，就是这种集体协作产生的生产力，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是按照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力的平均数来计算并给付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的采用都是协作劳动的产物，它无一例外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使这种“时间的压缩”产生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却被“一般社会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两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范畴掩盖、抹平了。

真正的“集体协作劳动”产生的生产力，与每个工人个别劳动力的简单相加（一般劳动）这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或者说是不平衡，如果看不到这个差异和不平衡，也就看不到真正的剥削和产业资本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确实是很难被发现的。故而，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根本就不必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蹩脚的作弊来达成，他只要老老实实按照一般劳动时间分别给付个别的劳动力工资就可以了。“一般劳动”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标准，它的决定权、计量方式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资本家总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付的工资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标准给付的。

另一方面也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劳动开始前谈好的工资，与劳动结束后实际给付的工资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而给付时间上的差异同样会产生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工资”作为对劳动力的投资，一开始并不表现为货币工资，而仅表现为劳资双方确立起来的信用，体现为由出资方主导的一纸契约（有时连一纸契约也不存在）。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

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事实上，资本家是事先从工人那里取得了贷款——这就工人预付的劳动力，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注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是资本家有意无意的“帮凶”，首先就是因为它所制造出的“一般劳动”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这个尺度严重低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资本家可以这样辩解说：“一般劳动”作为评价标准，并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制定的。但是，一旦让劳动力市场去决定“一般劳动”的价格，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势必会被进一步低估，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量也会进一步被低估，而这些被低估的劳动力和财富当然是统统被资本家占有了。

同样地，“一般劳动时间”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目的，乃是给资本家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是为工人提供劳动机会——所谓“一般劳动”和“一般劳动时间”，其实就是卢梭所谓“树”的概念，以及尼采所指出的“圆”与“三角形”那种东西。马克思说：“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注。

于是，马克思感慨万千地写道：

>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

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绝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价值”像语言一样，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像象形文字一样，掩盖了社会关系的对立，并把这种对立理性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里之所以要用“感慨万千”这种说法，当然是因为：马克思当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即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用数学、形而上学的方式观察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用形而上学臆造的“市场”这个范畴，用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这个道德法则上的契约，从而掩盖了“资本”对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对于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而言，是完全有效的。

在马克思的时代，数学、语言学和逻辑学这三门学问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学科——形而上学，马克思的贡献是将经济学也加入其中，故马克思方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必须从揭示古典经济学掩盖了什么入手。

正是为了揭示古典经济学掩盖了什么，马克思方才开始创作伟大的《资本论》。

## “挤垮”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风格，与他是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排除在欧洲政治领域之外的，是被整个主流社会所排斥和反对的。同时，出身于犹太先知世家的马克思承袭了犹太拉比的智慧，即自信自己在思想和智慧方面有着欧洲布尔乔亚社会中人所不及的能力。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竟然出身于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这只是历史戏剧性的一面，更为奇妙的是马克思家族堪称辉煌的宗教背景：马克思的爷爷迈尔·列维·马克思和伯父萨缪尔·马克思都是犹太拉比，马克思的奶奶叶娃的父亲则是欧洲最著名的犹太拉比莫泽斯·里沃夫，而且马克思奶奶的家族做拉比的历史可以上溯100年。也就是说，从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上溯8代，马克思家族世世代代都是拉比，直到卡尔·马克思为止。

“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注]马克思本人究竟是不是个先知值得讨论，但是，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先知世家这件事，却是完全毋庸置疑的。

我们还知道：在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的时候，即18世纪中叶的普鲁士，犹太人是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当时只有效忠国家的纯正基督教徒才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因此，只要回溯几十年，马克思一定会被这种严格的“政审”挡在大学校门之外。

1835年，马克思上了波恩大学，随后，他以“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为题写了一篇极具创造性的博士论文，并在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差

异”和剩余问题，这决定了马克思后来思考剩余价值问题时采用的那种独特方式。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时只有23岁，实际上，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首先是作为“普鲁士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而载入官方档案的。

马克思积极申请博士学位，自然是为了遵循父命，即希望能够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但是，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人们往往将此归因于当时的马克思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活动，特别是受到了布鲁诺·鲍威尔那个反宗教的激进小团体的牵连。但实际情况远为复杂。由于不能成为大学教师、知识分子，马克思才不得不去办报纸谋生，从此他成了“知识民工”、学者中的无产阶级，一生颠沛流离。

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深刻地研究了欧洲史，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命运。由于犹太人一直受到现实政治的压迫，于是他们只能退回到观念的世界，犹太人最擅长抽象的工作，就包括数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犹太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者”，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样地，那些指斥犹太人是无耻的放债者、道德堕落的高利贷者的人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实质，恰恰就体现为犹太人的道德。马克思这样指出：宗教的美德是“虔信”，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则是“信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就是“信贷”，“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是一种道德学说，斯密《国富论》的基础之所以是《道德情操论》，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康德“内心的道德法则”改造成为“信用的法则”，并落实为金融信贷机制。

在阅读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时，马克思指出：犹太人和资本家真正触及了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的实质——在信贷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是货币财富，而是一个人的道德和声誉，于是，在信贷活动中，道德一方面成为“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而另一方面又成为可以抵押和买卖的物品：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做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

> 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注]

可见，在欧洲宗教里面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这种思路其实是由马克思开创的，韦伯只是部分地沿袭了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尽管韦伯总被说成是“独自开创”了一种与马克思“截然对立”的思考资本主义的方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以极其特异的方式谈到了无产阶级，并第一次给无产阶级下了一个拗口的定义。马克思这样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注]。

马克思这句拗口的命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当年的犹太人可以凭借勤奋和发财致富，最终被欧洲主流社会勉强接纳，即可以由一个“犹太人”变成一个“基督徒”（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由犹太人转变为基督徒），并且把自己的道德法则——买卖和投资原则扩展为欧洲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

>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注]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无产阶级代表着现实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代

表着社会最真实和具有决定性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它是“市民阶级”；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人数过于庞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增加——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历史地决定了无产阶级完全不可能像原有的市民阶级（如历史上的犹太人）那样挤进主流社会，并以经济上的成功弥补政治压迫造成的亏空，于是，在这一点上，它又绝不可能成为“市民阶级”。

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洞悉了自己的命运，也洞悉了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制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规模限定在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束缚中，而这就是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于是，刻意造成大量过剩人口和大规模失业，这既是资本家的利益使然，更表明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狭窄性与落后性，因此，只有通过实现充分就业，解决被资本家刻意制造出来的过剩人口问题，才能发展和扩大生产力，而只有消灭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最终解决过剩人口和失业人口问题。

犹太人政治上“无权的焦虑”可以为其经济上的成功所抚平，但资产阶级却把自己经济上的成功，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失业、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全面被压迫的前提之上，无产阶级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不可能被追求金钱与物质生活的冲动所转移和替代，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过于狭小，也不能为他们提供饭碗。正是由于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政治和经济焦虑才是无法被抚平的，社会的危机和经济的危机状态成为日常性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不改变，人口数量如此庞大而且随着生产力发展日益增加的无产阶级，就绝不可能“挤进”欧洲主流社会，无产阶级更不可能用“市民社会的经济原则”去改造欧洲主流社会，恰恰相反——人数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只会“挤垮”既有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正如马克思后来预言的：生产和交换的日益扩大，会“挤垮”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体”。

马克思最为惊世骇俗的发现，看起来其实是最顺理成章的——这个

发现、这个学说，可以简单地称为人类社会运动的“挤垮”理论：

>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注)
>
>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注)

马克思曾痛心疾首地批判犹太人，这是因为犹太人的政治解放意识完全被形而上学和金钱——“犹太教禁欲主义”抑制住了，所以，马克思寄希望于“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非市民阶级的市民阶级”——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要么是现存秩序消灭“过剩劳动力”——无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消灭现存秩序，这二者必居其一。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化倾向，指出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就是康德的“内在道德法则”。但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肯定、援助却都不是道德性的，他毕生反对把历史和现实的革命斗争道德化，他反复提醒我们说，那种把无产阶级看作“救世主”和道德力量的说法，乃是十分有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指出：

>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注)

问题在于虚心地聆听无产阶级这一“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问题在

于让无产阶级自己说话，让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为无产阶级“代言”，幻想着去“解放无产阶级”。马克思对待无产阶级的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在苏格拉底看来，所谓“辩证法”不是说服的技巧，而是激发人说出自己的话。后来被柏拉图称为辩证法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叫“助产术”——帮助分娩的艺术，意思是帮助他人提出自己的思想，同时聆听他人的声音。

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哲学就不再是聆听他人的声音，而是成为代表真理的唯一声音。辩证法为哲学所垄断，而不再是让人民自己说话。于是，在马克思看来，让无产阶级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城邦政治的复活，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就是对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消灭：

>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
>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注]

与马克思相对立，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必须得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引导和教诲。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引导和规划下对社会进行的科学改造，而这种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无产阶级培养、改造为有道德、守规矩的“市民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欧洲所流行的就是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年）这篇文章中，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便把人类分为三个阶级，其中第一个阶级“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它“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前进”；第二个阶级是反对任何改革的财产私有者；第三

个阶级则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人们，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主要是穷人和无产阶级。可以看出，这三个阶级中，第一阶级掌握着知识，第二阶级掌握着权力，而第三阶级却既无知识又无权力。如果过去的人类历史是第二阶级统治第三阶级的历史，那么圣西门的想法是：现在，这种现状可以通过让后两个阶级都上升到第一阶级的方式得到改变。

圣西门和一切空前社会主义者当然都没有看到，资本家是如何“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的，他们没有看到知识、科学是如何通过资本化的方式成为第三阶级的对立力量，他们更不可能认识到学者和教授们制定的那些抽象的法则，如何掩盖了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从而一如既往地帮助着第一阶级、坑害着第三阶级。而圣西门天真的想法竟是：在牛顿的墓前设立一个募捐会，由捐款人提出三个数学家、三个物理学家、三个化学家、三个生理学家、三个文学家、三个画家和三个音乐家的名字，并把募捐的款项分给得票最多的前三名数学家和前三名物理学家，以此类推。(注)圣西门认为这些“有天才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的“照明的火炬”，他们的地位应该高于最有权势的人。而第三阶级在他们那里，无非是为了确立学者们的统治地位，搬出来吓唬统治阶级的“纸老虎”。圣西门说：如果第二阶级不资助第一阶级的学者和艺术家，使之得到尊重，那么第一阶级就会和第三阶级联合起来迫使他们这样做。他这样恫吓统治阶级说：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要把那些没有财产，但以重大发明证明自身优越智慧的人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就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当然，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中已经发生，“科学的资本化”进程已经说明了科学家的发明是如何帮助了资本家，而陷工人阶级于彻底的不利。

不过，“好心”的圣西门紧接着要求：用科学和知识去改造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即让第二阶级通过科学和艺术上升为第一阶级，第三阶级则通过掌握知识和文化的方式上升为第二阶级甚至第一阶级。圣西门认为：富人对穷人的优势只是知识上的优势。他竟然天真地劝诫劳动者

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只用少量时间从事学习，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而当你们成了有知识的人以后，就能削弱富人对你们所占的优势。"[注]

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社会再生产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抗，社会压迫的根源也不是资产阶级及其雇用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不是他们制定的社会法则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支配。在他们看来，垄断着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寄生虫们对于社会和劳动的支配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眼里，知识仅仅是知识者的特权，而劳动则是劳动者的宿命："这就是你们（指无产阶级和穷人——引者注）所说的：我们的人数比有财产的人多10倍、20倍甚至100倍，可是他们施于我们的权势要比我们施于他们的权势大得多。……可是……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为了共同的福利，应当按照文化程度分配权势。"[注]"你们要对给你们做出你们认为是有益事情的人（指有科学发现的科学家等——引者注）表示尊重，即自愿接受他们对你们的一部分统治。你们和一切人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没有十分明确地划清暂时有益的事物和长远有益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局部有益的事物和全局有益的事物之间的界限，以及使一部分人损人利己的事物和一部分人提高全人类幸福的事物之间的界限。总之，你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到，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注]最后，他们终于这样说：为了所谓的"人类共同利益"，就必须牺牲穷人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注]

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同时，马克思还无情地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虚伪。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完全不可能仅凭"道德感"和"同情心"去帮助无产阶级，这些道德的空话，除了显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德的优越感是一种不道德之外，实际上什么作用也没有。因此，他提醒无产阶级说：不但要"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还必须"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对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把工人改造成市民阶级，就是将劳动者上

升到社会再生产领域的说法，马克思批判说，无产阶级不是要成为社会法则的制定者，无产阶级根本不想成为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重建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历史联系，是为了通过造就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深刻地指出：

>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注

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从现实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无产阶级，这深刻地启发了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学说的要害也在于把人们从心灵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斗争的意志从理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柏拉图那种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哲学，而是继承并发展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是十分有害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产士”。按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十月革命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发生的哲学论断。同样，中国并没有大量的无产阶级，中国更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哲学条件”，但是，无论在俄国还是中国，却都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都处在人民如果不革命就活不下去的状态，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列宁和毛泽东倾听着人民的声音，站在了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哲学”一边。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不是绝对真理的代言人，而是人民的声音的聆听者。毛泽东说：“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马克思则说：“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

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注]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的欲望，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的政治能量，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离经叛道”的阶级斗争。他们的当务之急，恰恰是要避免无产阶级的“犹太人化”，即把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欲望，引导到对“救世主”的偶像崇拜和对“社会美德”的迷信方面去——引导到一种“禁欲主义”的方面去。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上，马克思曾经对裁缝出身的工人慈善家威廉·魏特林大发雷霆。当魏特林滔滔不绝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圣徒”般的形象时，马克思这样打断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受苦者修为“圣徒”，问题甚至也不在于去救助失业工人，而在于满足工人的劳动要求，即给工人以工作，因为只有丧失劳动能力者才需要救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在于：它把大规模的劳动者视为“过剩人口”，从而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家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慈善家，使得工人以为正是资本家施舍给自己工作和口粮。而作为“工人领袖”的魏特林现在要扮演的“圣徒”形象以及他所采用的宣传手段，其实与资本家制造幻象的伎俩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说：仅凭空洞的宣传伎俩，只会制造出虚幻的偶像，如果只是唤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放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反而会徒然给他们带来灾难。

当魏特林炫耀工人是如何把他本人而非任何理论当作“救星”时，马克思干脆指责说：无知完全无济于事！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刻意造成的，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人能真正救济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

马克思这样指出：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行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等于社会慈善事业，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工人阶级的组织更不是红十字会那样的慈善组织、社会救助组织。恰恰相反，过剩人口、大规

模失业的出现，是由于现存体制过于狭窄。于是，关键不在于通过慈善和救济去安抚失业者，也不在于把无产阶级教育成学者和哲学家，而是摧毁现存资本主义体制。

在马克思眼里，无产阶级的形象，其实也就是拉伯雷笔下的“庞大固埃”，是人类求生意志的代表者，现代性在拉伯雷的笑声中诞生，带着穷人咕咕叫的肚子的唯物主义。在弗洛伊德看来，压抑人的本能的社会就是一个变态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的变态社会，它的社会法则无非是拒绝满足大多数人起码生存欲望的假道学和伪善。如果一个社会把大多数人的求生本能和对劳动的要求看作“恶”，那么，马克思断言：推动历史发展的就是恶而不是善，造成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正是社会“坏的一面”，绝非“好的一面”。

而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一种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工程，工人阶级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该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来实现，而不必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努力扩大现存社会“好的一面”，而尽可能消除现存社会“坏的一面”，就是把无产阶级提升为有道德、有知识的市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也大都是呼吁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好人”，而他们的工作便是努力帮助、教育无产阶级改掉恶习，努力“做好人”。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论魏特林、巴枯宁、拉萨尔还是蒲鲁东——其实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好人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同时代的“好人社会主义者”之全体的批判。在蒲鲁东看来，大规模的过剩和失业人口，其实可以自行组成非正式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甚至可以是非政治的，甚至也可以是非生产性的，比如合唱团、健身俱乐部等，但恩格斯说：“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注]这样一来，“后现代社会”（如今的时髦说法）就代替了劳动社会，失业就成为

娱乐，它接近于度假。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饿得奄奄一息的状态，完全不是一种哲学的状态。主张“贫困的哲学”的“好人社会主义者”要剥夺无产阶级的求生意志，以便使他们的灵魂升入道德的天国，但是，马克思却要唤醒无产阶级的求生意志，使他们在现实阶级斗争的大地上复活。[注]

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史无非就是围绕着劳动产品而斗争的历史，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史。离开了“生存斗争”这个主题，经济学就成了布道。当经济学家们用数学、逻辑和科学的语言来美化市场的供需均衡，进而去美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们就是把经济学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在类似于神学布道的基础上。取消了意志，即斗争，就取消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教授们与封建社会的辩护者——教士们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注]

马克思指出，观察那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能凭借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法则”，当然也不能用数学的法则，因为这个在爆炸中解体和生成着的社会遵循的是星空的法则，它

的本质是能量的扩张，是阶级力量的对抗，而这个能量和力量要冲破的，正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法则：

>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正是从物理学的角度、从浩瀚的星空的视野、从力量和能量的角度看去，无产阶级代表了这个不断分裂和生成的世界的本质。只有消灭过剩人口、实现充分就业，才能扩大生产力；只有消灭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消灭失业人口。如果不是这样去观察，而是相反，即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中“坏的一面”的表现，是过剩和负担，这样的思考方式其实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认为，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种困难是暂时的、偶然的……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他们这样说：只要无产阶级肯辛勤劳动，只要他们肯好好学习，那么，他们或早或晚，就可以上升为“市民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过就是重复了这个论调而已。

回顾历史，马克思指出：经济学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学说，即它本质上便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这种“恶”的理论，恰恰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维科率先提出来的；资产阶级恰恰忘记了，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是封建主义“坏的一面”，因为在封建阶级看来，资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师傅、贩夫走卒、高利贷者，相对于农夫和地主而言就是“完

全多余”的，是封建社会中“人口过剩”的那一部分。而资产阶级自己却并没有通过“好好学习”地主的知识，即通过老老实实地遵从封建社会的社会法则，从而上升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力量——地主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听从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教士”们的劝诫，那么，历史的进步就不可能出现了：

>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注]

在这个意义上，“好人社会主义者”把劳动者阶级视为慈善救济对象，并力图用资产阶级的道德去感化他们，这些人绝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是资产阶级的说客，他们以道德家的面目否定面向社会进步的阶级斗争，以宗教和道德说教掩盖现实世界的分裂与解体，而这除了涣散无产阶级的斗志之外，绝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

列宁认为，制造出大量的过剩、失业人口，不是因为劳动者缺乏知识，更不是由于穷人生来道德堕落，即使他们缺乏知识、素质低下，这也不是劳动者自身的罪过，因为这不过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性，暴露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能满足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这种最起码的权利，因此，这种制度必须被推翻。

列宁说：

> ……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注)

## “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

>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
>
> ——马克思

资本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本能”，这种扩张采取了两种基本形态：其一是生产品的扩张；其二是货币发行量，即“流动性”的扩张。《资本论》的头两卷主要探究了第一种扩张的形式及其后果，《资本论》第三卷则集中阐释了后一种扩张及其后果。

因此，我们倘要研究经济危机，应该侧重阅读《资本论》前两卷；若要思考金融危机，则必须重点阅读《资本论》第三卷。因为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金融危机则表现为“流动性过剩”。

资本的扩张，虽为“本能”，但却绝不可能凭空发生，它受以下决定性因素的制约：（1）新技术的发明；（2）新能源的发现；（3）新市

场的开拓；（4）新的劳动力的涌流。正是这4点造成了资本扩张之持续性，即扩张所造成的产品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又会被新技术的发明、新能源的发现、新一轮市场的开拓和新一代劳动力的涌流所吸收。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循环的延续，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扩张的周期性”，或者所谓经济发展的“长波”。

因此，即使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即使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只要新技术能够被发现、新能源能够被开发、新市场可以通过无论什么方式被打开、新的劳动力再次涌流出来，“过剩”就可以被这些新技术、新能源、新市场和新涌流吸收，资本主义便会安然度过危机阶段，重新开始新一轮扩张。

对于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各类学说，马克思这样提醒说：社会阶级矛盾和区域差别，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区域差别和社会差别反倒是促使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只要存在区域和社会差别，就存在生产力扩张的空间，经济的“上升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结束。

而对于那些“市场主义者”来说，经济危机不过就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契机”，经济危机总是会自动地安然度过。马克思则这样批驳说：“复苏”和新一轮发展，完全取决于上述4个基本条件和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在无情消耗这4个基本条件和前提，直到这些前提被耗尽。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不但总是与阶级差别的扩大同步进行，而且总是与无产阶级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同步进行——直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有能力联合起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止。

“资本主义之死”，或者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将采用两种形式。第一种：世界市场已经开发殆尽，新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涌流式出现，新技

术和新能源开发日渐迟缓——总之，促进“复苏”和“发展”的4个基本前提日益耗尽，“最后一块处女地”也被开发完毕——在这样的情况下，产品和流动性的过剩最终将缺乏上述4个方面的吸收和支持。这样一来，危机就再也难以度过，资本主义周期如同停滞的钟摆，丧失了左右振荡的空间与动力。

“资本主义之死”还可能采取第二种形式，那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壮大到这样的程度：不仅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世界市场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自主生产和支配着全世界绝大部分劳动产品，而资产阶级则沦为纯粹的消费者和依赖者，成为纯粹的借债消费者和债务人。“产品的主人”和“货币的主人”之间的全面对立，也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即达到了生产者不愿再生产下去，而负债消费者无力再消费下去的程度——到了这个时候，掌握世界绝大部分产品的劳动阶级就可以通过改变产品的流向和分配方式，着手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作为“债权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关键历史使命就是：重新制定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彻底改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今天，在资产阶级那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那里，大量的土地被闲置着，大量的资源被埋藏着，大批的新技术成果被保密着，大量的产品被惊人地浪费着——生产力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要度过危机，除非剥夺剥夺者，因为即使今天全世界都退回到奴隶制，奴隶劳动也不足以让少数发达国家维持其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扩大以及生产和交换的扩大，最终将“挤垮”现存世界秩序，新的社会关系在旧社会的母体里破壳而出。

无论哪一种崩溃，资本主义的崩溃都只能是世界性的，而不会是区域性的，正如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在局部的危机中诞生。这就是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注

在马克思看来，"总危机"的到来，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全球化，即它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只有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中，方才能够产生出一个有能力生产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最终将无法被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包纳——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才能使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外壳被"挤破"成为必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变革的前提才算真正开始具备。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第三世界"不可能"挤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第二世界"也不行。由于上述"两个世界"都不得不认同"第一世界"所制定的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所以，资本主义并不会被另一个外在于它的社会体系击溃，恰恰相反，只要社会再生产的垄断局面没有根本性改变，所有的"隔离带"最终都将变成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女地"。

新世界只能在旧世界的母体上破壳，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外部另行建造起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商品生产市场上，勇敢地与资本主义展开激烈竞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是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前提的。因此，邓小平方才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是，一方面警惕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一方面扎紧资本账户的篱笆，同时积极主动地开放商品市场，积极参与世界商品生产市场的竞争。因此，改革开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自我封闭起来"搞不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其中的深意，却只有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争夺全球商品市场的方式，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前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在于：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军事上坚持独立自主；第二，在金融领域守住资本账户；第三，在商品生产市场上开放竞争。

马克思曾经预言说：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两极相联”关系，是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要害，这种“两极相联”关系是人类现代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支配现代世界的基本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所占篇幅并不少——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

自1851年8月起，马克思受邀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专栏，当时该报的总编辑葛瑞里正醉心于社会主义，执行编辑达纳则于1848年与马克思在科隆有过一面之缘，印象十分深刻。于是，马克思欣然应允了他们的邀请，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写下了一系列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波斯和中国》和《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后两篇系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撰写）等。

写作《资本论》的同时，马克思还在大英博物馆里大量搜求中英贸易的相关资料。无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计数据，还是英国议会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以及远在万里之外的广州和北京的报道，马克思无不一一穷尽。他不懂汉语，为此不得不用英语来写作。马克思为撰写这些文章殚精竭虑，以致恩格斯后来曾经这样抱怨说：美国人为马克思的文章所付出的报酬，与马克思的辛勤劳动完全不成比例。

尼采曾将康德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面写作《资本论》，一面为中国仗义执言的马克思，是否应该被称为“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呢？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作，他借助美国报纸，却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反复申述了如下观点：英国的对华贸易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因为英国的目标绝不是贸易，而是通过毒品贩卖这种手段彻底打垮中国，涣散中国的国家能力。英国打垮中国，是为了确立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因此，鸦片战争绝不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权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摧毁和破坏。

正因为英国的目的不是交换，不是贸易，而是“惩罚中国”，是摧毁中华帝国和中国文明，所以，鸦片战争的目的甚至不是开拓市场，而是破坏中国市场，但是，这却反过来破坏了欧洲的生产与出口。

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出现了：当中国市场被英国的大炮摧毁之后，欧洲的商品也就没有了销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崩溃，便因此与1848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了。

马克思说：

> 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注]
>
> 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注]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从“全球市场”的视野揭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假

如有一天，中国掌握了世界生产和交换的绝大部分内容，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能发展，因为这样一来，既有的世界资本主义框架就会被挤破。

这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兴盛，就取决于东方，取决于中国。人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其实是说：只有中国的市场以及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将资本主义从资本过剩的穷途末路中拯救出来。

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的这种视野，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与日本客人谈话时就这样指出：

> 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

而当马克思预言说只有中国才能使资本主义从内部崩溃时，他想说的其实是，一旦中国开始利用其庞大的市场以及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早在1858年，马克思就预言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

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注)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两极相联”规律之实质：

>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指黑格尔——引者注），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
>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引者注）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绝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注)

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两极相联”规律，马克思则赞誉黑格尔这个朴素的发现是“真理”，因为马克思预言中国的加入最终会挤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论这种看法在150年前听起来是多么怪诞，但150年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却认同了这一朴素的发现，因为他真的看到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是真的。

奥巴马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同样的

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注)

奥巴马的主张起码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停止发展，以此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否则，人类就会陷入悲剧。但他似乎忘记了：发展权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奥巴马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悲剧”，其实就是美国的悲剧；“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这不过是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美国作为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者，总是以“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口吻说话。按照这样的立场，人类的1/5就不算是“人类”，中国的3.　75亿劳工（主要是农民工）要过上人的日子，就会使一亿美国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如果换个角度看，这难道不是说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不可避免的伟大复兴，就意味着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或已经崩溃吗？

我们所谓“大国崛起”，绝不是指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这样的游戏不会再重复下去了。我们的“科学发展”当然不是像美国那样把世界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但我们更不会按照任何人的要求，甚至为了维持美国资产阶级剥削全世界的“好日子”，从此就停止发展自己。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是创造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所说的“大国崛起”，首先是指必须满足3.75亿中国产业工人——生产着世界上一半工业品的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欲望。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群体，这样一种庞大的生产能力和能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英国的GDP不足清王朝一半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霸主；当美国生产了世界上不足1/4的工业品的时候，它已经统治了全球。同样地，这样的劳动者群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恩格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欧洲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且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与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处

于利益对立，因而难以联合这样的难局。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人口很少，那里的工人阶级只是为苏联生产，他们仅仅是苏联工人阶级，而非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今天，只有今天，中国的3.75亿产业工人方才是在为全世界生产，他们才是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世界劳动者阶级的阵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庞大过。

当“中国工人”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是自该刊发行以来，一个群体、一个阶层而非一个人首次借助它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表明：今天，中国劳动阶层的联合，第一次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真正成为可能；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扭转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变人类发展进程，也第一次成为可能。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法从外部摧毁。今天的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商品市场的核心，但中国还是不可能“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正如中国的3.75亿世界商品生产者不可能挤入“全球市民社会”一样，于是，中国的崛起只能挤破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这就是马克思的预言。于是，今天，中国再次迎来了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发展的现实条件提出的。它的核心，就是以马克思的方式来思考和表述现存世界。

当然，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夜。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刚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破壳的历史进程中，全世界人民都必须增强危机意识甚至是困难意识，做好过苦日子和应对重大危机事件与事变的精神准备。

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这次大危机，这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手段提前用尽了。

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这一次空前的危机，这是由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特别是由支持资本扩张的4个决定性因素均已消失所决定的。

首先，像开发美洲新大陆、殖民地扩张、开放社会主义阵营那种推动世界经济大扩张的机会，今天已经基本渺茫了。需要重新开发的世界市场，除了南北两极和非洲之外，余地不大。众所周知，依靠南北两极和非洲的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极其困难的。

当今世界，除非对美国本土所垄断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再分配，除非对欧洲进行资源开发和再分配，否则世界经济便没有出路。但是，那就等于挖掉了现存世界秩序的根本。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让少数发达国家承担发展和危机的代价，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依靠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余地已经很小，且不可预期。何况正如马克思早已经指出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从来就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特点，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势必影响世界经济规模，进一步导致失业扩大。

再次，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趋势，但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可能下滑，导致消费水平日益受到制约。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的提速、超速发展，会导致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它直接反映为生育成本上升，从而造成人口下降，这一“矛盾共生”的自然规律并非预言，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

最后，21世纪中叶石油资源行将耗尽，同时世界煤炭资源也将耗尽，即使有新能源开发出来，也难以支撑现有世界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的规模扩张。按照热力学定理，熵的增加将与能源的耗散达到均衡，这意味着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

中国要带领全世界走出“总危机”，所面临的挑战、所承担的责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挑战，绝非如同使得14亿人特别是3.75亿普通劳动者

分享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是如何通过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产品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通过加快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两者彼此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后一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仅靠中国一国就可以完成。

在世界商品生产市场的竞争中失败之后（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攻守关系的第一次大转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将采用两种方式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失败命运：一是金融掠夺，二是帝国主义战争。

货币金融扩张导致流动性过剩，使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这几乎就是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能，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疾。马克思说，这个痼疾从一开始就埋藏在私人银行制度的机体之中。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到了这个痼疾：

>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当·斯密曾说：
>
>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就像同一些货币能够用作等于其价值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一样，它们也能够用作依次进行偿还的手段。”
>
>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过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注)

马克思在这里讲解的是：私人银行制度为什么总是与“超发贷款”，即“流动性过剩”紧密相连。

我们知道：银行的产生和金融业的发展，其根本的起因是将社会闲置资源集中起来，再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面去，以减少资源浪费，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因此，银行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依托现有存款”发放贷款。但是，银行从一开始就容易无意或者有意地忽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大量的“贷款”会以各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存款”。

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忽视了这一点，即并没有对应地扣除或者冻结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是把贷款当成了存款，并以这种貌似存款的贷款为据，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同一些货币“可以完成多次借贷”的现象，也就是说，同一种货币在银行手里就会成为“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这便是所谓的“贷款乘数效应”。

由于把贷款作为存款，并以此发放新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银行似乎可以创造无穷的货币投放，从而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最终便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贷款乘数效应”是一切银行都难以克服的痼疾，中国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避免，但是关键在于，银行和金融机构是警惕地防止资本过剩，还是处心积虑地制造资本过剩。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先生曾经这样指出：

> 中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以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则相当于初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注]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处心积虑地制造资本过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转变为“非银行性

金融机构”，它们将从银行手中获得的低息贷款再次以高利贷的形式贷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息。银行与跨国公司联手放贷，使得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从此局面再也无法收拾。

当今世界金融体制还有着其特殊的缺陷，那就是它以美国一国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中心货币，这必然导致作为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为了一国利益而牺牲全世界的利益，丝毫不负责任地超量发行货币。美元超发已经成为当今的“世界公害”。

尽管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但是，相较当今世界金融海啸般的流动性过剩而言，中国的生产能力却无异于杯水车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制造着海啸般的公共债务；另一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矿产资源不开发，大量高科技产品不肯出售，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愿缩减，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富可敌国的日子丝毫不肯动摇——指望在现有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现存国际资本主导下的政治体制的支配下，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来拉动世界经济，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目前世界证券市场上流动着天文数字般的过剩资本，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不是以我为主、积极创新，改革不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而是被动地开放资本市场，那么，中国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美国资本吸纳殆尽——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崩溃即是一个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关系，就表现为货币与商品生产的对抗、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抗、发行信贷的金融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对抗，最终，它必然表现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集团与生产国集团的对抗——而这就是当今世界北方与南方的对抗。

今天，这种对抗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支持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

国民财富以支持股票市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

>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注

今天的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在“资本主义”和“野蛮”之间做出抉择的关头，到了必须在资本与劳动、资本与人类文明之间做出抉择的历史时刻。

民主的实质是“无权利则不纳税”，发达国家想要继续消费中国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就必须给中国以相应的权利，就必须承认现存的世界秩序需要改革，就必须承认：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以金融垄断为实质的“西方中心论”必须终结。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首先就意味着：不再把空洞的“美国符号”作为生活的价值和精神的家园，不再把美国梦作为逃避现实的渊薮——最后，方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把商品以美元定价。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是一个著名的穷国，而最大的负债国却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欺骗的话，这种欺骗绝不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者“延长一般劳动时间”那种小小的欺骗——这是因为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欺骗，人被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所欺骗。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

如果人们还不习惯于独立自主，那就是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木脑袋倒立着行走"。如果人们还不习惯民主的扩大，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如此，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许会这样教诲我们：今天，西方资产阶级除了在社会再生产领域里拥有的优势之外，已经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了。无产阶级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制定相应的社会法则，尤其是国际金融法则，以取代资本法则支配世界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进一步说，这个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了。

马克思感慨于人们迷信资产阶级制定的社会法则虚幻的正义性，而不是去正视现实世界的分裂和解体。而人类思想之所以坠入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不能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告别马克思"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知识发展的主流。

马克思无情地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詹姆斯·穆勒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踩在脚下，他指出：自从《国富论》诞生以来，欧洲劳动者如果不是变得更穷了，就是变得更加不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把关于"抽象范畴"的讨论尽其所能进行得更抽象，就是为了掩盖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如果不榨取劳动者，所谓"资本增殖"就无从谈起。所有资产阶

级经济学的努力，无非是以理性的手段制造资本的泡沫和假象，再以繁荣的假象来粉饰四处可见的危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的口号由“四海之内皆兄弟”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意味着，让被剥夺者遵循剥夺者的“道德法则”，是多么的虚伪和不道德。因此，马克思明确宣布，他不愿成为那些人的兄弟。

让骗局的精心制造者与上当受骗者成为兄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是更大的欺骗。而要终结骗局，首先要揭穿骗局，因为正是那些幻象和骗局的制造者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团结，破坏了荣辱与共的人类情怀。因此，要实现现实的正义，绝不能靠空谈“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要为正义而斗争；要实现人类的团结，就必须驱逐不团结者；要实现正义，就要消灭不义的根源；要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就先要承认“四海之内已经不再是兄弟”的现实，承认不再有人类团结的现实。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们若要夺回劳动果实，就必须首先让思想冲破牢笼。

---

1.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9.
2. 基斯·基斯蓬.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师 [M]//凯泽，科尼希. 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39.
3. 基斯·基斯蓬.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师 [M]//凯泽，科尼希. 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39.
4.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3–94.
5.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8.
6. 柄谷行人. 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6.
7. 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49–50.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9.

1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4.

11.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7.

1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3–224.

1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4.

14.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5.

15. 海德格尔. 尼采[M]. 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50–351.

16.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

17.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18.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7.

19.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0.

20.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7–88.

21.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9.

22.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9–170.

23. 恩格斯.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593.

24.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4.

25.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26. 马克思.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43，44.

27.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542.

28.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

29. 马克思.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4.

30.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31. 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第2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36.

32. 恩格斯.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33.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3.

34. 杰克·卡希尔. 教皇与银行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102–103.

3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

36.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9.

3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2.

38.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

39.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

40.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90.

41. 马克·埃德蒙森. 弗洛伊德最后的岁月：他晚年的思绪[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2. “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

43.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75.

44. 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8.

45. 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2–203.

46. 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47. 马克思．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92.

48.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

49.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23.

50.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7.

5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5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53.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54.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5.

55.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18.

56.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M]//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

57.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M]//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9.

58.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M]//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8–19.

59.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M]//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9.

60. 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荒谬性那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

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头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参见韩毓海.从布鲁塞尔到北京[J]. 天下.

61.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62.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6.

63. 恩格斯.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64. 马克思说：法国人的“情欲和德国人的纯思维活动”之间的对立，就是现实的斗争与超验的、唯灵论的批判之间的对立。参见马克思.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65.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2–613.

66.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4.

67. 参见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5.

6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3.

69.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70.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539.

71.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2.

72. 马克思. 中国革命得欧洲革命[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0.

73. 邓小平.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5–106.

74. 马克思. 马克思致恩格斯[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6.

75.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7.

76. 摘自2010年4月14日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台采访时的讲话： http://www.abc.net. au/7.30/content/2010/s2872726. htm.
77.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4.
78. 王永利. 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未结束[J]. 环球财经：2011（12）.
79. 马克思. 资本论 [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4.
8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 第三章
# 马克思与美国

## 四个历史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十四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和第五条分别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和“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明显优势。美元在国际货币中占主导地位，百分之八十的国际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是用美元进行的。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美元现钞的百分之六十在国外流通，这等于美国无形中从其他国家获得了铸币税。正因为美元是一种硬通货，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的债券、股票等，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在年贸易逆差超过三千亿美元的情况下，吸收的外国资本每年超过七千亿美元。注

——江泽民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既没有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一“事实”，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舆论上的尖锐挑战。

对这个令全世界的“左”翼人士都感到头疼的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

直率的回答，大概就是桑巴特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不过极为反讽的是，桑巴特的结论竟然是这样的：美国的崛起和成功之路，还是印证了马克思最基本的论断——一个城邦兴旺发达的基础，就在于它拥有巨大的“公共财富”。而美国之所以没有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的公共财富，正是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从根本上缓解了美国的阶级矛盾。

而对美国来说，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首先指广阔的公共领地，是气候适宜、水草丰美、辽阔无垠、与天相接的北美大陆上的处女地。

实际上，《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的结论，就在于其结尾所引用的那一大段亨利·乔治的话。正是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方才真正说出了基本“事实”：美国之“例外”，就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先天拥有”公共财富的国家。

亨利·乔治论述美国“先天”拥有公共财富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 这一公共领地——尚未变成私有财产的广阔土地，精力充沛的人总会去面对的巨大公地，自从第一批殖民者来到大西洋沿岸的边缘开始，就已经成为塑造我们民族性格和影响我们民族思维的主要因素。
>
> 并非是因为我们避开了有头衔的贵族，取消了长子继承制，并非是因为我们选举了我们所有的官员，从学校董事到总统，并非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帝王的名义来执行，也并非我们的政府与宗教无关，我们的法官不戴假发——所以我们才免除了那些在国庆日演讲的人们所说的旧世界的专制的影响。
>
> 普遍的机智、普及的舒适、主动的创造、适应和同化的能力、自由独立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人民所具有的活力和希望——这一切并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因为它们就来自没有篱笆的土地。

> 这一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股转化的力量，将不节俭的、没有雄心壮志的欧洲农民变成了自力更生的西部农场主；它甚至对那些拥挤的城市居民也赋予了自由意识，成为那些甚至没有想过要借此避难的人们的希望源泉。
>
> 在欧洲，当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发现人生宴席上的所有好位子都已经被占满了，他们不得不和同伴们争夺剩下的残羹冷炙，难得有千分之一的希望抢到或者偷到一个位子。但在美国，无论他身处什么境遇，总有一种意识在背后鼓舞他，就因为在他背后有一片公共的领地。
>
> 对于这一事实的认识、行动和反应，已经渗入我们全部的民族生活，赋予我们这个民族慷慨和独立的特性，赋予我们这个城邦活力与雄心。所有我们引以为豪的美国人民的性格，所有那些使得我们的处境和制度优于那些古老国家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土地极其廉价这个最终的事实，因为总有新的沃土已经对移民敞开着。
> 注

亨利·乔治的这番至理名言，不禁令人想起电影《飘》的结尾：郝思嘉捧着一捧美国沃土哭着哭着又笑了，而她手中的那一捧沃土，实际上就是美国“公地”的象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补充另外一个事实，因为无论是亨利·乔治，还是桑巴特，这个“事实”都是他们没有提及的，而这个事实却至关重要：美国的公共土地并不是上帝对美国的恩赐，因为它是北美殖民者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抢来的——先是对印第安人，随后是对墨西哥和古巴，然后是对全世界。

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谈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都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一个托克维尔、桑巴特、亨利·乔治都谈到，马克思同样注意到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美国是一个拥有巨大公共财产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地方的公共财富都已被私有化进程掠

夺殆尽之后，唯独美国还拥有巨大的公共财产，特别是仿佛与天相连的广阔公地，而这构成了美国繁荣昌盛的真正基础，也成为“美国自由精神”似乎不竭的源泉。

“美国人民”——首先是男性白种人，正是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的主要受惠者，这构成了支撑他们个人奋斗、自由竞争的坚实后盾与保障。但是，这些人对于印第安人、黑种人以及外国人却从来不是这样说的。《独立宣言》起初所申诉的“平等”，无非是要求英国与美国平等，即要求美国的独立自主。而随后，“平等”却变成了美国白种人中产阶级内部的平等，同时也变成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平等。

如果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美国与罗马帝国极为相似，特别是它们都以战争和掠夺的方式建立起庞大的公共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共和制度。不过另一方面，美国与罗马帝国又极为不同，因为除了战争之外，美国积累庞大财富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垄断国际资本和国际信用，美国运作投资和债务的方式，是罗马人不能企及的。

讽刺的是，美国的统治集团显然深谙马克思所揭发的“资本”之道。与之相比，那些认为“马克思早就过时了”的人，并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书。例如，一种对《资本论》最草率的理解认为，剩余价值只能从生产领域，即通过剥夺工人来垄断商品的剩余价值而产生。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已经指出，通过操纵信用可以攫取剩余价值。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解释银行为何通过按揭贷款得以获利，也不能解释美国何以通过垄断信用、借钱消费而拖垮全世界，更不能解释投资战争为何能够发财。

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当战争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资本主义才能把全世界踩在脚下。而美国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要了解美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还是需要回到马克思。

历史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能够把资本投资转变为对债务人的勒索和惩罚（先是对欧洲，然后是对全世界），也只有美国能够把“引资”变成无偿提款和对债权者的要挟。今天的世界局势甚至表明，支配当今世界的国际金融秩序只对美国这一个国家完全有利，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不利的，尽管这种不利有程度上的不同。

马克思从未到过美国，然而，他对美国却一向怀有巨大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好感——这当然表明马克思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即使天才如马克思，他的某些具体看法也局限于所属时代。

在二人合著的早期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这篇重要文献并没有完成，故呈现给我们的始终是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要不受或者少受旧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束缚的地方，那里的生产力就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举出的例子就是美国。他们认为，凡是到美国去的移民，他们所掌握的生产力“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这些移民都是“最进步的个人”，他们能够采取“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而美国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从“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因此，生产力在美国发展得“异常迅速”[注]。

美国的工人组织是在南北战争中形成的，这一点令马克思和恩格斯尤为振奋，他们相信，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先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反抗“落后的奴隶制”的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战争”，而美国工人阶级在南北战争中扮演了“特别能战斗”的角色——曾经为了保住联邦而浴血奋战的美国工人，在追求劳动的正义、和平等方面，想必也是不怕流血牺牲的。

马克思不仅因此给林肯写过致敬信，还希望移民到美国去，以便亲眼看看（甚至是亲自领导）美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幸亏马克思

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否则可以想见，马克思的晚年将会在怎样失望的情境下度过。

我们下面将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美国的这种看法是怎样令托克维尔和弗洛伊德大为吃惊的。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托克维尔和弗洛伊德不仅到过美国，还深入地考察、研究过美国社会，因此，他们绝不会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美国人是“最进步的个人”的看法，在托克维尔和弗洛伊德看来，美国人除了赚钱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追求，美国人令人吃惊地拥有几乎一致的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货币拜物教”，那些沉浸在天真的“美国梦”中的人是典型的“没有内在深度的个人”。在美国，连普罗大众也都是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痴迷者和拥趸。因此，从马克思学说的角度去分析，美国本来应该是世界上最保守的“资产阶级文化堡垒”。

但是，马克思对美国的判断绝非捕风捉影，美国与社会主义也绝非毫无关系，因为美国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摇篮。19世纪初，被恩格斯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欧文，正是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合作社——“新和谐”社区。

在马克思的晚年，美国确实一度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1869年，大型劳工组织“神圣劳工骑士团”（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高举着“劳工神圣”的旗帜在美国成立；1886年建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组织，它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些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展到了大规模街垒战的程度。但是，当美国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美国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而且，自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日益成为一个最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于是，从那以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就成了一个被反复探讨的问题。

美国之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在美国站不

住脚），并非是因为美国没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和产业工人组织，也不是因为美国的无产阶级没有受到资本的掠夺和剥削；使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站不住脚的，恰恰是美国的文化，恰恰是所谓的“美国梦”，使民众中缺乏接受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土壤。

加里·纳什在其权威著作《美国人民》中指出，美国文化的深厚基础是种族和宗教，种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深刻地瓦解了美国人的阶级意识，可见，纳什关于移民的论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相反的（与卢梭也是不同的）。在纳什看来，移民因缺乏阶级认同基础，容易成为“个人主义的乌合之众”：

> 工人队伍里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使他们的联合变得十分困难。没有其他的工业国家像美国这样依赖移民。由于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目标和语言，移民间产生了种种误会和摩擦。而且，来自同一国家的移民工人常常只在某一行业聚集，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及本土的工人缺乏联系。纽约罐头工厂的意大利女工想罢工，而叙利亚和波兰工人却满足于他们的工资而拒绝罢工。美国工人不希望自己的工厂主要是意大利人。不同种族的技术差异也是导致不和的原因。
>
> 移民工人对工会漠不关心，也不在乎和当地美国人的矛盾。许多外国人都打算要再回老家，对改善美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就更没有兴趣了。而且他们只想工作，不在乎顶替罢工工人干活。厂主雇用他们破坏罢工的行为常引发暴力。一些美国人指责移民满意于低工资，导致工人运动失败。工人内部的分歧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一样严重。工人分化了，获益的当然是厂主们。[注]

如果马克思真正到过美国，他自然就会发现：种族矛盾、文化冲突（或说“文化的多元性”）如何瓦解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团结，而这恰恰是由移民社会的特点决定的，马克思必将会因此意识到，他和恩格斯所做出的“移民社会代表先进的交往方式”、移民都是“最进步的

个人”的断言，恐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旦被翻译成英文，它的一些关键词甚至都变得难以理解，比如说，英语中的“人民”是指“每个个人的集合”，它并无法语中“劳动阶级”的含义。

马克思重视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从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经济”这一单一角度展开社会分析。实际上，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是从对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析起步的，而不是从简单的经济活动起步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领域”这一整体，是资本积累的法则，而不仅仅是“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也绝不是一个宗教消亡了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偶像就是资本，这个社会中的人把所有的欲望都集中在赚钱这个唯一的冲动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社会既是“禁欲主义的”，也是高度迷信的。

弗洛伊德去过美国，并深刻地研究过美国，从而发现了他所谓的“集体心理贫困症”。他震惊地看到：这个标榜“清教禁欲主义”的社会，除了金钱之外，别无追求。在美国，一个人不成功，就没有公民权，而一个人如果没有钱，他便不成功。除了赚钱之外，美国人几乎没有别的消遣；除了赚钱的快乐之外，美国人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快乐。弗洛伊德说，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话，那么，它就是美国，在那里，人们唯一的理想就是发财，全社会一致崇拜的唯一的“神”就是美元。

美国大肆欢迎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是弗洛伊德却认为美国人的思想过于肤浅，美国人的内在生活和精神生活缺乏深度，因此根本不可能理解精神分析。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弗洛伊德这样说：“我把精神分析带到美国，但美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把怎样的灾难带给世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把美国当作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不同，在弗洛伊德看来，“美国生活方式”对人类未来而言似乎是一场灾难。

托克维尔也深入地考察了美国，他关于“多数的暴政”这一论断就来自对美国社会的诊断。他指出，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的社会关系过于简单、过于单纯——买卖与投资关系，就是在美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关系，“阶级”和“阶层”在美国的发育都不完整，所谓“美国人民”是指“每个个人的集合”，因此，美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只有希望发财致富的“大众”。美国大众的保守性表现为：占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不关心社会改革，只关心自己的财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正如加里·纳什所描述的那样）。在美国，如果有一部分人为社会改革和社会公正事业而罢工、斗争，那么，另一部分人会毫不在乎地顶替罢工工人的工作，他们甚至会认为，那些“闹事的人”耽误了他们自己赚钱的营生、影响了自己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在1886年的劳工联合会时代，还是在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绝大部分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认为：参加社会正义运动只会耽误自己赚钱。

“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爱钱如命”，这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句名言。托克维尔指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完全相反）美国那种没有阶级基础的大众民主，并非植根于卢梭所谓的“人民”（le　peuple）之中，而是立足于移民之上，绝大部分人移民美国的目的不是追求卢梭所谓的“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淘金赚钱，美国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因为美国民主的基石是那些希望发财致富的中产阶级，是“既不豪富又不极贫的小康之人，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和希望随时都寄托在这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注]，这些人自然反对激烈的变动，无论这变动是好还是坏。

而弗洛伊德对于美国民主的评价，甚至比托克维尔还低，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病症是他所谓的“集体心理贫困症”，而美国大众为金钱的“欲望”所支配，正如一个人的灵魂为“欲望”所统治一样，这种本能很难得到升华。弗洛伊德说，处在种族主义和严重不平等的矛盾旋涡中的美国社会之所以还能保持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级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

中，已经消耗了身上大部分的破坏性能量，是由于托克维尔所谓的“发财致富的欲望代替了争权夺利的野心，而社会的繁荣则扑灭了派系斗争的烈火”，但是，一旦出现类似1929年“大萧条”那种阻碍财富增殖的时代，美国人要么毫不犹豫地成为无政府分子，要么毫不犹豫地开动战争机器，以暴力去破坏全世界，从而把他们的攻击性本能发挥到极致。

美国没有成为“社会主义的摇篮”，而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墓地”，但是，美国建成的那个以金钱和物质需求为唯一目标的高度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却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支配物质生产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弗洛伊德和托克维尔正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的4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原始积累”——欧洲通过海外扩张和殖民暴力，剥夺美洲的财富；第二阶段，通过宗教改革，资产阶级剥夺了教会和封建主的财富；第三阶段，通过工厂劳动，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则重点展开分析资本积累的第四个阶段，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掌握和垄断世界货币，通过扮演“普世价值”的化身和充当世界警察，从而剥夺和统治世界。

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恰恰代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从列宁主义的角度看，美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最腐朽阶段，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完全与世界的物质生产相脱离、相对立。

当下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市场体系的目标，均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投资与扩张，它们是在全球性的资本信用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创建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实质，并以各种手

段保持国际信用体系按照美国的意志、并以最有利于美国资本扩张的方式建立起来。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国际关系、世界市场的真正基础是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其实质便是稳定美国财政收入与其国际债务之间的比例），依据这个标准，美国这个财政早已破产的国家依然成功地统治着全世界——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凭借这一点，美国在年贸易逆差超过三千亿美元的情况下，每年吸收的外国资本超过七千亿美元。而恰恰对这一点，大多数国际政要和资产阶级学者都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识。

列宁和希法亭都指出，帝国主义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美国的发展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和世界生产与制造业中心，而是要成为世界金融业的绝对中心。只有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管理者”，成为国际资本积累方向和规范的制定者。今天，正是通过三大评级机构、纽约证券市场和华尔街投资集团形成的庞大的虚拟经济，通过以投机赌博的方式为世界经济与投资制定目标和规范，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而且，即使虚拟的目标和方向一时落空，美国也不会遭受实质性损失，因为投机赌博欠下的债务将会由世界各国的公共财政和实体经济来承担，这就好比军中司令部的决策失误要由士兵们用生命来承担一样——而与军中决策不同，华尔街和美国财政部的决策采用的完全就是投机赌博的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发展方式标志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中，金融领域与现实生产和劳动领域已经分离，资本积累“反生产”的腐朽性充分暴露出来。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手中集中了全世界大部分过剩资本，而利用手中源源不断的过剩资本，美国得以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放债，再以制造各种“危机”的方式迫使这些国家的资产贬值，或者以催债的方式迫使债务国贬值出卖自己的资产。因此，在分析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时，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法则并不适用，真正适用的是社会再生产的法则以及信用的资本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必一定通过在工厂内部剥削工人，才能获得剩余价值：通过资本全球化运动向国外投资，资本家集团完全可以利用世界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而获得剩余价值；而通过战争的破坏，通过发挥“攻击性本能”，更可以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恰恰表明，只要能够维持和制造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就可以完成资本积累。而以恩格斯为代表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缺陷恰恰在于，它往往只是强调资本家在工厂内部剥削工人，而没有看到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剥夺全世界，以此完成资本积累——美国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我们身处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资本主义世界需要“教父”，需要与永远动荡的现实相对立的绝对法则。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是宗教衰亡了的社会，是没有偶像的社会，是“上帝已死”的社会，是以“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为特征的社会，但是，它把对于有形偶像的崇拜，转换为对于抽象法则的崇拜。这个社会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不是君主和教主，而是资本投资的法则。而所谓“美国霸权”的基础，就在于美国拥有为世界制定价值标准和投资法则的权力。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尺度是“世界货币”，而美元就是“世界货币”，美国掌握着美元生产、借贷和投资的法则，美国因此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和“教父”。

日益与世界生产领域相脱离、相对立的“美国法则”，象征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可以想见，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得更久一点儿，他一定会把美国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新发展的最典型案例。

## 崛起：利用“世界债主”获得世界霸权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简单地说是由当时的美国“催债”造成的，但是，美国显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债务链条崩断后会造成的

严重后果，美国也并没有努力去避免这样的后果。

——迈克尔·赫德森

《资本论》划出了一个时代——资本的时代。

什么是资本呢？人们常说，资本就是企业家所剥夺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看法是极其简单化的。先期投资总是需要的，起码企业家经营所必需的厂房、机器设备等所谓的“不变资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从工人的剩余价值中“剥夺”来的。

实际上，在大工业条件下，几乎没有谁能够完全用自己的钱来经营企业。企业的经营资本，甚至包括工人的工资，往往都是企业经营者从金融投资机构借贷得来的。

因此，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资本，首先是指金融机构的投资，是金融投资机构经营的产品。

那么，金融投资机构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可谓博大精深，但他对资本的一句诅咒最为著名：“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资本起初就是对“战争的投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现代金融投资机制，其实是与“战争国债制度”一起出生的。

什么是资本家呢？资本家起初就是替教会放债的“中间人”，是那些借钱给国王们互相杀伐的放债人，是那些为国王们筹措战争经费的人。中世纪后期，教皇统治欧洲的方式，便是分别放债给那些诸侯国，鼓励它们互相争战，以此对其“分而治之”。而这种投资必然转变为国债，并经国王之手分摊到老百姓头上。

现代金融制度、战争国债制度，就是这样伴随着资产阶级发起的殖民战争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中论述道：

> 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个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注

马克思的这些话放在今天同样是真理。如今哪个国家最富有？美国。哪个国家的老百姓负债最多？还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霸权国家，美国的债务主要来自其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战争投资。

那么，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金融机构经营的并不是钱（货币），而是“信用”。

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给“反法联盟”，是以联盟各国的“信用”为抵押的，是以各国的信用、税收和国土为抵押的。而通过这种抵押物，他们又获得了什么呢？

他们获得的是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马克思说，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是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开始的，这家银行以国王（背负的荷兰）债务为抵押，获得了发行英镑纸币的权力。从那时起到今天，只要英国王室借英格兰银行的钱没有还清，只要大英帝国不倒，英镑纸币的信用就不会倒。

《资本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之一在于指出：在资本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既不是商品流通，也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因为在资本时代，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货币买卖关系、商品交换关系，而是“互相预付”关系。因此，正

是“信用”，把这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以世界的规模组织起来，信用就是资本时代最基本的组织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销售者绝不可能把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一股脑儿全部买下，然后再拿去销售。实际上，生产者从经销商那里拿到的只是一个“信用凭证”而已，而回款和结账则是很遥远的事情。同样地，希望消费者能够用现金支付如此丰富而庞大的“物质涌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社会的大宗消费，一般只能采取“信用按揭”这种方式进行。

由于生产的规模总是在扩大，便没有一个生产者能够以“自有资金”去应付这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于是，企业经营者必须获得投资，而这里所谓的“投资”，与其说是一定数量的货币，还不如说就是信用。而正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信用评级”，决定了其能否获得投资以及能够获得多少货币投资。

马克思简短地概括说：“信用是道德化的货币。”这就意味着对于投资者而言，我向某人投资，这不仅是借钱给他，更是把“信任”赋予他。如果用皮尔庞特·摩根的名言来说便是：“银行家只向自己‘看好’的人投资，而不是向那些有抵押物的人投资。那些我不信任的人，那些没有信用的人，即使他有财产作抵押，也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那么，谁是他们“看好”的人呢？当然就是那些丛林法则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反法联盟”打败了拿破仑；1871年，摩根财团帮助普鲁士和法国镇压了巴黎公社；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摩根财团的支持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些历史课本中没有讲述的秘密，再次印证了《资本论》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借钱总是有风险的，这样一来，信用评估和保险业就成为一项新

的、极其有利可图的生意。如今，生产者也就是借贷者，在定期缴纳利息、税收之外，往往还必须付出一大笔保险金。因此，在资本时代，企业利润绝不可能全部归于企业家，因为信用的垄断者占据了利润的绝大部分，最终留给企业和企业家的，则是很小的部分。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企业家”与“资本家”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概括起来说，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对“信用”的经营。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基本区别是，前者研究的是“资本与信用”（金融），后者研究的是“商品和货币”，前者是高端的、复杂的，相对来说，后者则是初级的、天真的。

《资本论》创造性地区分了“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资本社会是靠资本即“信用”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靠市场交换组织起来的。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构成了信用的基础，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曾说，正是这种信任将人们组成一个自由的联合体。但是，市民社会里的人们是孤立的、彼此对立的，他们之间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信任，这使得信用成为市民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当这种稀缺资源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成为服务于少数人私欲的资本，那么，资本和信用就成了奴役人们的工具。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他从来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实际上，《资本论》就是以资本和信用作为研究对象的。而现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在于，尽管生产和交换已经全球化了，但信用和资本却依然垄断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家族手里。而这几个家族的特殊利益与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就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认为，信用是劳动者联合的重要手段，如果劳动者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信用体系，那么，他们就能从最高端控制经济活动，并战

胜资本家集团对资本和信用的垄断，变“资本支配劳动”为“资本为劳动服务”。今天，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单纯地围绕着商品和货币进行的斗争，因为这最终是围绕着“资本”和“信用”掌控权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毕生都在思考劳动者掌握资本和信用的方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和恩格斯都认为，巴黎公社最大的失败和局限，就在于劳动者阶级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更没有学会掌握、管理、运营资本的方法，而这就意味着，劳动者阶级还不懂得如何把他们之间兄弟般的“信任”，转变为为他们自己的生产活动服务的“信用”。

如果从《资本论》的视野看去，苏联最大的失误其实也在于此，这种失误与巴黎公社犯的错误极为相似。苏联虽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足以与西方对抗的生产—交换体系，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体——经济互助委员会之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信用体系，更没有建立起一种与之相关的金融机制。

苏联经济的弊端，不在于它没有把“计划经济”改造为“市场经济”，而在于它没有成功地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的“信用经济”。

正是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由于投资机制的僵化，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实际上，苏联不仅是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机器所摧垮的，更是被美国的金融资本战略所击溃的。

“社会主义信用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是在中国的倡导下，在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的强力推动下，方才横空出世的，这是向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建立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投资关系）迈出的关键一步。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小步，但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却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一大步。

这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精准的打击。因为创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信用体系，维护美国对全球利润的独占，这正是尼克松所谓“美国不战而胜”的秘诀。

为什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呢？美国的统治集团究竟是怎样抓住了资本时代的经济命脉的呢？当然，这就是因为美国手里掌握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资本。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在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垄断了这种世界货币，更在于美国建立起覆盖西方世界及其盟国的信用体系、信用网络。正是依托这种信用体系，美元才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美元并非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和贸易总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信用”的基础上。它确认的是世界各国与美国之间的“信任关系”。

美国是靠经营和贩卖其“信用”而发财的。

在“一战”中，美国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方才象征性地参战。而此前，它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放贷战争款。“一战”结束后，欧洲战胜国共欠了28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其中120亿美元是欠美国的，而德国要担负的战争赔款则高达600亿美元——在当时，这是天文数字。

《凡尔赛条约》刚签署不久，参与协定起草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预言说，无论是战败的德国还是欧洲的战胜国，实际上都不可能还清自己欠美国的债务。债务链条的最终断裂，将导致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崩溃，而无法清偿的债务只能用战争来解决。因此，另一场世界大战是无法避免的。

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投资国之前，资本家与国家还是分离的。无论是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还是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债主和理财人，而不是国家政权本身。但是，自从“一战”结束后，美国这个国家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放债人，这主要是

因为美国的中央储备银行变成了由12家私人银行构成的资本投资机构。资本家变成了美国的主宰者，而美国变成了资本家的国家。它垄断了国际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而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

这场巨变进行得悄无声息。1910年年底，摩根和洛克菲勒亲自召集了仅有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地点是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而“六人帮”开黑会的名义竟然是打野鸭子。

事实上，这6个人在岛上一只野鸭子也没打，因为他们要打的“鸭子”其实就是美国。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以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由12家私人金融机构组成的银行，而成立这个银行的目的，就是确立“最终信用者”的地位。在经济危机时，要由这12家金融机构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而为了确立这种“最终信用者”地位，就必须把美国货币的发行权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手里夺走，归于12家私人银行联合体。

通过垄断和贩卖“信用”而发财，这不过是对美第奇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生财之道的继承与发展，而今这种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他们的计划成功了。这个银行于1914年成立，它的名字就叫美联储。美联储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垄断者。从那时起，我们的世界就由美联储统治着。

今天看来，比亚当·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倒是非常接近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时代的真理，只是勋爵的名言被广泛地误解了。他说，当前时代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问题。因为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时代，便是我们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和信用被少数人垄断和支配的时代。

美联储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管理美国国际战争投资的信贷机构。

而20世纪初，美国正是利用其“世界债主”地位获得了世界霸权，迅速实现了崛起。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这本启示录式的小薄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现代欧洲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债务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爱你的邻人”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向其投资放贷，“好好敲诈他一下”，一切现代资本主义道德都建立在这种“爱”的基础之上。因而，资产阶级道德的实质是“恶”，而不是“善”。

基督教道德的箴言是：“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尼采则指出：这种基督教道德其实就起源于债主与债务人之间的投资放贷关系。所谓“爱你的邻人”，也就是爱你的债务人；所谓“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就是如果他还不起债，那么你就继续借债给他——这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实质。

如果用尼采的启示来解释20世纪初欧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国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一战”之后欧洲各国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洞察，因为这种关系的实质和基础确实就是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由于在“一战”中战败，德国背上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由于美国没有参加“一战”（只是在战争将要结束的最后一刻，美国才象征性地宣告参战），而只是向欧战投资，即借款给交战各国，所以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因此，“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间的基本关系就是：英、法是德国的债主，而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从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看作当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

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在债务关系即债主—债务人逻辑的基础上，在如何还债、如何处理债务这个议题上，方才产生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也就是指：金本位制（作为货币尺度）和自由贸易的逻辑，这二者首先是作为一个处理、平衡“国家间债务”的机制被提出、采纳和信奉的，而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起源的一个关键。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实行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以黄金价格为基础的货币稳定政策，以及以黄金转移、流动来平衡国家间贸易的原则。它把“稳定货币”和“平衡贸易”当作一国经济的根本目标，这同时意味着，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民生、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当作国家财政的基本目标，因为它生来就是处理“国家间事务”（具体说就是“国家间债务”）的国际机制。

与其说这一学说的前提是假定“世界即各国彼此依赖的市场”，还不如说，它假定国家间的债务关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解决。根据这种天真到了完美的逻辑：债权国由于黄金储备增加，其货币将自动升值，从而导致其产品价格上涨，出口自动放缓，随之黄金储备流出；反之，债务国由于其黄金储备减少，货币随之贬值，其产品就具有了价格优势，于是，出口增加，黄金回流，货币也因而稳定。

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说：一国之经济危机总是会导致贵金属——黄金的流出，而黄金的流出则会导致该国流动性的缺乏，因而，贵金属的自由流动绝不会制止经济危机，同时自动实现货币稳定和贸易平衡的目标，而只能加剧危机，并使一国的危机向各国扩散。

今天看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加剧经济危机之恶性循环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而一旦我们考虑到市场关系的真实基础是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这种债务关系的强制性，那么，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内含的“强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实际上，在“一战”与“二战”之间，也正是自由市场的方案中所必然蕴含的强制性，最终彻底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从而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它们的偿债能力，因为这个方案以严格“（市场）规范”的名义，不但拒绝考虑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情况，更拒绝考虑债务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以致对债务国来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方案。

这种强制性意味着：债务国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努力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乃至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从而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以稳定货币。这就使得债务国的经济完全服务于出口而不是国内需求。同时，它还进一步要求债务国必须严格削减国内开支，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包括缩减公共开支、实行下岗分流政策，以维持收支平衡（实际上，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如今的欧债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这是一个充分暴露市场逻辑和市场关系之强制性的范例）。

而一旦我们明了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乃是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这种真实关系之上，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其实也就没什么令人费解之处了——“‘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众所周知，导致“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大萧条”），而导致“大萧条”的根源，就是欧洲国家奉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造成的包括失业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灾难，由贸易纠纷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当时，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一方面逼迫德国贬值出售资产以偿还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则对内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只顾全力赚钱偿债而不惜牺牲国内经济，只顾增加对外出口，使得经济高度外向型，而罔顾内需和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各国为了稳定国内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努力削减开支，更

是罔顾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规模的下岗失业。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巨著中指出：发源于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妄图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法则来支配经济现实，它不仅假定了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而且，更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掩盖了市场逻辑中蕴含的根深蒂固的强制性，掩盖了“自发调节的市场”逻辑以“规范”代替现实的冷酷。正是对这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迷信，导致欧洲各国在“二战”前实行了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活动罔顾社会民生和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债务国的社会民生和承受能力。因此，卡尔·波兰尼才痛切地说，问题不在于赤裸裸的强制，而在于人们为什么总是认识不到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规范”本身正是一种强制。注

卡尔·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一战”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权力争夺，它最终导致西方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体系，现代欧洲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则”也就植根于此。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却彻底粉碎了西方国家间相对均衡的权力体系——这是因为，建立在债务关系之上的市场逻辑，首先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各国经济彼此严重互相依赖的“市场关系”，从而连带性地粉碎了欧洲各国的内需能力、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

因此，“二战”不过标志着相对均衡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欧洲式的“国际主义”，被“自我调节的市场逻辑”摧毁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的美国，在这个由美国—欧洲（以英法为首）—德国之间“连环债务关系”构成的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作用，我们可以说，美国率先起来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欧洲的投资者和债务人，美国认为：资本投资法则与商品生产—交换法则完全不同，前者根本不能遵循市场法则。按

照市场法则，某种商品跌价，购买者便会涌入；而按照资本投资法则，投资对象的经济前景下挫、商品贬值，投资者则会纷纷离场。正是按照这一反市场的投资法则：第一，当时的美国严厉无情、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欧洲各国削减债务和延迟偿债的请求——这与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接受美国永无止境地“赖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第二，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理直气壮地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乌托邦教条的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罗斯福政府不但没有让美元升值，反而令美元大幅度贬值，这一方面刺激了美国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又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涌入购买美国股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这与美国今天强迫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亦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唯一连任4届并且病逝在这个位置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的“新政”，对外坚持欧洲各国必须“按期偿还”美国的债务，而对内则实行国内市场保护政策，从而封杀了欧洲各国通过加强对美出口以偿还美国债务的可能性，而美元相对于黄金的贬值，则使得欧洲通过出口赚取的、用以偿债的美元一路缩水。最终，对英法等国来说，它们剩下的道路其实也只有两条：一是进一步加强国内的紧缩政策；二是进一步加大压力，向战败国德国催债。而这两条道路的结果，实际上都指向了新的世界大战。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德国在破产或者偿债之间，最终选择了拒绝偿还赔款，从而发动了战争，“二战”因而爆发。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毫无疑问在于西方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破裂，但意义更为深远的却是，与债务关系同时破裂和被粉碎的，乃是“一战”后形成的欧洲各国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体系，也包括欧洲一直高傲地自我标榜的“国际主义”。

而关于美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迈克尔·赫德森在《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一书中有如下简要评

价，他说：虽然“二战”不能简单地说是由当时的美国“催债”造成的，但是，美国显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债务链条崩断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也并没有努力去避免这样的后果。赫德森的论点应该是现代世界史研究的独具慧眼，也是持平之论。

但是，需要补充的仍然是：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真正要瓦解和粉碎的，恰恰正是“一战”后所形成的西方国家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和权力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世界债主”地位和它所掌握的巨额债务，不过是用来粉碎这个体系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武器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的美国其实并不缺钱，但美国政府还是逼迫欧洲立即偿债，即使由此导致整个世界金融秩序瓦解，美国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不难看出，美国当年“破釜沉舟”的气魄、不惜毁掉“现存国际金融秩序”也要“讨债”的举措，是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任何一位“债主”连想也不敢想的。

美国粉碎了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它造成了资本主义体系自从在欧洲诞生以来的第一次全面崩溃，造成了“以欧洲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崩溃，而这是通过将全世界投入战争的火海实现的。

与马克思所乐见的有所不同，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虽然造成了苏联的崛起），而是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权力交接”，即导致资本主义的权力中心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美国之所以“敢于”和“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其具备某些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美国的农业不仅完全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大规模出口；美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低，长期保持在5%的水平，因而，所谓“自由贸易”对于美国而言甚至就是可有可无的。第二，美国自内战（南北战争）以来，就形成了极其特殊的政治体制，总统必须听命于国会，而国会的议员又只服从于他们所来自的选区。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美国

的“国际责任”只能服从其“国内利益”，甚至其“国家利益”也取决于各州之间的利益博弈——一言以蔽之，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一定会把其国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所谓的“国际责任”放在次要位置。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欧洲的那种彼此依赖的“国际主义”乃至任何形式的“国际责任”，不仅仅是在政治上行不通的，而且在一般美国选民听来，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这就是所谓“美国优先论”。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只要自身免于被攻击，世界其他地区陷入火海似乎不关自己的事。

而美国最终之所以放手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赫德森说，“二战”之前，美国之所以要抛弃欧洲版的“国际主义”，乃是由于这种“国际主义”看起来根本不能为美国“所担当的世界责任”付费——特别是没有一个相应的国际机制来保证其他国家可以为美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付费。而按照美国的逻辑，“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无投票权则不纳税。何况当时的美国之所以不愿意给欧洲各国“纳税”（尽管只不过是通过延期债务和开放市场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因为美国要求在原有的世界权力体系中拥有一个简单的投票权（美国对那个投票权也许根本不屑一顾）。正因为国际联盟绝非一个能为美国的付出付费的机构，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甚至连国际联盟都不愿参加。

实际上，美国要求的是：以一个新的世界权力体系来取代那个仅仅保证西方国家之间“权力均衡”的旧的游戏规则。在美国要求的新的权力结构中，根本就不应该有“老欧洲”关于“权力平衡”的虚伪概念，而只有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完全不受制约的霸权地位。

简而言之，美国要的是一个“美国世界”或者“美国绝对领导下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权力体制可以保证全世界“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付费”。

美国的这个愿望在“二战”后迅速得以实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才不惜动用手里的超级债权，摧毁了“二战”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

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大概没有什么比如下事实更令人感到反差巨大的了：当年债权在握的美国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政治秩序”“国际金融秩序”及其崩溃，而这与今天的世界各主要债权国（包括中国在内）为了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权力体系的“均衡”不被打破，而一味地听任美国延迟债务，简直是天壤之别。

从“世界债主”走向“世界霸主”，美国用极短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惊人的跨越。

美国希望通过其债主地位建立独一无二的“美国世界”，这样的战略并非开始于“二战”之后，而是开始于“二战”前，该战略也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开始于亚洲的中国。例如，1916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AIC），就是由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莱因奇和前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范得利携手策划成立的官商合一的投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还包括洛克菲勒、杜邦和摩根等大人物）。AIC的主要目标是：趁欧洲列强陷入债务陷阱之时，一方面以金融控制的方式，率先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纳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

而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一方面已无法从债台高筑、自顾不暇的欧洲取得贷款，另一方面则更为担心欧洲在华势力衰落后，日本会乘虚而入大举扩张在华势力。因而，美国投资的到来被视为既可以促进国内发展，又可以制衡日本野心的一举两得的重大机遇。因此，当时的中国政府立即倒向美国一边，大规模引进美国资本参与诸多工程，并将一系列不应由外国人参与的工程也开放给美国公司，其中就包括让美国公司独家勘察和设计孙中山曾经幻想过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值得一提的还有，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财产也主要投资于AIC这家

具有深刻军方背景的美国公司。

由于日本也有相当迫切的向美国借款的要求，所以美国更为积极地向日本“示好”，这甚至包括AIC将自己承包的中国工程的41%主动让与日本，以换取美国对日本投资的便利。美国在“二战”中迟迟不对日本采取行动，而是长期听任日本侵略中国，最终导致日本打到了自己家门口的珍珠港，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包括AIC在内的美国金融机构和美国大金融资产阶级在日本存在大笔投资利益。（因此，令人感慨的并非这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在当下的金融风暴中因资不抵债而被美国政府“国有化”，而是中国某些“精英人士”竟积极建议我国政府参与“救市”，以协助这家历史上曾经投资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国际资本实体摆脱危机。）

“二战”摧毁了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美国。作为本土经济没有受到战火波及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几乎整个战争过程中通过大卖军火，又一次极大地扩充了财富。美国在“一战”结束之际只不过是欧洲人的债主，而至“二战”结束后，美国却成为除了苏联之外的几乎全世界的债主。此时的美国当然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金融霸权，而是希望以其超级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换取超级政治霸权，以“世界债主”和强权的地位换取“世界霸主”的地位，并以此让世界来为这个霸主的地位支付“管理费”。而“二战”结束后一片凋敝的世界，恰好为美国霸权的形成提供了机遇。

美国在“二战”前之所以不肯为欧洲经济摆脱困境“拔一毛”，就是由于它认为，即使自己付出了，也得不到应有的报偿，而按照资本投资的逻辑，这种道理完全说不通。“二战”后，美国非常积极地“承担起国际责任”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美国得到了它投资想要的报偿，这个报偿不但是美国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更是一整套为这种权力“付费”的国际机制，不仅包括美国在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驻军，美国还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北约的军事领导权，而且还成立了一系列美国拥

有最终否决权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集团、美联储甚至联合国安理会。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黄金与美元挂钩，使得美元成为“黄金券”（gold paper）。

上述简单的论述说明，从“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美国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从“光荣孤立”于北美大陆的年轻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霸主”，这其中包含几个关键性的战略步骤：

第一，“长于谋划”。“一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利用它的超级债主地位（内力），另一方面利用欧洲各国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迷信（外力），一举摧毁了西方国家在“一战”后所形成的权力平衡体系，并将世界推入“二战”。这得益于美国对局势的判断以及对机遇的把握，包括善于利用其对手的政策错误和无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自“一战”至“二战”期间的政策（特别是罗斯福时代）确实达到了非“谋一时”而是“谋万世”的战略高度。

第二，“勇于树敌”。“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掀起冷战，当上了“自由世界”的盟主。这表明“区分敌友”乃是政治的实质，没有敌人，也就意味着没有朋友。美国内部矛盾丛生，只有在外部树敌，方能平息内部的冲突。正是由于美国始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因而它也总是需要敌人（今天的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把中国当成朋友，目前经济陷入危机中的美国政府不但继续大规模出售武器给中国台湾，而且公开表示要“协助台湾扩大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权益”）。

第三，“敢于当头”。“二战”后，整个世界一片茫然失措、杯弓蛇影，在缺乏稳定和安全感的大环境下，美国扮演了一个教父的形象，给风声鹤唳的世界提供了信心，起码为已经崩溃了的欧洲提供了重建的方向。美国通过“黄金美元”启动了战后的西方经济，同时利用它在农业方面的绝对优势，以“黄油加大炮”的战略方式援助冷战伙伴，在重建“自由世界”的名义下，实际上重建了一个以美国为唯一霸权的“西方阵

营”，从而让这些被保护国为美国的保护和支援埋单（例如，让日本为美国的占领支付军费开支）。这表明：美国对于霸权统治有着深刻的自觉和自信。

总之，长于谋划，勇于树敌，敢于当头，正是借助这些，在短短20多年里，美国终于利用它的“世界债主”地位换取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而打造出了一个“美国时代”。

美国的崛起从来不是凭借单纯的经济成功，更不是美国通俗读物不断宣扬并为美国通俗读物所“启蒙”的人士所信奉的美国普世价值（美式自由）的伟力。美国的崛起，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成功地将其超级“债权”转化成超强世界“霸权”的国家。这一点，不但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做到，也是今天的中国或者日本这样的世界主要债权国极难做到的。

因此，如果说当年的美国与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债权国家之间存在什么根本差距的话，所谓的差距就体现在“有作为”“讲政治”和“当教父”这几点上，而并不在GDP的多少，更不在什么子虚乌有的美式自由。

## 颠倒：利用世界霸权驱动债务经济

> 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占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
> ——马克思

美国的崛起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也是最高的阶段。

美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意义上的传统帝国，也不同于近代产生的那些帝国主义强权国家。实际上，美国是个“霸权”，而不是赤裸裸的“强权”，所谓霸权，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自觉接受和认同的权力。同时，美国不仅是金融中心，也是一个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意义”的符号核心，把美国称为“符号帝国”也是恰当的。

美国符号所象征的意义首先就是“安全”。众所周知，对于未来的良性预期（或者说是对于未来的“信心”）乃是国际资本和投资体系得以运转、资本积累过程得以持续的基本前提。而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安全”，当然，这主要就是指资本投资的安全。

基于“安全”这一资本积累和国际投资的前提条件，“自由世界”不仅需要美国扮演“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世界警察”角色，更要求美国做出“世界永久和平”的弥赛亚承诺，并定期地通过“仪式化”的表演（其中就包括炫耀美国强大的武力）对这种承诺做出保证。因而，美国的角色就是在资本主义“千年至福”的弥赛亚仪式中充当“教父”（并收取费用）。即使美国式的穷兵黩武，也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对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其军事扩张总有控制和争夺殖民地等现实的经济目的，但是，美国的穷兵黩武却往往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因而带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质），甚至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符号帝国”并非空洞，而是具备强大的再生产能力，即美国的行动总是能够不断地再生产出如下象征意义——“历史终结”“自由世界”千年至福、资本积累和投资循环的“永恒性”，并能够通过各种仪式喻示“资本世界因为有美国的存在而安全”的符号箴言，这种能力则被美国垄断的世界主要传媒不断再生产和放大。

这就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其合作的《帝国》一书中，将美国称为一个立足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不是一个单纯通过武力追求海外利润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因。这也是弗雷德里

克·杰姆逊率先指出：资本积累和投资，循环的“永恒性”的形而上学，即他所谓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而作为资本永恒积累和永恒循环“守护神”的美国，因此就并非一个“帮会大佬式”的霸主，而看上去更像一位慈祥的“教父”，它做出的是关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承诺，是关于“未来景气”的承诺，是“自由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安全可预期”的承诺。总之，只有这样的承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根本命脉——国际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能够持续地运转、循环。

可惜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穷兵黩武却没有印证这一资本积累永恒循环论的形而上学，美国的武力表演最终也没有兑现这一资本主义弥赛亚仪式，恰恰相反，美国的穷兵黩武不仅逐步耗尽了美国的未来，最终也耗尽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未来。

这一切，当然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遭到其立国以来第一次军事挫折，随后又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开始的，尤其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被一群几乎是手持长矛猎枪、衣衫褴褛的越南农民击溃——这一历史转折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现实意义，它不仅表明“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且雄辩地证明了由美国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脆弱，同时也宣告了美国符号指涉的“永恒积累”“永恒循环”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秩序的动摇。

在朝鲜、越南和中东的失败导致了极为现实的后果，它不但使得美国极其迅速地耗尽了钱财，而且，对于那些积极为美国提供战争基地和物资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亚洲盟国），以及那些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的国家（西欧）而言，情况更为糟糕——它们非但不能分享战争红利，而且也将拿不回它们自己的投资。最终，美国“战无不胜”这一神话的破灭，更使得建立在自由世界“永久和平”这种形而上学预期基础之上的资本积累和循环运动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胁。

当然，美国当局是不会通过汲取教训，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美国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总是美国自身的利益。面对20世纪60年代末的巨大财政赤字，美国故伎重施，宣布美元对黄金大幅度贬值，这就等于放弃了美元作为“黄金券”的地位，此举的目的，乃是以这种方式推卸掉对其盟国的债务。

1972年，美国干脆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储备市场，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从而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的方式，再次单方面宣告对原有的西方经济贸易体系重新洗牌。而这就迫使那些美国的盟国们在“要美国还债”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一灾难性的处境中做出选择。这也迫使它们在陷入破产的“现实美国”和“美国的象征意义”之间做出选择，迫使它们在“允许美国拖延债务”（这起码可以在心理和精神上维持一个资本主义光明未来的想象）与接受“资本主义世界未来之灰暗和完全不确定性的现实”之间做出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西欧和日本也像“一战”期间的美国对待其欧洲债务人那样，坚持让美国立即偿债，这不仅要冒着与美国决裂，从而彻底丧失美国武力保护伞的风险，更意味着放弃美国所有的“象征意义”——“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江山永固”的形而上学，以及资本积累与投资循环永恒性的“逻各斯”。不要以为美国的债主和盟友们所拥有的这种形而上学狂热只是一种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恰恰相反，正是从最现实也是最坏的意义上说，如果放弃形而上学及其象征物（美国），就等于承认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处在毫无安全承诺的处境之下，这势必导致资本投资预期和投资环境的全面恶化，甚至导致国际资本积累活动的中断和停止。

这的确令人想起马克思被人忘怀已久的伟大论断：实际上，并非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竖立起形而上学的纸糊的大厦，恰恰相反，资本“无限积累”和市场“永恒循环”的整个逻辑，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观念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不能仅靠经济来

支撑，恰恰相反，要维持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和文化信念，需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信用机制，而后者则取决于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的能力。

从1972年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就是靠对资本积累和市场循环永恒性的形而上学迷信来驱动的，或者说，是依靠杰姆逊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逻辑”来驱动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靠它的木脑袋着地而翩翩起舞的“头足倒置”的世界。而这个“木脑袋”、这个“故纸堆”就叫“美国财政债券标准”。1972年之后，“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就代替了黄金以及一切物质财富，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从而开启了一种美国通过大量发行和印刷美国债券来驱动世界经济，世界各国则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储存自己的财富的“头足倒置”的世界经济结构。

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美国财政债券标准”究竟是什么、它代表什么、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货币吗？它是一种债券吗？它是“山姆大叔”应得的管理世界的账单吗？它是一种由美国的国力所支撑的财富表征或者财富标准吗？其实，它什么都不是，或者只能说：它是一个秘密，是一个谜。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的产物，作为资本主义迷信的“画符”，它是人们心中的神，是包含了社会秘密的“象形文字”——它除了是一个秘密、一种象形文字、一个谜之外，除了是资本主义这个新宗教的符咒之外，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指出的：

> 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占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注)

这再次表明：资本并非任何现实财富，资本只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一纸承诺和纸质复本。至此，资本主义已经是一场荒谬的赌博，只要欠债者不断签订信用承诺，即使他已经输掉了整个世界，这场赌博还是会继续下去。而美国正是利用当今不合理的国际信用体系绑架了全世界，1972年之后的美国超级霸权的神奇力量，当然并非来自其拥有的超级财富（美国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甚至也并非来源美国的超级武力（它已经在朝鲜和越南被击败），而是来自“美国符号”的“神秘性”，当然，它部分地来自“美国神话”或者“神化美国”，以致这个神话今天最终发展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仅是美国的月亮是最圆的，也远不止于“美国遍地是黄金”，而是“美国的垃圾是超级财富”，“美国的债务就是黄金”。

悖论的是，尽管今天的美国已由世界债主一举跌落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是，这非但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恰恰相反，它还空前地加强了美国的霸权。而与历史上美国曾经掌握的空前“债权”和空前的“政治霸权”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再次发明了一种空前绝后的霸权工具，美国发明和操纵的这个新霸权工具的名字就叫作“债务人的霸权”。

“债务人的霸权”作为一种最神秘、最神奇的权力，绝不是美国“应得”的世界“管理费”，“债务人的霸权”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逻辑之中。换言之，正如马克思和尼采所指出的，在以债务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逻辑中，最终必然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颠倒：由“债务人”来决定“债权人”的利益和未来。所以，债主必须像爱自己的未来一样“爱”自己的债务人，包括当其无力偿债的时候要继续借钱给债务人，以继续收取利息，从而一方面将债务人永恒地推入债务的深渊，另一方面以此保证债务链条的永恒持续。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断依靠制造债务并依靠债务来驱动的国际信用体系，没有债务关系，也就没有资本主义，所以，这种制度也就必然会导致债务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最终使全世界都陷入这种“债务人霸权”的逻辑。

毫无疑问，欧洲与日本正是因为迷信和深陷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逻辑，才会欣然接受美国的财政债券标准，并将其奉若神明，而美国也正是因为洞悉了这一逻辑，或者说吃准了其债主们的心理，所以才开始了一个通过肆无忌惮地推行美国财政债券标准，来免费消耗世界财富乃至“消遣全世界”的时代。

一种“债务驱动的经济”（debtor oriented economy）、一个由债务人的霸权统治的世界，这象征着马克思所说的“头足倒置”的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弗洛伊德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自虐性精神分裂”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其实也莫过于今天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与其债主们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揭示了这种颠倒，而这笔无尽头、也是无厘头的费用不是美国“应得的”，而是美国的债主们头脑中认为它们自己“应付的”。这表明，资本主义的道德法则恰恰立足于不道德的畸形债务关系之上。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把世界各国的大部分财富以及资本家私人财产的相当一部分都转化为“国际资本”，而所谓“国际资本”，实际上也就是由美国控制和经营的资本。美国总是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主张剥夺私人财产的洪水猛兽，但事实却是：恰恰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无情剥夺了各国的财富和大小资本家的私人财产，留给他们的抵押物不过就是由美国印制的、难以兑现的绿纸和票据，而那些被剥夺者对这种剥夺竟然感恩戴德——这正应了尼采在20世纪初发出的嘲笑：“瞧啊！……这些自我折磨、自我欺骗的蠢蛋！”这再次证明，如果不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切财富、财产皆等于资本这个定然信念，这种剥夺就是不可能的。

## 危机：债务经济瓦解美元霸权

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

——理查德·罗蒂

“使用工具是从猿到人进化中决定性的一步”，若问这句话是谁说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果电视台的抢答节目提出如下问题：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类所发明的最匪夷所思但又最有力量的工具是什么？恐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五花八门，而我的回答同样也与众不同。我认为：那就是美国财政债券标准衍生的、层出不穷的美国金融债务工具。（实际上，今天美国的债务标准已经没有上限。）

近40年来，正是美国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驱动着资本扩张，支配着世界经济，维持着消费和繁荣，同时也制造着战争与危机。美国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是如此神秘，又是如此强大而神奇，以致它一经问世，就立即使得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的巨大危机中起死回生，并仿佛重新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无穷尽的活力。而对当时的美国来说，不仅借此一举洗清了因越南战争欠下的一屁股外债，更从此开启了一个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侵略战争埋单的崭新时代。

当然，这种现象在贵金属本位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在金本位制下，当外国的贷款不可能获得的时候，那些好战国家只能出售自己的黄金储备以支付其军事耗费，从而必然导致本国货币相对于黄金的贬值，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例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以及“一战”之后，英国及其他交战国正是通过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通过失业和贸易的萎缩，即通过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方才使得其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在战后很长时期之后，方才回到了与战前持平的水平，最终好不容易维持了收支平衡。

众所周知，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频繁的战争使欧洲国家陷入沉重的公共债务之中，从而使得欧洲各国不断增加税收成为必然。两个世纪之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指出过：英国是如何通过发明新的税种来使老百姓为战争埋单的。他断言，具有军事野心的国家

必然导致高赋税、高负债、高耗费的经济。

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冒险，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重蹈欧洲好战国家的覆辙，但情况似乎更糟。到1971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消耗殆尽，美元也不再能够维持35美元/1盎司的美元/黄金比价，这导致美国撤出伦敦黄金市场。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仿佛又到了一个世界霸权“改朝换代”的巨大的转折关头：越南战争的巨额花费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金融核心地位，正如“一战”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金融地位并逐渐耗尽了它，最终迫使英国将世界金融核心接力棒交给美国一样。看起来，除非通过出售黄金或其他形式的有形资产，否则美国非但无法偿还债务，而且无法继续取得外国的任何贷款。而如果美国真的被迫这么做（出售黄金和良性资产），那么它就必须首先面对国内大规模通货膨胀的严峻现实。

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便遭遇了其立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危机：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没有任何脱身的希望，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梦”及“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第一次在美国国内受到大规模的质疑。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发起了反抗美国和以色列的石油战争，欧洲各国也“趁火打劫”，迫使美国以黄金或者固定资产偿还债务，美国仿佛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看来，如果世界金融体系还停留在1971年时的状况，美国就再也不可能发动任何一场战争，而且如果是那样，美国今天恐怕早已不是一个世界霸权——它甚至会比苏联更早地走向衰落。

但是，美国却神奇地顶住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严峻局势，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美国一举抛弃了黄金和美元挂钩的体制，转而全力创造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1970年，美国通过一场空前的战略大转变顶住了空前的大危机，而美国所进行的大转变的实质就在于：它通过发明和运作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即宣称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美国所欠债务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标准”之下），使过剩美元回流华尔街，再由华

尔街流入美国财政部的口袋里，从而成功建立起“美元债务体系”。这一大转变的后果，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一大转变的核心之处就在于：美国政府全力使得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并且迫使世界主要银行接受、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作为信用储备。

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创制首先意味着：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银行也不能通过购买美国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良性资产的方式向美国索取债务，它们只能通过购买和储备美国债券，在国际金融信用评级机构（实际上是由美国控制的）中获得一个“评级标准”，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得美国的债务得到无限延期。其次，这还意味着：美国不必出售其黄金储备以及任何其他有形、有价资产，仅通过发售美国债券就能换得大规模的外国贷款。最后，这还意味着：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即使通过印刷和发售“债券”这种形式举借再多的外债，也不会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当美国的财政债券标准被外国主要银行当作财富来储存、积累时，一旦美国缺钱，只要印刷一批此类债券，外国的资源和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而且即使美元贬值，那也意味着美国债券的缩水，它只会对美国财政状况造成正面影响。

美国以其软硬兼施的高超外交战略实现了这一创制。例如，1972年，当伊朗和沙特要求以它们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企业的时候，美国立即以战争相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却又告诫石油输出国组织集团：只要它们用石油收益换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债券，它们就可以随时提高石油价格，即它们具有随时提价的自由。这样，美国就可以用它随时印刷的绿纸美元和债券——而不是黄金或者任何优良资产购买石油。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用其永无止境地印刷出来的绿纸美元源源不断地购买了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制造业产品，以及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产品。

美国的战略大转折伴随着一系列重大政治和外交调整，其中最为著

名的就是，被当年美国国内短视的意识形态反对派们称为“新朝贡之旅”的尼克松北京之行。在封锁了中国长达30年之后，美国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所驱使，终于放下身段，公开承认中国是一个“应该平等对待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而不是美国的附庸。这是自1840年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开始，美国也借此得以从越南“体面”地撤军。

但是，更应该指出的还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就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大转变的时代，它既是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以中美政治、军事权力由对抗走向相对平衡为基本标志，更是以全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为背景与基础。就后一点来说，美国需要的从来就不仅是中国的市场，而是希望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纳入美国的上述“评价标准”，特别是美国的财政债券标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乃是一个由美国发售债券，再由美国所支配的各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美联储）通过制定“债务标准”来管理国际货币金融的体制。今天，中国已是世界上持有美元外汇和美国债券最多的国家，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一体制下，美国政府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办法，就是使美元和美国债券贬值，从而轻而易举地改变财政收入与债务之间的比例，而对于积累美元和美国债券的国家而言，其财政状况会立即受到打击。

在最近30年全球“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下，我想也许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能够比理查德·罗蒂的理论更能体现当代美国核心价值的精髓了。按照他的理论，没有什么价值是“实在的”、是“真的”，一切价值都是“话语的建构”，因此，只要你所创造和诉诸的东西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跟你走，那这就是价值了。什么是真理？罗蒂说：真理绝不是手段与目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契合和联系，所谓真理，就是“通过讨论和说服而取得社会一致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罗蒂所谓的“价值”的最核心的体现，其实就是美国债

券。因为它的“价值”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它是美国利用外交和战略手段说服全世界接受的“美国信用”，其“价值”的根本依据只是因为有人接受它、相信它“有价值”而已。进一步说，欧洲人和日本人接受它，是因为他们是美国利益攸关的同盟者；石油输出国接受它，主要是因为它们被美国行了“随便涨价”的小惠；而最为令人啼笑皆非的也许是：中国不得不接受它，乃是因为“大家都接受它”。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由美国发债、国际金融体系制定债务标准的新的金融体制起初看起来运作得相当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实的世界因此而颠倒或者“倾倒”：债务非但不意味着危机，相反，还意味着机遇。这令我想起1996年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的游船上聆听弗朗西斯·福山宣讲他的新书《信任》（*Trust*）时的情景，其时风头正健的福山凭海临风，登台后宣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事实证明，卡尔·马克思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从根本上错了”，这个世界需要“信任”和“信心”，如果没有“信任”和“信心”，就没有“信用的扩张”，而马克思却把“信用的扩张”误解为迷信的扩散。

但是，今天的金融危机表明：马克思所说的都应验了，对美国的信任完全就是一场迷信。

美国通过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匪夷所思地度过了空前的危机，此后，金融（债务）衍生物就一直成为美国对抗一切艰难险阻的“灵丹妙药”，成为它制造一个又一个经济泡沫的屡试不爽的神奇法宝。全世界也都为美国发明的这种“灵丹妙药”而痴迷，或者说，美国这种“点纸成金”的金融戏法令举世若狂。而美国金融（债务）衍生物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手段更是与时俱进，不但把全球生产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几乎超过当年美国武器研发和科技创新的速度。不过，如果我们多少还记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断的话，或许就会知道，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这不过就是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当二者的差距变得不可弥合的时候，危机时代就到来

了。

而这就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毫无疑问最具权威性。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此处所指的是马克思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表现）。这就是马克思将《资本论》写作的目标确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经济学家们根据头脑里的形而上学法则制定投资规划。因此，关于《资本论》，马克思这样说：“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注]

资本积累的动力就来自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来自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差异。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就是由于这个制度本身是“头足倒置”的，是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非生产—交换机制基础上的。观念支配现实，正如虚拟资本支配现实资本，而这就是资本社会的一般特征。

康德说，先天综合判断的基本范畴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被当代的某些学者们称为“西方现代性”核心的“时空规划技术”，其实无非也就是指资本主义金融技术。如果借助王国维对形而上学乃“色空”的定义，用最通俗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买空卖空”。“买空卖空”这句中国成语最形象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它一语中的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经营。

在另外一本叫作《现代性的后果》的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中，安东尼·吉登斯也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时空规划技术，并解释说：这是一种在空间上“脱离具体地域”（脱域），在时间上规划、透支未来的技术，资本“经营时空”的最特殊的技术工具就是债券，因为债券

代表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吉登斯把债券称为对时间的规划，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对未来的预期最终一定可以实现，就等于相信债券的价值是有保障的，而反过来，如果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在现实的冲击下破灭了，那么这些债券就一钱不值。经济危机一定导致货币金融危机，其道理即在于此。

吉登斯说，货币金融技术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资本投资活动从根本上说是由对“虚拟时空”的运作来支配的，于是，“风险”便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而应对“风险社会”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对虚拟经济加强监控或者管控（发现问题及时预警、及时干预）。显然，吉登斯的说法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批判，换成了更绅士化的“风险”一词，进行了温和的包装而已。

毫无疑问，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很典型地说明了美国虚拟经济或者泡沫经济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尽管当年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问题的根源显然不仅仅出于哪一届政府，也远不只是这一届政府热衷于泡沫经济政策，问题的核心和真正根源在于驱动债务经济、泡沫经济运行诸政策背后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令人吃惊的是，指出这一点的恰恰是奥巴马。在其选举演说中，奥巴马公开运用了一种典型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以此来批评美国长期热衷于运营虚拟经济而放弃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发展观”，从而一针见血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奥巴马说：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种“经济哲学”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致除了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党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经济哲学”已经彻底破产。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信用机制，而绝非生产与交换的市场机制——这是《资本论》一书的核心观点。因此，要批判资本主义，就必须

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开始。正如奥巴马深刻指出的，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是典型的“买空卖空”的经营活动，隐藏在这种“买空卖空”背后的，则是根深蒂固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其实质是对“信用”的滥用：把债务证券化，把经济活动彻底虚拟化，把现实生产交换还原为信用机制，把世界还原为数字。

而所有那些先进的金融衍生物都是运用高超的数学方法，将时空托架出来的技术，它们只不过是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种良好预期反过来又体现在金融衍生物的“价值”或者“升值”上。在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中，银行之所以不计后果地放贷，购房者之所以不计后果地贷款，保险公司之所以不计后果地提供保险，都是因为在这种种不计后果的行为背后，存在着对“唯一一种”后果的估计：美国的房价会不断上涨，而且是没有尽头的上涨，而这只是被数学和逻辑推论保证了的。

经济活动中的上述三方（银行、保险机构、买主）所经营和消费的，其实是并不存在（起码是当下还不存在）的“利润大饼”——这个“大饼”也就是未来美国房价会一直上涨的利润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消费或者经营的，本来就是一个“空”，尽管当这种未来时的、尚不存在的“利润大饼”以房贷、保险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物来表现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张“饼”，仿佛不是“空”。而当美国长期将其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于这种金融炒作之上，无视内部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和民生等议题时，我们就非但不能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还应该指出这种自欺欺人的泡沫经济、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对于所谓的“经济基本面”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而且任何没有实体经济和实际财富支撑的泡沫越晚破裂，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一旦风吹草动，泡沫预期破灭（因为它早晚一定会破灭），那就不仅仅是大家的未来都“落空”，那些精心营造的各种金融衍生物也会立即成为“空头支票”，成为废纸。而且，此前超前消费掉的一切都将立刻成为巨大的债务，银行、保险公司和购房者三方都成为欠债者。与其说他们未预期到并提前消费了一个“坏的未来”，还不如说这是“买空卖

空”活动的必然结果。

与以往一切危机不同，这次由次贷问题引发的美国金融大危机，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它在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以及“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所支配的债务经济、虚拟经济破产的同时，也预言了美国这个世界唯一霸权的终结，预言着资本主义的第四个发展阶段的终结。

第一，这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挑战造成的，危机发生在美国经济的最深刻部位，暴露出美国所依赖的虚拟经济模式“病在腠理”。所谓“善剑者死于剑下”，美国乃是为它自己所发明并擅长的金融债务衍生物所伤。这恰如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美国的失败是它自己造成的。它深刻地表明：长期的投机赌博式金融炒作道路，已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伤害了美国经济的基础。当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毫无疑问是它历史上最糟糕的，即一方面是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的飞速发展和泡沫化，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解体和正在解体，例如，次贷危机不仅影响到银行，而且极大地打击了作为美国工业支柱的汽车产业。它充分表明：如果此前的历次危机都没有深刻地伤及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话，这一次则不然。

第二，这次危机还同时伴随着美国式发展道路乃至美国道德、美国信用的破产。在当今世界，美国长期在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内民生、发展实体经济乃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所作为，而且总是站在与大多数国家相对立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驱动的经济、超前的消费、日趋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堪比苏联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也使得世界各国日益对美国式发展道路感到失望和厌恶。此外，美国长期拖欠世界债务的不道德行为已经使得美国的国际信用陷于破产。

卡罗琳·鲍姆在一篇短文中指出：支配当今美国经济的并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资本投资的运作者，是形形色色的机构投资人、保险业从业者，这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产业资本家不得不对产品销售负责，即

保证产品可以卖得出去，但是对金融资本而言，贷款者只管贷款，保险者只管卖保险，每个人都从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出发，却没有任何人考虑到其个人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的后果是什么。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假定，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向一个好的结果。这个荒谬的假定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为贷款负责任。当然，所谓自由主义社会的实质不仅仅在于自私（或强调每个人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在于人际关系的僵化、隔绝和异化，官僚社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市场的社会就一定是典型的“多数的暴政”的社会。(注)

第三，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除了给当地的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之外，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无底洞式的赤字，从而成为捅破美国金融泡沫的致命利器。正是这些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宣告了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真正衰落。

今天，无论是叙利亚还是委内瑞拉，无论是朝鲜还是伊朗，对所有这些地区，美国并非不想动用武力积极去干预，而美国至今没有干预的原因，只是因为美国确实没有能力干预，只是因为美国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它早就应该发现的事实：美国没有钱了。实际上，今天的美国除了利用西方中心主义的陈旧遗物以维持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外，除了利用中国某些“精英”极其愚蠢的“自由主义拜物教”继续制约和要挟中国外，美国可以指挥、命令、调动的力量已经非常有限。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当前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乃是美国主导全世界的局面，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本身，甚至还不能说是美国经济本身。尽管投机赌博式的、债务驱动的经济在严重伤害了世界经济的同时，也重挫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破坏了美国内部的经济—产业结构，但是，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占据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曾经具有相当完善的产业结构（尽管被克林顿和布什父子进行了几

次“结构调整”后，实体经济能力已大为削弱），美国依然还是世界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还是高科技产品和人才的集聚地。所以，一旦美国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洗掉或者赖掉其庞大的外债，美国的损失充其量也不过是丧失了国际信誉而已，大不了关起门来搞“自力更生”。而一旦美国结束其投机赌博的虚拟经济，一旦把它伸向全世界的手缩回来，而把精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建设、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上，那么，不到4亿人口却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均资源的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历的所谓“困难时期”和“苦日子”，在有着14亿人口却（严重不均衡地）分享着微薄资源的中国的老百姓看来，其实早已经是“超级小康”的生活了。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以为中国应该去“拯救”美国，这恐怕不是忘乎所以，就是居心叵测。

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美国经济的破产与美国符号或者作为“符号帝国”的美国的破产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只要全世界依赖美国的“事大主义”迷信心态不变，美国就仍可以被“打工国家”养起来，美国也就永远不会破产。而所谓“大而不能倒”，正是政治反过来决定经济乃至文化反过来决定经济的最好例子。

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中国最应该做的，其实首先就是从美国长期奉行的债务驱动的经济、泡沫化的发展道路中汲取“反面教材”的意义和教训，从而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扩大内需、保护环境、增加社会公平、切实加强实体经济建设的“科学发展道路”。中国政府不应该去华尔街“救市”，而是应该在各个领域都大张旗鼓地宣传“救中国就是救世界”，宣传只有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好了，世界才有指望。特别是，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理直气壮地宣传：只有占中国人口90％的普通劳动者过上好日子，中国经济才有指望。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今天面向内需，也就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这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最后，在切实坚持、落实中国道路的同时，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公

开检讨、严肃批判严重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而如果听任“新自由主义”政策公然当道，那么，在此重要历史关头，政府的决策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取信于世、能否真正落实和推动科学发展观，这些必然都是问号。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向美国学习的。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确实应该学习美国的如下品质：长于谋划、敢于当头——起码是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包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如何，今天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而对当下的美国而言，它起码必须在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通过发行虚拟债券愚弄世界并自我欺骗之间做出选择。而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损失（其实已经损失）在美国的部分投资，说到底，这是14亿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底层劳动者“一个汗珠摔八瓣”赚来的血汗钱，然而，这个残酷的结果已经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训，切实加深自己对美国的认识，切实增加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从而排除干扰，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那么，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上，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交一定的学费、走一段弯路，其实也是在所难免的，尽管这一次的学费实在过于昂贵了些。

---

1. 江泽民. 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M]//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8–429.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6–577.
3. 威尔纳·桑巴特.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62–163.
4. 加里·纳什等. 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第6版）[M]：下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07.
5.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下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00.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4–865.
7.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3.
8.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
9. 马克思说，自己的著作“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马克思.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10. 马克思.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11. Caroline Baumm, Anatomy of Financial Crisis Begins with Skewed Incentives, *China Daily*, October 9, 2008.

# 下篇
# 创造新世界

# 第四章
# 马克思与恩格斯

## 现实资本、货币资本、虚拟资本

> 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
>
> ——马克思

马克思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世上最通俗的社会主义读本，就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于1883—1892年在德国卖了约两万册——在当时，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它被译成10种文字，译本超过了《共产党宣言》。[注]尽管恩格斯为此很高兴，但马克思在该书的前言中却老实且不客气地指出：这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注]。

恩格斯一向为自己的“资本家”身份而倍感懊恼。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恩格斯与罗伯特·欧文一样，都只不过是“企业主”而已，而且他们还是世界上最具良知的、品德极为高尚的企业主，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本家”——实际上，恩格斯的自责是完全多余的。

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围绕“货币资本”形成的“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并通过三者之间的差异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但是，恩格斯所理解的“资本”主要就是“现实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产业资

本。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资本”由“产业资本”“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几个部分构成，而产业资本无非是通过“商品”和“劳动力”才能实现的资本；恩格斯对于虚拟资本、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都缺乏马克思那样高超的了解和分析，他对于资本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产业资本内部。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视野无疑是比较狭窄的。

正因为恩格斯的分析主要局限在产业资本内部，所以，他才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简单地理解为：由于资本家刻意压低工人工资收入而造成的“产品过剩”和“消费不足”。而且恩格斯还认为，这个矛盾可以通过计划性的生产和分配得以克服。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掠夺性扩张，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是资本家这个阶级，而是资本扩张这种行为。这种扩张主要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它涉及劳动力的养成、科学技术的运用、市场的开拓与归置，特别是，由于资本扩张往往是借助信用发行进行的，因此，其主要表现就是虚拟资本的扩张。由于生产发展总是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所以，在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存在着刻意制造的差异，而这也是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所在。因此，资本主义的痼疾是“资本过剩”，而不是“产品过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不是恩格斯所谓“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是“过剩资本”与“劳动”之间、“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靠剥夺企业主和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自动取得胜利，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科技和市场准入标准等社会再生产领域，皆被服务于资本扩张的专家阶层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并非政府，而是职业经理人，特别是银行，而超发货币引发的资本过剩是私人银行的痼疾，如果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整个信用体系，那么，巴黎公社的一纸命令在法兰西银行的一纸汇票面前便什么也不是。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过剩资本借助世界不平衡向发展中国家流动，

以攫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这是资本积累的另一重要方式，于是，一个资本账户不设防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就没有货币金融自主性，就没有真正的主权，如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无产者和劳动者的权力了。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一定会指出：占领工厂与占领华尔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之间互相拆借的体制没有被摧毁，占领多少工厂都无济于事。

恩格斯的经济学，与其说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还不如说是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劳动价值论。恩格斯毕生关注的是工厂内部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是与产业资本相伴随的"劳资关系"问题，而且他还像李嘉图那样，把这种剥削理解为"延长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资本家小小的作弊行为所致。

但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剥削"，不仅是指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而且是指资本家利用信用机制欺诈全世界，指资本家利用世界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以"全球化"的方式剥夺全社会和全世界——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已经说明了。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只是欧洲产业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而马克思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不过，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恩格斯的重要性，或者说了解恩格斯思想的"紧迫性"，似乎还是要超过马克思。这是因为，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所谓"实体经济""现实资本"（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是当代中国最为活跃的资本因素。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产业劳动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恩格斯所提出的通过扩大内需、改善劳动者福利、调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刺激经济发展的思想，以国有企业税收为主干，实现社会分红，并支持社会福利计划的思想——所有这些恩格斯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方案，对于中国产业振兴、摆脱当前的经济—社会困境而言，都是切实有效的。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许会这样提醒我们：世界永远动荡和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是围绕着资本扩张建立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华尔街操纵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它驱动着金融垄断的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对立，因此，必须摆脱“三大评级机构”“巴塞尔协议”“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那些社会法则和经济法则，必须向美元汇率评价标准宣战，必须向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垄断在内的一切普世价值、社会法则无情宣战，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劳动者的权力。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就当前而言，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救中国”的短期方案，马克思则为我们提供了长期方案。

## 恩格斯的自画像

> 个人幸福只有通过促进社会公共幸福才能得到，卢梭的这个论断，很好理解并一直被实践着。
>
> ——罗伯特·欧文

与思想家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天才的管理者，也是杰出的企业家。

思想家的雄心是改变人类，起码是改变人类思考世界的既有方式。因此，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学说并不需要“现有的听众”，而是要培养出、打造出自己的听众，因为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美好的旋律也无济于事。

海德格尔说：“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本质上都有这样一个特征：它必然为同时代人所误解。甚至面对自身，哲学家也必须停止成为

他自己的同时代人。一种哲学学说越是重要，越是具有革命性，它就越是首先需要培养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的种类。因此，举例说来，我们直到今天也还必须费心尽力地去把握康德哲学的本质内容，把它从康德同时代人及其追随者的各种错误解释中释放出来。”注

实际上，最能理解马克思的读者向来都是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般的工人群众很难读懂马克思那些像砖头一样厚重的深奥著作。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这样的阐释者，能够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人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同样地，如果没有恩格斯的通俗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注定不过是些“连老鼠也懒得去批判的东西”。

因此，毫不奇怪，最初对“社会主义学说”感兴趣的人，并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工人，而是开明的社会改革者、具有科学管理头脑的工厂主，这些人中最杰出的代表者，就是罗伯特·欧文。而恩格斯本人的禀赋，与其说接近于马克思，还不如说更接近于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年出生在英国威尔士一个马具匠家庭里，他的出身与康德完全一样，只是他并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甚至根本就没读过什么书。欧文9岁时就开始奔走于欧洲各地，做卖布的营生，他曾在恩格斯后来经营家族企业的曼彻斯特管理一个纺织厂，在那里，欧文率先引进了先进机器。29岁时，欧文就成为苏格兰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棉纺厂的老板，成为欧洲最成功的企业主之一。

虽然欧文出身工匠家庭，但他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他正是恩格斯所寄予希望的“新型的社会管理者”。

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历程的畅销书曾经这样描述欧文：

从画像上看来，欧文的样子有点像一只温驯文静的兔子，独断

坚定的典型英国鼻子，椭圆形的脸蛋，加上一双深邃而看似无辜的椭圆形眼睛，好像要伸向两片面颊似的。注

虽说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欧文却是卢梭的信徒。在当时欧洲的开明人士中，卢梭的思想像空气那样四处弥漫，卢梭的许多话已经成为常识和格言。在18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欧文写道："个人幸福只有通过促进社会公共幸福才能得到，卢梭的这个论断，很好理解并一直被实践着。"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以极其反常的、近乎歌颂圣人降临尘世的调子，这样赞美欧文：

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这当然是指卢梭的观点——引者注）。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 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注

人类迈入19世纪的第一天非常重要，因为恩格斯曾经说：“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注]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欧文开始在苏格兰新拉纳克大棉纺厂旁边建设工人社区，建廉租房给工人居住，从而形成了新拉纳克小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社区。在新拉纳克小镇，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社会，第一家工人子弟幼儿园也在那里诞生。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在哪里诞生，那么，答案并不是巴黎公社，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国，而是苏格兰，欧文管理下的新拉纳克小镇。

社会主义事业一开始就是从建设工人社区，即从给劳动者建廉租房、为他们的子女开设幼儿园这种“民心工程”起步的。我们建国伊始，在北京改造龙须沟、在上海建“曹杨工人新村”，目的也在于此。当我们亲眼看到城市中心的“民心家园”拔地而起，看到普通百姓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段安居乐业，这情境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斗争性，在那一刹那，一切有良知者想必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高尚的情怀，想起罗伯特·欧文那孩子一般天真的眼睛。用黑格尔的话说：仿佛看到了“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欧文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个科学而完美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就建立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良性关系的基础上，它取决于工人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工人消费得越多，就越会推动生产的不断扩大，促进企业家利润的增加——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而这个完美的体系就会很好地“永恒轮回”下去，劳资双方就会互利双赢，社会便会最终走向高度和谐。这个体系之所以看起来不完美，就是由于贪婪的经营者故意压低劳动者工资，导致他们买不起商品，生产者消费不起自己的劳动产品，结果造成利润下降、生产停滞。

经济危机，就是由贪婪者恶意破坏生产—消费之间美妙的循环造成

的，而解决办法，就是牢记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这个二重性，具体来说就是以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方式来支持生产的扩大，来重建合作的经济，并以劳资利益的一致性来重建社会和谐。

> 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曾经在俄国努力推行泰勒制的管理方式，其核心就是制定科学的管理标准、培养和造就有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工人，同时实行刺激性的奖励措施，以扩大工人消费的方式来刺激生产发展。

而了解美国制造业发展历史的人也一定会知道：正是福特主义把美国经济打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造财富的引擎。正像罗伯特·欧文一样，亨利·福特主动为他自己工厂的工人提高工资，为的就是使他们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推行之前，在这种荒谬学说把世界经济推向因为低工资而造成的生产过剩之前，福特主义在美国和德国运行得相当成功。而今天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则在于：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是通过把美国的过度消费“债权化”而得到“想象性的弥补”，其结果却是造成了商品和流动性的双重过剩。

当前，启动内需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但很多人却以为一旦劳动者工资提高，外资就不来了，而没有外资中国就不能发展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陈云同志曾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

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看看“一战”后的德国。那个时候德国非常困难，欠了一屁股赔款，各国都不愿意借钱给它，于是，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依据李斯特（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也是马克思之前所在的《莱茵报》的主编）的经济学说，基本不依靠外资，经济发展完全立足于国内生产和消费，政府推动充分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增加。起初，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政府就利用国家信贷担保其不破产，并且补贴劳动者创业。结果，德国迅速地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三年后，工人收入、国家税收都上去了，德国在几年之内就发展起来，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今天，德国依然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最先进制造技术的国家，这就是由于它坚持了以不断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方式促进消费、促进劳动者素质提升的发展道路。

今天的中国生产着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商品，中国的市场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中国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生产的产品送到美国去换不断贬值的“绿纸”呢？难道在某些人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与自己劳动者的利益反而是不一致的吗？

现在，也有一位极其成功的企业家——洛克菲勒公司前投资顾问、一位欧文式的管理者（廖子光）这样告诉我们说：“中国经济浪费人才，因为它太便宜了。甚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过度廉价的劳动力都是经济状况不良的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这是不可原谅的。这样做将把中国锁定在落后国家行列。”注

欧文的经济学是从现实的经营管理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学术讨论会的空谈中得来的。欧文出名后，经常受邀参加一些精英的聚会，但是，他极其失望地发现：他见到的经济学家无非是些毫无实际操作经验的空谈家，他们谈起教条来固然头头是道，但却根本不了解实际经济状况。

例如，他受邀参加一次国会的座谈会，商讨拿破仑战争后应对经济萧条的对策，出席该会议的都是他心目中赫赫有名的显要，号称一流的经济学家、政坛要员、企业家和慈善家，主持这次会议的还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但是，欧文最终却悲哀地发现，与会者中，实际上只有他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能够真正了解如下简单的事实：当时的失业大潮是由于战后大批军人解甲归田造成的，而战争造成的市场需求突然萎缩、产业发展资金匮乏，更使得情况雪上加霜。他更进一步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丢掉工作是由于引进机器所致。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精英们”认为他已经疯了。

这次经历使欧文明白，要想让人们，特别是“精英阶层”了解真正的经济学，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

欧文进一步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工业生产力，究竟怎样才能是可持续的呢？

> 这2 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 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注]

这个时候，欧文方才把明白的答案说出来了：这部分差额是落到投资家手里了。欧文说，新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使得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被奴役，因此，除非让劳动者得到更多好处，给工人更多的钱，让他们去拉动消费，否则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持续。

恩格斯说：“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商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注]实际上，欧文的论断也是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诊断：经济危机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产品过剩。克服危机的一个办法，就是通

过开工建设一些公共项目，以吸纳过剩资本，刺激就业：

> 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包括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在内，都做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至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注

由从感情、热情、善心出发，到从科学和理智出发，恩格斯说：这也正是欧文由一个"好心人"转向共产主义者的转折点——以前他只是慈善家，现在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尽管欧文的企业越办越好，最终却没有人愿意与他合伙了，因为所有合伙人都感到钱分得少了。实际上，他们与欧文合伙从来没有亏过钱。在英国式的合伙制度下，合伙人是作为投资人或投资者的代理人而存在的，他们完全脱离生产、经营和管理，所关心的只有利润回报。与企业家不同，合伙人具有纯粹的资本家性质。而在当时的欧洲，能够保证每次投资都赚钱，这完全是个奇迹。但是，欧文的那些合伙人太贪心了，他们总是认为钱赚得还不够多，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投资、生产与消费必须联系在一起，一切不能通过消费回笼的投资，统统都是坏账。

最终，不仅仅是在英国，欧文竟然在整个欧洲都找不到合伙人了，欧文把全欧洲的资本家都得罪了，而讽刺的是：这恰恰是由于他杰出的经营成就。

马克思后来解释了欧文失败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体系里，产业资本总是要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和制约，而投资者的理想并不是生产，而是获利。在这个意义上，欧文不是资本家，他的产业理想是与资本家的理

想截然对立的。

那么，政治家们又怎样呢？

欧文一向认为，改善民生、扩大就业，解决基层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这必定是精英和统治者们所关心的。按照常识，只有抚平底层的骚动不安，社会才能稳定，只有社会稳定，精英和统治者们才能高枕无忧。直到某一天，他发现自己完全错了。

1817年（即马克思诞生前一年），欧文在法国参加一次主权国会议，在会上，他遇到了欧洲会议的秘书长——一位老权贵。欧文极其卖力地向他说明：由于科学和贸易的发展，现在大家的利益是纠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劳资的利益是纠合在一起的，精英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努力地发展科学教育、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在“水涨船高”的情况下，欧洲上层的财富才会稳步提升，生产力才会持续发展。但这位政治老前辈的回答却令他大惊失色，这位权贵淡然地说：“是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甚至比你更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群众变得聪明、富有了，经济和思想独立了，统治阶层将如何控制他们呢？”

欧文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一厢情愿和“错误”的根源：原本在他看来，只有民生搞好了，社会才会稳定，如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才会稳固；但是，在统治者看来，倘若老百姓变得更聪明、富有，那就不好控制了，如此，社会才会真的不稳定。

欧文不得不离开欧洲，到美国去。在印第安纳州，他建立了一个叫作“新和谐”的社区。因为需要在欧洲赚钱，欧文就将“新和谐”社区交给美国人泰勒去经营。但是，泰勒是个骗子——他不仅卷走了欧文的财产，还把欧文告上法庭。“新和谐”社区很快就垮了，这是欧文经营产业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搭进去了。

这次失败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沙龙都对欧文关门了，尽管很多达官贵人还欠了他的钱，但却借机对他避而不见。以前，这些人说他是慈善家，是最成功的企业家，是天才管理者；现在媒体要么不报道他，要么就无情地打击他、诬蔑他。

欧文只好单干了，他最终成为工会运动的创始人。欧文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欧文毕生坚信，劳动者可以凭借基层的市场组织——劳动者公社，战胜经济危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当中，这样讴歌说："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注]欧文最终一贫如洗地回到了威尔士老家。当年他两手空空离开家乡闯世界的时候，还是个英俊少年，他一度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并曾经富甲天下，最终，他还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不过却怀揣着对一个美好和谐新世界的梦想。

而当马克思还是个英俊少年的时候，他也曾这样写道：

>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
>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注]

毫无疑问，罗伯特·欧文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如此盛情地赞扬了欧文，也

许恩格斯从欧文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毕竟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甚至都是曼彻斯特成功的企业家。“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实际上，恩格斯也正好是这样一个人。恩格斯曾谦虚地说：“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注]恩格斯将他的第一部畅销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全部版税收入赠给了马克思，只要马克思说没钱了，恩格斯马上就给他寄钱。如果不是恩格斯发动和领导，共产主义的几个国际都不可能成功。恩格斯是天才的组织者、实干家和企业家，他的才能绝不限于可以在曼彻斯特开办成功的工厂。

但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桂冠给了欧文。在恩格斯看来，欧文的方案不是“不科学”，欧文的失败也绝不是因为他不懂经济运行的要害和弊端究竟在哪里，在企业经营方面，欧文比几乎所有空谈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强得多。

欧文失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欧文的改革只局限在工业社会内部，甚至就是工厂内部，他不知道资本家并不是企业家，资本也不仅仅是产业资本，作为资本投资者，资本家的唯一目标是资本扩张，因此，生产发展的速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投资者或投机者面前，企业家也是被剥夺的对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但劳动不可能战胜资本，企业家也不可能战胜投资家和投机家。因为资本家完全可以不投资、不经营现实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而是利用金融手段，通过剥夺全社会而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还可以投资于战争，进行剥夺性积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可以投资于政治。当所有的政客都联合起来反对欧文的改革的时候，他必然面临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封杀他的厄运。

第二个原因在于思想水平的局限。正像康德迷信“内心的道德法则”一样，欧文关于工业文明的运行最终将遵循“和谐规律”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资本与生产活动相对立，这不仅表现为企业家与合伙人的目

标是不同的，归根到底还在于资本的法则与生产和交换的法则是不同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前者叫作“扩张中的崩溃”。当然，这并非因为欧文“读书太少”使他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就是把世界理解为本质上是“和谐”的，而它的基础就是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即这样一种科学其实只不过是代表了18世纪人们对待世界的一种哲学方式，它把世界理解为“有规律的”与“合目的的”。

欧文不知道他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只有在资本主义遇到危机和崩溃的时候，他的改良方案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他的经营越出色，他的成效越显著，他的方案便越被看作是哗众取宠、神经错乱的产物，他本人也就越被视为“可有可无”。

然而，恩格斯说，欧文的思想激励了也必将不断地激励几代社会主义者前赴后继，因此，借用他赞美马克思的话来赞美欧文，其实也是合适的：

>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注]

## 企业主与资本家

> 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
>
> ——马克思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曾经幽默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座不朽丰碑，而恩格斯在编辑、改写《资本论》的时候，一不小心便把自己的名字也“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注]。

实际上，这种说法不仅仅是幽默，也正是事实。马克思生前，《资本论》只出版了第一卷，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恩格斯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初稿、手稿中编辑出来的，列宁甚至认为“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注]。

列宁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恩格斯本人却坦承他对《资本论》进行了“改写”这个事实，并且声明：“我的改写顶多只有解说的价值，而且是对某种没有出版的和没有机会见到的东西进行的解说。”[注]对于由此而必然会产生的歧义和争论，恩格斯寄希望于通过全部出版马克思的原著，即有朝一日能够全面公开马克思的手稿、初稿来解决——只是，这个愿望至今也没有实现。

或许，马克思就是这样成了雅克·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的幽灵”，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只有戴着面具、操着“幽灵的语言”才能现身。

马克思主义学说确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创造的，但“联手创造”并不等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没有讨论、没有争论、没有不同和区别。如果认为马克思就是恩格斯的阳光雨露，恩格斯就等于马克思的影子和传声筒，那他们就根本没有必要联手创造什么了，而那样一来，就既贬低了马克思，同时又贬低了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就在于“什么是资本家”，以及资本家阶级的历史起源这个关键问题。

关于资本家阶级的起源，恩格斯这样说：

> 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

> 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注]

简而言之，在恩格斯那里，资本家也就是支配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的私人企业主。作为大工业的产物，他们是从行会师傅发展而来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通过剥削剩余劳动、占有剩余价值，甚至通过秉承一种勤劳、节俭、精明的新教伦理，而成为资本家。

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基督教—犹太教社会，它把宗教的虔信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内心道德法则”，这个“内心道德法则”的核心是信用，而信用的外化机制或者外在表现则是信贷：

>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做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注]

资本追求的不是生产，更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抽象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主宰和支配地位的并不是哪一种“人”，而是“资本投资”这种行为，是资本扩张这种现象，而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扩张运动的“人格化”而已。

>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

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通过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注

资本家并非“私有财产”的垄断者，而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垄断者，通过这种垄断，资本家所支配的，却绝不仅仅是恩格斯所谓“他人的劳动”“他人的劳动产品”，而是“整个的社会资本”和“全部的社会财富”，即马克思所谓“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

马克思说：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经手绝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注)

这就是说，通过垄断信用体系用这一体系去“冒险”，资本家剥夺的不仅仅是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而且是全社会的财富，他们把一切财产和财富都转化为“冒险”，从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注)。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提出了后来为列宁和卢森堡所发展了的“剥夺性积累”学说。根据这一学说，资本家不是一般的“货币占有者”，而是社会信用的攫取者、利用者，是“资本投资者”，而非“财产拥有者”。资本家从银行获得的，不仅是一定数量的货币，还有信用担保。通过这样的方式，它把全社会的财产转变为个人的风险投资，即最大程度上把社会剩余价值集中起来，再以投机赌博的方式进行放债活动。如果这种投资放债成功，资本积累便可以完成；如果投机失败，债务则由公共财政和全社会承担，资本积累同样可以完成。

因此，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既要看到生产规模的扩大，更要看到信用和投资规模的扩大，离开了后者，前者便不能真正实现。

在马克思之后，堪与马克思比肩的经济史学家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巨著中，以极其丰富的史料论证了马克思提出的见解，即欧洲资产阶级产生于投资—放债制度和信用的扩张。他说，资本家首先是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信用，然后利用这种信用进行社会融资，再以公共财政和国家税收为抵押，把融

资得到的资金借贷给国家，以此服务于欧洲近代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因此，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体制产生于特定的战争信用体系，这个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起成熟。战争国债制度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基础。

查尔斯·蒂利综合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的话：因为资本活动从战争投资中壮大和崛起，所以，资本，从它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起，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肮脏的血。

>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从当前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它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向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机会。
>
>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以前对它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注

因此，尼采方才这样说：把资本家的剥削仅仅理解为“对工人的剥削”，那实在是太狭隘了，因为资本家剥削的是“整个社会”，资本家是随着资本的扩张、信用的扩张发达起来的阶级，总体来说，他们是那种利用社会资金即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者，正如银行家是把全社会的钱集中起来放贷，是社会放贷者一样。资本主义绝非仅是把现代社会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对立，它还把一切社会财产剥夺为资

本（投资），从而把现代社会关系转变为买主与卖主、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对立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的对立就是买主与卖主、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无处不在的对立。

在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尼采是相近的，而他与恩格斯则是不同的。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投资活动支配的社会，因此，资本投资者与企业家便是不同的。生产与销售，这是企业家必须关心的，但对资本投资者来说，他却可以完全脱离这一切，因为生产与销售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正如欧文的合伙人一样）。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

因此，资本投资者固然可以把货币投向现实资本，即他固然可以借助于企业家对于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来获得利润，但是，他更可以把货币投向虚拟经济，投向股市、债市、楼市、能源和资源市场，乃至投向战争，而不是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资本家阶级随着资本和信用的扩张而壮大，这个阶级垄断了以金融为核心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建立在“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之上，因此，如果不了解货币经济学，不了解货币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就不能了解什么是资本家、什么是资本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注]罢了。虽然“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

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处心积虑地剥削工人，而这种剥削从来只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但是，作为资本投资者的资本家，却可以利用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通过加剧这种不平衡，通过不断地制造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不平衡，通过扩张资本的规模和流通速度，从而成为真正的“买空卖空者”。他把过剩资本集中起来，向迟发展国家和地区投资放债，向各个可以盈利的领域投资放债，以此掠夺其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他还把虚拟的、证券市场上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公共财政头上，让全社会来承担、埋单，而这都不需要在工厂内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一部分，而且相对而言是很不重要的那一部分，其实也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解说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分析那么透彻、彻底罢了。

而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即抽象财富递增的不懈运动，从而从“资本不断加速流通和规模扩张”的角度去牢牢把握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这一部分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这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

既然资本投资者与企业家不同，既然他可以脱离生产与交换的领域，那么，他就不是按照生产与交换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投资的法则，而是完全按照形而上学的法则来制定投资的法则，即按照逻辑的、数学的法则来制定投资的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华尔街上的投资家和投机家，主要是由那些对于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数学、统计和计算机天才构

成。正是由于资本投资的法则依据的是形而上学的法则，所以，投资活动本身就成为根据这些抽象的法则对于财富的想象、“对于财富不懈增殖的许诺”，就成为“想象的财富”。而股票、国债，就是这种被许诺的虚拟财富，它不过是对财富的预期，但却是经过理性计算的预期，是理性包装的财富想象，因此，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种想象，即不再是虚拟的、虚幻的。因而，所谓“虚拟资本”，也就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投资法则的产物，是“买空卖空”。

马克思说：

> 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注]
>
>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注]

资本家、投资家和投机家，他们绝非社会财产的捍卫者，而是将一切财产转化为风险投资的“炼金术士”，他们的作用无非是为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一个虚拟的方向，提供一种虚拟的价值、一种虚幻的信心——一切债券和股票的实质就是如此。而所谓经济危机，无非是这个四分五裂的现实世界呈现出其本来面貌，是资本主义内在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残酷的竞争本相的呈现。但是，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客都不肯正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残酷竞争日益扩大的现实，都不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分裂和解体中生成的事实，而是把经济危机解释为“信心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因此，对资产阶级政府与政客来说，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竟然便是“提振信心”，即提振对

于“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的信心，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于是，他们就利用国家财政和政府税收的方式，去补贴股票和债券市场，以维持资本家的财富不贬值，以此提振他们的“信心”（还不如说是其贪得无厌的贪心）。当然，他们补贴股市、楼市和债市的钱，都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收入，即通过剥夺劳动者和一般国民而来的，或者是通过发行新的财政国债而获得的，他们这是拿劳动者的钱来补贴资本家。他们如此“杀贫济富”，损不足而奉有余，而嘴里一如既往说的却是“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信心比信用更重要”。而在当今世界，也绝不仅仅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一家在这么做。

在马克思看来，永远变动和不安定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荒谬世界，这个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尖锐对立的世界，只能依靠有价证券为它的未来提供信心和预期，只能靠虚拟的观念为它提供方向和整体性，只能通过虚拟经济来承诺资本积累的永恒性。而日益庞大的虚拟经济，完全是靠资产阶级政府以财政手段剥夺社会大多数来支持的，这个1％对99％的游戏，从根本上说又是靠资产阶级政权的枪杆子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就在于它要靠虚幻的信心、虚拟的证券承诺来支持，因此，它是建立在对虚拟资本的迷信之上的没有信用的信用制度。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头足倒置”的，也就是指这个荒谬的制度是建立在“枪杆子支持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持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支持资本家的信心—资本家的信心和信用就是剥夺全社会”这个逻辑的基础之上。

《资本论》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而且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荒谬性，而所谓“世界是平的”这类谬论，不过就是形而上学最粗俗的表述，因为它把投资行为理解为一种基于数学的客观法则的“圆周运动”，它以观念的虚拟“平滑”来掩盖现实世界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掩盖了社会再生产领域与生产领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一旦这种数学法则支配下的投资行为落空，资本家阶级就只能以股票支持资本家的观念，以国家财政支持股市，以枪杆子支持资产阶级国家。

资本主义体制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无信用的信用机制，这种体制无非是形而上学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解和认识，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当然也包括恩格斯在内。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指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恩格斯却认为，这乃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对立，具体说，这就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恩格斯看来，资本家的荒唐仅仅在于他刻意扭曲了消费市场，即他总是以为自己的员工仅仅是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他就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无情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却忘记了，这些劳动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当资本家拼命压低工资的时候，就等于在市场上驱逐消费者，直到市场上没有了消费者。

资本家阶级如此依赖市场，但它自己却恰恰是反市场、反消费的力量，恩格斯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一切矛盾中的基本矛盾，而所谓经济危机，无非就是市场上缺乏有能力的购买者，却充斥着大量失业者：

> 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连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注
>
> 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

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并非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是“资本”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它并非恩格斯所谓“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而是“生产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

《资本论》第三卷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上、下两部分构成。马克思在这里开天辟地地区分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区分了“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积累”和“剥夺性积累”，这就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可以断言：如果抓不住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这三个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区分上述三种资本积累方式之不同，就根本读不懂《资本论》，当然也就不会真正了解资本积累的总过程。

从最粗的线条来看，资本首先分为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这两部分，虚拟资本的基础是信用，它由股票、债权等构成，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行为；而现实资本的基础是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和产业资本（“商品生产资本”），产业资本则由劳动力和商品构成。但总体来说，信用扩张是资本扩张的根本手段，正是借助于信用的扩张，资本扩张采用了虚拟的形式，因此，它扩张的速度总是要大大地超过生产和交换扩张的速度，超过现实资本的增长速度。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期和景气阶段，由于资本流通速度加快，资本投资主要依靠信用扩张，而不是主要依靠货币发行，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从银行获得的并不是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是信用担保，

在生产和流通环节起中介作用的主要也不是货币，而是汇票、支票、债券等信用凭证。只有当危机和不景气产生的时候，人们才纷纷抛弃股票、债券等，急于将其“变现”，也就是说，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才追求货币，于是他们抛弃虚拟资本，而紧紧抓住货币资本，但是，这必然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短缺，甚至导致银行的倒台与破产，而这正是“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 在这样的繁荣时期，回流是容易而流畅的。零售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批发商人，批发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工厂主，工厂主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原料进口商人，等等。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之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客户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注]

> 使停滞时期同繁荣时期区别开来的，并不是……对贷款的强烈需求，而是在繁荣时期，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在停滞发生之后，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注]

经济危机为什么总是导致金融危机？

马克思说，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是因为货币短缺、流动性短缺、货币资本短缺，从而造成银行的危机。因此，马克思指出：治理金融危机，可以采用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由资产阶级的总银行或者资产阶级国家，向市场注入货币，增发货币资本，以此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所以不可救药，就是因为资本家总是去救“市”，而不是去救“生产”，即不是将新增的“货币资本”转化

为"现实资本"，而是转化为"虚拟资本"（这是由股票、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是由大资产阶级构成这一点决定的，简而言之，是由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的），这种举措当然就是饮鸩止渴，即它只能把股市、债市进一步推高，而这些虚拟资本只代表"对于真实财富的要求"，是"纸面的富贵"，如果不通过现实的生产活动，它也就不能真正"变现"。

于是，马克思深刻地说：正是由于增发的"货币资本"不能转变为"现实资本"，即能够通过商品和劳动力而产生剩余价值的那种资本，所以"在停滞发生之后"，生产和企业贷款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危机便被扩大了，换言之，正是针对实体经济的紧缩政策，使得生产和经济难以恢复。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其实早已经把历次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描述得极其完备深刻了，他的分析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同时也远远超出了恩格斯局限于现实资本和生产领域的分析，这种分析，更是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境遇的最为透彻的揭示。

当前，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无非是开机印钞，即向银行注入流动性；但是，人们不要忘记，"量化宽松"又称"定向宽松"，至于"定向"的目标究竟是谁，却属于"银行业的机密"，美联储有权对此保密，正因为它是"私人银行"，所以纳税人也无权过问它究竟对谁"定向"增发了货币，而马克思曾经说：这正是资本体制设置的"精妙之处"。

实际上，即使美联储不说，我们当然也知道，它不断增发货币，其实就是为了救"市"，即救股市、债市和楼市，而不是援助实体经济和生产领域，美联储注入的大量货币几乎没有进入美国的生产领域，这些"货币资本"并没有转变为"现实资本"，"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进一步推高虚拟资本，是为了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这是由美联储的本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当今的美国，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几乎已经没有了健康的“实体经济”，因此，美国治理危机的政策，无非就是将危机转嫁给全世界。而美国为了增加流动性所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将进一步洗清美国的债务，推高能源和主要资源性商品的价格，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困难。同时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会使金融市场上投机资金更加充沛，发展中国家资产贬值、泡沫化的风险将加大，市场波动和震动很难避免。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均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夺性积累的理论提供了经典案例。

可见，世界经济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种境地——而且势必还要滑落到更危险的境地，主要是因为人们一度愚蠢地相信了一个狂妄无知的宣传口号：“告别卡尔·马克思。”

而“永别了——马克思”，从今往后，我们将与经济危机日夜相伴。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昭示着：人们在创造着物质世界即“谋生”的同时，也创造着他们的社会和文明，人总是在既定的社会法则支配下劳动和谋生。离开了社会再生产领域，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但是，恩格斯却认为：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支配地位的活动就是生产与交换活动。而一旦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做出这样的理解，那么，就很容易狭隘地把一切社会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把一切社会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并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学话语，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支配作用，忽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是资本投资的法则，而不是生产与交换的法则或市场供需法则。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这样概括说：

>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

> 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注

不过，我们却要问：如果“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可以决定社会的发展与构成，那么，“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这一切又是由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呢？

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切是由资本投资者决定的，而资本投资的法则，则是根据那种貌似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法则来制定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方才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原因，不能简单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寻找，而恰恰需要到人们的头脑中，即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寻找。资产阶级不是生产者，而是交换和投资法则的制定者，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在这种既定的法则下进行的，如果资产阶级不首先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这些法则，也就根本不能迫使他们在资本体制下劳动。

海德格尔说：真正的“时代课题”只有一个，只有抓住“唯一课题”的人才算是思想家，而其余的，虽然也号称思想家，实际上都只是芸芸众生罢了。

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唯一课题，他不仅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性理解注，而且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张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差异关系，区分了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积累和剥夺性积累这三种不同的资本积累方式。马克思上述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实际上，自从《资本论》发表之后，迄今为止进行的各种分门别类的研究，都不过是对马克思“资本”学说的补充罢了。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冥思苦想而不能解决的几乎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学派，却根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以为：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是亚当·斯密，其杰出继承者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开创了信用经济学的则是“货币供应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乃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只不过是描述了工业革命时代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即《资本论》讲述的无非是工厂内部的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不过就是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纺织厂，他对于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和市场扩张根本一无所知，因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已经属于陈旧的知识了。

造成这种致命误解的原因，有客观的，当然也有主观的，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比如说，尽管大资本家索罗斯一直把马克思当作“知心人”，把《资本论》当作资本投资活动的“秘籍”来看待，但是，一旦马克思博士被贴上“工人阶级代言人”的政治标签，那么，一个悲剧性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一方面是一般的工人阶级成员实际上根本读不懂马克思的书，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天生就看不起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天然地反感马克思，就像他们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反感工人阶级一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说到底只是一个不知所云的“工人代表”，无论如何不过就是个头脑偏执的书生，因此，他的发言终归是谬误，其中绝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以汲取。

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

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的某一节甚至某个段落，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的某一节”也没读过）。对时间和精力都十分有限的现代人来说，《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足以把他们折磨得精神厌倦、疲惫不堪了，如果还有余力去翻翻“作为思想过渡”的第二卷，那已实属不易，实际上，绝大多数马克思的读者都没有认真研究过《资本论》第三卷，因为那足以让他们精神崩溃。

伟大的戏剧都是从序幕开始的，但是，序幕还远不是高潮。如果说马克思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的书写得实在是太长了，他的思想太过深邃——马克思忘记了现代人不是有耐心的读者，忘记了大多数“非音乐的耳朵”的存在。马克思的观众经常在戏剧的第一幕结束后就已经退场离去，因为他们以为戏剧已经结束了，而并不知道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场。

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只不过是个入门教材而已，马克思自己早就这样说过：那不过是对此前知识的一个总结，是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综述而已。“万事开头难”，《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中虽然包含着极其深邃的视野，但是，这种视野还并没有真正展开。而经过《资本论》第二卷的过渡，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方才真正开始论述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实际上是《资本论》第三卷。对于经济学而言，它既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所谓崭新的开端，当然是说它与此前的政治经济学论述都不同。所谓基本框架，则是指此后关于“资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关于“虚拟资本”、银行与货币、资本过剩与“全球扩张”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已经包含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本论》的第三卷既终结了古典经济学，

同时也终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前或之后，“资本”和“资本家”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但是所有的理解都不可能超越马克思。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者说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力”才能实现的资本——那种只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马克思，均是经过恩格斯阐释的马克思，但是，恩格斯所阐释的绝不是马克思的全部。

恩格斯之所以会对“资本”做出如此狭隘的理解，或许与恩格斯自己就是个杰出的企业家有关，即与恩格斯这个“马克思思想接受者”的身份、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先天教养方面的另一个不同在于，恩格斯不是犹太人，他对于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没有震惊，对于生产领域受社会再生产的法则支配这一点没有震惊。恩格斯紧紧抓住了生产与交换的扩大这个问题，而对于资本借助信用机制实现的大规模扩张，并没有马克思那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透彻认识。人们常说犹太人是天生的资本家，但是，人们却又经常忘记并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企业家，而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恩格斯是优秀的企业家，当然，罗伯特·欧文也是，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即马克思所谓利用社会信用投资放债、“空手套白狼”的“资本家”，实际上，他们也因此格外地反对乃至痛恨真正的资本家那种“买空卖空”的行径。企业家要为生产提供和筹集资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参与生产与销售的活动，并始终承担着市场的压力，他们的活动始终与商品和劳动力的活动相联系，而不是与“抽象的价值增殖”，即所谓“空头”买卖相联系。但是，“资本家”就完全不需要这样做，所谓资本家，充其量不过是企业家的“合伙人”，简而言之就是那些利用信用机制进行投资的人，“精明的企业家可以通过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买空’（as a bull），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卖空’（as a bear）而挣钱”[注]。

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不过就是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资本家是以信用机制为依托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们只是“企业家”而已。而且，只有当企业家把商品和货币当作“可增殖的抽象价值”（资本）来投资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而绝不是生产和产品的使用价值；“可增殖的抽象价值”固然可以是商品和劳动力，可以是贵金属货币，但也可以是一张纸——债券和股票。一个企业家，他要使资本增殖，就需要应付市场和生产的压力，需要处心积虑剥削剩余价值，甚至还要发扬“新教伦理”，即把节俭和吝啬当作美德，可见，做一个企业家是有代价的，因此，这就绝不是资本家的理想状态，也绝不是真正的资本家所向往的。

真正的资本家，他的理想其实就是：精明地利用社会信用体系而获利，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巨额收益。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并不一定是“人”，它完全可以是个信用机构，即“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银行也是资本家。

因此，资本活动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更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追求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资本扩张规模的增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活动绝不可能被局限在生产和实体经济领域之内。

可见，现实资本的活动是十分有限的。无论恩格斯对于现实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行为怎样的义愤填膺，他也只是看到了资本活动的表面现象，因为“现实资本”充其量只是资本活动的一个部分。如果资本仅仅是或仅仅表现为“现实资本”，如果差别只存在于工厂内部的“劳资之间”，而不是广泛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发展不平衡”中，那么，资本扩张就只能局限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就只能局限在工厂乃至发达国家的工厂和市场范围之内，它就不能跨越时空，实现“脱域”，它也不能以全世界为舞台，向着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扩张。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

互相转化的。最简单地说，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而金融资本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购买者就会减少，迫使其降价；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营利，这是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信用最直接的尺度。但是，把某种货币如美元确立为“唯一的”一般等价物，确立为世界中心货币，并让它来支配全世界的生产与交换，却绝不是凭借一国、一地的生产和交换能力所能达到和实现的，也绝不是人们在社会交换活动中约定俗成的“习惯”之结果。那种唯一的、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货币，正如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国际信用机制一样，是强制的结果，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民族统治的表现与产物，它强制性地决定着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为谁生产，在资本投资机制的强制性面前，全世界的企业家和劳动者的地位根本就不值一提。

如果所谓“共产主义”就是剥夺私有财产，如果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企业家，那么，这样的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倒退回野蛮。

混淆“财产”与“资本”的区别、“共产”与“共资”的区别，这既是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误解，更是对这一学说的妖魔化。

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这样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

成社会财产。”

## 经理人与机构投资者

>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
>
>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已自动地预言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他指出：从私人企业主到联合公司的过渡，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从自由竞争向计划生产发展的必然历史过渡，因此，联合公司的产生，就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是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向“计划调节”过渡的桥梁。

不过，马克思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在马克思看来，上述过程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突破了狭窄的工厂制度，深化为全面的社会剥夺关系的表现，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是向“工业封建主义”的退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征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重新封建化”，它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剥削由资本家剥削工人，变成了资本家以“社会集资”的方式剥夺全社会。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掌权之后所必然采取的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就是劳动者以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方式制定投资、生产和分配计划。这种投资、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将由劳动者雇用的、完全按劳动者法令行事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来完成。1893年，恩格斯在写给国际社会

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说：

> 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
>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注)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并非由“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代替资本家而主导投资、生产和分配活动的社会，恰恰相反，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致力于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旧分工，即改变知识与劳动相分离的局面：“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注)“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注)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不仅是恩格斯所谓的由科学家推动的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而且是通过重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有机联系，再造“全面发展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成为生产实践的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再生产领域与生产领域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知识是知识者的特权，劳动是劳动者的宿命。这种“现代等级制”造成的结果是：人必然是片面的人、异化的人，在这种“现代等级制”的支配下，所谓“人的自由”和“自由的人”都是不可能的。

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并不能“凭一纸人民法令”，即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行了，也不能将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委之于一批专家去计划就行了。因为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与分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政治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是高度政治化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仅仅表现为政权的统治，其本质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对于生产领域的支配这种“现代等级制”。投资、分配和管理这些领域是资产阶级的专长，这正如劳动是工人阶级的“宿命”，这种“宿命”不过是“现代等级制”的表现。但是，也正因为投资、分配和管理是高度复杂的领域，所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于：要么继续将这些领域委之于资产阶级，要么致力于培养自己的专家。但是，问题却在于：如果不触动这种“现代等级制”以及“工业封建主义”，那么，如何保证这些“红色专家”不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显然，所谓专家领导的"计划经济"似乎就是这样"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的乌托邦。）与之相反，马克思这样提醒说：无产阶级必须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注]。

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由"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主导社会投资、社会生产、社会分配，并制定相应的计划。但是，马克思却指出：资产阶级是与生产活动相脱离的特殊阶层，资产阶级是投资、交换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垄断者和管理者，至于这些社会资本的垄断者是否公开拥有大量私人财产，这并不重要："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注]

于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困局在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却不得不将投资、商品交换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交到"专家"手里——这是因为，劳动者要学会这一切"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

因此，列宁方才这样指出，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注]毛泽东也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管理者分离的问题，投资分配、生产计划依然是由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专家管理层来掌握，这些人只是没有私有财产的私人而已。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的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无非是一种"工业封建主义"体制，在上述条件下，劳动者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所谓解放只是马克思所谓"想象的和设想的"解放，所有制一变，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甚至可以是一夜之间的事。[注]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特别是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同理解乃至重大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在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就成为他必须面对的最大困难，这迫使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者的恩格斯，不得不在这些地方加入自己的大段解说，以修正马克思的观点，同时也校正自己的看法，以使得马克思的思想符合他们共同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当然，在加入这些解说的时候，恩格斯都是注明了的，即注明了哪些是马克思的观点，哪些是他自己的解说。他说：

> 在编辑出版时，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这样做曾经遭到指责。人们认为，我应该把摆在我面前的材料变成一本系统地整理好的书，像法国人所说的，en faire un livre，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读者的方便而牺牲原文的真实性。但是，我不是这样来理解我的任务的。㊟

尽管如此，作为后世读者，我们还是不免会感到好奇——如果马克思再生，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这样的改写：《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者把自己大段的言论加入到《资本论》的正文中，即马克思将如何面对恩格斯“替自己写作”的这种尴尬。

正是恩格斯使《资本论》成为“小说式的文本”，其中有主人公自己的语言，也有叙述者的语言，而这方才使德里达那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资本论》中，究竟谁在说话？究竟是谁在向读者发言？㊟

现在，让我们来看埋藏在《资本论》文本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企业由“工厂制”到“公司制”的转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密切地注视着资本主义企业方式正在进行的转化，这当然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厂制”到“联合公司制度”的转化。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认为，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看去，资本主义经历了二重变化，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工业革命时期的业主制、合伙制企业，向19世纪以来以“公司革命”为标志的“经理人资本主义”的转化。

典型的早期业主制企业，体现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所分析的19世纪曼彻斯特纺织厂。在1834年，英国有1 200家棉纺织厂，平均每家雇用300—400名工人，其基本特征是：企业主对于企业负有“完全责任”和“无限责任”。

所谓“无限责任”就包括：企业主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剩余价值的独占者，不过，他同时也是企业管理和企业责任的完全承担者——直白地说，工人算账斗争所面对的直接对象，也就是企业主本人。

与早期的业主制企业完全不同，联合公司的产生，不仅标志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大型的公司不仅控制生产环节，而且把经营扩展到生产、供应、销售、研发的各个环节，同时，它可以囊括许多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公司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因此，“管理”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而这便导致了“职业经理人”的产生。

而公司体制的根本特征，或者说公司制与业主制的基本区别，就是前者采取了“有限责任”的形式。马克思说：

>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

上述就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由“无限责任”转向“有限责任”。

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则表现为资本投资形态的变化，这就是指资本投资的形态由个人投资，向着社会集资、社会投资的转化，它使得企业由个人所有、职业经理人经营向着机构投资者募集社会资金的方式转化，即向着表面上的“股民所有”——“表面上的社会所有”转化，企业责任也由“有限责任”向着“社会承担责任”转化。

那么，这种表面上的社会投资、社会负责，实质上的职业经理人、机构投资者管理是否就是社会主义了呢？这是否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征兆”和“桥梁”呢？

细心的读者（也许只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者为了对我们做出警示和提醒，在“社会的”一词处提供了一个注释：

这里的“社会”、“社会的”，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又有“公司”和“公司的”含义。㊟

在德语中，因为词语同义的原因，“公司”和“公司的”，很容易被理解为“社会”和“社会的”，正如在英文中“公司”与“联合”，以及“联合体”是同义词。因此，我们万不可为字面的意思所迷惑，把公司制度理解为“社会所有制”，更不能进一步将它理解为通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桥梁。

机构投资者通过募集社会资金进行投资的方式，使企业所有权看起来正由“个人所有”向“社会所有”转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机构投资者因此就成为最大的私有者，而且，他们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并非“无限责任”，而所谓“有限责任”，其实往往也就是“不负责任”，所谓“社会负责”，实际上往往就是“无人负责”。

正如今天美国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其作为金融中介机构，表面上代表大小投资者管理各种基金（养老基金、人寿基金、共同基金等），但倘若投资失败，他们却不会真正对“社会”负任何责任——而这就与华尔街发生金融海啸，但金融界高管们照样拿高薪完全是一个道理。

> 动产信用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交易的借口。动产信用公司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指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罗——引者注）所用的方法。因为动产信用公司是得到政府支持和拥有比较大量资本和贷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无疑问，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场上就能赚到贴水。动产信用公司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公司中所拥有的股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润，首先影响到动产信用公司本身的股票价值，而这些股票的行市高，就保证新发行的股票的价值也高。动产信用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监督用于工业企业投资的相当一部分借贷资本。注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的过程，由“无限责任”的企业主个

人所有，经由"有限责任"的"职业经理人"作为过渡，走向了表面上的"社会所有""社会责任"，然而，这其实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的社会集资和融资（圈钱）。这个总历程，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过程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股民用股票选企业，正如选民以选票选政府，实际上完全就是一回事；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政府，一旦被选出，其对待选民的方式，实际上也就如同机构投资者对待"股民"一模一样：机构投资者与民选政府，对股民和选民承担的只是"有限责任"，而选民和股民的命运也完全相同，他们最终只能是"愿赌服输"而已。

股份公司经理人、机构投资者正是这样的"社会剥夺者"，这些人造就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官僚主义的铁笼子"，正是他们通过股票融资，通过通俗意义上的所谓"圈钱"，使得社会大众变成了"表面上的社会所有者"，而他们自己则成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拥有者。马克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出的最新剥夺形式，这一次，它剥夺的对象就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它剥夺的范围也不仅仅是工厂内部，因为这一回，它把"全社会"都当作了剥夺对象："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因此，马克思这样说：如果把股份公司制理解为社会所有制，如果把机构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即不负责任，也当作一种历史进步，甚至把它理解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这不但是完全错误的，而且，简直就是愚蠢的，因为所谓"社会资本"，无非就是"资本掠夺社会"的代名词，"社会资本"比"私人资本"实际上更加野蛮。

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

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注

因此，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地向着社会主义发展，恰恰相反，它会自动地向着一种特定的封建主义——“工业封建主义”退化。

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持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注

但是，很不幸，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可谓是意见完全相反，他认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和社会融资，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也都是迈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于是，我们就很难揣测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上述那些论述时的心情，因为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去世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恩格斯在这里给马克思的话加了一个长注，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个人的解释，或者说就是大胆修正。在这个冗长注释的结尾，恩格斯虽然有些踌

躇，但最终还是这样坚定地展望：

> （公司制度和社会融资——引者注）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但是，无论今天的美国式金融垄断还是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瓦解，都充分且雄辩地表明，“社会资本”的确立，恰恰是为官僚集团的剥夺，即社会财产私有化做好了准备。

而这不过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资产阶级是个脱离生产活动的特殊阶层，是投资、交换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者，至于其是否公开拥有私人财产，这并不重要。马克思这样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支配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恰恰就是把股份公司、大规模的社会融资以及马克思所警惕地注视着的“资本主义的封建化”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在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恩格斯还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几个极其明确的步骤，而社会融资则是其中极为关键的步骤。

恩格斯所描述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如下：第一，企业个人所有者的过度竞争导致“联合经营”，导致公司制的出现；第二，“社会融资”代替了私人资本；第三，大的企业集团的“社会所有制”，被“国家所有制”代替；第四，工人阶级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变资产阶级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社会主义就算实现了：

>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

> 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
>
>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
>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
> …………
>
>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注]

然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的那一瞬间，却不得不将生产投资、商品交换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交到专家手里（这是因为劳动者们要学会这一切“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这种新的信托关系是一种现代等级制，它使得劳动者再次把信用让渡给专家和官僚，这正如农村的存款人不得不将他的劳动果实交给他丝毫不能控制的银行家一样：

> 这就是信用的“美妙的”交错联系。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

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所认识的个人。他绝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敦一个票据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也不能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像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当进入到通过社会融资的方式实行“表面上的社会所有”（即股份制）的时候，它的野蛮性绝不是削弱了，而是空前加强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社会所有”，采取的是融资者的“有限责任”或者就是“没有责任”的方式，从而使得资产阶级可以采用不负任何责任的方式，毫不费力地将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广大的股民——真正的社会所有者们对此却丝毫也不能控制，这种所谓的“社会自由”，恰恰表现为全社会对于剥夺的无可奈何与束手无策。

这种“工业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也更为残酷：在企业私人所有制下，正由于企业主是“无限责任者”，所以工人阶级还可以把自己之所以受剥削、被压榨归结为遭受了资本家的剥夺和欺骗，但是，在“信托公司”制度下，由于信托机构实行的是“有限责任”，那么，广大的股民被剥削，只能自认倒霉，只好承认自己是被自己欺骗了。

恩格斯非常乐观地认为，社会生产、社会管理和社会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

> 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自由的人。
>
>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注]

但是，马克思却指出：恩格斯这种“激情澎湃的想象”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或者直率地说，他高兴得太早了。即使国家作为政治权威消失了，专家的权威却没有消失，社会再生产与生产领域之间的对立更没有消失，当政治学演变为“管理科学”，问题并不在于哪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和“社会管理”，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社会主义将公共财产的管理委之于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便与资产阶级无异，这种委托关系与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区别也不大。如果这种“社会所有”和“社会管理”采取的仅仅是“表面上的社会形式”，即采取的是“有限责任”，那么，这种“社会有限责任”造成的必然就是实际上的“无人负责”，而它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以“社会管理者”的名义，贪污盗窃社会公共财富。这种“工业封建主义”与信托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尖锐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注]而这其实就是指恩格斯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所必然出现的缺点。

无论对于哪种体制来说，如果说所谓“有限责任”“社会责任”是一种进步，那么，它也仅仅是对资本家和管理者来说，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那简直就是一个噩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条件的信任和信用让渡给了只承担有限责任的管理人，从而，他们一方面被侵害、被剥夺，另一

方面却又彻底沦为了无处倾诉、无人负责的苦主。

随着生产、企业和投资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被冲破了，职业经理人、机构投资者取代私人企业主，成为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支配者，恩格斯把这种转变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退步，是资本主义的“重新封建化”。无产阶级绝不应听凭历史自动进步，也不能迷信资本主义体制会不可避免的进化，而必须以革命去阻止资本主义的退化。真正的社会主义取决于“新人”的产生，这种新人不是职业经理人和机构投资者，而是有能力把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领域重新结合起来的劳动者，这样的“新人”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

>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
>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猾的精灵。我们

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注)

因此，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工人阶级要摆脱被支配的命运，就必须学会支配社会再生产领域，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正是因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方才倒在了血泊之中：

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注)

---

1. 参见恩格斯. 1892年英文版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501.
2. 马克思. 马克思写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3.
3. 马丁·海德格尔. 尼采[M]：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59.
4. 艾德蒙·威尔森. 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M]. 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114.
5.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3–534.
6.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528.
7.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4.
8. 陈云.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M]//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7,158.
9. 廖子光. 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战略[J].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10.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4.

11.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5.

12.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5.

13.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6.

14. 马克思.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15.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7.

16.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17.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

18.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

19. 恩格斯. 《资本论》第三册增补[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5.

20.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5.

21. 马克思.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23.

22.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8–179.

23.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7–498.

24.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3.

25. 查尔斯·蒂利.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2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5.

26.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4–575.

27.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0.

28.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

29.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555.

30.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

31.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7–508.

32.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0.

33.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7.

34. 艾瑞克·霍布斯邦说："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使我们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资本主义评论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 1867年），该书亦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邦. 资本的年代[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1.）

35.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 经济思想史（第7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03.

36. 恩格斯．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87.

37.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

38.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1–562.

39.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

40.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41.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7.

42.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0.

43. 参见1976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

44.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补[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5.

45.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6.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5.

47.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4.

48. 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3.

49.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50. 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4.

51.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7.

52.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7–561.

53.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4–565.

54.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567.

55.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56. 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3–4.

57.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8.

# 第五章
# 马克思与列宁

## 乌里扬诺夫传奇

> 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
> ——马克思

为了抑制资本主义向着封建主义——“工业封建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退化，需要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并实践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是列宁主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出生于俄国的辛比尔斯克，也就是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列宁”，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

辛比尔斯克坐落在伏尔加河岸，距莫斯科560英里[注]，距彼得堡935英里，它后来被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就是因为在这座伏尔加河畔的城市里，诞生了伟大的乌里扬诺夫家族。

列宁的父亲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个开明的政府官员，曾经担任辛比尔斯克省的总督学（国民教育视察员），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在任期间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省内各地，筹办“希望工程”。但是，在沙皇统治下，这一套自然是完全行不通的，伊利亚最终被迫辞职，愤而闭门著书立说。1886年1月24日，不幸第一次降临在乌里扬诺夫家，伊利亚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就一直在助手的协助下写报告，一直忙到下午两点，他本来想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但却睡着了——“不过却是永远地睡着了”。列宁的父亲死于脑溢血，终年只有55岁。

列宁有一个哥哥叫萨沙，即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从小就品学兼优，他19岁的时候考入彼得堡大学学习生物学，在学校里不断获得奖章。列宁从小顽皮捣蛋，但哥哥亚历山大却博学善思，凛然若有大志，从小便是个“小大人”。亚历山大长列宁4岁，父亲去世后，家庭的重担自然压在了这位兄长肩上。

但是，1887年3月13日，也就是列宁的父亲去世仅一年多之后，噩耗传来，亚历山大因为参与暗杀沙皇的行动而遭到逮捕，当时他只有21岁。

列宁的母亲玛利亚独自一人跑到彼得堡去探监，并从头至尾旁听了法庭的判决，儿子在法庭上的表现让玛利亚既伤心又自豪。21岁的亚历山大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沙皇统治是完全的暴政，而当今俄国又没有任何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可以抗衡这种暴政，所以，自己采用这种暗杀和恐怖的方法，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正是统治者的恐怖手段，把老老实实的老百姓变成了恐怖分子，迫使他们只能以恐怖对付恐怖。亚历山大对自己的行为丝毫不后悔，他最后呼吁道：好汉做事好汉当，希望不要株连他的家人。

17岁的列宁没有去彼得堡旁听法庭判决，不过，亚历山大的遗命却给列宁的毕生带来了重大启示。列宁后来说：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而无政府主义者乃是最根深蒂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看不起群众，更没有找到在思想上武装劳动者、在组织上训练无产阶级的方法，因此他们就绝不能够发动群众。于是，最英勇的资产阶级“民意派”恰恰不懂得如何去组织和表达“民意”，他们所能够采取的手段，也无非就是暗杀而已。列宁发誓说：绝对不走这条恐怖主义的道路。只是列宁没有想到，十月革命后，他自己却遭遇了来自哥哥所在的阵营——民意派的两次暗杀。

亚历山大并不是刺杀沙皇的主谋者，也没有参与具体行动，他只不过是协助制造炸弹而已，但是，为了保护同志，列宁的哥哥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降临到乌里扬诺夫家的灾难到此还远没有完结，因为亚历山大被捕的时候，同在彼得堡大学就读的列宁的姐姐安娜正好去看望他，尽管她对于亚历山大的所为一无所知，但也同时被捕了，结果，亚历山大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了绞刑，而安娜则被判流放。

这个天降的灾祸几乎毁灭了乌里扬诺夫一家。这个曾经是社会楷模的“官僚之家”，这个一下子就出了两位彼得堡大学高才生的教育之家，一瞬间就变成了“叛逆之家”“罪犯之家”——当然，这场灾难，最终也把乌里扬诺夫一家变成了“革命之家”。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大概只有列宁和毛泽东出身于完全的职业革命者家庭，列宁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母亲和岳母，以及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都是极其坚定的革命者。

列宁的家庭仿佛就是个党小组，正如毛泽东一家有8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没有人天生就是革命

家。

家庭的突然变故，使得自小活泼好动、无忧无虑的列宁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熟了，他靠拼命地读书学习来抑制内心巨大的悲痛，以至在中学毕业考试中，除了逻辑学之外，列宁在数学、物理、文学、神学、拉丁文、法文、德文、希腊文、历史、地理所有学科都得了5分。校长克伦斯基先生兼任逻辑学课主讲，他最终解释了为什么没有给列宁5分："逻辑学能得5分的只有老师我自己，所以我不给任何学生打5分。"但是，克伦斯基校长却力排众议，将金质奖章授予列宁。而在那个时候，这位校长绝对不会想到，他自己日后将会成为一个深刻影响俄国历史的孩子的父亲，甚至成为一个影响人类历史的学生的恩师，他命中注定将有一个了不得的儿子，同时，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学生。

克伦斯基校长在给列宁的毕业鉴定中这样写道：

>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非常有天赋，一贯勤奋，品格端正。乌里扬诺夫在各年级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作为在学习成绩、发展水平和操行方面最合格的学生，他在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未发现他有过学校领导和教师给予不佳评价的语言。乌里扬诺夫的学习和德育一直得到父母的关注，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他更是厚爱有加，她的全部操劳都集中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教育的基础是宗教及其合理的纪律。宗教教育的良好结果明显地反映在乌里扬诺夫的优秀品质上。(注)

1887年年底，也就是家庭遭受巨大变故的那一年，17岁的列宁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彼得堡大学，但是，因为他是"暴徒家属"，所以尽管列宁的成绩非常好，他也没有被彼得堡大学录取。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中学校长克伦斯基又一次站出来，为自己的学生打抱不平，克伦斯基写信给沙皇的教育部部长，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同学品学兼优，一贯遵纪守法，如果官方对他不放心，可以让孩子的母亲陪同他上大学，以示担保

并任监督之责。

这封来信竟然打动了教育部部长，他批示说：该学生虽然不能上彼得堡大学，但却可以上喀山大学，而且，克伦斯基的建议听起来也不错——该学生入喀山大学学习，需要他的母亲随行并作为担保人。

替列宁出头作保的克伦斯基校长，像一切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师者”一样，不但是个“好人”，而且，他还把高尚的道德情操当作最重要的知识传授给了学生。他的作为再次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格言：“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注]

克伦斯基校长，就是后来成为1917年临时政府司法部部长、总理的克伦斯基的父亲。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列宁后来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所推翻的，恰恰就是恩师的儿子当权的政府。[注]

十月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的富农父亲曾经这样抱怨道：“请你们说说看，在家园与儿子之间，我究竟该选择哪一个？”

同样地，克伦斯基校长也许会这样说：在我的儿子与我的门生之间，在他们争夺人类未来的斗争舞台上，我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

在克伦斯基校长的保举之下，列宁终于上了大学，不过，列宁所遭受的迫害远没有到此结束。大一的时候，喀山大学发生了反沙皇的学生游行，尽管列宁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参加者，充其量只是个围观者，但因为他是“暴徒家属”，头上戴着顶“红帽子”，按照“围观即参与”的原则，结果，他在大一就被校方开除了。

列宁被开除后，只能在家刻苦自学。列宁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他凭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其中德文尤其突出，这使他日后可以熟练地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列宁是家里的次子，哥哥被绞死了，姐姐被流放了，一家老小的生存都压在他的身上。两年后，他直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

要求参加全国律师职业考试（列宁与马克思一样，学的是法律），信发出后自然是石沉大海，于是，列宁的母亲玛利亚不得不以家长的身份写信给教育部部长申诉理由。

玛利亚说：我的儿子需要养家，如果没有律师资格证明，我们全家只能活活饿死。那个教育部长也真不错，大概是考虑到玛利亚的丈夫伊利亚曾经是总督学，即他曾经的同事，于是再次特别批示，允许列宁参加职业考试。

列宁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用两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大学4年的课程，在全国考试中，他一举考取了第一名，但是，列宁还是没有成为开业律师。直到1892年，列宁才成为律师助理，取得了协助律师承办诉讼案的资格，但不能亲自出庭。不用说，这还是因为他是“暴徒家属”，而“暴徒家属”竟敢考得这么好，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当局的挑衅。何况，即使沙皇政府再开明，又怎能容忍“暴徒”的弟弟坐在律师的席位上呢？那难道不是对于法律的公然嘲讽吗？

人们经常产生疑问：在沙皇俄国，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职业革命家”？而列宁的经历表明：如果像他这样的人竟然没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沙皇的压迫和欺凌，甚至使统治阶级阵营里的开明者也看不下去，最终迫使一切有志青年选择一个共同的职业：革命家。

涅克拉索夫的名言是：“生活在俄罗斯，有谁能够快乐？”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走投无路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则这样呼号说：“人活在世上，你们总要给他条道走啊！”

《怎么办？》是列宁很重要的一篇雄文，不过对于列宁而言，这并不是革命家特殊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而是他毕生必须随时面对的问题。

19世纪的最后10年，俄国工业发展极其迅速，而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也此起彼伏，这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十分相似，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日后给出了最为明确的回答。

在《怎么办？》这篇经典文献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虽说是"并列产生的"，但二者却并不是一回事。工人的罢工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其目标不过是要求改变工人阶级的经济处境，而社会主义学说却要推翻整个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对美国来说，那里的工人阶级虽说是两手空空来到新大陆，但他们的脑子里往往塞满了旧世界发财致富的旧思想，塞满了"新教伦理"和保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觉悟反而不如年轻的俄国工人阶级更先进，后者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知甚少，因此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就更容易一点。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要担负起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使命，靠自发的经济冲动只会坏事，那样，他们只能走到美国工人阶级那种被动的处境中去。无产阶级要承担它的历史使命，首先需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武装自己，需要经过严格的思想和组织训练，即不是从经济上做起，而是从意识形态上做起。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训练的方法，并不是写《资本论》，而是开办面向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和媒体；对无产阶级进行组织训练的方式，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毕生从事的其实就是这两项工作。

列宁说，革命者不仅需要掌握真理，而且要能够用真理来感染人，他不仅需要把知识表述得清晰严密，而且还需要用语言和行动去打动人、鼓舞人、改造人。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必须是优秀的演讲家、艺术家和美学家，而列宁就是这样的革命家，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历史壮剧。

高才生列宁一生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然后被反复地关

押，流放，结果，他从来就没当成过职业律师。实际上，列宁一生中最舒适、安逸的时光，竟然是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流放中度过的。1897年2月，列宁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三年。次年，即1898年5月，列宁与同是流放犯的克鲁普斯卡娅，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共结连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869年2月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她与列宁在1894年2月由“斗争协会”组织的聚会上第一次相遇。列宁被流放之后，克鲁普斯卡娅也被判流放到乌发省，根据他们双方的请求，当局同意把他们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并同意他们在那里结婚。

克鲁普斯卡娅两手空空地从彼得堡的监狱出发，几经辗转来到列宁的流放地——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她自然没有任何嫁妆，只是把自己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也带到了流放地。后来，伊丽莎白就一直跟着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四处流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她也尽自己所能帮助女婿的工作，为他做饭、洗衣，将进步书刊缝在来访者的衣服里，以防被警察发现。

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列宁作为流放犯，方才终于过上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上午读书，下午捕鱼、打猎，晚上与克鲁普斯卡娅辩论哲学问题，临睡前还有岳母熬汤给他们喝。

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壮举之一，就是那些曾经的贵族小姐自愿随同自己的丈夫流放他乡，而伊丽莎白则是跟随着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俄罗斯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儿女，更因为有伊丽莎白这样的大批革命的母亲。

环顾人类世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民族总是烈士辈出，却很少出叛徒，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即使俄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是那

种在议会里面夸夸其谈的人物，绝不是那些只会空谈、摇笔杆的人物，而是敢于抱着炸弹去炸沙皇的勇士。

列宁的最后一个流亡地格外的出人意料——瑞士。不错，那正是卢梭的故乡，那正是《社会契约论》诞生的地方。

1762年，卢梭就是在这里幻想一个新世界，而1917年4月，列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冒着狂风暴雪乘火车回到俄国，着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制度和崭新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05年1月，沙皇政府向10万徒手请愿的莫斯科工人开枪，造成了“流血星期日”，刚刚从流放地归来的列宁再次受到通缉，不得不逃往国外。在俄国国内，沙皇的高压统治恢复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沦为彻底的保守派，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改良派也占了上风。列宁认为他自己这辈子恐怕是再也看不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了，看来他不得不准备在欧洲当寓公了。

在流亡的日子里，列宁每天的工作，也就是出入于租赁的房子和图书馆之间，与马克思当年在伦敦的生活差不多。列宁的文风也改变了，他准备大张旗鼓地做学问。1908年，列宁在卢梭的故乡日内瓦和伦敦，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篇文章的理论抱负就是重新探讨康德哲学与马克思的关系。与列宁一贯的、政治动员式的、马基雅维利风格的作品相比，《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这篇文章是高度理论化的，它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风格很相似，简而言之，就是多少有些晦涩难解。毫无疑问，撰写这种纯粹理论风格的文章，似乎并不是列宁擅长的，文风的转变自然也反映了列宁这个时期思想和精神上经历的巨大痛苦。

好在1914年爆发的“一战”拯救了他，因为世界大战摧毁的，不仅仅是欧洲社会，还包括一切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战争刚刚爆发

时，列宁住在奥地利，但由于奥匈帝国与俄国成了交战国，列宁等俄国流亡者们统统被赶到了中立国瑞士。那时，在苏黎世的一间咖啡屋里，一批艺术家整日讨论，他们要通过“达达主义”来表达一切既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已被轰毁的事实，即马克思当年所谓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事实。“达达主义”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意思，而当这些艺术家七嘴八舌讨论艺术的时候，列宁就伏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读书写作。1916年，也就是在卢梭的家乡瑞士，列宁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与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的列宁主义的诞生。

在长达12年的流亡生涯中，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岳母伊丽莎白一直与他在一起，列宁是一个好丈夫、好女婿，同时也是个大孝子。列宁更是个真君子，他一向认为，“同志式的信任”、彼此之间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比空洞的民主和公开更加真实有效，因此，他从来不会把个人恩怨加诸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身上。列宁对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和岳母伊丽莎白一向很好，伊丽莎白经常帮他们传情报、做饭，老人家喜欢抽烟，而列宁孝敬岳母的办法就是给她买烟（列宁年轻的时候也曾抽烟，但有一次母亲批评了他，列宁想到母亲独自操持家庭非常辛苦，便从此戒烟，而且一辈子再也没有抽过）。

有一天，列宁岳母的烟没了，他便跑遍整个苏黎世城的大街小巷，帮老人家买烟。列宁对老人家的关心无微不至，尽心尽力至于此。

关于革命者的民主，列宁指出，就是指同志之间的信任，指建立在这种同志式的信任基础之上的日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党内思想争论的正常化，就是指党的自我监督。他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势下，所谓的“公开和广泛的民主”，只能为资产阶级的镇压提供方便，而且，无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指“普选”和“轮流担任公职”，而是指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作用，而离开了有效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民主和革命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

对于党内那些意见相左的同志，列宁从来没有忘记和他们一起度过的艰难时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感慨万千地说："多么遗憾啊，现在马尔科夫没有与我们站在一起，他是多好的一个人啊！"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为与列宁意见不合，竟然幼稚地按照"民主和公开的原则"，把起义的消息公布在报纸上，这完全是一种非组织的行为，他们的作为已经不仅是幼稚，简直与叛徒无异，但是，列宁却原谅了他们，就因为他们曾经是与自己一起流亡的好伙伴。

每当想起流亡的生活，列宁都会感伤地逐一念叨那些客死他乡的革命者，他总是这样说："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将会是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多么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临终前主张把多次在危急关头保护了他、总是与他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斯大林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他说：斯大林的缺点是对同志缺乏信任，不善于带头做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他不适合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

流亡者的生活非常痛苦，其中很多人得了各种各样的病，还有人患了精神病。有一次，一个流亡者来到列宁家里胡闹，并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一直做梦，经常梦见一辆大车装满了粮食，粮食上还坐了一车漂亮姑娘。列宁赶紧找医生来看，医生说：这个人饿傻了，他得了饥饿恐慌症。这段真实的经历，后来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被改写为工人瓦西里的故事。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度几乎失明，经过手术，她的眼睛凸出来，像鲱鱼一样，而她做革命工作时的暗号也叫"鲱鱼"，但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她依然不知疲倦地帮助列宁抄稿子，并坚持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

1917年3月15日中午，正当列宁吃罢午饭要去图书馆的时候，有人跑来告诉他：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了。

1917年1月12日，为了纪念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彼得格勒、莫

斯科、巴库的工人上街游行。3月10日，彼得格勒25万工人总罢工。3月12日，被派去镇压工人的一万名彼得格勒驻军倒戈起义，沙皇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彼得格勒，去前线视察战事，而在视察途中，罢工的铁路工人把沙皇的专列劫持了，让他签署停战协定。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可是米哈伊尔只继位了一天，就宣布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从此画上句号。

俄国社会一片混乱，工农兵扛着枪满街跑。一方面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由立宪党和社会革命党构成，它的背后是沙皇军队主力；而社会民主工党的背后则是工农兵苏维埃。

由于列宁等社会民主工党的核心人物都被流放了，所以当时在国内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集体是由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组成的。孟什维克的方案自然就是参与临时政府，即由社会民主工党与克伦斯基的立宪党、社会革命党一起形成一个联合政府——而这就如同后来的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应该与蒋介石一起成立联合政府一样。

列宁起初当然也赞成组建联合政府，他还估计到：克伦斯基的立宪党只会接受社会民主工党的少数派，即孟什维克，而不会接受他这个“多数派领袖”，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列宁积极协助那些还在国外流亡的孟什维克回国。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农兵苏维埃却形成了一个决议：立即请列宁回国。这表明：像克伦斯基政府一样，国内的社会民主工党其实根本就掌控不住局势，实际上，他们也当不了工农兵苏维埃的家，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只认得列宁这一个领袖。

这样，本来只打算在国外通过写《远方来信》的方式影响国内革命运动的列宁同志，便于1917年4月开始准备回国了（后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共产国际称为“远方”，这个称呼就是受到列宁的《远方来信》的影响）。不过，由于从中立国瑞士通向俄国的交通

线都控制在英法军队手里，而俄国已经被同盟国包围了，所以，任何人想从外面进入俄国都非常困难。列宁曾经想开飞机回国，但是，由于驾驶技术很难掌握，这个大胆的提议被同志们坚决地阻止了。有人曾建议找一个外貌像列宁的瑞典人，让列宁拿他的护照混入俄国，但由于列宁不会讲瑞典语，装聋作哑很容易被识破，所以这个方案也被迫放弃了。

万般无奈之际，在4月2日召开的侨居欧洲的流亡者会议上，有人提议借道德国回国。但是，大多数与会者均对此深表疑虑，因为一方面那样做不太可能成功，另一方面，即使侥幸成功回国，列宁等人也可能因此被扣上“德国奸细”的帽子。但是，列宁经过反复考虑后却认为：既然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唯一的办法”似乎也可以一试，无论如何，能走就好，有办法离开总比坐以待毙好。

而代表流亡者与德国当局进行接触的，便是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茨·普拉廷。没想到，普拉廷竟然把事情给办成了，德国提出的条件是：你们这些人回去参加联合政府，是否可以把德国的战俘交换回来？列宁认为，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于是，德国政府便决定给他们一个车厢，但申明只能送他们到瑞典，至于到了瑞典之后怎么办，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运气了。

列宁准备一回彼得格勒，要么继续去坐牢，要么就把群龙无首的工农兵在思想和组织上武装起来，对外抵抗帝国主义，对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当然，他和克鲁普斯卡娅也考虑到，他们可能根本就进不了俄国。列宁在伯尔尼租的房子租约是三年，由于房东跟列宁夫人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房东说：如果你们半途而废再次回来，我还可以把房子继续租给你们。

1917年4月9日，列宁等30人登上列车，离开伯尔尼，顶风冒雪，向瑞典进发。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茨·普拉廷，在两个关键历史时刻救了列宁：一次便是帮助列宁回国，另一次则是帮助列宁躲过了暗杀。列宁一生曾遭遇两次暗杀：1918年1月14日，彼得格勒，12名杀手一起举枪扫射，把列宁乘坐的汽车打成了蜂窝，多亏同车的普拉廷反应敏捷，他把列宁的头摁在了座位下，自己的手被打得鲜血淋漓，而列宁却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不过，第二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演讲结束后，被半盲的女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近距离射击，列宁连中三枪，一颗子弹深入他的颈椎，列宁虽然侥幸活命，但是，最终他还是死于这次枪伤的后遗症——脑中风。

由于列宁乘坐的列车享有治外法权，所以列车安然进入瑞典斯德哥尔摩，没想到的是刚刚当选的斯德哥尔摩市长竟然是位社会革命党人，列宁一行受到了他的热情款待，并住进了五星级饭店——这简直是命运的安排！只是，由于列宁穿着过于寒酸，看起来像个小学教员，那个五星级饭店竟然拒绝他进入。

结果，市长大人亲自跑来斥责饭店的门童说："赞美吧！——荣誉归于这位小学教员，因为他马上要去打扫历史的垃圾堆。"

热情的瑞典人还帮助列宁置办了几件新衣服，以使这个不修边幅的流亡者看起来像个大人物，但列宁却统统将之弃如敝屣，他说："我这次回去不是要开百货公司。"历史证明，列宁同志非凡的领袖气质，是根本不需要包装与点缀的。

离开芬兰检查站之后不久，列车终于进入俄国境内，车厢里开始出现大批俄国士兵，而依旧穿得如同小学教员的列宁便上去跟他们谈话。开始，那些人并不相信这个"小学教员"的话，但是，后来围拢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列宁干脆就让列车长打开餐车，自己则站到了餐桌上给他们讲话。列宁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土地，可是，现在的政府会给我们土地吗？不会，因为他们是大地产主的代表。第二，我们要面包，但是，现在的政府却要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是银行家的代

表。第三，我们需要和平，但是，现在的政府要人们把钱都存在英法等国家的银行里，他们为了维护英法的银行，就要继续打下去。

没有面包、没有工作、没有土地，只能当炮灰，那我们这些人究竟该怎么办？

列宁对士兵们这样说：究竟要什么，你们自己来决定吧！

士兵们这时便说：你说得真好，那我们推举你来做决定吧！

列宁挥手说：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凝聚起来，一切权力归工农兵苏维埃！

这样，列宁在火车上成了明星，连列车长也赶来向他致敬，当列车奔向彼得格勒的时候，列宁所在的车厢已经被那些群龙无首的武装士兵保护起来了。当列车停靠在白岛车站（进入俄国境内第一站），斯大林专程从彼得格勒赶来保卫列宁时，他发现，列宁已经被士兵们自发地团团保护着，而其中一个士兵竟然说：这个穿得像小学教员的人，可能就是列宁同志。

4月16日晚11时10分，列宁乘坐的火车缓缓驶进彼得格勒车站，车站上人山人海，月台上高奏《马赛曲》，一个大尉军官上前向列宁立正敬礼，列宁感到有些不安，马上向他回礼。列宁在斯大林等人的陪同下，检阅了水兵仪仗队，随后，在两架探照灯的照耀下，列宁登上一辆装甲车，向群众发表演讲：他的大衣敞开着，他的便帽插在口袋里，他的一只手伸向远方——这个形象定格为历史。

俄国局势并没有因为列宁的回国而回归平静，实际上，20世纪的人类历史从这一刻起刚刚开始。

由于当时的社会民主工党还是要搞联合政府，随着列宁的归来，列宁与孟什维克们的分歧彻底公开化了，结果，列宁回国后不久，他又被

克伦斯基政府通缉了，这一次，列宁的罪名果然就是“德国派来的奸细”。

列宁不得不逃往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利夫湖畔，就是在湖畔潜伏的日子里，列宁完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大部分。随后，列宁又化装成火车司炉，被秘密转移到了芬兰境内，而列宁这次离开俄国时，只带了一个写作《国家与革命》的笔记本。

因为列宁同志知道，自己马上就会回来。

9月3日，俄国防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列宁立即指示工农兵苏维埃粉碎政变，尽管克伦斯基政府因此得以复位，但这个时候，工农兵苏维埃其实已经掌握了全国大部分武装力量。10月20日晚，列宁再次乘火车从芬兰进入俄国，开始着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列宁全力说服党内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工农兵委员会是避免独裁和无政府状态的唯一选择，什么是委员会制度，它与民主制及独裁者的区别何在。

11月6日晚，列宁化装后通过层层封锁线，从彼得格勒郊区的藏身地，徒步走到斯摩尔尼宫（这段情景为电影《列宁在十月》所复现）。在那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协助列宁，指挥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孟什维克和党内其他同志估计的完全相反，起义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胜利了，在组织起来的武装工人面前，资产阶级不堪一击。克伦斯基——列宁恩师的儿子坐着美国使馆的汽车逃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诞生了。

《国家与革命》的剩余篇章，其实是列宁通过十月革命完成的。

## 过度积累与剥夺积累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夺取外国领土始终是“夺取”。

——马克思

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雄文。列宁主义是具有世界视野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将资本积累的动力理解为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指出资本主义并非在西欧凭空产生，而是由既有的世界货币体系（白银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与朝贡和传教相伴随）发展而来。资本主义在西方已经“腐朽”，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已经“重新封建化”，因为它已经成为与生产活动完全脱节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更具爆炸性的是，列宁认为西方民主运动乃至西方无产阶级也已“落伍”，因为西方列强使国家成为既为资产阶级谋利益、也为“民族”谋利益的工具，这使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要求不断被推迟。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夺，已经迫使“外围”的革命者把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使命，放在了单纯争取经济利益之上，据此，列宁提出了“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这一论断。

我们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这不过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突破西欧内部工人阶级运动局限的是列宁，而不是恩格斯。

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生产性的，资本家的剥削也不只是通过投资实体经济，以商品和劳动力为中介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方式有三种，商品生产的积累只是其中之一。

资本积累的第二种方式是：利用信用机制，通过维持虚拟资本（即股市、债市等）的价值而获得剩余价值。平时，只要金融机构随意提高贷款利息率，就可以让许多工厂关门、大批工人失业，而不断利用国家财政、国民税收和国民财富来补贴虚拟资本的亏空，这在金融危机过程

中表现得最为赤裸裸。

资本积累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攫取外部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获得剩余价值，而这就需要强制性地维持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区域差别结构，以此贬低外部资源和劳动力的价格。

在资本积累的三种主要方式中，只有前一种是生产性的，而后两种都是破坏性和掠夺性的，其中第二种表现为虚拟经济掠夺公共财政，第三种则表现为通过维持世界不平等结构而掠夺外部资源和劳动力。

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和尼采都刻意地区别了商品交换关系和建立在信用机制基础上的债务关系，指出这两者并不相同：前者与生产相关，与实体经济相联系；后者则是纯然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它表现为虚拟经济投机赌博欠下的巨债要由公共财政来偿还，或者表现为发达国家以资本投资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放债，并以提高债务利息的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贬值出卖自己的资产以偿债（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和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实质都是如此）。前者不过是剥削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后者则是无情地剥夺整个市民社会和全世界。

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剥夺性积累”的学说，她指出，发达国家内部产业资本的发展，导致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这种过剩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家不肯通过扩大劳动者消费和就业，来消化过剩资本和过剩产品，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度积累”，也正是内部的“过度积累”迫使资本家去创造一个不平等的“外部”，而这个“外部”必须有廉价的且不断贬值的资源和劳动力，以供过剩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而维持这个廉价且不断贬值的“外部”，就需要强制手段，需要暴力，这种暴力就是帝国主义。

资本扩张表现为信用机制的扩张，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将过剩资本委托给几个大的金融机构，形成“金融垄断”，以过剩资本投资放债的方式去剥夺外部，从而将内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由金融垄

断（放债）的资本主义，转化为掠夺外部世界的帝国主义。

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由发达国家内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世界投资市场、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进行的战争，即转化为世界大战。

与之相应，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不只是工业国内部无产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而是演变成为制止世界战争——为了制止过剩资本掠夺世界的战争而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斗争，要进行这样的斗争，就需要足以与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劳动者组织，需要被掠夺者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简而言之，需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面对的是资本积累的新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封建化和帝国主义化。在列宁时代，发达工业国的资本家解决过度积累、处理“过剩资本”的办法，不是扩大内部消费、提高劳动者工资，即不是通过调整内部劳资关系、进一步促进产业资本的扩张这个方法，而是将过剩资本集中在几个资本家银行手中，到“外部”去投资放债，从而以金融资本扩张的方式，制造和扩大世界不平等。这就是所谓“金融垄断”的资本积累方式。

列宁指出，如今，资本家关心的并不是生产，而是资本的扩张，银行把资本集中起来，其目的当然也不是扩大生产，而是使资本投资扩大。于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垄断，如今表现为金融垄断。

他这样说：

> 在任何情况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不同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
>
> 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写过：“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

> 式而已。”我们所引用的关于银行资本的增长、关于最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数目及其账户数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体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公共簿记”，而且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因为银行所收集的（即使是暂时收集的），是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极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从形式上看来，是从现代银行中生长出来的……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绝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的，因为大资本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中“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赋的条件下活动的。[注]

正如列宁所说，私人银行和金融家们，将“公共财富”“社会财富”收集起来，将一切财富转化为资本投资，用于大资本家阶级追求超额利润的“私人目的”，而资本家银行所扮演的“公共财政角色”与其“私人本质”之间的矛盾，必然决定了他们绝对不会“自动地”投资于生产与民生，即不会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更不会像亚当·斯密当年所设想的那样致力于改变整个欧洲“农业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畸形发展道路，甚至，他们也不会投资于一般的工业生产。在发达国家到处可见的是银行投资于虚拟经济，而资产阶级的政权则以公共财政补贴债市和股市。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美联储超额发行的货币，实际上都是为了救“市”，即股市、楼市和债市，而并没有一分钱是给了恩格斯所憎恨的“企业主”（我们今天称其为实体经济的经营者）。

那么，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信用

机制，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一举抓住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要害，他指出：资本积累的关键，就在于造成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体系，而不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资本自由流动，使世界变平。要维持这样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当然就需要帝国主义暴力，但是，仅仅依靠帝国主义暴力又是不够的，因为金融资本的实质，是对“信用”和“社会信用”的攫取。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暴力是“强权”，而对社会信用的攫取则构成了“霸权”。

而毛泽东则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主义”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安东尼·葛兰西率先发明了“霸权”一词，但是，在列宁和毛泽东之前，这个词的真实意思，其实从来就没有被说清楚过。当然，这不能怪葛兰西，因为葛兰西是在《狱中札记》中阐述“霸权”这个概念的，作为在狱中写作的书信，他必须把信的内容搞成《伊索寓言》那种隐喻式的文体，才能通过狱卒的检查。

葛兰西给出了有关“霸权”的最简单解释：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肤浅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世界货币”。

这便是马克思所谓：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它的机制是信贷，“货币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虚拟经济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对于资本永恒积累的想象——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在资本永恒积累的虚拟经济之上，这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率先在西欧之外、在欧洲外面的世界展开的，而这一过程以美洲的发现为开端。

如果不是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去打开封锁、使它们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

真实的历史是：先有美洲的发现，后来才有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最后才有欧洲内部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这也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西欧要想取代中国这个“霸权”，仅仅靠船坚炮利也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它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日本的海盗和“倭寇”几乎没有区别。当然，依靠传播天主教或是新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依靠“普世价值”，更做不到，无论是利玛窦还是张诚[注]、白晋[注]的经历，都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西欧能够取代当时的中国成为“霸权”，靠的首先是白银，靠的是第一个以欧洲为核心、围绕着白银建立起来的世界金融体系——银本位体制。更准确地说，靠的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通过对白银的掌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制，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通过征服美洲，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仅仅靠强制，那只能形成“强权”，而不能铸就“霸权”。因为霸权意味着对游戏规则的认同，意味着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信用机制的形成，

如果说建立霸权需要普世价值，需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那么货币金融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核心。“世界货币”除了是认同、服从和信任的象征物之外，它什么也不是——马克思也早已指出了这一点。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地，那种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的看法，也仅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一系列世界性的信用机制方才得以建立。正像美联储、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一样，“美元霸权”作为国际金融投资的核心——或更直率地说，作为国际放债体系的核心，是基于人们对它的信任。

美元是人们自觉认同的，因此，它方才可以“无中生有”，即它方才可以派生出虚拟资本、派生出向军工联合体的贷款、派生出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美联储只需通过操纵利率，就可以剥削全世界。

概括来说，真实的世界史是这样的：西欧先是掌握了为世界所认同的货币，转而成为“信用”的化身，从此，它才可能成为一个“霸权”，而自此之后，它方才有可能把“霸权”转化为统治世界的“强权”和“暴力”。

这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强权”“暴力”乃是建立在“霸权”的基础上，而绝不是相反——事实上，仅靠“强权”和“暴力”并不足以支持“霸权”。

在葛兰西的意义上，“霸权”是虚拟的，而“强权”则是现实的，于是，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强权”结构，方才成为马克思所谓的“头足倒置”的结构。

列宁真正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这样指出：世界资本主义

体系形成的动力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是武力保护下的放债活动，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自19世纪后期以来，“国际投资”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支柱。

实际上，自16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方式就是不同的：对美洲的掠夺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而在欧洲内部的积累主要是靠剥削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西欧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掠夺则主要是通过手中掌握的白银货币；而19世纪后期以来，金融资本的掠夺越来越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金融资本的运动采取了三种主要形式：第一，金融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第二，金融资本与军工集团相结合；第三，金融资本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扩张与流动。上述三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分析了第一种，列宁则分析了第二种和第三种。

列宁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以国际投资方式剥夺世界，而非本国工人，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因此，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还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会自发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因为能够分享金融资本掠夺外部世界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红利，他们会听凭资产阶级将社会资本转化为金融垄断资本，他们自己也会成为食利者，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就将堕落为工团主义，而它的思想表述就叫作“机会主义”。列宁指出，这种机会主义的代言人就是卡尔·考茨基。恩格斯去世之前，把马克思主义“法定继承人”的位置留给了考茨基，并指定由考茨基来完成《资本论》的编辑工作。

列宁几乎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所有核心部分，被列宁发扬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有些是马克思深刻阐释过的，有些是阐释得不太清楚或者还很模糊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在马克思那里明显属于前后矛盾的。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与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帝国主义便是通过“分化”和“隔离”的方式统治世界，简而言之，这种统治的目标就是制造“不平衡”，只有世界不平等和不平衡，才能在“过度积累”与“剥夺性积累”之间架起桥梁；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其矛盾越来越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资本全球积累依赖于世界发展不平衡，与此同时，它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从而既激化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激化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而“边缘地区”却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西方列强使国家成为既为资产阶级谋利益，也为“民族”谋利益的工具，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要求不断被推迟，结果，在考茨基看来，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是经济斗争，国家由资产阶级管理似乎是有效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列宁指出：对“外部国家”来说，夺取并掌握国家主权，这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也是“全民族”的迫切要求，对于外部国家而言，它从一开始就需要考虑改造国家以及如何管理国家的政治问题。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考茨基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即使《共产

党宣言》的开篇也这样说，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注]，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世界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只是发达工业国内部的产业工人组织。直到晚年，马克思方才通过巴黎公社思考了国家政权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方式，相对于列宁而言，马克思的这种思考并不完备。

考茨基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即剩余资本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和流动。也正因为这种资本“过度积累”的实质，就是转嫁危机、转移矛盾，因此，它才激化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列宁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仅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不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广泛的社会反抗运动呼应，而这种广泛的社会反抗运动，就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市民民主运动和失地农民的运动，它的主体是剥夺性积累的受害者——社会大众和被压迫民族，而国际资本家阶级就是这样，成为发展中国家统治阶级的朋友、支持者，同时，也就必然地成为那些国家进步力量、劳动人民，以及欧洲和全世界进步力量与劳动者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力量所要反对的国内统治阶级之后台、债主和贷款者，其实就是国际资本家阶级，他们反抗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也就是支持发达国家进步力量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当列宁听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他第一时间的反应，便是深刻指出：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主张中，包含着宝贵的社会主义因素，因为孙中山提出，新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社会主义方案为前提，这样，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便突破了欧洲市民阶级以私有

产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构想，也突破了仅为城里的工人谋利益的工团主义。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便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形式。因此，列宁说，与欧洲已经丧失了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相比，现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乃是亚洲和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进步力量，当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还在为是否应该夺取政权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当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学会掌握政权“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的时候，形势已迫使中国的革命者们，把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新国家的任务放在了争取经济利益和劳动权利之上：

>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正在衰朽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已经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摇摇欲坠的雇佣奴隶制。
>
> …………
>
> 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
>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注)

亚洲革命比欧洲的工人运动更能代表“全世界受苦的人”。据此，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思想论断，而这也是列宁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原因。

跨国的金融资本家阶级，不但全面剥削和统治欧洲社会，而且通过金融放贷的方式统治世界上的各民族，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

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金融垄断统治、摧毁世界债务关系、改造现存的国际信用体制，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同时，也只有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打倒帝国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地，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以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于是，列宁指出：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反抗帝国主义”。他说：

>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注

## 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马克思

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欧洲工业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出发思考资本主义不同，列宁是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思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马克思曾经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

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注

但是，列宁看到的却是：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即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下子”同时发生的那种行动，或许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即“一战”。

列宁说，这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均衡的、普遍的，它们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的方法，因此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比如：以英国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国家集团，它们代表的是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权利，体现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就是“一战”的主要同盟国的实质，是英法资本家集团的实质；但是，以德国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国家集团，代表的则是现实资本或产业资本的权利，它体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家托拉斯的利益。“产业资本”发展快的国家迫切需要占领世界销售市场和争取资本投资，而“金融垄断”的国家则以资本垄断的方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前者争的是市场份额，后者争的是金融霸权，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因此而日益尖锐起来了。列宁这样说：

>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还要高得多，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注

于是，那些产业资本发展得特别快的国家，就必然会感到自己是被掌握着金融资本的国家剥削、围堵了，它们的发展空间被金融垄断资本挤占了，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反应：

> （在产业资本方面——引者注）德国永远地超过英国了！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注)

列宁说：“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斗争的集中体现，便是“一战”的实质。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日，还有美国与德国、俄罗斯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要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以金融垄断和军事暴力统治世界，而“超级帝国主义”则是幻想世界最大的金融垄断势力与最大的生产制造集团之间实行联合统治，但是，列宁说：这绝不会实现。不会实现的理由是：帝国主义时代把国家主权问题鲜明地摆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面前，在帝国主义时代，超国家的统治模式不可能真正取代国家主权，因此，外围地区的无

产阶级欲求自身解放，必先争取国家主权，必先学会管理国家、投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用劳动者当家做主代替西方的民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专政”的内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无产阶级如何管理社会再生产领域，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这一论断，自列宁以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

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当前世界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看作中美之间的联合，即所谓G2模式，也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与中国产业资本之间的联合[注]。但是，历史证明，即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合成为一个“超级帝国主义”，其实质依然还是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就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

19世纪欧洲的崛起与繁荣，是金融、商业和产业资本结合的结果，现代欧洲文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创造的，它的文化表征便是现代主义。而今天关于G2模式的想象则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复制19世纪欧洲的那种联合，其文化表达则是“后现代主义”。不过，若用列宁的话来表述的话，那么，当今世界最时髦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它的本质其实也就是“机会主义”，但却是连考茨基时代还不如的机会主义，它的理想就是“超级帝国主义”，而超级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的联合，是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剥削全世界，而且，他们竟然以为这种“和平的剥削”会被“全世界”认同。

实际上，第一个提出“超级帝国主义”即“资本帝国”概念的人，绝不是当今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的西方“新左派”，而是被列宁讥为“机会主义总头子”的考茨基。考茨基率先提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实行国际

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联合起来，采用金融垄断加产业垄断这种“和平的方式”剥削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是资本剥削的主要对象（因为产业的外移），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将由现实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和平的议会斗争，由经济斗争转为文化斗争，由生产斗争转为消费斗争。

机会主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贵族的意识形态，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剪息票为生”的寄生虫们的哲学。值得一提的是：奈格里和哈特出版的《帝国》一书，其主旨就是考茨基思想的重复，它是100多年前欧洲机会主义思想的翻版，这本集西方新左翼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其实质是彻头彻尾的反列宁主义。尽管这部著作文采飞扬、巧思迭现，但是总体来说，它除了欺骗全世界人民坐等一个“超级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消费时代”之外，没有多少新货色。好在这些“后现代著作”一本比一本写得更加语焉不详，因此，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言，它们的破坏力就没有当年的考茨基那么大。

列宁系统地批判了考茨基。他指出，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由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由于金融垄断与产业垄断之间的斗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绝不会出现真正的联合。相反，在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分散。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

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注)

现在不是同样如此吗？今天，在欧盟与美国之间，在东亚、欧盟与美国之间，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在所谓“东亚经济共同体”成员之间，它们的矛盾难道真的减少了吗？实际上一点儿也没有。

总体来说，恩格斯所理解的资本积累，只是“资本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性积累”。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指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剥夺教会财产，而所谓的“现实资本的积累”，也就是指剥夺工人剩余劳动。但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世界性的资本积累方式，则包括“过度积累”和“剥夺积累”这两个方面。前一个概念属于卢森堡，后一个则属于列宁。

所谓“过度积累”，也就是指资本通过海外投资攫取剩余价值，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资本全球化”。而列宁所说的“剥夺积累”，也就是指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它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制造危机，通过战争与催债、结构调整，甚至通过局部战争的扩大，使得负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现实资本在一瞬间贬值，然后，帝国主义国家再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这些资本。

当然，制造危机的办法有很多种，除了最常用的操纵投资利率，这里仅列举我们熟悉的几种：鼓动政权更迭、鼓吹“颜色革命”，还有制造金融危机。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发动战争。

因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在战后重新分割和拍卖资产，即通过战争使得现实资本贬值，然后再廉价收购它。这就

是今天正在伊拉克、利比亚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最高形式则是“剥夺积累”，而它的主要手段，就是帝国主义战争。

按照列宁“剥夺积累”的论断，我们可以这样说：在1989年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鼓动政权更迭，无情剥夺或者极其廉价地收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同时，它们又通过“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私有化，廉价收购了包括中国、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国有资产。与此同时，1998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它们便通过金融危机，无情剥夺了东亚那几条“龙”的大部分资产。而现在，它们终于要通过战争来更加无情地剥夺中东、伊朗的石油资产了。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围堵、颠覆企图不是减弱了，而是正在加强。

既然金融与产业资本联合的“超级帝国主义”不会出现，既然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区域的不平衡，既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之间、在老牌资本主义与新兴资本主义之间、在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矛盾，因此，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空前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再次进入到野蛮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在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中难以复苏，于是，我们面对的也无非就是列宁最惯常的思想和提问方式——怎么办？

从理论上说，这个世界的未来只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放弃剥夺积累和过度积累。这意味着让最发达的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放弃它们的金融垄断地位，即放弃通过虚拟经济，利用它们的股票、债券愚弄和剥削全世界的方式。这是根本做

不到的，或者说，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这等于让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垮台，对此，不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会同意，而且，由于那些国家的工人贵族也是“靠剪息票为生”的，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基金、股票和债券，他们当然也会强烈反对。

在20世纪，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是保守主义，那么就是机会主义，从而，金融资本的发展，使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转向，变得几乎不再可能。

第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空前的危机面前实现整合，即以“超级帝国主义”的全球“善治”，来摆脱老的、野蛮的、战争形式的帝国主义，而当下的超级帝国主义模式，也就是西方战略家们所提出的G2模式。但是，起码是美国的所作所为，使这种“中美联手平衡世界经济”的设想难以实现，即使中国彻底放弃社会主义，中国这个“超级打工仔”也满足不了美国社会超前消费的胃口，何况中国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来，与当年一样，产业资本发达的国家要么承受金融资本国家泡沫经济造成的代价；要么一直忍受“输入型通货膨胀”，即忍受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削；要么最终孤注一掷，联合起来与金融垄断集团展开争斗，而那样的结果就是各种力量互相摊牌——这就是列宁看到的现实。

第三，在金融垄断资本和产业资本尖锐斗争的时代，无产阶级必须严肃考虑自己的利益，必须认真思考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这首先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成熟。于是，列宁通过把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和掌握政权提到首要位置，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了新境界。

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组织形式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管理投资、政务和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只是作为“经济基础”而存在。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却把国家主权问题

鲜明地摆在了各民族面前。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面前，无产阶级欲求解放，必先争取国家主权，必先学会管理国家、管理投资、管理文化，这并非是由于其“先进性”使然，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同时，因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比产业资本主义要强大得多，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世界放债体系又是由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以武力捍卫的（汉娜·阿伦特说，在这个时代，“权力的输出却卑顺地跟在货币输出的后面，因为在遥远的国度中无法控制的投资威胁着将社会广大阶层转变为赌徒”[注]），所以，要反抗金融垄断的剥夺，无产阶级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反抗帝国主义。也就是说要反抗帝国主义靠一般的工人阶级组织是不行的，它要求无产阶级手中能够掌握更大的资源，而这个资源首先就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和人口相联系），其次就是货币主权（以此与金融垄断资本抗衡），也正是这两方面，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邓小平这样指出：“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注]

邓小平的这些话大有深意。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应该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起初就是从“现实资本”的活动中，即现实资本剥削劳动，从（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在工厂里面剥削工人的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们都看到的。[注]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则是针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针对帝国主义时代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货币金融主权的意义，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一定的战略机遇期，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货币金融主权，与维护国内

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那当然就是“左”倾的教条主义。

因此，邓小平很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是马克思的发明，这才是列宁的真正发明，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不是他们的发明。仅靠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能解决社会再生产领域的“霸权”支配问题。

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与资本扩张支配的金融放债关系并不相同，把它们一股脑地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根本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在资本剥夺劳动的基础上，这是对市场的扭曲，因此，只要比较好地调整劳资关系，只要努力保证劳动者的利益在商品生产与交换中不被损害，只要把“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就能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中拯救出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无论人们怎样批判列宁关于“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论断，事实是：在苏联存在的近70年里，列宁主义把一个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落后国家，改造为世界上唯一可以抗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伟大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抑制了资本“过度积累”和“剥夺积累”的野蛮进程，制止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抑制了资本主义的重新封建化，而且，正是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也建成了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今天看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确实走了弯路，如果谁否定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十分危险的。而总结这种弯路，正是我们的责任。

从客观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之所以走弯路，首先便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以及我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都处在帝国主义的军事

威胁和包围之下，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建立“世界商品市场”和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换的可能性，则显得十分渺茫。因此，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均长期把主要精力用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方面，这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也必须承认：倘不能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倘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货币金融主权，那么，不但发展谈不上、生存谈不上，实际上，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迅速地完成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革命、掌握最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简而言之，“二战”之后世界之所以太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拜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硬实力”的不断提升所赐。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为4.8％，东欧为4.4％；而美国为3.2％，日本为3.8％，西欧为3.1％），因此，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中国改革之前的30年和苏联近7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都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如此又怎能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在马克思生活、写作的那个时代，西欧确实只存在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关系，即在无干预的状态下，市场竞争只能加剧资本的优势和资本的剥夺，因此，马克思对于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是采取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也正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这使得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当然，这里的原因也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起炉灶；二是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包括苏联高层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的严重估计，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限制了与资本主义在相对和平的

环境下进行市场竞争的思路。

例如，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例进行比较，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德国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均高于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更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民主德国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这当然是由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所致。而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更是一个严重教训。今天看来，假如苏联和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工业市场竞争，完全可以想见，苏东集团先进的工业企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但非常可惜，苏东集团在面临工业品生产过剩、消费品生产不足时，并不是将过剩的工业产品和工业生产能力转向西方市场（实际上，在苏东解体前，西方市场对于苏联一直是封锁的），而是受到西方经济学的误导，对工业企业实行“休克疗法”，而西方跨国公司正是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以极低的价格使苏东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从而消除了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

与苏东集团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为国内的产业升级打开了大门。中国经济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其重要原因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理解和总结要高于苏联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中国对抗国际掠夺，这就包括他所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基本点：第一，枪杆子在我们手里；第二，不开放资本账户，牢牢掌握货币金融主权，防止资本外逃；第三，积极利用世界市场，抓住机遇，引进世界先进制造业技术，做大做强自己；第四，国家始终要注意调整市场经济状态下的劳资关系，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这一创新建立在对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与苏共不同，中共是从基层起家，经过漫长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根据地斗争获得政权的，因此，高

度重视基层的活力和自主性，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便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反复强调“两条腿走路”，这是革命经验在建设时期的新发展，它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了道路。

我们还要注意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更与苏东集团货币金融主权的丧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1991年7月实行了“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民主德国居民的选票，联邦德国政府决定，民主德国居民持有的民主德国马克可以1∶1的比例兑换联邦德国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达到6∶1的真实汇率。这对民主德国居民来说就是一笔飞来横财，也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然而，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民主德国的工业。统一货币后，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这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更使民主德国企业顷刻间丧失了东欧的传统市场。民主德国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联邦德国马克，大肆购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民主德国的老式产品，这就使民主德国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陷入大面积破产。联邦德国企业向东扩张，使得民主德国市场进一步陷入萧条，而联邦德国居民则不得不交重税来支持民主德国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这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从而构成了当前欧洲经济危机的远因。[注]

社会主义经历的弯路，也与列宁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者的政治训练和政治教育有关。列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视为一种“会计”和“写材料”的工作，因此，也就是一种一旦经过培养训练，几乎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他的本意是“打碎国家官僚机器”，使得人人都能够在国家管理中负起责任，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却造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会计”和“写材料”的工作人员阶层，最终使得苏联成为一个由会计师、工程师和秘书管理的官僚主义国家。实际上，列宁生前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无非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

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但是，这样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时也就必然与“没有私人财产的管理阶层”相联系，而那样一个日益庞大、缺乏明确政治信念的阶层，虽然没有私人财产，但却希望将手中的管理权转化为私人权利——这就是苏联的解体被称为“管理人内部的革命”的原因。

列宁把“先进性”理解为科学和知识的先进性，进而就是专家（管理者和科学家）的先进性，而并非像毛泽东那样，将认识活动理解为“格物”的过程——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知识、现实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矛盾中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列宁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科学性，随之便是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种科学性相伴随的“先进性”，这有可能助长一种独断论的思维，与辩证法和实践的思想是相悖的。列宁强调“职业革命家”对于群众的优越性以及“管理者”与“科学家”的决定作用和先进性，而他的意见更被斯大林进一步强化了。这恰恰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列宁和斯大林的“专家路线”的不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过是因为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科学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工具，但它并不能保证这种分析是完备的，更不能自动导致正确的实践和政策产生。毛泽东指出，即使革命政党拥有先进的科学方法，但是，他们根据科学方法制定的政策也必须得到群众的拥护，也要经历实践的检验，仅凭科学的、先进的头脑，不顾现实条件，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便会犯错误。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说明，掌握包括金融主权和文化领导权在内的这种“霸权”，以及管理者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刀子”，丢掉了“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革命”和“群众路线”这两把刀子，仅靠专家委员会的力量，不能支撑政权。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还说明，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在掌握国家主权、货币金融主权的前提下，大胆地与资本主义展开市场经济，正确地区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社会主义苏联倒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改革，却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端。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在发展，尽管前进道路上仍然充满艰难险阻。

因此，邓小平方才这样说：

>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注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
> ——邓小平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每一次的结果又总归不同。

发生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运动，与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便是如此。

这两个历史事件有着内在的连续性[注]，且基于十分相似的历史境遇而发生，只是，由于历史主人公之不同，却产生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便是所谓：时势固然可以造英雄，但只有英雄方能成就时势。换言之，尽管戏剧的起因相同，但最终结果究竟是悲剧、喜剧还是壮剧，那就要看出场的历史人物的表现了。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列宁同志、如果没有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也许就只能是巴黎公社起义，它终归还是会失败。

首先，众所周知，这两次历史事变的起因都是列强间的战争，即由于战败而导致了帝国垮台：在法国，这就是普法战争，它导致了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法兰西帝国垮台；而在俄国，由于与德国的战争失利，沙皇尼古拉二世乘坐的专列被劫，沙皇本人被愤怒的铁路工人俘获，从而导致了俄罗斯帝国和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垮台。其次，在帝国垮台之后，这两个国家都成立了临时政府；在法国，这就是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而在俄国，则是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立宪政府。第三，新政府都不能控制国家局势，特别是不能控制主要城市的局势，而在这个时期，两国都存在“双重权力”：在法国，这就是巴黎公社的前身“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而在俄国，就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自治的“工农兵苏维埃”。

但是，在如下三个方面，情况又有所不同。第一，相对于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来说，梯也尔的第三共和国政府力量比较强，因为它已经向普鲁士军队投降，并以投降换取了普鲁士军队的全力支持，这样，它就不必对内、对外两面作战，而只要专心对付国内反对派即可；但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就不同了，它既要继续与德国作战，同时还要镇压国内的反对派，结果自然是捉襟见肘、腹背受敌，与当年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相比，它的能力明显不够。

第二，相对于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公社的领导集体

十分弱小。巴黎公社的领导者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的追随者构成的，他们大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公社委员会其实也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权力完全依赖于普选，以至马克思要花很长时间去思考：究竟是否应该支持这些一腔热血而头脑简单的蒲鲁东分子（马克思与蒲鲁东进行过公开的论战，《哲学的贫困》就是为批判蒲鲁东而写的）。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派”。早在1903年的布鲁塞尔党代会上，该党已经按照列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领导层。从那时起，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就被称为党内“少数派”（孟什维克），而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的民主原则的支配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实际领导权已经操在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手里，因此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尽管托洛茨基起初反对列宁的主张，但在会议表决时，却也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积极向列宁靠拢，带头主张由列宁取代马尔托夫担任党的主席，并直接领导《火星报》的工作。

这也包括在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天晚上，当列宁化装来到斯摩尔尼宫时，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就立即将指挥权交给了列宁。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由马克思担任德国支部书记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始终也没有直接参与巴黎公社的斗争，对待公社的沉浮，总委员会的姿态差不多就是“隔岸观火”。在公社存在的两个月里，国际工人协会没有对公社的方针做出任何具体的指示和建议，结果，他们既不可能代替巴黎公社执政和管理国家，也不能保证巴黎无产者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

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列宁自始至终领导、推动了十月革命，与当年总委员会那种“隔岸观火”的无所作为相比，列宁的积极举措就是舍生取义。而且，列宁十分自信比自己中学校长的儿子更有能力管理俄国。

在公社彻底失败之后，马克思对公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自有《法兰西内战》为证，不过，更为重要的事实却是：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整整两个月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1871年3月29日，即公社正式成立的第二天，马克思就提议起草《告巴黎人民书》，委员会让他来负责[注]，但是，令人感到有些费解的是，马克思却用一种做学问、搞研究的方式，来对待这项生死攸关、火烧眉毛般的革命工作。他广泛地收集材料、几易其稿，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措辞，两个月下来一直犹豫不决，结果，该宣言直到5月30日，也就是公社覆灭后的第二天，才交给委员会，而这就是著名的《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与其说是公社的“宣言”，还不如说是公社的“悼词”更为合适些。

令人费解的还有：马克思缺席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讨论巴黎公社问题的两次会议。对此，恩格斯事后解释说，马克思是因为生病才没有来开会，但实际上，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非常谨慎，甚至是有些犹疑。他其实写了三份《告巴黎人民书》，而《法兰西内战》只是最后一份，“在此之前曾有两份明显迥异的详细草稿。这些手稿与其他东西相比，表明了马克思对一些公社社员的激进的暴力行动基本没什么好感”[注]。

为马克思所高调赞美的“巴黎公社”原则，其实就是指他所谓“真正的、彻底的人民普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廉价的政府”。最为马克思津津乐道的是：公社领导者的工资只有5 000法郎，这相当于临时政府一个小办事员工资的1/5，即一般工人的工资，而且，这些领导者可以随时撤换。但是，对于这些“公社的创举”，列宁均有所保留。

列宁的理由如下：第一，在资产阶级武装专政之下，无产阶级的组织根本就不可能公开存在，更不用说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了，那种实

行“广泛民主原则”的高调，“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第二，所谓“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这种民主几乎等于“儿戏”，它不但不利于组织效率的提高，而且会阻碍革命组织效率的提升，治国理政不是夺权造反，革命更不是搞普选大民主。列宁举出的例子是：离开了金融和保险专家，工人阶级自己不可能管好银行，离开了专业化的新闻工作者，所谓“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说法，也是幼稚可笑的，它只能使无产阶级的事业失败。第三，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普选、不是轮流担任公职，无产阶级的民主有赖于发达的舆论监督，有赖于日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赖于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

在列宁看来，为马克思所赞美的巴黎公社的“广泛的民主”，恰恰就是其组织涣散的表现，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当然，倘若马克思活着，他想必也不会无条件地赞成列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因为列宁的那个原则，与普遍选举、随时撤换的原则完全相悖。在列宁的委员会模式里，由上一层级的委员会选举下一层级的、权力更为集中的委员会，而最终的权力将集中在处于金字塔顶尖的委员会手中。

马克思确实批评了公社没有剥夺教会财产，这是因为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全面剥夺了教会财产，而公社却只是从教会那里搞到了区区8000法郎。不过，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当他知道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一文，在十月革命后断然下令，将资产阶级统统从他们的别墅中赶出来，把别墅分配给新政权的支持者——劳动者居住的时候，他也很可能会把这视为完全的“痞子运动”之举。而更重要的还有，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亲自签署法令，让一切资产阶级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包括挖沟、修理下水道这种脏活苦活，也最好让资产阶级自己动手去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对于这一条惩罚措施，马克思肯定会深表反对，因为那样一来，马克思这个大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被派去扫大

街。

马克思公开指责公社绑架人质的恐怖举措（其实后来都释放了），认为与其去绑架一千个人质，还不如通过占领法兰西银行，以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去绑架“资产阶级这个整体”更为有效。马克思这个建议固然极其精彩，但当这个精彩建议提出的时候，它对公社而言其实已经是十足的马后炮，因为那个时候，公社早已经被彻底镇压下去了。

马克思是政治理论家，不是职业政治家。他毕生热爱斗争，不过，他所从事的唯一一次武装斗争，可能也就是把两个闯进《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士兵赶走——因为那两个家伙看到马克思的睡衣口袋里装着一把手枪。马克思固然不是那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人，不过，像一切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思对于暴力的理解非常复杂。马克思曾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而他在这里所说的暴力，很显然就是指生产力的扩张冲破旧社会的外壳。马克思对于暴力做出的极其有限的颂扬，其含义与尼采的“主人道德”大体一致，即是为了反对德意志民族“软弱的奴隶道德”，是为了戳穿基督教道德的虚伪。因此，恩格斯这样正确地指出：马克思“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30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扫除“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注]。

在马克思那里，暴力就等于反抗压迫的自卫，与之相对的则是反抗基督教的、软弱的奴隶道德，但是，在“压迫”和“镇压”的意义上运用暴力，却要慎之又慎。在马克思看来，暴力与“广泛的民主原则”不沾边，而巴黎公社的原则乃是“为真正的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列宁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与马克思截然相反。在列宁看来，所谓国家，无非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实质其实也就是镇压，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少数人镇压多数人，还是多数人镇压少数人。因

此，列宁说：国家乃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暴力工具，国家的统治，其实也就是官吏、警察和常备军的统治，而这个暴力机器则是由统治者豢养的，因此，一切现存国家统治都与民主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尽管资产阶级国家总是标榜民主，但国家除了是官吏、警察和常备军之外，它实际上什么也不是。

而连这一点都没看明白的人，就根本不配谈国家，也不配谈民主。

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才能叫作民主、才配叫民主，但是，这里的民主，与普选、随时撤换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种民主的实质和要害是：在无产阶级国家里面，官不再是官，警察和常备军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警察和常备军，在那里，除了少数剥削者之外，90％的普通老百姓其实都是官，都是管理者，从而也构成了最庞大的常备军——民兵。

因此，真正的民主，绝不是指选举，因为一切选举的实质无非也就是“选官”而已（用列宁的话来说也就是“分赃”），而选出来的官，自然依旧是官、依旧是统治者，这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便是：“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注]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却是“打碎国家机器”，而所谓“打碎国家机器”，其实也就是打碎现实中的“官”以及人们头脑中的“官吏崇拜”，而代之以“人民委员”。

而所谓“人民委员”，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三代之治”下的“大禹”，也就是老百姓的召集人和跑腿的，他没有任何特权。当了这种“官”，自然也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倘若干不好，还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每干满一个任期，即使老百姓不通过选举撤换他，他也会积极要求“禅让”的。

列宁还说：随着生产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经过专业化培养，官吏所必备的专业知识最终几乎人人都能具备，因为那无非就是“当会计”或者“写材料”罢了，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列宁还形象地（然而却更是天才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比喻成“邮局”，因

为邮局职员所做的，无非就是恪尽职守，把信息、商品和金钱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与一般国家官员的日常作为有极大的类似性。

既然邮局职员可以拿普通工人的工资，那么国家官员怎么就不行呢？

众所周知，邓小平也曾这样说：“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注]革命家邓小平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其实与列宁是很接近的。

当然，列宁并没有这样强调：离开了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即日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离开了思想路线的斗争，离开了舆论的监督，那么，邮局职员就与技术官僚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打碎国家机器，就是打碎“以官治国”的现存秩序，同时打碎祖祖辈辈、根深蒂固的“官吏崇拜”，一旦人人都可以成为管理者，管理者也就不再是“官”，“官帽子”也不再是什么稀缺资源。毛泽东说：只有人民都负起责任来，才能打破“历史周期律”。而用列宁的话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当然，这是最高的民主，即人民民主。但这种民主也就是空前严密的组织管理，对老百姓来说，就是人民自我管理，或者老百姓互相监督、互相管理。列宁说：“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任何人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都会受到严厉惩罚。

于是，列宁如此明白无误地宣告：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委员会的严格管理、计算和监督，它的极端就是镇压，但是，它并不是通过官吏、警察和常备军的镇压，而是通过老百姓的互相监督，是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对剥削者的镇压。列宁还说：民主的真正基础就是经济民主，而经济民主的要害，一方面是分蛋糕，即决定应该剥夺谁、给予谁，如果不通过镇压，这种剥夺和给予，这种财产的“民主分配”，其实也就根本办不到；另一方面，就是经济管理，因为它是“一切人管理一切人”，所

以，这是史上最严密有效的管理体制。

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革命角度看去，巴黎公社运动也许根本就算不上是一场革命，它只不过是一次最温和的普选罢了。当这样真正的普选几乎是必然地被资产阶级的刺刀镇压下去之后，它仅仅说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作为普选的民主之破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要想通过公开、公正、全面的选举获得政权，其实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政权存在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两个月——说到底，这也就是巴黎公社的教训。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为新科学、为新时代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作为哥尼斯堡大学校长的康德，却是一个连鸡窝都管不好的人。列宁可就完全不同了，列宁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奠基，并训练无产阶级去学习掌握那些为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技能：治国理政、管理工厂和银行。列宁所关注的就是如何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训练、组织管理训练和政治训练，像一切伟大的政治家一样，列宁知道，政治就是组织，就是管理，凡与组织效率提高无关的东西，都没有抓住政治的要害。

因此，列宁发明的新科学就是一种新管理科学，其核心就是人民管人民。列宁认为，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程中，训练工人学会管理大型企业，依靠严格的纪律，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注]，让他们学会“计算和监督”，这乃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管理革命：

> 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注

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注

尽管如此，列宁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想要掌握管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技能，需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此，人民代表、人民委员管理制应运而生。列宁在许多文章、讲话和演说中特别强调了利用技术专家、尊重特殊人才甚至是资产阶级专家的重要性。他反对党政干部干预专家的具体事务，他甚至认为：在经济生产领域不应该过分讲政治，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应该效益优先。因为列宁一贯认为：脱离生产实践的政治有害无益，脱离生产管理的领导是瞎指挥；而在生产领域中，专家比领导和政治工作者更了解实际情况。

我们没有专家，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招到1 000个精通本行业务的第一流专家，这些专家重视自己的业务，热爱大生产，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注

要记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

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了解事情的本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的和内行的资产阶级专家。

……研究是学者的事情。既然我们这里早已不是在谈一般原则，而是谈实际经验，那么，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多了解一些事实，少来一些竞相标榜共产主义原则性的口角吧。

…………

……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注

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这些事实要说明：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是前进了，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后退了。……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只会侈谈“领导”，却不善于安排专家做实际工作，不善于使他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就……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无用处。注

在列宁的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中，专家占了很大的比重。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试验大量地吸收专家，同时培养新的领导人员、新的专家，使他们

学会做极其艰巨复杂的新的管理工作，以便代替旧的专家”[注]；同时“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注]，我们的真正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和工程师。

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运动的阶段性特征，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尽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了如何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体制”以及最终消灭国家的问题，但是，列宁更提醒说：消除官僚制和消灭国家，这一切只是最后的目标，在当下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列宁认为整个国民经济应该像邮政那样，具有完善的分工、统一的管理和严格的纪律，而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也应该像由大工业企业构成的国民经济那样运转，因此，列宁式的管理方式，似乎具有黑格尔所谓的以“管物”的方式来“管人”的倾向。实际上，列宁倡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大生产模式，非常类似于20世纪初美国出现的福特主义，即标准化、流水线、可替代性。而从马克思的视野看去，列宁将这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引入社会主义的管理机构和国家机器中，显然没有重视和解决“异化”与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相反，列宁反复地提到“简单化”这个词，并力图将国家治理，简化为可以机械复制那样的大生产模式。尽管“列宁式管理法”建立在人人都可参加国家管理的前提之下，但人人参加国家管理却是通过“计算和监督”来实现的。于是，这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必然会突出两种人——管理者和技术专家的重要性，而他们都是按照一种简单化的技术程序来运作的——甚至官员也应该由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来担任，它导致的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是：大工业企业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也就成为国家的管理和运行模式。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形而上学支配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其在大工业生产领域的集中表现，便是高度计划型的经济模式。

因此，只有了解列宁式管理及其在中国实践的后果，才能理解毛泽

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甚至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5年之后历次政治、经济方面的运动（包括“大跃进”、消除三大差别运动乃至“文革新中国成立”等）的初衷，因为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对话或针对的对象：列宁式管理和苏联高度计划体制所暴露出的问题。

当然，只有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于计划经济模式的纠偏，只有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应该重新思考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遗产的合理性，因为那一遗产中也包含着对形而上学发展观的纠偏。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意义所在：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应该用来改善民生，惠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它的目的在于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为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达至“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

在列宁生前，苏联的雏形已经形成，他创造和管理着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并把这个国家从战争、动乱和饥饿中拉了出来。列宁与康德甚至与卢梭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切现实的政权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而所谓政权的血肉，其实也就是组成它的机构。无论这些机构多么“廉价”和“廉洁”，它们也都只是针对人、管理人、规训人、镇压人的工具，而一旦没有了这样的机构，政权就成了“没有肉体的灵魂”，这样的政权只能存在于天上，只能存在于理论教科书里，而根本就不能在现实中立足。

什么是政权？西哀士曾经说过，“政权是不祥之物”，而所谓“不祥之物”，其实就是说政权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政权是用来管人的。

对于政治理论家而言，区别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准，当然就是它是否合乎抽象正义，但是，对于政治实践家来说，判定政权好坏的首要标

准，则是它是否有效。

与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对巴黎公社的“隔空指挥”完全不同，列宁是在沙皇倒台、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时，即1917年4月，便千方百计、不畏险阻、顶风冒雪，从瑞士穿越德国国境，然后又途经瑞典，乘坐雪橇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再乘坐火车从芬兰回到俄国，最终几乎是九死一生地潜回了彼得格勒。不过，他却很快又被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赶了出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即从1917年4月到11月期间（十月革命发生在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的心路历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体现在他这个时期的杰作《国家与革命》之中。

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完成的，它是一场“流产的革命的产儿”，而《国家与革命》则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几个月写成的，列宁写完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便立即去发动和领导十月革命，所以，《国家与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助产士——它几乎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大炮一起打响。

当列宁刚从瑞士回国的时候，他心中或许还对“巴黎公社的原则”，即普选和“历史上最廉价的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幻想，但是，1917年彼得格勒“七月事变”（临时政府镇压苏维埃事件）却彻底地粉碎了他心中这最后的幻想，甚至也包括他心中的最后一丝温情。“七月事变”发生后，列宁并没有被捕，而是退到彼得格勒与芬兰交界处拉兹利夫湖畔的一个草棚里潜伏下来，也就是在那里，列宁以大梦初醒、孤注一掷的心态，开始撰写著名的《国家与革命》。在书中，他这样简明扼要地指出：既然“一战”的实质就是“剥夺积累”，就是对战败国的资产进行彻底的剥夺和廉价拍卖，这当然就包括剥夺战败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内，那么，无产阶级何不干脆事先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呢？为什么还要坐以待毙、等待战胜国来剥夺这些财产呢？事实是：巴黎公社没有剥夺法兰西银行，这就等于没有剥夺普鲁士从法国那里攫取的财产。

无产阶级夺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而不让它成为战胜国的战利品，这难道有错吗？这难道不是既保卫国家财产，同时又保卫私有财产吗？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无产阶级高效地组织和管理一个混乱国家的能力，这种民主的效率与它的廉价是相联系的，而无产阶级政权之所以看起来要“廉价”一点儿，无非因为它是多数人管理少数人，是人民之间互相监督，是发动人民自己负起责任来，这比少数人镇压多数人要省力、要经济有效得多。

如果说，19世纪新生的无产阶级还需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从而听任资产阶级掌握上层建筑，自己甘当“经济基础”，那么在20世纪，无产阶级已经不需要这种“合作”，它也不可能再奢求这种“合作”。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这个经济基础已完全可以直接决定和领导上层建筑了。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绝不是指什么普选，绝不是指什么史上最廉价、最廉洁的政府，而是指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它掌握的国家机器，残酷无情地镇压和剥夺资产阶级。这同时意味着，以这样的方式，将国家财产、劳动者的财产从帝国主义的剥夺中拯救出来。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确实需要一个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也不应由巴黎公社那些拿着普通工人工资而尽说空话的人民代表们构成。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固然需要议会，需要“委员会”，那种取消无产阶级议会的说法，也就等于是取消民主。但是，无产阶级的议会和委员会绝不是一个“讨论机构”，绝不是一个“议而不决”的机构，它不是说“空话”的机构，而是“形成决议”的机构，而且，决议一旦形成，就必须雷厉风行地执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和委员会是行动机构、是办事机构，它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是合一的。而一切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却是：它只是说空话的“橡皮图章”，它不办实事，或者根本就不办事。

不能形成决议的讨论就不是讨论，而是扯皮；不能执行的决议也不是决议，而是一纸空文，若要执行，就必须把权力交给执行者，这就是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所谓无产阶级议会和委员会的实质。因此，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24小时都手握暴力的“全国肃反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不是“契约”，而是“契卡”。

他说：

>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注]

列宁绝非政治浪漫主义者，尽管他也绝非铁石心肠。因为他明白一切政治契约都是有代价的，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说：暴民政治、“多数人的暴政”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代价，因为它需要一个资产阶级强政府来应对它（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镇压它），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就需要加税、需要发债，以此来养活大量的官吏、警察和常备军，以此来养活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且这一过程永无尽头。因此，列宁方才指出，如果我们肯“倒过来思考问题”，即按照人民互相监督的方式来统治，那么相对而言，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要小得多，社会承受的痛苦也要减轻许多：“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注]从管理学的角度说，俄国的政权之所以代价高昂，就是因为一小撮儿统治者处心积虑地对付如此辽阔国土上的庞大群众，最终必然是力不从心、土崩瓦解——而这个道理，则是从列宁视死如归的革命生涯中总结出来的。

当然，“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这也是有代价的，只不过代价会相对小一点儿而已。而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起来，政治之所以是没有代价的，就是因为它是抽象的理论，就是因为它里面的人是抽象

的，是“没有肉身的灵魂”，因此，卢梭所谓的“缔约”也就成了开“神仙会”，从乌有中来，又归于乌有去。而这也就是黑格尔对于卢梭的批判。实际上，正是黑格尔把“时间”和“空间”引入了政治理论，在黑格尔看来，一个政权存在的理由，一个政权的功能，绝不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永无止境地缔约和制定计划，绝不是“以开会落实开会、以契约落实契约、以文件落实文件”。作为一个政权，或者说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一个“政权”，就是因为它明白，它自己要做的事情起码是搞清楚自己管理的领土究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而这样的领土和人口方才构成了现实政治的基础，它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统治，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政治含义。

同样的道理，我们之所以要这样说，相对于列宁而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是抽象的，原因是：马克思的专政对象“资产阶级”还近乎一个概念——抽象的“世界资产阶级”；而列宁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现实的资产阶级——以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暴力为后盾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尽管他们是“少数”，但列宁首先要考虑的，却依然是他们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他们手里掌握着何种资源，由多少军队、警察构成，有多少是在现实世界作威作福的，还有多少是隐藏在地下出谋划策的。而革命家之所以必须小心谨慎地计算这一切，绝不是为了研究和著述，而是为了设置相应的机构去对付他们——直白地说就是与他们进行铁血斗争，去剥夺他们。因为对俄国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不被无产阶级的国家剥夺，也会被帝国主义的金融垄断剥夺。

仔细认真地估算自己手里的家当和对手手里的家当，这是一切合格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因此，列宁方才把黑格尔哲学称为“革命的代数学”。

马克思说，巴黎公社方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但列宁却说，要把剥削者改造成劳动者、把他们改造成普通老百姓的“兄弟”，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且，只靠开会、写文章、说

服教育是根本不行的。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一个人民自我管理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说：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当然存在剥夺，存在压迫和不公正，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这却是劳动者剥夺压迫资本家，对少数人而言，它当然是不公正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却是相对公正的。列宁还说：社会主义，它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好制度，但是，它却是有史以来最不坏的制度，尤其对于当时的俄国而言，更是如此。

多年之后，丘吉尔曾模仿列宁的腔调这样为资本主义辩护：资本主义恰是这样一个“最不坏的制度”。他还说：俄国最大的不幸便是列宁的降生，而比列宁降生更不幸的，则是列宁的逝世，因为是斯大林接替了他。

不过，当丘吉尔说这些风凉话的时候，他也许忘记了：如果没有他所谓“无恶不作”的斯大林（其实丘吉尔自己干的坏事也并不少），英国就很可能在“二战”中被德国灭亡，而丘吉尔自己也许会被扔进希特勒的焚尸炉，化作一缕青烟随风而去。

关于现代世界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说的假话，一定比斯大林说的要多得多，其中包括他们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占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数万犹太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盟军而不是斯大林指挥的苏联红军。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失败者所写的悼词，因为资产阶级的残暴出乎马克思的意料，马克思的悲愤方才格外溢于言表，马克思以充满正义感的语言对资产阶级的残暴进行了控诉，以致他出离愤怒、情绪失控，使文章的有些段落沦为了谩骂。例如，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马克思对梯也尔、第三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茹尔·法夫尔、财政部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巴黎市长茹尔·费里的下贱人格大肆曝光，连他们包养

情妇、伪造文书乃至他们究竟有多少私生子都逐一列举，这在马克思的论战文章中是极其少见的。它起码表明，在巴黎公社之后，无产者与资产者最后一丝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而与《法兰西内战》相比，《国家与革命》方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个堂堂正正的“宣言”，列宁就是无产阶级的马基雅维利。众所周知，马基雅维利关心的并不是政治理论，而是政治实践。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此前的君主们是依靠人们的“迷信”而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但此后的君主却要依靠切实的实力稳固自己的地位，即他必须靠“政治算术”“政治科学”来进行统治——统治的合法性要能够通过数量和质量的精密计算才行；此前的君主需要统治人们的灵魂，而此后，君主则需要管理人们的肉身；此前，王权与神权的合一构成了君主的形象，而此后，支持者数量和领土面积的合一，方才构成了“新君主”的形象。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20世纪的《君主论》，而这个“新君主”当然就是指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新君主”，布尔什维克党行动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政治行动的效率与代价，是组织的严密和高效，一言以蔽之：是政治的有效性，而这也就是所谓“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

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列宁仔细研究了彼得格勒的地图，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兵营，都经过他的仔细计算和分析，在起义发生之前，革命已经在他脑子里反复进行了好几遍了。

最通俗地说，《法兰西内战》就是失败者对镇压者的抗议，就是通俗的所谓“你打我，我便骂你”；而《国家与革命》则是执政者的文告（虽然写作此文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执政），其中充满了“勿谓言之不预也”的誓词。特别是，列宁这样理直气壮地预告说：共产党人将以无情的暴力来回击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反抗，其中甚至也包括无情地反击对劳动者的任何挑衅和谩骂，无产阶级不但善于摧毁旧世界，它还必须学会管理、创造一个新世界。

不仅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暴力，无产阶级的统治也无法回避暴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从列宁主义诞生以来，无产阶级就不再是被压迫者，而成为剥夺者；无产阶级不再仅仅是暴力的受害者，而成为暴力本身；无产阶级不再是被同情的对象，而是被恐惧的对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历史，从此一去不返了。

如果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先知，那么，列宁就是社会主义的“恺撒”，正如毛泽东被称为“秦始皇”。因为正是他们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魄，将无产阶级在思想和组织上严密地凝聚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实体，一举结束了空前的战争与动乱，并以霹雳般的手段重整乾坤，把社会主义的新秩序送到了人间。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注

---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 原名Gerbillon Jean Franois，法国人，清朝康熙年间来华的传教士。
3. 原名Joachim Bouvet，法国人，清朝康熙年间来华的传教士。
4. 季正矩. 列宁传[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9–20.
5.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6. 参见艾德蒙·威尔森. 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M]. 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451.
7.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3–604.
8.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9. 列宁.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318.

10. 列宁.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5.

1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539.

12.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9.

13.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0.

14. “唯一的可能性是中国正在着手进行的，从本质上而言相当于原始积累的大规模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将会激起相当速度的经济增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能够吸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资本盈余。这种假设必须建立在这一过程不会在中国引发反革命的基础之上。”（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67.）

15.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7.

16.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5.

17.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18.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19. 陈平. 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2）.

20.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383.

21. 不仅巴黎公社被称为世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而苏联则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1871年的普法战争既是巴黎公社运动的起因，也埋下了“一战”的火种，而十月革命则是“一战”的产物。

22.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96.

23.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96.

24.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8.

25.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26.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1.

27. 列宁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像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M]//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4.]

28.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1–202.

29.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2.

30. 列宁.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M]//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2.

31. 列宁.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M]//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53–354.

32. 列宁.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M]//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0.

33. 列宁.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M]//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0.

34. 列宁.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M]//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5.

35. 列宁. 怎么办？[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9.

36. 列宁. 国家与革命[M]//列宁.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2.

37. 毛泽东.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M]//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61.

# 第六章<br>马克思与毛泽东

## 马克思、毛泽东与“中国道路”

>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
> ——毛泽东

马克思是怎样观察中国与亚洲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

马克思最杰出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未完成的。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巨著的写作计划和提纲，共分为6个部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根据这个提纲，《资本论》只是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分（资本），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则一直在尝试着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

概括地说，从马克思自己制订的写作计划来看，他曾经设想从“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农民入手，以编年史的方式展开他的论述，而不是从抽象的资本理论开始。

“土地所有制”，原本是马克思设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巨著

的开篇，而“资本”只是一个导论。

实际上，自1852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规模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非常可惜的是，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他的叙述，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一般结构。

而这是由马克思伟大的严谨所决定的。在开始工作之前，马克思总是希望最全面地占有研究资料，从而进行最彻底的思考。虽说在人们眼里，马克思的全面与彻底是无与伦比的，但在马克思自己看来，依然还不充分、依然还远远不够。

正是在他的第一个写作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这个问题。

马克思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原本计划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从亚洲和中国展开，而结果却变成《资本论》讲到的680个人物中，只提到了一个中国人王茂荫。王茂阴提出国家向商人（徽商）借款、由商人来管理货币发行的主张，但他的主张被皇帝否绝了。

这个唯一的例子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马克思借此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货币？货币究竟是衡量劳动的尺度，还是衡量政府债务的尺度？由此，马克思展开了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关于货币理论的思考——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深刻思考。

为了阐述马克思的思考，我们不妨从最直观的、今天大家都熟悉的例子说起。众所周知，美元纸币上写着一句话：“这张钞票是所有公共与私人债务的合法清偿手段。”这意味着，美元是支付债务的信用工具，而且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共债务（来自普通纳税人），一部分是私人债务（来自金融集团）。可见，正如英镑建立在英国政府对

于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债务的基础上一样，美元建立在美国政府对于美联储债务的基础上。

美元不是衡量劳动的工具，它本质上是债务工具——不但是美元，几乎所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都是如此。美元和英镑这种货币，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理解的“货币”大相径庭。

马克思认为，由控制商品交换的商人，向控制货币投资的资本家这关键的一跃，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产生的关键。而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一步，在中国却受到抵制？

王茂荫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

而且在中国，一般而言，国家只有公共债务（表现为税收），而没有私人债务。大的财团不能掌握、支配国家财政，也不能包办货币发行。在中国，商人就是商人，而不是掌握国家财政和金融命运的资本家。于是，正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欧，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尺度。因此，只有中国才有比较典型的商品经济。而西欧和美国由于货币是债务工具且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以，它们并没有中国那种商品经济，有的只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个例子表明，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研究、思考和了解达到了怎样深入细致的地步。

与通常的理解不同，马克思的“中国意识”是极为深刻且独特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开始他关于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呢？他为什么选择先从历史的角度、从欧洲外部，而不是从内部去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呢？

简而言之，这首先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反常的、变态的，而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常性只有从欧洲外部、从世界史的视野，才能被更直观地看到。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在货币经济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在那里，只有“货币劳动者”和“货币拥有者”，而没有真正的劳动者和“财富拥有者”。换句话说，在那里，人们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完善（本质力量的发挥）而劳动，而是为了追求货币而劳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货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为对于货币经济的理解取决于对“货币”的理解：一种是把货币理解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另一种则是把货币理解为衡量债务的尺度。而只有第二种，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基于这样的区分，马克思才把亚当·斯密著名的公式——“商品—货币—商品”改造为“货币—商品—货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信用的垄断者——资本家。

马克思接着指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货币，而首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同体成员”。“在那里，每个人都不把自己当作货币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货币所有者和共同体的成员。人们劳动，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

为了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列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他说，为了建造和维护公共灌溉工程和水利交通枢纽（黄河河运、大运河漕运）而劳动，这是中国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公共工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土地私有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土地是建立在公共灌溉和公共交通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强调，正是在投身于公共工程的过程中，农民才得以成为“公民”，即国家的一员。

马克思是在亚细亚、日耳曼、资本主义三种生产方式的比较中，建立起他的社会经济理论的。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封建）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的“封建”，意思是“封疆土、建诸侯”。而马克思认为“feudal”特指日耳曼生产方式。那么，什么是“feudal”（日耳曼生产方式）呢？举个形象点儿的例子来说，日耳曼统治者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略者一样，住在城市据点和碉堡里，并在那里对广大的农村进行统治。正是日耳曼生产方式，在历史上首次展现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城市市民”与“农村公民”之间的对立。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城市市民才垄断了“公民”一词，而广大的农民则从“公民”中被开除出去。

实际上，在希腊和罗马，人们也是因为拥有共同土地而成为公民。希腊和罗马的“公民”，起初指的也是武装起来的农民。

马克思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断裂就是由日耳曼民族的入侵造成的。作为游牧民族，日耳曼生产方式下的农民既不当兵，也不会种地，而只是依靠城市堡垒和据点，通过征税和手工业生产与农村进行“交换”。在日耳曼时期——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围绕定居点得以重建，这种定居点逐步扩大为城市——占领者只把定居点里的居民视为“公民”。于是马克思说：“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

马克思说，资本的原意是“头”，它起初的意思就是“人头税”。

城市是中世纪的产物。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日耳曼生产方式的特点，而这又是由军事占领造成的。

正是日耳曼生产方式造成了契约式的统治，所谓“feudal contract”（封建契约）的实质是：农民通过提供劳动产品以换取领主的保护。农民不再承担军事任务，因此不再是政治力量和政治性的“公民”，而是沦为纯粹的生产者与交换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与交换成为支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只是从这一刻才正式开始。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从中世纪“生产与交换的契约制度”中发展而来的、具有“抽象性”的剥夺形式。

于是，随着日耳曼民族的入侵，西方的古代就结束了。因为随着税收和城市手工业的兴起，货币交换发展起来了。而为了巩固共同体进行的交往——馈赠，先是被契约交换，随后逐步被殖民主义和国际贸易所替代。

马克思极为深刻的创见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日耳曼生产方式——“feudal”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交换中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只有在“feudal”这种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中，才能产生西欧式的资本主义。而从中国的“封建”中以及希腊和罗马制度中，都是不可能产生西欧那种资本主义的。尽管中国一直拥有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罗马也并不缺乏布鲁土斯这种最精明的放债人。

于是，马克思的问题是：在欧洲，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是日尔曼民族入侵带来的东西，欧洲没能抵抗它，而至于亚洲能否抵抗住入侵，以及在这种抵抗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这才是世界经济史的“大分流”。

马克思认为，这种分流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关于鸦片战争，他这

样说："所谓的文明人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而所谓野蛮人则是为了维护共同体——这是历史的悲剧。"加州史学派的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一书，实际上就是沿着马克思的这种思路继续思考。

借此，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欧洲，从什么时候开始土地被当成牧场，农民从国家、国家公民中被开除出去？市民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怎样代替了农民的"国家公民"地位？欧洲的农民，随后就是工人阶级，是如何失掉了这样的地位？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前史。实际上，卢梭和尼采对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与马克思的上述思路是一致的。在他们的观点里，古代的终结，意味着蛮族入侵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最终使失地的农民大量沦为无产阶级。

可见，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土地所有制"，这些原本就是马克思所思考并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农民通过土地革命重获国家公民地位，这种"反日耳曼化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有当这种可能性完全丧失了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完全被"日耳曼化"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才会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运动。

但是，绝大多数马克思的追随者，却完全没有马克思这样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视野。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斯大林，以及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派。那些人不但是不同程度上的西方中心论者，而且他们很少思考：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日耳曼化的欧洲"，而非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欧洲。欧洲的居民已经是接受了基督教的"蛮族"，而原来的欧洲和"欧洲人"都已经不存在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比较了古代与现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哪一种土地财产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的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社会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
>
>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
>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看来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注)

农民因与土地分离而沦为无产阶级，这是异化劳动的开始。在欧洲，这种异化劳动是由日尔曼统治造成的，但这也正是日尔曼与亚细亚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

路易·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思想曾发生过断裂，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只是讲人的异化，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不再讲抽象的人，而是讲生产的人、劳动的人。马克思后期不再讲人的异化，而是讲劳动的人怎样受剥削。

改革开放之初，周扬与胡乔木论战，其实也是重复争论这个问题。

但是，只要读过马克思的书就会知道：马克思并非只是前期讲异化，后期就不再讲异化了。他后期讲劳动者不得不被剥削、“心甘情愿被剥削”，当然就是讲“劳动者的异化”。

马克思一辈子实际上都在讲异化，他所谓“人的异化”是在哲学层面上讲的；而他讲劳动者被剥削，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的。前后一致，根本就无所谓断裂。

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断裂其实发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那时他举家逃亡英国，在大英博物馆，他看到了大量的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说自己的时间都被“亚洲问题”占去了。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请他就亚洲问题写了一系列的专栏文章，前后有数百篇。从那时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亚洲了。

“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专制落后的代名词。要说转向，从研究欧洲到研究亚洲，才是马克思一次真正的、伟大的转向，但也是一次没有被后人察觉的转向。

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认为，只有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以及欧洲内部的革命，才是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力量。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才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向。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备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在力量。因此，从1852年起，马克思便开始全力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1850年），金田起义爆发。马克思极为兴奋，他立即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提出了著名的“两极相联”定理，即中国革命，将决定欧洲与世界的命运。

以太平天国运动为开端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这样，成为对马克思特立独行的思考的回应。

对马克思来说，是金田起义一声呐喊，给欧洲和世界送来了革命。而率先提出“中国道路改变世界”的人，就是马克思。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其中一幅浮雕，描绘了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金田起义，而这种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就是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那里来的。

对于亚洲问题，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研究，列宁虽然基于当时欧洲革命的失败，转而提出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这一论断，但是，斯大林在随后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中，却简单地以5种社会形态发展论混淆了“封建”与“feudal”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他把中国定义为封建社会，而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绝对落后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注意过马克思后期，即写作《资本论》之前发生的重要转向。他们都没有研究过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潜力，他们也都没有思考过马克思于1852年指出的那个问题：要避免资本主义化，首先必须避免“日耳曼化”。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有一场反“日耳曼化”的土地革命。

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工人革命，与农村和农民没有关系；社会主义只有欧洲能搞，而亚洲根本搞不了。

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有西方。

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唐宋之变”——以农业和江南农村的发展推动城市化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是

把城市化建立在摧毁农村的基础上。正是这一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今天的巴西、印度、南非都存在大量的失地农民，而中国至今尚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毛泽东使中国避免了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西欧把其他民族作为自身资本积累的肥料，但毛泽东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使中国免于成为西欧发展的牺牲品。他以包纳56个民族的“天下”制度，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共产党的长征走过了苗、藏、回、蒙地区。中国革命是动员少数民族一起革命，中国革命的两个动力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因此，毛泽东的革命不是同盟会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是重建多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国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分裂与解体，而是将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原因就在这里。

曾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内亚洲边疆》中说，蒋介石通过掠夺边疆来完成内地的积累，他的政策是“次帝国主义”。而毛泽东则是发动边疆和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城市掠夺农村、沿海掠夺边疆的“蒋介石式现代化”只能造成中国分裂，而只有毛泽东才能使少数民族重新认同中国，因为少数民族所认同的现代中国，是革命的中国。

斯大林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要给资产阶级帮忙，不要添乱。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建立的，就是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

但是，中国的革命并没有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没有走民族国家从“帝国”中分离出来的道路。不但共产党的革命不是这样，孙中山的革命也不是这样。

孙中山的革命——乃至康有为的“保国保皇”，他们所依靠的都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而是海外华人华侨。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是明代郑和航海结束后闽粤地区民间航海的产物。由于明清的海禁政策，这一部分人成为海外的“弃民”。这部分人从历史上说，也包括清朝初期的内、外三藩势力，即由南明的福王、桂王、鲁王（内三藩）以及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外三藩）所代表的势力，而台湾问题也是这段历史的产物。郑芝龙是鲁王的部下，而安平郡王就是南明桂王封的。

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一个被视为“弃民”的海外华人回归中国、参与现代中国建设与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更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得以继续。海外华人华侨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所能概括的，他们用血汗钱支持孙中山，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一种确认自己属于中国共同体的行为。

海外华人华侨与现代中国建设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表明，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不是海外华人的离心过程，而是海外华人通过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得以不断回归中华的过程。香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

同样地，毛泽东的革命，也是动员中国边疆各民族参与现代建国的过程。革命没有造成中国的瓦解，而是加强了中国的大一统——这是现代建国道路中的一个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现代外交思想，是从清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即不是建立强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维护弱小民族的权力，这就是所谓“资小，大国之仁，伐交，上国之智”。

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日本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而中国革命的目标则是联合亚洲和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是伸张天下公道。这也就是孙中山所谓的“王道”与西方之“霸道”的区别。正是基于此，孙中山提出了亚洲的联合以及大亚洲的思想，以与日本的脱亚论抗衡。

孙中山先生于民国13年（1924年）11月28日应邀向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有关“大亚洲主义”的专题学术演讲，其精义为：“大亚洲主义”，是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众为和平解放的文化。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由日本国民详审慎择。

正像在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大菩萨”一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也被称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中国“王道”和天下思想的继承。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体现的就是“大国之仁”“上国之智”。孙中山和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遗产，对于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离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了解，离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日耳曼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比较，谈中国传统、西方传统，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

思考、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谈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也势必会沦为空疏之谈。

## 大地与革命

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

“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注]从那时起，不但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于此）。与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以及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相伴随的，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以及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

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与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的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创造并代表着现代科学技术变革的无产阶级，与开拓了“世界商品投资市场”的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矛盾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同时，由早期工匠和现代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现代工业文明，却日益被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和资产者盗取，并转而成为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必须强调

指出的还有：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和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剥夺与反剥夺的斗争。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是对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地区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则随着20世纪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9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所谓1％对99％，这已日益成为世界共识；第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与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第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

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都无法否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与“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作为“共同体”的意义，这是由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历史处境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利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更是指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国家更必须从被压迫人民中培养和造就出能够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型无产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封建旧文化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现代的、民族

的新文化以及新的民族认同。在反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在建设新社会的合作劳动中，中国人民在同甘共苦中形成的民族共识，是这种新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即卢梭所谓的“le peuple”），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早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先觉者们便已经认识到传统治理结构日渐失败的宿命。因此，从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到王夫之、顾炎武、康有为和梁启超，改造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便是1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泽东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孙中山等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革命与改革，但是，这些革命与改革都失败了，而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着由“宗法—科举—朝廷”这三重结构构成的传统体制，倘若仅仅将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对准上层朝廷，而不能触动中国的基层（宗法、士绅阶级），不能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或中坚（科举、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与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改造便也不能真正发生。

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首先就是因为它几乎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基层。长期垄断中国基层的士绅——胥吏阶级，被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社、队）取代——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

而当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场面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革”），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很难为一般读书人所理解，而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可能是知识分子中这样极少数的例外，即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正义性。钱学森曾经这样说：

>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注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进行社会再生产领域内的建设与改造，与单纯进行生产领域内反经济剥夺的革命相比较而言，前者任务远为艰巨。在缺乏欧洲那种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在欧美无产阶级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斗争也陷入了困境的历史条件下，力图在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育都很不成熟的大国的民众中，培养和造就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和造就一支强大的、有教养的无产阶级队伍，培养和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绝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

在披阅《南史》中梁武帝（萧衍）的故事时，毛泽东曾引罗隐诗叹

曰："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一举横扫蒋、美、日反动派如卷席，斯可谓"天地皆协力"；而在与中国社会的中层——士大夫阶级（及其现代产物）进行斗争时，毛泽东所面临的难局，当然绝非他要取消社会的中层和中坚力量（即某些人所谓要实现"扁平化管理"）。毛泽东所遭遇的挫折无非表明：摧毁旧社会的中层和中坚结构，与建立和再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中层结构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困难。而这首先要求对复兴现代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能力再次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泽东并非秦皇汉武，因为他创造的历史在"春秋"之外。中国旧的传统价值体系当然不能用以评价毛泽东，因为他领导的革命，其目标就在于摧毁中国奉行了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宗法—科举—朝廷，或者说是士绅—士大夫—王朝，而这一做法尤其因触及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而显得"激进"。

毛泽东晚年曾经这样给自己"盖棺论定"，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一，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豢养的国民党政权驱逐出中国大陆；其二，发动了"文革"。

就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当然还应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即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一举击溃了美国从那个方向对亚洲大陆的进攻。这是500年来，中国第一次针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当然，这也是亚洲大陆国家应对来自海洋的挑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而从世界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这次胜利的意义，还远未被我们认识到。

漫长的人类历史，曾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民族向周边扩张的历史，举凡蒙古、突厥、回鹘、女真、俄罗斯和汉民族，都曾经是欧亚大

陆上的主导民族，而欧亚大陆主导世界的大趋势，直到16世纪才被海洋文明的扩张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海洋战争的高度机动性，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和“外围”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孤悬大洋之中的美国，才从“边缘”出发，包围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时代”逆转了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世界史发展进程。

1904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只要欧亚大陆国家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将广阔的大陆空间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只要大陆国家能够避免来自海洋的攻击，并善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只要科技的进步可以为这种大陆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创制，那么大陆就可以战胜海洋，陆权就可以击溃海权，海洋支配大陆的时代也就会被终结——而他当时设想的现代科技方法就是铁路。麦金德预言说：无论德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欧亚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联系起来，只要它们联系起来，海洋时代就会被终结，海洋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将崩溃。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铁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乃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找到了一种政治和组织的方法，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宰割下分崩离析的中国大地重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被视为最封闭、最保守、最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国的黄土高原，重新崛起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发源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理论，当然，这也就是被列宁赞美的方法，即孙中山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

法，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战略。列宁说，这种方法是欧洲国家不能想象的，它体现了亚洲的先进性。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泽东关于南水北调、三线建设、铁路建设、十大关系的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依托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使得新中国这个“伟大的昆仑”重新崛起于世界。

卡尔·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中，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注]。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从空间秩序的视角来看，主权国家的概念乃是一个陆地性的观念。它是一个大陆性国家的概念。它只不过是那个世纪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发生的剧烈空间革命的许多后果中的一个……它没有碰到和涉及海洋。从海洋这个方面出发，那种国家的、封闭的、有疆界的空间观念的对立面才显现出来。那种自由的、也就是摆脱了某种国家空间秩序的束缚、国家疆界无法穿越的海洋，成为了权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空间观念。”[注]

因此，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海洋法”，其实质在于论证“自

由的海洋”攻击和突破“封闭的大陆”之正当性。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特别是以“海洋法”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背书。

第三，随着“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高度机动特点，即以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为目标，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

由于海洋战争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所以，从战争模式变迁的视野看，大兵团陆地作战的方式并不能适应和有效应对海洋战争体制，而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魏源看来，清王朝放弃了林则徐提议的武装沿海渔民、蛋户[注]对抗英军的方式，而是从西北调集大规模陆军兵团奔袭英军，这是鸦片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战略战术时，没有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这就是继承了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海战与陆战两种不同战争模式之差异的精彩分析。胡绳这样指出：

> 英国……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整一个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

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但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的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将陆地战争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论则把广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农民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开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泽东并不仅是像列宁那样，用中心—外围的世界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更以“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中国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革命，倒转了500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然而毛泽东深知，数千年的积习，500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场革命而最终改变，而且这场革命空前艰巨复杂，必然包含着诸多失误、挫折和灾难，但正是因为毛泽东面对失败的不屈不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漫长的革命”已经真正开始并不可逆转。

毛泽东当然希望，自己青年时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能够在他身后得以继续，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作《七律·洪都》的诗中，他曾豪情万丈地写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事业是否已经失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断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的红旗依然没有倒下，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泽东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没有完全落空，即“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如果这些中国人没有彻底失败，毛泽东就没有真正失败；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在失败中善于总结历史并坚持斗争，毛泽东的事业就依然还在继续。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一向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简单化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抽象教条和公式，而是力图恢复马克思那种综合性的视野，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多重因素彼此之间的矛盾作用，方才构成了社会运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指出，尽管从抽象的意义上说，经济和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现实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非可以截然分离，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两者都必须有其特定的环境和土壤，即经济和生产力只能在既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如果没有信用关系的发展、没有维护资本积累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专政，资本积累就不能发展，这意味着资本只能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进行积累，离开了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条件，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成熟均在工业革命之前，而工业革命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不仅仅意味着生产手段、劳动工具、物质条件，“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表现在：它始终将生产力发展的规模，限制在“资本收益最大化”这个束缚上。同样地，当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时，它也会历史性地对既定的生产力发生作用，改变生产力，培植并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

正是从社会构成和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政治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也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方式。例如，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5—1947年的中国，正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方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而意识形态之所以始终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场所，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劳动者），并为经济和政治的不同阶段的发展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因此，毛泽东强调，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和重点因之不同，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多元的矛盾，不能忽视矛盾的历史转化。正因为中国革命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社会革命，所以，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始终全面地考虑和把握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的长远发展，完全依赖于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们形成何种价值追求与价值取向，而如何使经济活动导向社会关系的平等和民主，这是毛泽东始终关心的问题。莫里斯·迈斯纳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比其他共产党国家都要好，而也正是对于社会平等和民主的追求，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

在一个历史极其悠久、情况极其复杂、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摆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并在多元矛盾和辩证法的视野下，历史地、具体地恢复马克思辩证综合分析社会各个因素的基本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尽管毛泽东晚年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决定作用，长期把阶级斗争作为“唯一的纲”，视其为党的工作的唯一重点，这显然违背了他自己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元一体的矛盾互动方才是构成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矛盾论学说，乃至酿成了“文革”这样严重的历史悲剧。但是，我们今天在“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不重视社会关系的调整，如果不

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建设，如果酿成严重的社会对立和促发严重的社会矛盾，那么，这也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那就恰恰意味着，我们没有真正从“文革”中汲取深刻教训。

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实践”的观点放在了首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是与现代无产阶级一起诞生的，举凡蒸汽机、火车和轮船，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都是无产阶级劳动实践的产物，而一旦科学和技术为资本家和“专家”所垄断，那么其发展就会受到根本的限制，并与劳动者相对立。因此，离开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劳动实践，就无所谓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根据这种历史教训，毛泽东方才强调：正如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实践一样，知识分子和专家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一切科学的观点都不能脱离现实，更不能脱离群众，离开了现实和群众的先进性是空想，离开了现实和群众的科学性是形而上学。与列宁和斯大林格外强调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的先进性作用不同，毛泽东认为，离开了基层的落实和群众的实践，离开了千百万人的创造性劳动，离开了“千千万万臭皮匠”，仅靠“专家”的“顶层设计”，任何工作都不能有效推动，科学技术也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先贤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毛泽东则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所谓“全心全意依靠群众”，乃是因为一切先进性离开了群众的实践都属画饼，都属于空想，甚至会适得其反，成为奴役群众的枷锁。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我们丢掉了

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泽东，不但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必然丧失思想的主体性，陷入知识上的虚无主义，其结果也必将是杀戮了中国的未来。

从毛泽东晚年的偏颇和错误中汲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一种偏颇走向另外一种偏颇，那就不是纠正错误，而是以新片面代替旧片面。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阐述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最精彩、精练的总结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它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平日袖手谈心性（尚空谈而鄙视实践）的痼疾，从而，中国共产党方才能够取代士大夫阶级，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中坚力量和政治干部来源。毛泽东一贯主张科学而反对儒学，这当然是因为儒学只是少数贵族阶级的无用之学，但是，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了科学，并不能将科学运用于现实并为劳动者的实践所发扬光大，那就不是毛泽东所谓的“科学的态度”，那样的科学和学术同样有害无益。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党脱离群众，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造福于最广大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就将在资本贪得无厌的无情剥夺下，不得不选择再次奋起革命。

邓小平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注]

将20世纪称为“革命的世纪”的霍布斯鲍姆，也把20世纪称为“短促的”。他说：20世纪以1914年“一战”的爆发推迟开始，又以苏联在1991

年的解体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1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霸权的确立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大转变，是“短促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深化和延续。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实践与想象似乎正在逐步丧失，而且，至今还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大规模复兴的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似乎退回到了19世纪那种资本无情掠夺世界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注]

毛泽东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抚今追昔，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的名言：

> 那个人在斗争中失败了。而他为之而斗争的成果，却在他失败的那一瞬间出现于历史的地平线，只不过是改换了名头而已。于是，后来者们将会根据新的、不同的历史条件，高举起他的旗帜，去继续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注]

## 战略与战术

>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
> ——毛泽东

毛泽东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正如列宁所

指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夺积累”，是这一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这种“剥夺积累”的方式需要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危机，而制造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不同，甚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同，毛泽东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激烈的战斗生涯中度过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警觉地注视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着祖国北方边疆和东南海疆的安危，晚年的毛泽东披阅《南史》，神游于南朝抗击北魏的大小战例之中，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直到晚年，作为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依然挥动历史巨手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泽东依然还在为捍卫他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这样预言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最为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用讲述“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分析。阅读毛泽东的著作，首先就会惊诧于他缜密、细致、高超、灵活、出神入化的战争艺术。但是，与一切纯粹的军事家完全不同，毛泽东始终是以“战术”为手段来描述和规划“战略”问题，而这正是他区别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和孙武的根本所在，当然，这也是他远超越于他自己手下的“十大元帅”并令他们心悦诚服之所在。在毛泽东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

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装备、兵力，乃至兵员素质，而是总体的形势和局势，是敌势、我势和地势，是国际和国内形势，是敌我双方乃至多方互动的态势；决定一个政党前途命运的，是对于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即“思想路线”和战略，而不是战术，不是打了几次胜仗、创造了多少GDP。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对帝国主义时代之政治实质的精准概括。从而，毛泽东为红军讲述的不仅是孙子兵法，不仅是克劳塞维茨，也不仅是苏联红军、中国红军的战争经验，尽管他表面上似乎是在细致、缜密地讲述军事、战争和战术问题，这些叙述还如此的令听众着迷，但实际上，毛泽东却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分析与讲述。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他把战争理论改造为哲学（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哲学”），把战士变成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听众。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解了这首战斗的诗篇，并请叶剑英亲自背诵辛弃疾的这篇《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以此，毛泽东寄希望在下一代人中能够产生一大批新的“孙仲谋”。而这就是毛泽东的方式，即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讲述战争的战术问题，心平气和地叙述历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小战例，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极其深刻地把哲学、政治和经济作为“经纬”贯穿其中。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像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一样，一介书生毛泽东完全白手起家，除了手中的一支笔之外，毛泽东本来什么都没有。1928年11月25日，在中国南方最为寒冷的时节，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一个叫作井冈山的地方，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缜密细致的报告，而

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当时的毛泽东，只不过是在中共湖南特委领导之下、小小的湘赣“边界特委”的前敌书记，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也很快被撤职了。在当时的中国，所谓“红军主力”不过是以国民党军队中的少数“叛军”为主体改编而成的，所谓“工农政权”也不过处于中国历史上人迹罕至、最偏僻狭窄的南方客家移民区，即存在于崇山峻岭之中。没有几个人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会取得全国胜利，包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人在内，而在80多年前能够科学地指出这一点的，只有毛泽东一人。

《井冈山的斗争》文风缜密细致、气势慷慨悲凉，作为一封向中央汇报和描述战地生涯的书信，它令人想起毛泽东的乡亲曾国藩的名文《克复金陵折》，而这两篇名文，都是以书信的方式讲述战争，以讲述战争的方式，来讲述人事沧桑、天下兴亡的道理。

“无湘乡，不成军”，正如他的湖南前辈曾国藩和左宗棠那样——以学问经世，从思想文化建军，待士卒如孺子、如子弟，与中国历史上一切依赖于士大夫精英的改革家不同，毛泽东转而依靠下层工农群众。但是，为了克服劳动者祖祖辈辈与文化相隔绝的状态，为了突破中国自春秋战国时代以降产生的文武分途、兵农分殊、将相分离、脑手分裂的痼疾，毛泽东这才发明了“战地书信”这种方式，从而把战争上升为学问，用思想来武装士兵，以战略来指导战术，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红军队伍改造为一所大学校。

80多年前的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延续了《井冈山的斗争》的风格，他撰写此信，本是为了回应红军将领林彪“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质疑。像一切杰出的军事家一样，林彪善于将军事理论建立在精密的战术分析之上，这正是他的“天才”之处；但是，与那些如林彪一样的人不同，毛泽东从来就是把战术分析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和战略视野之中。毛泽东曾因此批评林彪说：“他是个娃娃，懂个啥？”实际上，战略与战术，这是他们

毕生之根本分歧所在。

究竟应该重视战术，还是必须始终将战术分析纳入到“战略”的视野之中，纳入到国内、国际发展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和阶层不平等的结构视野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等人的观点从来都是截然相反的。

也就是在这篇书信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会存在、红军的斗争为什么会最终胜利、革命的高潮为什么会到来，这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问题，绝不是从单纯的战术角度以及单纯的军事角度能够看到的，因为这需要战略的视野，需要洞察世界发展不平衡、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这种总体性结构，因此，只有在“战略”的基础上，“战术”问题才能被观察和描述：

> 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做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

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注]

我们之所以要完整地引用毛泽东80多年前说过的这些话，不仅是因为这种综合性地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视野，这种针对国内外社会发展态势和规律进行战略分析的方法，对于我们分析、认识今天的世界局势依然有效，更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大发展，即一种“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重读这篇文章，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是如何用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这条联系着的“线”，一举串起了国内外的各个压迫结构和压迫性因素，同时，又如何用工人—农民—士兵—城市贫民—学生这另外一条“线”，串起了被压迫的结构和被压迫的阶层，而这两大结构织成的网络，则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地图”，即社会“网络”或者毛泽东后来所常说

的“纲”。

从根本上说，上述两大对立结构进行的是“零和博弈”，但是，正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本身的复杂性，正是结构中诸因素彼此作用形成的结构功能，使得两大对立结构之间的“零和博弈”得到了缓解——或者说：正是多元矛盾、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结构的运行具有了复杂性。因此，所谓“革命高潮”的必然性和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只有从这种结构的复杂性、功能性中才能得到认识。

于是，在毛泽东上述的战略分析中，战争、战术、“井冈山的斗争”这些东西统统都退隐到了后台，而浮出前台的，则是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国内矛盾结构的总体呈现，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处境与发展变化总体规律、总体结构的分析。

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在于帝国主义或者无产阶级这两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在于在这个复杂的“结构网络”中，“矛盾着的诸因素”是如何彼此联系、互相推动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也并不是源自其自身强大，而是源自其在这个结构中的支配地位，而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便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取胜，其关键在于如何“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与反动派“周旋”。

与简单的阶级对立不同，社会结构乃是一个多元矛盾因素彼此联系构成的“网络”，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纲”（或“罟”，即渔网），而这便是毛泽东的“社会结构视野”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同，也是毛泽东的创造性所在。

在毛泽东看来，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结构以及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结构，造成了反动派之间利益的不平衡，从而造成了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而这就造成几个帝国主义势力彼此争夺中国、瓜分中国的局面，同时，也就造成了它们各自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势力之间的剧烈矛盾和彼此混战。帝国主义的剥夺和国内统治者的妥协退让，又导致

赋税和地租加重、劳资矛盾加剧、社会瓦解、军阀混战、人民求生无路，从而使中国的每一个社会阶级、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使中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一种混乱状态之下”，从而，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日益深化。

中国革命究竟处于高潮还是低潮，这取决于对于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能从几次战役的胜负中看出。这就是毛泽东当年要告诉林彪的东西。

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经常把红色根据地比作“苏联”，而把中国比作“世界”。在他看来，尽管大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但是，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总体结构，却是完全相同的。苏联的存在与发展，与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一样，之所以是必然的，就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和阶层差别所造成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而且还在日益扩大）。同样地，中国的红色根据地之所以不会被灭绝，正如中国不会亡国一样，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简而言之，恰恰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中国，或者说，它们需要剥削和剥夺中国，即需要中国做它们的殖民地，做它们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基地和商品倾销国。

当然，这种剥夺也就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不过，它也正是中国不会被灭亡的前提，它更为中国人民的长期反抗与斗争提供了空间和回旋余地。故而，从前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命运是悲惨的，而从后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前途又是乐观的。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一个极其天才的发现，就是他在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文章中，重提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规律，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的这个发现加以根本改造，从而使其更加经典化、现实化、丰富化了。因为毛泽东所关注和描述的，并不是简单的“两极”，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和结构；不是主要矛盾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多元矛盾构成的结构本身

的运作功能。倘若没有这样一种“网络”，倘若社会不是这样一个多元矛盾、互相依存的结构，那么，所谓的“两极”便不能发挥作用，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结构，“两极”本身也就不能运行。

马克思这样指出：如果丧失了作为劳动力、原料基地和市场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危机，但是，一旦中国发展起来，一旦中国加入世界生产—销售的链条，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就会被“挤破”——这是马克思运用“两极相联”规律得出的洞见。但是，毛泽东则补充指出，从结构运行视野来看，显然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中国既不能灭亡，当然更不能发展起来，即对它们而言，中国存在的“最佳状态”，便是半独立的“依附”，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而与那样一种“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不同，当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准备，孤注一掷，妄图灭亡中国、妄图独霸中国利益的时候（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那样的情势之下），中国人民所遇到的危亡难局是空前的，但是，它却使得全中国人民结束内乱、一致对外，也使得国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独占，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高潮也随之到来。

由于中国这样大，各个地区的发展又是如此不平衡，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领土的企图便不可能实现，它最多只能占领几个战略要点而已，不过，也是由于这种不平衡，中国力图把各个地区的、各种分散的反抗力量迅速集中起来，这同样也非常困难。于是，正是“不平衡”结构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游击战争”而非“正面作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方才这样说：所谓“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是建立在清醒的战略分析之上，因此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开辟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从而突破了简单、僵化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毛泽东的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建

立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个总体结构的复杂认识基础之上，它强调的是整个结构自身的生成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个因素、某个阶级、某一种力量的“唯一决定作用”。因此，它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乐观论或者悲观论，超越了一般的中国“灭亡论”“崩溃论”，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速胜论”“崛起论”。

而那些如林彪一样的人之所以“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便悲观失望，就是因为他们的眼里只有战争，没有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眼里只有“井冈山”，而没有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总体结构分析，一句话——只有战术，并没有战略视野。于是，就“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因此，毛泽东方才这样告诫说：“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而“结构分析”之所以不等于简单的阶级决定论和生产力决定论，就是因为它揭示出：社会结构的活力和动力来自其中各个因素、各个阶层之间的互动，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所以能够获取领导能力，其关键就在于善于利用和运用结构本身的功能，利用结构运动所产生出的动力和活力，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自身的、一己的力量。

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均是极其重要的。例如，毛泽东不但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而且正是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共产党人把握整体结构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基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批判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部门垂直管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

争的发展模式。这种互相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发展模式，比简单的“市场竞争”模式要宽阔得多。

正因为不平衡，所以才有竞争；因为存在矛盾和竞争，方才有活力、有发展、有变化。而在这种互相促进和彼此竞争的关系中，毛泽东又格外重视沿海地区的发展，强调给予企业、地方更大的自主权，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积极主张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高度重视民主协商，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与鼓励基层和地方与中央部门竞争，他还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注]——所有这些主张，都成为发生在他身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南。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共产党、工业化等，都只能在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结构中存在和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深刻地认识结构中诸因素之间的彼此制约和多元矛盾的互动。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在许多方面落实得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在他指出的某些方面，例如“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保护“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方面，落实得就是不好的，或者说是不那么好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经济产业结构，正是上述结构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造成了根本的限制。而今天的有些人却往往只是在战术的意义上理解市场经济，而非在战略的意义上理解市场经济，即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往往完全离开了整个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实际，不免流于形而上学和一厢情愿。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机遇，正是由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结构造成的。以当前的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之间之所以在短期之内并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之所以是大趋势，中美关系总体来说之所以是“乐观的”，按照毛泽东式的分析，就是因为美国需要中国——更直白地说，就是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最大的“世界工

厂”。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美国的金融资本如果不能与中国的制造业相联系，它也就无法“变现”，即无法实现剩余价值。今天，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对象，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已经说明了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个结构之要害。

因此，中美军事冲突、“中国崩溃”之所以不会发生，除了中国自身日益强大这个内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这个外因就是：“中国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集团的根本利益。

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阴暗的一面、悲观的一面、危机的一面同样也是存在着的。而倘若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长远的眼光，也就是缺乏战略的视野。

所谓阴暗的、悲观的和危机的一面就是指：当今世界经济产业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已经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与“去工业化”相伴随的，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和高科技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在这个“新结构”中，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已经日益成为世界新型经济产业结构中的低端。随着大量美国金融资本涌入中国，随着中国日益受制于“世界工厂”这个紧箍咒，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势必日益凸显；随着大量西方企业离岸进入中国，随着外国资本大规模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与“输入型通货膨胀”相伴发生的，便是“输入型劳资矛盾”的日益激化，即激烈的劳资矛盾也随着外资的进入而输入到中国来了。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矛盾原本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劳动者与资方的矛盾；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又常常扮演着“招商引资”的角色，结果在今日之中国，这种矛盾便往往表现为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它势必日益危及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感召力。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结构，导致了资本“过度积累”方式的发

生，即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列宁、卢森堡都已经详细地论述过了，但从毛泽东的视野看去，资本“过度积累”，也正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国区域差别、贫富差别产生的真正基础与根源。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首先就要深刻把握这个基本规律，特别是认清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

如果从短期视野看去，恰恰是这种差别和不平衡的存在，方才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和增长的机遇，比如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只有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而这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存在着相应的区域差别，因此，过剩资本和过剩产业，便可以向中国中西部和内陆转移与流动。

但是，从长期来看，或从战略的视野来看，这种资本“过度积累”模式的发展和增长，如果不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区域差别、贫富差别，它起码也与这种差别的扩大相伴随，而这就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双向的进程”，其中财富的扩大与贫困的增长、资本的扩张与矛盾的激化乃是同步进行的。

概括起来说：如果从短期的视野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态势似乎是乐观的，即以毛泽东的语言来说，从短期的视野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高潮，而不是低潮。不过，如果从长期的视野来看，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压力日益沉重，社会矛盾、阶层矛盾日益凸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长期的视野来看，“过度积累”的方式最终会掏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甚至也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是内因，即依靠的是中国自身凝聚力的日益强大，但是，目前的这样一种资本“过度积累”的发展方式，却从各个方面瓦解着中国的内在凝聚力，使得中国的发展与增长越来越依附于外部资本（特别是依附于美国资本）。故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对这种发展模式做出根本性的调整，那么，中国的前途便是非常不乐观的，即一方

面是中国为世界资本主义结构贡献了活力，但另一方面却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把“熵”，即发展的代价转移到了中国。如果没有这种结构性的视野，如果没有看到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而仅仅是满足于“世界打工者”的地位，那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发展战略。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变，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没有变，“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有了不同形式的发展。像当年在马背上颠簸、在战火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革命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所面对的问题同样在于：面对“敌强我弱”“西强我弱”这一总体态势，我们究竟有无可能、有无能力、有无信心和决心，将这种战术上的总体“被动”，逐步地、自觉地转化为战略上的日益“主动”。

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

从毛泽东的战略视野来分析和观察当前的形势，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基本判断呢？所谓基本判断，其实无非是好和坏两种，无非短期的形势与长期的形势这两类。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还会持续，这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这种“过度积累”造成的阶段性结果，因此，对于这个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应该有比较充分的估计。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造成劳动者地位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家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下降，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这种资本的“过度积累”方式将掏空中国，将瓦解中国的内在凝聚力，将造成中国的发展完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丧失自主性。

“长期性”与“短期性”之间的矛盾，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战术性的调整，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我们想要破解当下和未来困局，想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就需要重拾毛泽东的战略。

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我们会从“毛泽东战略”中发现如下法宝——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如何变战术上的被动为战略上的主动。

如果把资本“过度积累”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视为一场激烈的战争，那么，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场战争也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注]。

“毛泽东战略”对于中国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变战术被动为战略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即不但要引资，还要出去投资，以打乱世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内部结构，特别是敢于在国外建立自己发展的根据地。

第二，善于利用结构自身的矛盾，特别是善于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并积极地把这些矛盾转化为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因素。

第三，“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东南沿海加工贸易已呈强弩之末的态势下，必须果断地将发展的重点放到中西部去，把“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中西部丰富的资源走新型产业化道路。

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实践提高到了“路线”的层次，我们的事业因此有了胜利的保障。保罗·柯文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指毛泽东对于世界结构的分析，因为他能够用一条线串起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又用另外一条线串起被压迫的力量，并调动整个结构的功能为己所用，不断地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而这就是所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文风之中。毛泽东的文章，其标题往往就是纲领，是眼睛、是灵魂、是旗帜，而“要目”叙述的则是各个因素之间的彼此制约和运动，并使这种运动服务于“纲”。

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继承并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风，即路线是纲、纲目相继、纲举目张。

战略是纲，是思想路线，是规律性的东西；战术是目，是叙述和体现纲的东西，是围绕着纲而展开的东西。

但是，结构、网络，或者说“纲”本身却是看不见的东西，能够看见的只是现实中的各个具体因素。所谓“结构的能力”，便是指把具体的东西串起来思考的能力，而把这些具体因素串起来的那条线，也就是“路线”。

毛泽东指出：

>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

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注

这里的“用心去想一想”，就是要求把战术的东西“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就是指思想路线的形成，是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

毛泽东关于战略与战术、纲举目张的思想，深刻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对今天的我们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异常繁重，保民生、促和谐，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要求日渐迫切。为了使全党同志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避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热锅上的蚂蚁”的事务主义，就必须注意在“务实”的同时“务虚”，必须注意始终抓住党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这个主题与主线，必须强化那种把各种社会因素“串起来”的思考能力。

毫无疑问，修桥补路、招商引资、拉家常、送温暖，这些当然都极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事务性的，如果干部变成了“救火队”，每日处于“热锅上的蚂蚁”的状态，如果不是将各种因素串起来思考，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长此以往，思想混乱和方向迷茫就会产生，这种混乱和迷茫就会加剧队伍的疲于奔命。而队伍的疲于奔命，又将导致思想混乱和方向迷茫的进一步加剧，如此恶性循环，党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前进的任务。

所谓“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谓“路线是个纲”，就是指用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把国内外各种因素串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和路线图，并不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服务。

## 士大夫与政党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200多年前，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现代社会的兴起，是同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和不平等相联系的。

首先是城乡分化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城市商人之间的分化。亲身经历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三农问题”的卢梭，这样记录了当时法国的农民、农业状况：

> 随着工业和艺术的繁荣，被人瞧不起的农民，担负着维持社会生活所需的苛捐杂税，因此注定要辛苦劳作却得不到温饱，于是他们只好离开农田，涌向城市去挣应由他们提供的面包。都市生活的繁华越是令人羡慕得目瞪口呆，人们就越是应该悲叹乡村十室九空、农田大片荒芜、大路上到处是沦为乞丐和强盗的苦难市民的那种景象，而这些苦难中的人注定某一天要在残酷的刑罚中或穷困潦倒中了结其一生。国家就是这样一面富裕起来，一面又国力衰微，人口减少。注

卢梭对于城乡分化、农民与商人之间分化的精彩描述，是对以魁奈

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的深刻表达（对这种描述，今天的中国读者并不会感到陌生），而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经济学家”的魁奈，在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农业劳动者”条目时，更区分了“劳动产品”与“金银”之间的区别。他指出，“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在于积累金银，而非劳动产品，这就破坏了生产活动，并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能力：

> 货币交易只会在一种象征物中引起波动，而这种象征物本身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只有土地才能提供真正的财富，它每年的更新保证了国家固定的，不受舆论影响的，可以看得见的岁入。注
>
> 在商业繁荣后面接踵而来的，往往就是帝国的衰落。当一个国家把从商业中赚来的钱花在奢侈品上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只是货币的流通，而不是财富的真正增加。过剩产品的销售富了国王和他的臣属们。我们土地的产品必须成为制造业的基本原料和商业的对象，任何不以此为基础的其他类型的商业，都是靠不住的。在一个王国里，这种商业越是诱使人们生活奢靡，就越会促使邻国仿效，并会使更多的人分沾。而在农业方面，对于一个土地肥沃的王国，那些没有这种条件的其他国家是无法模仿的。然而，要想从此中获利，我们就必须克服那些使田园荒芜的原因，这就是财富向大城市的集中。所有的贵族和富人，所有那些能够靠年金或补助金过舒服日子的人，都住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里，在那里，他们差不多把这个王国从土地所得的岁入都挥霍光了。这种花销吸引了成倍增加的商人、工匠、佣人和劳工；人力和财力的这种有害的分配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它扩展得太快了，如果我们在乡下公民和居民之间，开始给予前者以更多的保护，可能会大大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在乡下保证人们得到这种好处，那么，那里的人口按比例也不会比城市少。城市居民的生活既不富裕，也不舒适。乡下自有它的资财和动人之处，人们离开那里只是为了躲避让人烦恼的事。然而，政府是可以克服这些不利之处的。看来商业在城市里很发达，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富有的商人。但是，除了把王国内几

> 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一种并不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上之外，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注]

实际上，卢梭对学术与科学的消极态度，是与“重农学派”重视生产和劳动产品的取向完全一致的。他说：“从社会及其所造成的奢侈生活中，诞生了艺术、工艺、商业、文学以及所有那些使工业繁荣兴旺的无用之物，富了国家，也亡了国家。亡国的原因很简单。由农业的性质很容易看出，它是赢利最少的技艺，因为农产品人人都离不了，所以价格就必须定得让最穷的人都能买得起。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推出一种规律，即一般说来，技艺的获利与其有用性成反比。最必需的技艺最终必定最不受重视。工业带来的真正利益何在？由这些进步产生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对此我们应当抱有什么看法？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注]

进一步说，从历史上看，为什么那些奢侈贪婪的民族，总是会被勤劳节俭的民族无情击败？卢梭说，这就是因为他们重视商人而非农民，重视金银而非劳动产品，从而使得游手好闲者集聚于城市过好日子，但却听任劳动者陷入贫困、听任广大的农村走向衰落。

卢梭说：“但愿当今的政治家放下手中的算盘，仔细想一想这些事例。但愿他们认识到：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与公民。”[注]

不过，200多年来，世界上的统治者们似乎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算盘，去认真思考一下卢梭的忠告，而是把他的这部伟大文献简单地理解为一篇“仇富”的偏激之辞，更忘记了作为经济学家的魁奈曾经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了卢梭的洞见。他们共同发现：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却周期性地被“危机”摧毁和破坏，这就是因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以掠夺和欺诈而非劳动为业的阶级，古代社会如此，现代社会同样如此。我们可以在现代战争、金融掠夺和投机剥削中看到那些不劳而获的阶级，这些人既不尊重劳动阶级，也不尊重

劳动产品，对他们而言，占有财富并非是为了满足物质和知性的需要，而仅仅是为了以“炫富”彰显社会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在金钱文化中，炫富就意味着权势、声望、荣誉和成功。正是这个阶级构成了破坏社会生产劳动的力量，将社会生产与消费导向了非生产性的一面，不断毁掉了生产劳动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所造成的，同样是城市内部的分化，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化，资本、技术与劳动的分化。

就科学技术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首先是与工匠阶级的聚集、行会组织的发展——是与现代无产阶级的兴起同步发生的。无产阶级才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的真正发明者、推动者。无论是制造出阀门系统的手艺工人托马斯·纽柯门，还是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他们的发明创造都是现代科学技术史上最辉煌的一笔。研究科学技术史的杰出学者基斯蓬认为，工业革命早期的技术发明者，其实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实干家，他以运河建造师詹姆斯·布林德利、机械制造师和工具滑块的发明者亨利·莫兹利、铁路建筑师的先驱乔治·斯蒂芬森为例指出：“他们出身平凡，只受过最基础的中学教育，但却从最底层开始干出了一番事业。斯蒂芬森在18岁时自学阅读。他们还努力学习物理和数学知识，由于天资特别聪慧加上具备实践经验，学起来并不困难。最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对自己的工作必不可少的科学知识。”[注]1850年之前，科学技术的进步建立在蒸汽机的发明和炼铁技术革新的基础之上，“当时人们有两个目标：一是制造技术工具，如机车、机床以及桥梁等，二是建造大型工程系统，如铁路线和铁路网。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发明创造能力、组织能力、试验、计算和辛勤地工作，似乎并不一定需要科学发现和理论知识”[注]。

然而，随着技术发明对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方才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伟大。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资本家开始以“知识产权”的方式购买科学技术，而国家为了领土和市场扩张，则开始以财政资助的方式兴办科学研究机构，从而使得一个与无产阶级相脱离的特殊的阶层——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阶层得以产生。而在欧洲，这是1850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由于一个独立于生产活动的工程师阶层诞生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劳动不再被资本家所需要，科学技术便开始与无产阶级分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便开始分离，社会的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便开始分离。正是无产阶级和工匠们在劳动实践中进行的科学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但是，现在他们的发明被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国家盗走了，科学与技术被从工厂和工地请进了实验室，委之于资本家与国家雇用的专家与工程师，它们从此与工人阶级绝缘了。

马克思一语中的地说：

> 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注)

从此之后，劳动便成为劳动者的宿命，而知识，则成为知识者的特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建立在这种劳动的异化、分化或者分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注)

资本家通过“占有科学”，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占有了社会财富和权力，而工人却被异化为机器，他们的劳动与科学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变得一无所有——于是，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的鸿沟进一步拉大

了。

城乡差别、劳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处处看到这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劳动者被从社会再生产领域驱逐出去，并被完全束缚在物质生产的领域。

像卢梭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人类社会分化的历史动因，特别是中国社会长期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宗法—士大夫—王朝构成的统治结构，其中，士大夫是这个统治结构的中坚，这个阶级既脱离生产活动，又脱离民众，但却是文化的垄断者、社会法则的制定者。既然与生产活动相脱离，从士大夫文化中便不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既然脱离民众，于是从其中也就不能产生民主政治。

而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民众则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他们既与文化生产活动相隔绝，又没有自己的劳动组织，只有长期匍匐于宗法—乡绅的奴役之下，这样，中国的生产就不能发展，劳动者的互相团结也不能形成。中国传统社会不仅仅是严重分化的，它在组织上也是无效的——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于是，毛泽东把再造基层和改造士大夫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两大主要目标，他更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实事求是”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士大夫的最优秀的品质，而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视为新中国、新社会的基石。

尽管毛泽东毕生厌恶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士大夫阶级，但士大夫阶级却并非中国文明天生就有的，它只是贵族阶级在中古时代的蜕变，而与之相对立，中国历史上当然从来就有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人，正像西方无产阶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工匠劳动者的文化那样，中国也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个传统才是毛泽东心仪的。左宗棠曾

以“胸怀天下，心仪古人”自况，而毛泽东所心仪的“古人”尤以墨法之徒为多，其中自然也包括秦始皇。

于是，针对郭沫若沿袭陈说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批评，毛泽东起而为嬴政辩护：“焚坑事业要商量。”

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即墨家所谓的“尚同”，“它维护的是博士官所保存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定本，所焚者乃六国贵族的私家演义本，焚书当然不是焚毁一切儒家著作，更不是焚毁一切诸子百家著作，而是对于各国医药、卜筮、种树和法令著作更加以保护，这本是保护先进文化、淘汰贵族文化之举，王阳明因此方才说“焚书有理”，它与统一度量衡本没有什么不同。而所谓“坑儒”，不过是坑方术之士70人，也并非儒生，对此，史珥早就指出：“历代朋党株连何止此数，而秦独丛诟詈。”而这诟詈之真正原因就是：秦始皇镇压了六国的贵族，也便因此得罪了后世一切封建贵族阶级。

毛泽东把秦之前中国传统制度的内在矛盾，描述为“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也就是儒家与墨法两家之间的矛盾。其中儒家实质上就是贵族之学，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而墨法两家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与生产和实际相结合的。

所谓“秦政法”的核心，就在于把生产者——农民，按照军事编制从基层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农战”共同体。这就是《商君书·农战》的要义：以农（劳动生产）立国，寓兵于农。而所谓的“农战”，也就是把生产劳动放在第一位，军事力量要以生产劳动的发展为基础、以基层劳动者的壮大为前提。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条件下，士兵来自农民，军队给养也来源于农业，如果没有粮食和农民，不但国家富强谈不上，而且到头来终将是万事皆休。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指出：国家强大的根本，在于“作壹”，就是把“生产劳动”作为统一思想的唯一指针，只有把思想统一到生产劳动上来，同时淘汰无用的行业，使人们专心于生产建设，国家才能富裕，人民的力量才能集中而不分散，全社会才能强有力地组织起来。他说：

>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秦之兴起，当然始于商鞅变法，秦孝公用商鞅为大良造，于是商鞅按照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县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所谓“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可见，秦之“县”既是生产组织单位，也是军事和司法组织单位。《汉书·食货志》说：“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至于始皇，遂并天下”。

这就是说：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所谓务实，就是指把百姓的思想统一和集中在生产劳动与军事斗争方面，而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六国诸侯之骄奢淫逸。

在商鞅被车裂之后，秦孝公之子惠文君继续采用墨家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南。墨家除了“以农战行赏罚”这一点与法家相同之外，它更主张上下同心同德的团结凝聚，即“尚同”，因而也更强调基层劳动共同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墨家的组织“钜子”[注]其实便是立足于基层的工

匠组织。在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军事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秦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也就是惠文君七年，秦与魏之间进行的雕阴（今陕西富县）战役，从此秦便夺取了魏的河西之地，开始了东并六国的进程，而秦之称王，也就是从这场战役之后开始的。在夺取河西上郡的战役中，秦因为采取了墨家先进的军事技术——《墨子》中《备城门》《备蚁附》《旗帜》《号令》诸篇中所描述的那些先进军事器械和先进技术，方才得以取胜。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墨法两家，就是因为在这两种学说中，学问、知识分子不但没有与现实政治相分离，也没有与生产活动相分离，更没有与科学技术相分离。墨家的“钜子”组织，便是中国最为庞大的工匠组织，也可以说是劳动者组织的起源，它重视科学技术是非常自然的（秦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铜马车显示，当时的合金铸造技术，已完全达到了今天的水平）。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秦亡之后，墨家的传统从此中断了。清代的孙诒让、曾国藩都曾正确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失落，就是与墨家传统的失落相伴随的，在这种失落的背后，作为贵族之学的儒家学说方才从此独步天下，而一个与现实相脱离、与生产相脱离、与科学技术相脱离的士大夫阶级，以儒家为基础，方才形成了文化霸权，而中国社会结构也就从此丧失了强有力的中坚力量。

汉有天下，其政策在矫秦之枉，文景之治的要害是“自由放任”“与民休息”，不过，这里的“民”，以《春秋繁露》的说法，其实是指“豪民”，即贵族和豪族。董仲舒游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其核心在于“尚文”，它除了助长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外，还鼓励了雕琢铺张的贵族作风。黄炎培所谓“历史周期律”（即所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从此铸成。于是，武帝弃“农战”而重“商战”，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

大、宫廷愈富，贵族、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廷为中心，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围绕着盐铁、均输这些主要的利源，帝室与贵族、豪族形成了激烈斗争，分裂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国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之所以为毛泽东所激赏，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到了中国国家分裂、社会解体和天下大乱的最根本原因：统治者为了使手中的权力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便于自己“在位”或权力在握的时候，争相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产”和“资本”，以将这些资本传给子孙，而最为牢靠的资本，在当时也就是土地，因土地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变成了摇钱树。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

章太炎先生的《秦政记》，亦是毛泽东所推崇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这样指出：真正的“专制独裁”，其实就是指“权力的私有化”，即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子孙和家族永远立于权力的不败之地，采用的办法就是“私天下”，即通过权力而掌握大的资产（在封建时代，这就是掌握大地产），只要掌握了地产，那么子孙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专制制度就与“国家财产私有化”联系起来了，封建的实质，便是国家土地的私有化。而秦始皇的失败，恰恰就在于他没有进行国家土地的私有化分配，即“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恰恰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通过国家土地私有化来延续权力的秦始皇，方才是真正的“公之大者”；而那些把国家财产私有化给自己和子孙者，方才是真正的专制者：土地分封制是家天下、封建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嬴政首倡“天子无家”，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尚文，所尚之文是儒术，但由于混杂了法令，总还有些社会教诲作用，而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统治者尤其“尚文”，但其所尚之文是文辞，所谓“连篇累牍、积案盈箱”，无非“月露之形”，尽是“风云之状”。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支配者是上层的贵族和地方的豪族，这支社会中坚力量严重脱离了基层的劳动者，整个社会风气更是鄙视和脱离生产劳动与治国理政，这方才使谶纬、儒术、“清谈”、文辞成为时尚。也正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造就唐代兴起的制度基础是府兵，并不是科举。唐初的科举无非是“天子唱堂会”，朝廷对“能歌善舞”的应举者无非俳优蓄之，而与科举相比，基层的征兵工作方才是真正的国之大事。

中国的“士大夫治天下”，其实是从宋代方才真正开始的。宋太宗以来，取士尤滥，而宋代建国以来，之所以一向以对北方持保守态势为国是，就是因为士大夫对于治国理政、上马杀贼其实一窍不通，这方才使得“老成谋国”“切勿多事”成为一代士风，国运于是只能坏下去。宋人之中，毛泽东格外推崇王安石，他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主张，其实与王安石从改造士大夫阶级入手来改革社会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安石认识到：宋代国家的基础，既不是汉代的贵族和豪族，也不是唐代的“府兵”和“农战”，而是“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的士大夫，宋代国家虚弱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制度建立在这些“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的士大夫身上。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则迷信文辞，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辞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与其说是什么“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王安石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定保甲、保马之法，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的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注]，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只能在“苟安”中沉沦。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就是因为在“士大夫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墨家子弟在汉代所遭遇的命运：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重蹈墨子式的悲剧：“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明代思想家中，毛泽东尤推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一举说穿了知识、现实和民心之间的关系：格物致知，说的是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正心诚意，说的是要正视民心所向。毛泽东的《实践论》受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像王阳明一样，毛泽东也看出了中国士大夫的两大缺点：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口吐莲花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文饰是虚伪的渊薮，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士大夫阶级“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

今天的人们，经常把历代中国王朝不能走出“历史周期律”说成是由于中国“没有民主”（而且往往借助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席谈话阐述此论），但实际上，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没有民主权利的并不是士大夫阶级，而是老百姓。与欧洲那些

因科学发明而被送监和被送上火刑柱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士大夫是垄断话语权的贵族，而历代王朝也总是把国策的制定立足于“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但是，这反而造成了士大夫阶级的议论四起、言不及义和新奇相高，在各种意见争执的背后，则是私利的讨伐，从而形成了士大夫集团的痼疾——朋党政治或者“党争”。毛泽东所主张的“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其所针对者，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这个怪圈，因此，他倡导“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他所谓的学习，首先就是指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就是“大学之道在亲民”，“亲民”当然就是指知识分子和干部精英不脱离而是亲身参与社会实践与劳动实践；正心诚意也就是“民心就是我心”，是以人民群众的是非好恶为是非好恶，与民同心，斯为大同。

毛泽东既发扬了中国的大同之道，更发明了中国的大学之道，他说：

>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
> …………
>
>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注

如果说毛泽东最为担心的“身后事”是什么，那很可能就是他深深地担忧着：他一手缔造的党会退化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世界大势的“新的士大夫阶级”。1959年8月16日，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枚乘《七发》”的短文，并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枚乘，江苏淮阴人，曾是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吴王谋反，他上书劝阻，不听，遂去。“七发”属赋中一体，即七体。《七发》以楚太子与吴客对答

的方式，论述了“富贵病”之可怕，即处在美食、美女和美言的“热烈”包围之中，即使金石也会被熔化，何况人的筋骨。毛泽东推荐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指出“富贵”足以消磨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志气。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他就这样告诫中国社会改造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说：

>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注)

中国文明的悲剧，就是士大夫阶级的悲剧，因此郭嵩焘方才说“故夫士者国之蠹也”。中国最终之所以科技落伍，近代更落到被动挨打的地步，从内部说，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士大夫阶级是一群文明的蛀虫。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并不是专家专政、知识分子专政，而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取代士大夫阶级和专家集团，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

美国历史学会会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注)，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中这样写道：

>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成为毛（泽东）摆脱在野地位，摆脱在党内的政见孤立和在延安黄土山沟的流放的斗争史。毛泽东扮演了一个

先知的角色，但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太晚，以至未能早日获取胜利。这样，毛泽东似乎独立开拓了革命，以至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成了他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的传奇。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加具有革命性。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自我实现……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毛泽东担心胜利以后国内出现停滞和倒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相反，他确信只要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他的革命业绩永存下去。㊟

在魏斐德教授看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长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于他同时代人广泛的肤浅无知和自以为是”，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知识”，并非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而是各式各样的传统和现代教条。

毛泽东当然不愿看到：在他的身后，中国基层和农村再次沦为家族宗法统治的“动物庄园”。他当然不愿看到：新的士大夫阶级靠“半部《论语》”、一个市场“治天下”，重新成为脱离现实的精英。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反抗人类之不平等而牺牲了自己几乎全部的亲人，但他知道，他领导的革命可能失败，他本人亦可能成为“士大夫阶级”诅咒的“秦始皇”。毛泽东不仅仅是“思考超前”了，与伶牙俐齿的精英阶层恩义两绝的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孤独的，他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曾经放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毛泽东，晚年竟发出这样的感慨！呜呼！中国历史之哀，何其甚也。

## 改造基层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

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疏》是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献。这一变法纲领的核心是官制——政府体制的改革（用今天时髦的词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试图通过政府行政改革，使清政府的职能与现代西方政体接轨，他的这种思路被“政改专家”们沿用至今。

不过，即使当时的康有为也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实行“三权分立”那么简单的事情，它也不单纯地表现为上层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的提高，因为上层制度的设计（今天所谓“顶层设计”）总是依赖于基层能否有效执行，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进一步说，政治体制改革总是要落实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总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妥协，而不是单纯地体现为上层命令与基层执行的关系。

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在“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被表述为“郡县”与“封建”之间的关系，而在长达几乎两千年的争论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共识”是：国家行政效率的提升，必须依赖于地方的自主性与合作，过分的中央集权以及对于地方财权、政权和军权的剥夺导致的“地方无能”局面，将反过来极大地涣散国家的能力。南宋的改革家叶适在《外稾》中，便把地方权力被剥夺视为宋代国家无法对抗辽金之关键。而钱穆对清代巡抚制度的批评之要义也就在于此。他说：“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注

康有为也同样看到了中央—地方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因此，他提

出：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强大的上下整合能力，中央的“行政”必须与地方的“民政”相结合，而地方“民政”的基础，也就是基层的士绅阶级。康有为说：

> 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自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馀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兴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注]

简言之，康有为整合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的办法是：国之下设道，每道设民政局，道的内部每县设民政分局，由上层向下指派官员，与宗族乡绅一起协同治理基层——这很类似于汉代的制度，即郡县首长往往是只身上任，办事人员皆从当地招募。当然，康有为的这样一整套现实制度改革方案，也是与《大同书》中所设计的世界公政府—州政府—基层度政府的结构是相对照的。而康有为的那本著作则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影响。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而今天的“改革家们”之思路，实则也并无出康氏之右者，他们并没有认真思考毛泽东在1949年曾经说过的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注]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哪个方面超越了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什么康有为、孙中山的改革和革命失败了？

毛泽东向历史和未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刚刚走过28年的战斗历程，并即将开始建设新中国的“万里长征”，那时的毛泽东只有56岁，他这样说道：“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注]

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另外一些人会说，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捣乱破坏，是“痞子革命”阻碍了国民党的渐进改革进程。于是，剩下来的问题就成为：井冈山的那几支枪、太行山里的那几杆旗，怎么就能够击溃被美国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又是怎样的国内外不平衡社会结构，孕育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究竟是从怎样的深重灾难中，方才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足以“煽动”遍布中国农村和基层的共产主义革命？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垄断中国基层的宗法势力，而这恰恰就是康有为“会同治之”的合作对象，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大肆讴歌的中国固有之“美政良俗的基础”——“地方绅士”阶级。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其依靠的基层对象，也就是这样一个阶级。而这样一个阶级之所以会被依赖，首先就因为它是国家在地方的“包税人”，是国家在

基层农村征收“皇粮国税”的工具，是国家财政金融的依赖对象和运作基础。

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近100年时间里，宗法势力在帝国主义冲击下的乡土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1840年后一轮接一轮的军事战败，清政府面临着巨额赔款的压力，向地方和基层征税的任务空前加剧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包税人”的地方绅士的权力空前加强了。国家分配的征税任务被士绅转移给处境更差的农民，从而使得村庄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缴纳不起，就只有向士绅地主借贷，于是，高利贷取代了地租，成为地主阶级的主要获利手段，而一种以放债为业的“资本家化的地主”，即“金融地主”便在基层壮大起来了。[注]不过，这种金融地主的角色，却又并非1840年以后的军事失利以及国家财政困难的直接产物。

地方豪绅掌握“银根”的历史，起码要追溯到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随着东南沿海的地方豪绅在海外贸易中引进大量白银，“国税征银”的政策本身也就是国家向地方豪绅妥协的政策结果。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地方豪绅一方面成为国税征收的组织者，同时，由于国家将白银铸币权下放到了“民间”，白银也就这样被垄断到基层豪绅手中的。

国家财政困难、外国金融资本的冲击，都使得金融、货币问题成为清帝国面临的头等大事。林满红的研究发现，货币金融问题乃是清代学术界所面对的重大课题，其中，今文学派通常支持放任主义的货币政策，而古文学派通常支持干预主义，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指向一个必然的困境：丧失货币主权、长期依赖海外舶来白银的清政府，同时还必须依赖国内“银根”的掌握者——基层豪绅。无论已有白银的税收还是新货币（国铸银元）的推广，都需要士绅来配合。[注]

因此，起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看，明代以降的中国王朝，实行的乃

是“官绅一体”的统治，而这就是明清时代500多年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实质所在。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

> 中国士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从士绅和官吏隶属于同一个集团（都是官僚集团的实际成员或候补成员）这一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传统的政治秩序。因此，尽管有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差别，实际上是同一个权力集团在控制社会。这个权力集团在公共领域表现为官吏，在私人领域表现为士绅。结果是，政治性基本权力就是政治中的主控权力。而且，只有那些实际或潜在拥有权力的人才可以进入精英阶层，得以参与治理活动。注

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地方团练成为清王朝维护自身统治的强有力武器。通过举办团练，掌握着“银根”的地方士绅有了自己的武装。有钱又有枪的基层豪绅地主阶级，就这样成为近代中国最强大的社会势力，而各路军阀的总根子也就是基层的豪绅地主。

对乡土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帝王来说，治河始终是中央动员地方的主要手段，“河工”作为一项国家定期举行的公共事业工程，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地方民众的参与。民众因此得以认知国家，而国家亦因之得以深入动员基层。但是，1855年，传统中国王朝动员地方的这个最大的手段也失灵了。那一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汹涌的河水于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复从山东垦利入海，作为中华帝国命脉的大运河从此南北中断，冀、鲁、豫、皖和苏北地区，亦从此陷入经常性的水旱灾害之中。而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政府，非但不能治河，反而继续加税。在地方豪绅的催逼之下，水深火热的基层百姓除了逃荒要饭之外，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可走了。

裴宜理在分析这段历史时，采取了生态学的视角。她指出：

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了求生存而采取的最具有适应力的策略也许是集体暴力……那些资源短缺和供应无法稳定的环境可能孕育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对他人的拒绝被视为对自身的生存直接有益……淮北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受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其环境艰难而不稳定，一种攻击性生存策略随之产生。我认为，这些集体暴力的形式，绝大多数可以被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生存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注)

兵匪交加，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于是，在赤地千里的黄淮泛区，谁能“救民于水火”，谁就能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在位于黄淮两岸的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当时，他们有着一个名垂史册的名字——游击队。毛泽东说，游击队是这样的小分队，他们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战斗，而且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恢复生产，救灾救荒，教农民读书识字——这便是建立敌后根据地的理论。

离开了游击队，也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对于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要求：我们的党是一支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共产党是种子，人民是土地，共产党的种子就是这样植根于晋察冀、冀鲁豫贫瘠的大地上。

而共产党“向南发展”，最初也是在淮北的土地上取得了成功。裴宜理通过分析，认为这种成功“是基于对地方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改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工作是极其具体的，包括减租免息政策以及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实现劳动交换。直到20世纪50年代，停止了100年的“河工”再次成为中央与地方最基层农民联系的纽带。广大农民响应毛泽

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被发动起来修淮河，加固堤坝并修建水利设施。正如睢县县长王凤梧（音）对这项工作所表达的希望那样：

> 你可以看到每个农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他来到治河工地劳动，首先挣得了一些救济粮来养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去养活家小。至少他会想到，他现在的劳动是为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说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了。他原本希望划出一片土地，自己将它开挖出来，并将土石运走，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劳动算计到一个立方厘米。现在，他发现集体工作更方便更有利……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渐渐地使他开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正在改变自然，而且我们也同时在改变我们农民的思想。㊟

如果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中共睢县县长上述这些朴实的话则说明了普通中国农民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对于一个新国家的热爱是怎样产生的，在被梁启超判为“没有民族主义产生的土壤”的中国大地上，是怎样诞生了一个站起来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将处于王朝国家和基层土豪劣绅双重压榨下的基层农民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农业生产还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生产来说，这都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空前壮举。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建立在这个壮举的基础之上，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成功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来自向基层的放权；而另一方面，长期分权也造成了国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的弱化，一个调控能力日益弱化的国家难以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却必须面对市场造成的问题和被市场抛弃的弱势群体。正如王绍光

指出的："国家能力的削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用其掌握的财力追求局部利益；二是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注)正是为了应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次失衡，国家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大了中央财政能力，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

而在乡村领域，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有学者（如贺雪峰）从特定的研究角度思考说，分田到户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推行，使得农村基层政权拥有的政治权力在革命和建设时代被大幅削弱了。而新世纪取消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后，农村基层政权的财政权力亦被剥夺。取代基层权力真空的，是刻意设计的基层村民普选制度和"一事一议"的行政决策机制，但是，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基层难以对抗宗法力量的崛起，随着征地拆迁，围绕着包括矿产在内的稀缺资源，农民必然地分化了：一方面是在拆迁中获得了巨额财产的城郊农民以及因为掌握了资源而暴富的煤老板；另一方面则是在狭小的土地上靠种地和打工为生的基层农民。即便在国家大幅补贴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不足，上层行政机关维护稳定的行为并没有缓解基层的矛盾。随着这种分化，作为整体的农民和农村都不复存在。

成年的农民走向城市，化为身份难以界定的"农民工"。而其子女，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因村办中小学（一项重要的公共品供给）的荒废而得不到好的教育，就愈发失去进入上层的希望。(注)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都是必须正视的。

1938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曾感慨地说：

>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注)

毛泽东更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说：

>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注]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作风是怎么来的。现实也已经告诉了我们，失落了这样的作风，后果是怎样的。未来还将告诉我们，丧失了这样的作风，未来将会怎样。

---

1. 蛋户指以船为家，从事捕鱼、采珠等劳动的沿海居民。——编者注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1—1857年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738–740.
3. 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4. 钱学森． 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J]． 政治学研究：1989（5）.
5. 卡尔·施密特. 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4.
6. 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5.
7.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6.
8.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4.
9. 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17.
1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11.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
12. 毛泽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2.
13.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102.
14.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M]//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
15. 毛泽东. 论持久战[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62.
16. 毛泽东.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7.
17. 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7–178.
18.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3–184.
19. 参见魁奈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农业劳动者"，见狄德罗.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12.
20. 参见魁奈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自耕农"，见狄德罗.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18–219.
21.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3.
22.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9–30.
23. 基斯·基斯蓬.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师[M]//凯泽，柯尼希. 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30.
24. 基斯·基斯蓬.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师[M]//凯泽，柯尼希. 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39.
25.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4.
26.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
27. 钱穆. 墨子惠施公孙龙[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9–52.
28. 王安石在此次上书前，曾任督察江南东路司法行政（提点江东刑狱）之职。宋时全国分为若干路，辖区类似现在的一个省。故文中开头即说："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

29. 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1005.
30.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31. 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大师，著有《洪业——清朝开国史》《大门外的陌生人》等重要著作，生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加州伯克利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32. 魏斐德.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
33. 毛泽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34.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2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5.
35. 康有为. 应诏统筹全局疏[M]//郑振铎. 晚清文选：下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
36.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37.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38.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9. 林满红.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0.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83–284.
41. 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
42. 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67–268.
43. 王绍光.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M]//王绍光. 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
44. 贺雪峰. 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45.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46.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1094.

# 附录
# “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权问题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 政治厌倦症

当前，对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1949—1966年）基本特征的描述，是高校教材中通行的“一体化”叙述。所谓“一体化”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垄断和专制，造成了作家、作品的单一化，以及对待文化遗产态度的简单化；文学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包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在内的机构），造成的文化等级制。[注]但是，当上述论断强调新中国成立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此一“定论”自身的高度抽象性和模糊性。

例如，这里的“政治权力”究竟指什么？指毛泽东本人，一个或多个机构（共产党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和“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

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

显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秩序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规训的结果。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自血亲、天授、宗教和武力）。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向才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

当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直到傍晚才起飞”时，他的意思是说：哲学（形而上学）是在希腊政治衰落时兴起的。换言之，柏拉图认为，政治的承担者应该是哲学王，而不是希腊公民。同样地，当马克思说“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以管理学代替了政治学，这只不过是以一种政治形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形式。马克思这样说：“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究竟什么是政治？当人们提议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从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去理解事物[注]，甚至就意味着从毛泽东所谓“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当前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政治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者所说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因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所谓政

治，也就是对矛盾、竞争着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更为强调阶级权力和阶级关系在诸种权力关系中的纽带作用而已。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和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政治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唯物主义教条。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一词。[注]

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遵循的权力”。）

根据《矛盾论》和《狱中札记》的描述，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是，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但这一点绝不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性。

“合法性”和“认同”本身首先指涉的是文化问题，涉及审美、习俗和偏好诸方面。但是，它们也涉及现代国家，乃至现代国际准则的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人的需求仅仅被理解为物质需求，人的生存仅仅被理解为肉体生存的时候，人本身的定义就发生了逆转，即“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于是，与所谓“剥削”相比，马克思所谓的“异化”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因为后者意味着心甘情愿被剥削。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它的“文化合法性”没有被动摇，那么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真正胜利。如果没有“文化合法性危机”这一条件，那么马克思所叙述的“经济危机”就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充分条件。

而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注]

早在1950年，装饰艺术家高庄就曾写信给毛泽东，直率地称毛泽东并非某个特定门类的艺术专家，乃至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对此欣然接受[注]，由此既可见毛泽东的胸怀，也表明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凭借个人偏好简单地介入文化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实际上，毛泽东每次对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抛开毛泽东是否“简单粗暴”这一问题暂且不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对于毛泽东的文艺观的态度，恰恰可谓十足的“简单粗暴”——这种“简单粗暴”，特别地表现在毛泽东批判者们，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更为讽刺性的却是他们用来批判毛泽东的武器，竟然就是福柯、葛兰西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思想（以可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名义）。

20世纪80年代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简单抛弃，与当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宣传采取的是同样一种态度。正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态度，导致了一种巨大的“政治厌倦症”：在大学里，教师和他们所影响的青年学生，既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压迫者的政治”感到不满，同时，更对“被压迫者”的政治，即革命的政治、劳动者求解放的政治，感到失望乃至不快，而且，在我看来，后一种失望与不快，还要甚于前一种不满。

所谓对传统的否定，尤其集中地表现为对人类政治传统的否定，特别表现为对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革命政治传统的失望乃至否定，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便是政治虚无主义，而“告别革命”、“告别马克思”、祛除中国文明中治国理政的内涵，乃至祛除西方文明中的政治传统——这一切都不过是表现而已。

马克思主义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学说，是对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最深刻、最全面的置疑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根植于统治者对于财富和武力的独占，而且，更根植于一种强大的精英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传统。随着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这种传统在工程师、职业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身上得以强化，于是，正如詹姆斯·伯纳姆在《管理革命》中所描述的那样：受压迫的农民没有替代压迫的地主，因为它们双方都被完全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同样地，无产阶级似乎也没有替代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双方都被“管理阶级”所取代。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方才演变为“经济学”（其核心是，将经济活动理解为理性的个人的逐利行为，同时祛除一切制度的因素），而经济学和政治学又演变为“管理科学”（其实质是，对“风险”的评估与想象性解决）——这造成了人类政治传统的变异、造成了新的社会统治方式，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新的形式的不平等。

今天，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曾经参与、介入的那些有关文学问题的讨

论，由于不过就是这样的“政治专制”的表现，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我想，对这种无所作为的姿态的批评，首先该做的不是与其进行理论论辩，而是使讨论尽可能地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力恢复历史语境的努力相当微弱，而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比如说，我们频繁地运用“政治专制”这个词汇，却很少分析为什么从来没有离开特定历史处境的专制 / 反专制行为，也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专制 / 反专制方式。历史领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技巧，实际上不仅仅掩盖了具体的专制，而且也一如既往地制造着对历史、现实和知识的专制。这种态度长期被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例如，类似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这样的讨论中。我下面的分析就将从这两场讨论开头，尝试着把这种讨论恢复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然后，逐步思考关于所谓“专制 / 反专制”的框架在描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虚构性、片面性和专断的实质。

## 1951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土地改革与抗美援朝战争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论断来评判，这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反日尔曼化”革命的胜利。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

## 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王朝国家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西周井田制、春秋初税亩发端，秦的兵农合一（农战），使拥有土地的农民成为国家的捍卫者。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大量的田地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唐的府兵制，依然是兵农合一制。

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随着募役法的推行，一般农民不再承担当兵之责。于是，基层的“包税人”便取代农民，成为国家的依靠力量，这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中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制、屯田和府兵制，下开宋代的“募役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唐中期之后，地主乡绅阶级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注]

自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而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和改革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以地主和豪绅为主导的地方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地方的过程，也体现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的“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拥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清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恢复农民的“国民”地位、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又名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领导下，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粤系，还是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就是毛泽东。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

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而军阀统治的根子就在基层和地方。军阀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必然会瓦解。所以毛泽东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这样才能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正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注]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出发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但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被苏联归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异端邪说，中共四大时期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坚决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而当时的毛泽东恰好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 “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

乡绅地主阶级是王朝国家时期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他们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注]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为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原因如下：一是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使传统的乡绅日益担负不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是毛泽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中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注

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毛泽东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他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正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注

长期研究中国和亚洲农村问题的学者杜赞奇的研究从社会与经济学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是对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和收取田租——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

## “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一直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简单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确定农民的国民地位、国民革命的实质，也就是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在康乾盛世之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致，而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1/3，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之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

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上策）。但是，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这条路，但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以及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注]

1950年的毛泽东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根据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才能有钱向农村投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建设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转移农村人口。同时，这条道路还意味着：在工业化的条件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首先可做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此解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内卷化”问题。这首先是要建立覆盖农村的健康医疗体系，消灭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疾病，进行大革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水旱灾害问题。随着人均寿命的迅速提升和新生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所造成的人口增加，必须对“过剩”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统筹

规划，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方式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现代改造，创立规模经营的现代新农业。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在农村兴办工业，乃至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就地安置富余劳动力。这条道路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只能要么对外扩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大地盘，要么在内部实行丛林原则，通过消灭大量的老弱病残孤，减少人口。而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更需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前方的战事要求后方（农村）的高度组织化，如果后方出现了两极分化，非但对于国家的工业化，且会立即对前方士气产生直接影响。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将其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过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中共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第一次重要争论之时[注]，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正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肯定了山西长治地委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社会主义方向”：“虽然生产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的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的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开始，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当时土改中的斗争扩大化，而今他再次抨击农村的分散化。因为无论斗争扩大化还是

分散化，均不利于农村的组织化。）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之“始作俑者”（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的，几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王谦的反对者。赵树理也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广大农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解。他说：“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得不够深刻，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了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够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个时候两个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同时在好多年中已经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再增加更能提高生产的新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了。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都觉得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注]

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开始就包含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分歧：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在一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旧的所有制中必须包含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因为后退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毛泽东才说：“个体农民，一家一户，增产有限。难道可以说（过渡时期）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 劳动人民知识化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哲学就已经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哲学和绝对精神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而这也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获得了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这是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对于劳动者的历史命运，早期马克思的遗憾是：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头脑和哲学，但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德国成熟的无产阶级在国外，《共产党宣言》就是为旅居外国的德国工人协会而写）。所以马克思这样感慨："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著作时，他更加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普遍命运。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与德国恰好相反：那里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和队伍，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惊人的肤浅（除了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之外）。E. P.辛普森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源头是工匠文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这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只会有两个前途：技术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结果，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能收获工团主义。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裂，是知识与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基于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寻求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所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重要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权），关键在于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压迫，而在于劳动者是否"有觉悟"认识到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动发生，这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象征的劳动者最普遍的状况决定的。这就是说，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

说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哲学的贫困”。

我们只有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政治、经济领导权，但是，这与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根本不是一回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劳动者阶级距离真正“解放”还非常遥远。[注]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题中之意。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于此。

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劳动者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为突出而急迫的任务，毛泽东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过渡时期”，中国也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文化任务，那段时间既是空前的经济建设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当家做主，在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获得解放的时期。对劳动者来说，革命最大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革命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以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手中。这才是这场革命最伟大之处。青年时代，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表达了对达尔文主义的不满。在他看来，历史不是自然进化的历史，而是人类自我教育的历史。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是一部革命政党、劳动者阶级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不断在学习中改造自我的历史，所谓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就是指这一点：

>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

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

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用激昂的调子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过程。在他看来，漫长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史、政治斗争史，而首先是“学习的历史”，是“追求和寻找真理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它提出并逐渐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自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就找到了自己的“头脑”，中国革命者就找到了自己的“机关枪”。㊟（他还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了“学风”问题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这段最著名的话，显示了毛泽东的历史视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

界。

同样地，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必须保持对于中国革命这出波澜壮阔的“长剧”的总体认识。要获得这种总体认识，就要不断学习，不断获得对于“历史使命”的认识，不断努力去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表述的话语权。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 “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正是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到统一，由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到现代工业化的“过渡时期”。

该片于1948年在北京开拍，一开始就命运多舛，其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灾，至1950年年底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近乎老套的“苦情戏”，它讲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向导演孙瑜推荐《武训先生画传》（作者为李士钊）。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进步青年栾淑濛（原名李云鹤，1938年在延安改名江青）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学团”义务为大家服务，而1951年《武训传》事发后，又是江青、钟惦棐（当时分别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副处长）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细致的调查报告以“武训历史调查团”署名，分5天在《人民日报》连载，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平心而论，这是一篇颇有内容的报告）。(注)它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了当地百姓口中武训的另一个形象：流氓和劣绅。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土改运动明显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基层农村进行的现代社会体系建设——包括农村卫生医疗体系、防灾救灾体系、农村教育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即推广全民识字、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现代社会体系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动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赵树理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注)

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注)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包括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还要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接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陶行知先生在内的改良主义者，如何评价他们所推行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从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包括如何评价《二月》《倪焕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农村办教育的萧涧秋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现代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所从事的，恰恰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共同体意识加以“瓦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所灌输于农村的个人主义伦理，既是一个把人们从原来的村社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无法将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组织过程中去的过程。改良主义的“陶行知道路”的绝望在于：一旦将农民从旧的村社中抽离出来，而又无新的社会组织接纳他们，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为个人主义伦理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即使将农民从乡土社会中抽离出来也是不太可能的。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其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理的核心所在。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究竟谁养活了谁”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与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济”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经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也就无法找到根本出路——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

（在中国基层农村建立现代社会体系），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了巨大的欢呼，而且竟然发生在中共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决定性历史时刻，这使得毛泽东不禁感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来，在一片盲目的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还有某些共产党人一进城就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用黑格尔的著名比喻来说就是：奴隶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头脑上却做了主人的“俘虏”（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毛泽东忧心忡忡地，也是十分惊讶地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地批评道：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注]

毛泽东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建立基层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还是回到听天由命）。而且，毛泽东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更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改良侮蔑革命，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毛泽东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所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战死朝鲜沙场。

刚刚得到消息的毛泽东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在他看来，如果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了单干和两极分化，那么不但征兵工作无法持续、势必动摇前方将士的军心。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地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1954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运动，经常伴随着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活动。这种风气起码起于后汉时期。

内藤湖南（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曾经指出，在基层建立文化体系，使基层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把礼视为法的基础，把风俗视为制度的基础，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思想，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例如，“礼学只是在汉代后期才开始实施，这与后汉的风俗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后汉的风俗在古今中国是最美好的话，那也是由来于礼学的实施”。(注)因而，伴随着汉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当时出现了许多围绕着礼学经典进行的讨论（早期如班固的《白虎通义》，随后有许慎的《五经异义》，郑玄门生及弟子所作《郑志》）。

内藤湖南还认为：著名的王莽新政，完全是以回到周公之制为目标，新政的措施，也是按照《周礼》而行，其中取缔豪强、善断民讼的良策在现实政治中遭受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刘歆等“今文经学派”将经典的阐释完全庸俗化为上层的权力斗争，从而改变了将文化经典普及于民间的方向，二是由于豪强的抑止和反对。所以内藤湖南指出：“应用《周礼》失败者，第一个是王莽，第二个是王安石。”

显然，正如内藤湖南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古文经和今文经的斗争为标志）、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当代中国的《红楼梦》问题讨论、《水浒传》问题讨论，乃至“儒法斗争”问题

的讨论，其经验教训，也都应该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理解。而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如何去分析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以及他的错误，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范式危机与学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整风”运动，是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开始的。它上承延安时代的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下启“双百方针”，即整顿党风，是以整顿学风开始的，而整顿学风，则从胡适开始。

从现代文化历史的角度看，被毛泽东批评、反对过的人物，往往都不大高明，这其中当然就包括胡适先生。而今胡适重新成为学术“正统”、摩登圣人，势头压倒鲁迅，以至文化界几乎重新回到了“开口必谈胡适之”的时代，我们恐怕就更加不必随波逐流，也跟着去拍马屁、当“追星族”了。

胡适代表的“新红学”属于“浅薄而不长进”，其实早就陷入“范式危机”，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是势所必至、理固有然。指出这一点的，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更不仅仅是蓝翎、李希凡这两个“小人物”，如今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倒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余先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如果论意识形态色彩，他该属于偏白而非偏红，而偏偏是他指出胡适学术研究的毛病其实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被拿下只是早晚的问题。余英时的理由是，一切科学学科都由“范式”和“技术”两部分构成，技术失误固然贻笑大方，但如果范式或者前提错了，则技术再好也毫无用场，好比一旦开普勒假定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无论他在研究手段和技术上如何先进和精密，最终所能证明的也只能是自身范式的荒谬而已。[注]而自《红楼梦》诞生后产生的两大“红学”流派——索隐派和考据派，犯的恰恰是这种研究范式和学术前提的错误。比如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的研究前提是：《红楼梦》乃

一部“排满”的民族主义小说，是抒写汉人亡国之恨的影射之作，这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却最终不能不使“红学”成为清史之“野史”的猜谜和捕风捉影。而胡适所代表的考据派则更糟，它将《红楼梦》理解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从而使得红学不可避免地沦为“曹学”乃至“曹雪芹家史研究”或者“曹雪芹家谱研究”。索隐派和考据派都犯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范式错误，就是忘了《红楼梦》首先是文学、是小说这个起码的事实。在如此错误的范式指引下，进行了无数“失事求似”，乃至于福尔摩斯探案式的研究，而最终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竟然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写的”则依旧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历史上传抄者们的增删，哪些又是1791年程伟元、高鹗出版120回本时的增删，这些问题在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后才基本得以解决，或者说，到了1963年才终于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曹雪芹的《红楼梦》”。）

可见，倘范式、前提错误，则所谓用功、刻苦和先进技术统统白费，这就是同是过来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判胡适时提出的质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何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假设和前提“不小心”或者干脆是荒谬的，则技术上再“小心”也无非是错上加错，弄不好就沦为披着科学华服的大规模、旷日持久的学术造假运动。郭沫若因而说：真正的科学方法其实与胡适的口诀相反，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胆反证”。[注]借着“小人物”童言无忌揭开的盖子，郭老总算是戳破了一层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户纸。

问题是，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头上既然明摆着如此明显、亮丽的“虱子”，为什么会长期被科学研究所忽视（或如毛泽东所谓“不能触动其毫毛”）？这说到底，还是因为胡适不但是“文化霸权”（“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而且这个文化秩序又与一个社会秩序密切联系，胡适长期亦官亦学，朝野兼顾，天下没有比他更八面玲珑的了。而作为文坛与学界盟主（“老大”），他的能力又大大超过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1931年胡适院长权威之大，到了一句话就可

以将黄节、林损、许之衡三教授开除，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和好友。因此，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搞学问混进文化圈，不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恐怕是不行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身处考据派的研究范式之中，就永远不会发现胡适有什么错误；身处胡适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之中，也就永远不会怀疑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荒谬。即使有人指出胡适派明显的错误，他也不会被整个文化秩序所接纳和理解，这也就是深谙学术界即名利场的余英时所说的：“明白人不是没有，只是有也没用。”

其实王国维早就指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美学和文学作品来阅读和研究，可惜王国维太想不开，不积极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反而跳湖早死，因而身后自然无一批拍马的学生，当然更没有形成“学统”。而俞平伯从文学角度对胡适考据派的批评，自然也要比蓝翎、李希凡两个“小人物”早得多，除了1925年的《〈红楼梦辩〉的修正》，1954年年初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说得更清楚：不能把《红楼梦》当曹雪芹的“自叙传”，更不能把《红楼梦》研究搞成“曹雪芹家谱研究”。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尽管并不系统，但也证明了指出考据派方向上的错误，显然绝非蓝翎、李希凡两个“小人物”的独家发明。只不过由于俞先生自己还要在北京大学胡适的徒子徒孙们之中讨生活（俞先生升任“一级研究员”，是北大文学研究所划归科学院之后的事），所以有些磨不开面子，理直却不能气壮而已。

这就表明：一个观点、一项研究，乃至一种行为，其实并不能因为其“科学”、“正确”、“有创见”就被“学术界”或“文化界”欣然接受。因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一种文化秩序、一种“学术规范”，乃至一种正统地位和学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1954年毛泽东所要批判的确实不是胡适，而是以胡适为“文化霸权”、以技术和形式主义为范式的文化秩序，老人家看不惯的，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规范”“权威”面前纳头便拜的柔软身段。而这种柔软身段或者“皮厚骨头软”，恰恰被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和党派”的姿态掩盖着。

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对文化起制约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东西：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或者叫“文化合法性”），前者通过政治权力起作用，实际上比较表面，而后者则通过文化秩序和学术权威起作用，作用则更为深层。因此，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独立”，不能仅仅看他对待“政界”的态度，更要看他对待“学术霸权”的态度。因为压制学术发展的，不仅仅是“党阀”，往往更是“学阀”，是胡适这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新八股”。如果只是空洞地“反官方”而不反学术恶霸，乃至于本身就是学界的恶霸或者帮闲，仅仅有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姿态，而没有对文化秩序合法性和学术霸权更深一层的反思，这也就根本不是，也不能称其为“学术独立”，离所谓“思想的清醒”尤远。

而记住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1954年，蓝翎和李希凡这两个青年大学生之所以能够一鸣惊人，以小人物之身将大人物批得“体无完肤”，特别其正义在胸、真理在握的姿态之获得，绝非因为能天才地预知自己背后会有毛泽东撑腰，首先倒是由于孤陋寡闻、信息不灵。或者说是因为山东大学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们才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之中，处在山东大学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特区”，可以不拜、起码是少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既是“小人物”，也就更没有什么“文化负担”，自然是直抒胸臆、敢想敢干，说穿了，他们当年本不过是喊出皇帝在裸体游行这一真理的两个小男孩，属于童言无忌、一锤鼓破的煞风景之举。如今想来，作为观看“胡适之先生”长期裸体游行的后排观众，他们的文章是在非常边缘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刊载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肯定会被淹没在大量的文字垃圾之中。

## “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方法”与“学风”问题

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去梳理，那么，1954年《红楼梦》研究讨论

所提出、暴露的问题，还涉及自20世纪30年代胡适入主北大文学院以来所长期奠定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基本方法。因此，1954年的讨论，也是一次迟到的对于这种基本方法的“清算”。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中国大学文学系在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匮乏和研究水平的低下。因为没有文学理论作为基础，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讲授变得几乎无法完成。而且非但北大如此，清华的中文系也是如此。

例如，何炳棣先生考入清华时，大一国文恰恰是由俞平伯教授主讲，何先生回忆说，俞平伯讲“春日迟迟”和“白杨何萧萧”这两句古诗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注]而据张中行先生回忆，俞平伯在北大兼课讲词时，讲到李清照，“也只是说‘真好，真好！’，至于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注]

而清华所采用的朱自清和杨振声提出的“纯文学”和“鉴赏”教育法，也是失败得一塌糊涂。“1933年3月，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萧涤非举行毕业考试，萧答案至令人失望，结局殊纠纷，久之始定为中等……一多（即刚才美国留学归来的闻一多）谓此间国文系治学方法极不满，系主任朱自清亦甚愧怍。”[注]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中文系，已经到了老师“说不清楚”，学生“答不清楚”的尴尬的境地，甚至到了老师不知怎样教，学生也不知学什么的地步，一时造成大多数喜欢文学的学生不得不转投外文系听课——因为外文系分析外国文学作品，就不得不借助外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作家如冯至、穆旦、卞之琳、曹禺等都出身于外文系而非中文系，即是这种原因所致）。

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胡适于1931年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而他执掌文学院所面临的当务之急，自然就是改变文学学科这种极其尴尬的

教学、研究局面。众所周知，胡适本人并非完全不擅长理论研究，他自己对于理论也并非没有兴趣。例如，他最重要的著作都不是鉴赏、考据方面的，而是理论和思想方面的。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哲学》《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鉴的范例研究》《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特别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种长篇论文。只不过，这些被视为重要的理论性研究，却都是他以英文撰写，为在美国进行的讲座、研究所准备的。胡适并非不知道现代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和范式的研究，即学术研究不可能不是一种“主义”（试验主义恰是一种“主义”）的研究，但是，基于极其现实的考虑，胡适认为：理论性的研究、思考和教育，非但不适合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理论本身简直就是有害的。

今天看来，我们也许只能说，胡适这种奇怪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由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尤其他执意反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学——因为“左”翼文学之兴起，在他看来不是由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而完全是由于“西洋理论”造成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旦涉及“理论”，则不能避免德国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黑格尔、康德以降，也自然就不能回避马克思，而在胡适眼里，“研究马克思理论即等于替共产党宣传”。正是在这种定见的支配下，胡适入主北大文学院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反而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文学系教授不能“出学术成果”，即不能生产论文和著作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上。胡适主张的文学院改革是他所谓“半放脚”，而不是“鼓励天足”。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他所谓“鼓励天足”就是鼓励文学理论的建设，而“半放脚”则是把文学研究引向作家生平研究、作品版本考订、文坛逸事掌故整理——胡适把这一切称为“整理国故”——上去，而这就是一种胡适版的特殊的文学史研究。

1954年之后，大陆知识界所大张旗鼓批判的胡适的“唯心主义”学术观，其实大致就是指他的这一点。

而就任文学院院长伊始，胡适即拿赏析派开刀，一举开除了擅长赏析和“纯文学”的三位教授林损、黄节和许之衡，解聘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三人“没有著作”。胡适晚年还坚持说：“不用功，怎么会给人家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注]可见，“用功”“竞争”和出著作，这是胡适所关心的要害，而他发明的这种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最起码的好处就是：这种“科学方法”可以大规模地生产“研究成果”。一旦有了这种“知识的积累”的“科学方法”，就有了著作，有了教材，有了学术规范，自然也就有了考核教授和考试学生的依据。何况胡适本人即以著作多而见长，特别是由他发起的“新红学”，轰轰烈烈地搞了几十年，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最终却只搞清楚了一个问题：“《红楼梦》确实是一位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这种被1949年之后的大陆知识界称为“皇帝的新衣式”的研究，客观地说，也确实浪费了中华民国无数宝贵的教育经费，甚至成为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一个隐形的佐证，因为正如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所说：“在一个大多数人吃不饱肚子而卖儿鬻女的中国，一个18世纪小说里面人物的真伪问题，非但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而且它反过来印证了胡适道德立场的可疑。”[注]

但是，胡适的最大成就，确实是把大批的中文系学生吸引到“文学史”研究当中。这当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学史研究，由历史上作家的生平掌故、作品的版本考订构成，这种新的文字游戏把大量学生吸引到“故纸堆”中，成为不折不扣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火迫近北平时，胡适最欣赏的学生吴晗却突然幡然悔悟，他觉得从事这样的所谓研究，对于个人良知来说是完全不道德的。但是，如同吴晗和格里德那样感受到学术良知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女作家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写到了一个北大文学院学生余永泽——他不但对“一二·九运动”不感兴趣，而且确实是“为了一个18世纪小说里人物的真伪”，竟然将自己爱人的生死弃之不顾。余永泽这个形象，长期被视为当时北大文学院学生的典型。

无论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是否对文学研究做出了“实质性的贡

献”，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他最大可能地使北大的学生避免卷入政治：发起“一二·九运动”的主体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两所学校因为有美国大学课外活动和组成“俱乐部”的传统，所以很容易使学生团结起来；而发动了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却几乎默默无闻，不但是在政治上，甚至也是在学术上，因为学生之间很少聚首，遑论讨论。而这不得不说是蒋梦麟和胡适治校的最大功劳。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和教育界，胡适的声誉早已压倒了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人。不过，无论胡适当年倡导的“学术”从长远看是多么的有道理，但是从北京大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他对于思想和理论的有意识的拒绝，不仅对北京大学在学术上，更在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思想的讨论和理论的批判，乃是知识活动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学术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条件，它既是蔡元培时代形成的北京大学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传统，也是世界上优秀大学之通则。而对于思想和理论的拒绝，自然就是对于讨论和自我批判的拒绝，历史证明，蒋梦麟和胡适的这种方式，不足以阻挡马克思学说和“左”翼思潮对北大的影响，恰恰相反，它却足以从根本上瓦解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北大。

实际上，毛泽东选中《红楼梦》这部作品和俞平伯这个人也不是偶然的。俞平伯是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曾祖父俞樾是晚清杰出的经学家、诗人，是《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甚至还是《七侠五义》小说的改编者，也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同时，又是汉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从俞平伯这个也许是最典型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传人的身上，的确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变迁，简单地说，这就是清代以来的考据学如何被胡适的经验主义所替代，而传统的“性情”说又如何穿上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外衣得以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的内容一方面可被当作“事实”用以“科学考证”，一方面又可被当作“自叙传”文学来伸张五四运动时所谓的“人的文

学”观念。对当年的胡适来说，他强调“事实”“证据”，无非是用他的经验主义“方法”来批判中国传统经学方法的“不对”（例如他对章太炎的批判），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批老知识分子不断强调“事实”、“材料”和“考据”要先于“观点”、“方法”和“思想”。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借助于胡适当年攻讦新文化“左”翼阵营的论调，不过是在巧妙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之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在他们对事实、材料和考据的鼓吹中，暗含的不过是胡适当年的话语伎俩——这一回却是用他们的所谓“科学方法”来潜在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毛泽东对当年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关于“问题和主义”，经验主义的“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世纪初论争可能有着深刻记忆，他完全有可能把当下的问题看成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世纪论争的一个延续。还有，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不能被看作关于人生追问的“人的文学”，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全面的、整体性腐败和崩溃的一个见证，这种腐败是与家族制度、官僚制度和阶级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种全面的、整体的和周期性的腐败，而用抽象的人的问题掩盖它是不奇怪的，因为毛泽东倾向于认为他们就是这种腐败的一部分。

毛泽东本人是《红楼梦》的热情读者，他不仅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看出了中国“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个根本性的治理问题，注意到在“门子”（即胥吏）的视野里，整个中国传统治理结构无非是一幅“升官图”，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士大夫阶级的思想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渗透。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并非一个“情种”或纨绔子弟，而是士大夫阶级思想的清醒的拒绝者和批判者。例如，在参加科考前，贾宝玉与薛宝钗就理学和心学进行的那场别开生面的辩论中，贾宝玉以为，所谓理学与心学的实质就是当官（功名），只有断了这样的念头，人生才会有出路。而当蓝翎、李希凡指出曹雪芹是封建士大夫阶级思想的批判者、背叛者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就是很自然的。

## 正常的学术批评与“双百方针”

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后人所阐释的“大批判”，它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遑论“迫害”。实事求是地说，1954年的《红楼梦》问题讨论应该算作新中国学术讨论的典范，它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的。比如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俞平伯先生才被增补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结尾，毛泽东还特别慎重地加上了对俞平伯“当然是要采取团结的态度”这样关键一句。

1956年科学院评选职称，周总理、胡乔木等均赞成将俞先生评为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理由就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1963年俞先生校勘的《红楼梦》发行量达14万（“毛选”当时的发行量只有5万），俞平伯所做的这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将历史上辗转传抄的《红楼梦》各种版本比对校勘，特别是将前80回从程伟元、高鹗“混编出版”的120回本中剥离出来，基本恢复了曹雪芹创作的原貌，属于名副其实的“盛世修史”。据说毛主席得知后很高兴，这表明：毛泽东反对的，不过是将考据方法用于一切，特别是分析虚构的文学人物和文学形象，但对于考据和古籍整理本身，无论毛泽东本人还是周恩来，他们从来也没有否定过这项工作的建设意义。更有趣的是，俞先生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大秀才”的康生一直是积极参与者，出钱出力，很是投入。

倒是对写出了重量级理论文章的“小人物”李希凡，毛泽东后来说了更为严厉的话。1957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文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这表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认为中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

里的核心问题是“教条主义”，是解放思想不够、争论太少的问题，是“放得不够”而不是“收”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在1962年“九评”之后，他才转向注意“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之所以批评李希凡文风的变化，并且多次点名批评陈其通、陈亚丁等4人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陈亚丁，也是著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整理者），认为这种文章是“过左”和“教条主义的大批判”，而不是学术讨论，文风很坏，并因此牵扯到《人民日报》的文风和改组问题，就是出于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感。关于学术批评，毛泽东特别强调：“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辨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1954年12月1日，北京大学由校工会（而不是党委和校行政）出面召集文科部分教师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举行座谈会，研究如何通过《红楼梦》研究在北大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的问题，就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北大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主持会议的是工会主席季羡林，党委成员并无一人参加会议，校长马寅初只是作为教授出席，而代表学校给会议定调子的是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江隆基。江隆基的讲话专门谈到了什么是“学术批判”：所谓学术批判，“不能企图开几次座谈会、写几篇表明态度的文章就能解决问题，更不能采取开斗争会，轮流检讨、过关、交代思想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进行。学术批判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科学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提高。搬用三反运动的方式或者沿袭旧社会派系斗争的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是必须注意防止的。学术批判的尺度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党员和非党员，也不是青年与老年。在学术批判中，他们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注)

今天看来，1954年有关《红楼梦》的论争当然算是严肃的理论论争，是毫无疑问的“文斗”，绝非触及灵魂与肉体的“武斗”，《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并非后人所简单理解的“大批判”和“整人”。进一步说，历史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说到在党内的“人脉”，俞先生原本也并不见得

比别人浅，论萝卜也是里面红的“心里美”（例如，胡乔木和乔冠华这“南北两乔木”都是俞先生清华时代的学生）。当然尤其不好说蓝翎、李希凡秉承“圣旨”整肃俞先生，事情全都是毛泽东事先布置下的局，事实是：毛泽东确实是偶然看到了蓝翎、李希凡的文章，赞赏之余，江青推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未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为小人物“争取言论自由”的信。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不可能公开发表，该信第一次刊发，已经是13年之后，即1967年5月27日（刊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所谓蓝翎、李希凡二人乃至北大、山大两校“响应毛主席号召”整俞先生之说，恰恰是“将学术批判理解为旧社会的派系斗争”，也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虽然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本身遵循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俞平伯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团结保护”，虽然大批旧知识分子（包括后来被奉若神明的钱钟书）依旧安然无恙地继续以他们的事实、材料和考据的整理，来暗自表达他们对“左”翼学术重视的政治和思想现象的不满，但是却引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悲剧性的后果——导致了自愿留在新中国参加建设事业的胡思杜，也就是胡适之子的自杀身亡。这是许多悲剧和严重失误中不能被忘记的一个。

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这样强调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注]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旧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在新时代“丧失了作用”，甚至包括那些对社会主义理想怀着巨大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胡思杜的自杀是一个象征。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末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学和思想史方法的下意识不满，对于材料、事实和“证据”的病态的强调，就是在那次批判胡适的科学经验主义方法时埋下了种子。它也使革命是否“威胁学术和文化建设”，成为一种不断被争论的话语实践——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无一厢情愿的答案，因

为它的答案只能在历史中寻找。

##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恰恰发生在第一部《红楼梦》评阅本出现（1754年）后的200周年，这也算是个机缘巧合。今天看来，1963年出版的俞校80回《红楼梦》使得我们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俞平伯的工作起码算是给了20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确的交代。而蓝翎、李希凡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则开启了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应该说，这些工作全都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而人类巨大的文化成就的取得，总是离不开批评和争论，进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深刻的误解、过激的争吵，一旦放开视野，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多少年来，如果我们只是对那些误解、争吵感兴趣或耿耿于怀，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将这些误解、争吵任意地夸大、炒作，那么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只能是：新中国的文化几十年来只有无聊的争吵和钩心斗角，这会掩盖许许多多通过严肃的争论才能获得的真正的成就。一部《红楼梦》，道学家只看到淫，革命党只看到了“排满”，才子们只理解为三角恋爱，那是其各自视野的局限使然。同样地，对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钩心斗角的黑幕，长了黑色的眼睛，却不能看到光明，那也只能说明自己心胸太过狭窄，心理过于阴暗。这样的历史观，往小处说是太“小家子气”，往大处说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觉得正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使得我们忘记了那固然是艰苦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但也是奋斗的年代、创业的年代、发奋图强的年代；忘记了毛泽东悲怆而激越地指出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尤其忘记了俞平伯、钱钟书等“老人家”和蓝翎、李希凡这些“小青年”都不是一小撮“精神贵族”，而是大变动的中国社会

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说他们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代表当然不合适，但是这些人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自觉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俞先生就不会在1949年所写《7月1日红旗的雨》中真诚地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是一世纪来所没有的，这是半世纪来所没有经识过的”，“迈开了第一步的万里长征”。

何况，20世纪50年代初无法在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真正展开争论的根本原因，显然并非是由于政治的压迫和干预，其根本确实在郭沫若所说的中国学术界的三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其一是“权威主义”，“对大人物不敢碰，大人物也不让人碰”；其二是“面子主义”，照顾圈子和朋友，实行“在暗默中采取了无原则的多数表决”；其三是论资排辈，不但压抑小人物，而且“无原则地压抑少数人的不同意见”。郭沫若说，这三点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潜规则”。[注]正是这种潜规则，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悲剧，郭沫若还以这样的民谚来沉痛地现身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庸人，40岁的老而不死。”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首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作为后来者，最深的感慨和教训也许有两点：一方面，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发展为“大批判”，特别是将对于经典的阐释，引向庸俗化的上层权力斗争的注脚（如“四人帮”之作为）当然是个灾难，更是必须严肃汲取的教训；另一方面，更需认识到的却是，在重大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如果没有健康的、有深度的、与现实相关的学术批评、讨论和争论，那么学术和文化不但无法发展，而且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会陷入另外一种灾难。对于重大理论课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是科学和学术发展唯一的创新机制和纠错机制。离开了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健康且深入的讨论和争论，所谓学术秩序、文化秩序、学术规范乃至“知识界”“文化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也会沦为“把头统治”的利益共同体或者“门派”（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1954年之前胡适统治的中国学术界的确就是如此。

韩愈曾经表彰孟子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

老于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如果没有两个“好辩”的“小人物”“不识好歹”地跳出来，对于胡适派的研究进行批评，以堂吉诃德状挑战大风车，那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可能至今也只有“两家”，甚至只有一家（考据派）而别无分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的其他问题，就完全抹杀当年“小人物”身上的理论勇气和民主精神，更不能因为健康的学术批判和讨论机制曾经被破坏、滥用、误用过，就反过来拒绝一切讨论和批评——如果那样，就等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我认为，后一点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尤其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今天看来，其价值起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指出《红楼梦》不是作者的“自叙传”，更不能被简约为宝、黛、钗的三角恋爱传奇。理由是：《红楼梦》是一部“多音合鸣”的巨著，它不是写了“几个人”，更不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开，而是“写了一群人”，仅主要的女主人公就有“十二钗”之多，而且，这群人几乎每个都有鲜明而不可替代的性格，都是不能替代的“这一个”，这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成就。进一步说，推动作品叙述不断展开的，也正是这种“多音合鸣”的结构，正是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的“众声”（众生）的语言和行动，而完全不是哪一条单一的线索，更不是作者头脑中固定的某一个观念——蓝翎、李希凡的文章概括说：《红楼梦》的一个基本成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超越了作者的世界观”。第二，《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这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本质化的士大夫文化、家族文化。《红楼梦》的文化成就，恰恰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有家族的，也有性别的；既有官场的，也有下层和奴仆的；既有所谓“高雅的”，也有所谓“通俗的”。更进一步说，《红楼梦》正是通过揭示不同阶层、等级、性别、语言的文化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既呈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长卷，更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流变”，这种呈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而用蓝翎、李希凡的话概括就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近代文化（是否叫封建文化可以另说）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不是单纯地“为士大夫阶级唱挽歌”，这是《红楼梦》

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注

毋庸讳言，正如冯雪峰在代表《文艺报》转载这篇文章时所写的按语中所说，蓝翎、李希凡的文章“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定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要求两个青年大学生的文章“十全十美”，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就是鲁迅所讽刺的“倘不是天才，干脆就不要出生”吗？

## 1958—1976年：包围与突围

1958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十九大做“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携手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怎样和平共处这个问题。

对于刚刚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来说，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极为渺茫。而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赫鲁晓夫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实际上就是要牺牲中国的利益，苏联希望站在中国的肩膀上，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实现媾和。

赫鲁晓夫要抛弃中国，但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抛弃列宁，即抛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自1959年起，中苏两党围绕着“列宁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对于中共来说，就是要在这场极为不利的国际秩序博弈中占住“理”。

而代表中共与苏联“说理”的人，就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推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严格地说，“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中苏论战中形成的。

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并强迫中国立即偿还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务，同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而苏联则开始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

在中国人民终于把帝国主义从中国大陆赶走之后，自1960年起，新中国陷入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严密包围之中，而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把灭亡新中国作为其首要战略目标。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包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首先是空前形势“倒逼”的结果，而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同志便率领我们的党和人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开始了又一次彪炳人类史册的“大突围”。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批革命者，曾经面对过像长征这样的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空前强大的敌人，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恶劣的生存境遇——如果有，那就是自195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面对国际包围所进行的又一场空前的突围、又一次残酷的长征。

对于今天的后来者——我们而言，世界上的道理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包围，何来突围？没有突围的流血牺牲，何来平白无故的“入围”？

对于新中国前30年的功过是非，不能离开最基本的国际条件去评价。

面对中国人“那样一种被人家看不起的局面”，毛泽东曾经说：“封

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什么东西都有了。”而在当时，他如果不这样说，又能怎样说呢？

1971年，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穷兵黩武的彻底失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随着“二战”后最剧烈的经济危机降临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随着苏美两霸战争冒险的失败，随着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建立，随着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对于中国道路的认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方才不得不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毛泽东的中国伸出了和平的手掌。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新中国开始的另外一场长征，同样是一条血路杀出重围。

其中，当然有错误、有失误、有残酷的牺牲，正如当年的苏区、当年的长征有教条主义、有“左”倾路线，有肃反的扩大化。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打破封锁，绝不是外国人的恩赐，正如当年长征的胜利，不是蒋介石和统治阶级“发了善心”，放了我们一条活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30年来勒紧腰带，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换来的，是18万志愿军烈士的血换来的，为了这一天，毛泽东同志与许许多多中国父母一样，牺牲了他亲爱的儿子毛岸英。

据说，当得知毛岸英战死的消息后，连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为之罢食、落泪。

正是因此，尼克松总统方才由衷地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而我们今天的某些不肖子孙，他们的觉悟和胸怀，还不如蒋介石和

尼克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辉煌，也有苦难。我们没有否认毛泽东同志在探索这条道路的时候，犯过错误。

但是，正像不能离开错误讲成就，离开苦难讲辉煌一样，我们更不能离开了包围讲突围，绝不能离开了突围谈“入围”。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就等于既否定了历史上的长征，也否定了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新长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

1.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2. Foucault M (1984a), The Foucault Reader.Harmondworth: Penguin Books.
3.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4. 参见毛泽东于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5. 毛泽东多次承认自己不是艺术方面的专家，而是“门外汉”。不仅仅1942年在延安这样讲过，1950年，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高庄否定了政协已经通过的国徽方案，并且写信给毛泽东说：“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则欣然接受了高庄的国徽设计方案。
6. 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以其为基础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地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 中国史通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 毛泽东.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M].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参见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华北农村乡绅地主角色变迁的形象教材。
10. 毛泽东. 寻乌调查[M]//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1.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5.
12. 参见黄宗智所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13. 这里指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以土地、劳力入股的方式巩固集体经济的举措和引发的争论。详见杜润生.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4. 赵树理. 赵树理文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4.
15. 实际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其党内战友的最激烈的否定和批评就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
16.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7.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武训历史调查记》由《人民日报》于1951年7月23—28日连载，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
19. 赵树理. 赵树理文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6.
20. 马社香.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56.
21.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的相关论述。
22.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N]. 人民日报：1951–5–20.
23. 内藤湖南. 中国史通论（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56.
24. 余英时.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M]. 上海：三联书店，1997.
25. 郭沫若. 三点建议[N]. 人民日报：1954–12–9.
26.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0.
27. 张中行. 负暄琐话[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00：34.
28. 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419页。
29.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236.
30. 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 上海：三联书店，1985.

31. 王学珍等.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38.
33. 郭沫若. 三点意见[N]. 人民日报：1954–12–9.
34. 李希凡，蓝翎.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J]. 文艺报：1954（18）.